TUULEN PUOLELLA

[芬兰]蕾娜·莱道拉宁 著

奚梅芳 译



顺风

四川文艺出版社

芬兰当代长篇小说首次登陆中国

这是一部洋溢着美文气韵和欧洲精神的小说。

“尤哈·麦瑞瓦拉命案”

只是牵引读者徜徉于北欧大陆的航标，

在整个案件的侦破过程中，

读者会随着情节的发展，

一步步走近芬兰这个美丽遥远的国度及其

善良朴实的民众。

——编辑荐书

Tuulen Puolella

蕾娜·莱道拉宁很注重自己的风格，

并能不断地创新。

玛丽娅·加里奥确实是一个新型的侦探典范。

她既非那种冷漠无情的侦探形象，

也不是那种传统的毫无性感可言的老阿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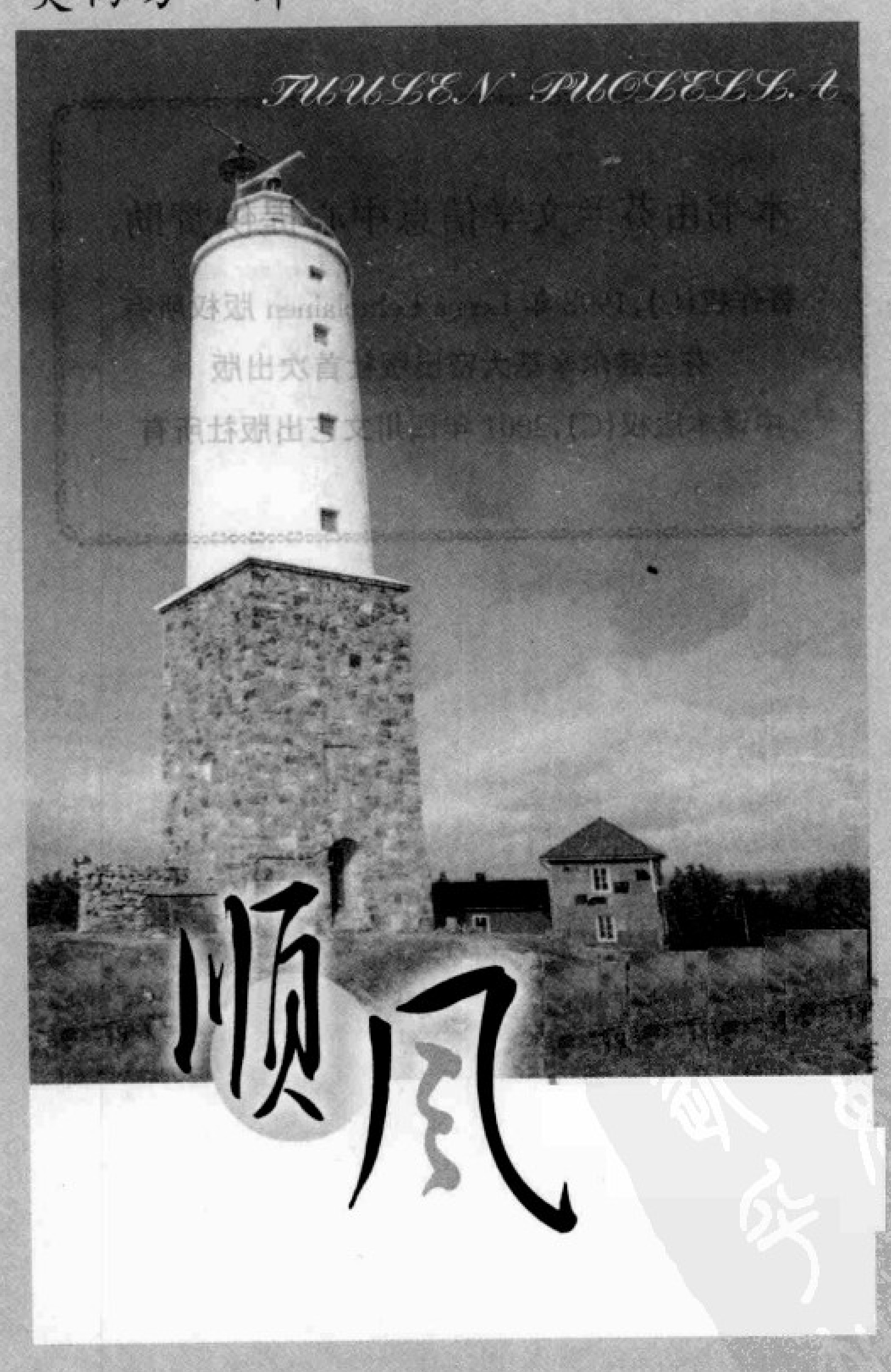
她是一个很完美的女性。

——杜莱威·奥瓦斯加［芬兰］



ISBN 7-5411-2081-2/I·1789
定价：20.00元

[芬兰]蕾娜·莱道拉宁　著
奚梅芳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顺风/（芬兰）蕾娜·莱道拉宁(Leena Lehtolainen)著；奚梅芳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3

书名原文：Tuulen Puolella

ISBN 7－5411－2081－2

Ⅰ.顺… Ⅱ.①蕾…②奚… Ⅲ.长篇小说－芬兰－现代 Ⅳ.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8639 号

图进字 21－2002－001 号

策　　划：杨希贵
责任编辑：杨　枫　冯　文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邓小林
责任印制：黄　迅
责任校对：韩　华等

顺　风

[芬兰]蕾娜·莱道拉宁　著
奚梅芳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电子信箱　scwys@mail.sc.cninfo.net
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锦祝印务所印刷
字数 245 千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125
2002 年 8 月第一版　　200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411－2081－2/I·1789
定价：20.00 元

1

从海底升起的岛屿是红褐色的，好像这些岩石都在血中浸染过似的。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化瓦解，这些石头渐渐地有了形状。最早在瑞兹盖尔岛上建起了圆柱形的灯塔，后来在克烈密战争时期盖起了城堡。瑞兹盖尔岛位于埃司堡[①] 南边最尽头的一个岛，再往前就是海岸线了。十多年前，那里还是禁区，公民是不准入内的。在海上航行，老远就能看见那里的告示："禁止通行，驻军重地"。

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也是我休假期间的最后一个周末。之后，我就要结束妈妈假[②]，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我要接受一个新的职务：埃司堡警察局暴行侦缉科科长。

那个周末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好天气。我们驾驶帆船，从达毕奥拉航海到英高去拜访公公婆婆。依旦很适应航行，十一个月大的孩子了，白天仍然要睡两次觉。睡觉醒来，她就喜欢坐在安全椅里。她最高兴的是在甲板上又喊又叫地逗海鸥玩儿。安迪正在查看航海线路图，我则舒舒服服地靠在他的背后悠哉游哉。我虽然生长在内地，可我非常喜欢大海。我当然知道它有多么危险——随时都可能遭遇不测风云。

---

①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卫星城。现在该城高科技发展迅速。
② 产后十个月。

“我记得码头是在岛的东北角上。再转过去一点，剩下的那点距离启动马达，因为瑞兹盖尔岛这地方船不容易靠岸。”安迪说。

“那里可以上去吗?”

“可以。八年前进入那里就已经是合法的了。你不记得了吗?麦瑞瓦拉公司在前年夏天买下了这座岛，使得这座荒凉的岛屿已经有了人迹与生气。”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两年前国防部的驻军从这座旧城堡里撤走时，他们寻找租赁这座岛的人，并要求租赁者负责修复那些年久失修的房子。当时有一伙手工艺匠人对这座岛很感兴趣，并上岛进行了考察。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环保先进单位、生产船漆的麦瑞瓦拉公司，在租赁的谈判桌上甩出了购买整座岛屿的意向书，国防部没有拒绝，这笔生意就成交了。这件事在航海员圈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同年夏天，麦瑞瓦拉公司公开声明：我们不但不会关闭岛屿，而且希望所有的航海员光临此地。

我也确实想看看瑞兹盖尔岛。安迪曾经给我看过他航海旅行时在那座岛上拍的照片。埃司堡的地方报纸也称赞这座荒凉的岛屿被改造得非常美丽。但我此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想亲眼看看哈瑞去世的地方。

我和鸟类学家哈瑞同居过几个月，但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去年十月，也就是依旦出生后两个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他的讣告。讣告中没有提及死因，也没有说什么突发病或车祸，惟一说到的是他死的地方，在埃司堡瑞兹盖尔岛上。哈瑞已经在那里安息了。

这件事情一直缠绕着我。哈瑞不会是自杀吧?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因为我们的活动范围完全不同。在我们的同居生活结束后，彼此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们是在气头上分手的。

哈瑞的理想是成为一名鸟类学家和植物学家。在我们同居期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认识鸟和花。但我们两人的性格不适合在一起。哈瑞太老实、太懦弱，喜欢整天呆在森林里与鸟为伴。我的性格又太奔放、太好动。我在读法律系二年级的时候，仍然热衷于舞会；可我那乱踩乱踏的舞步，常使男舞伴们无法忍受。我还有喝酒的嗜好，经常一喝多了，就感到昏头昏脑，以至不能陪他一起到森林中去消磨时光。再说，我也没有那个耐心，连续几个小时举着望远镜看鸟；举起身边的啤酒瓶对着嘴吹喇叭，倒是可以。所以，当我们俩协商解除同居合约时，两人都像卸了重负似地感到轻松愉快。

就在看到讣告的那天晚上，我翻出了一本旧影集，找到了两张哈瑞的照片。一张是瘦高的他，戴着一副圆形镜片的眼镜，正在勃勒加拉半岛上支一顶帐篷；另一张照片是他正在用望远镜看一大群鸟。我感到很好笑：从照片上看，我爱的是一个幼稚的男孩，可现实生活中，伴随在身边的却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唉，为什么生活要把哈瑞的死带到这么远的旧城堡岛上？那则讣告的最后说他没有家庭，甚至连个固定的女朋友也没有。我想给哈瑞的姐姐打个电话，询问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我不好意思，因为莎瑞不是特别喜欢我。她是一个古板的人，对她弟弟也不怎么好。

凡是在埃司堡境内发生的死因不明的案子和自杀案子的卷宗，都要送到我们科里来，也就是我休完妈妈假，要去出任科长的那个科。我给我的老搭档高依吾打了个电话——兴许他知道一些有关哈瑞死的情况。

“哈瑞·依冒宁？我还记得。他是溺死的。等一下，我找一下当时的案情记录。”高依吾说。在此之前，他曾告诉过我一些局里的最新的小道消息。“这案子发生在三个星期前，那时正值秋

季的暴风雨时节。依冒宁可能是到瑞兹盖尔岛上去观察鸟群南迁的情况。破晓时分，他走到西海岸，踩在苔藓上不慎滑倒，他的头被尖锐的石头磕破了。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倒在水中失去了知觉。他的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是千分之零点六，看来依冒宁在前一天晚上喝了一瓶红葡萄酒。他是一个人去岛上，第二天才偶尔被上岛的人发现的。来岛上的正是买下这座岛的公司老板，他最先发现夜宿屋[①] 里有睡袋和其他的旅行用品时，就感到很奇怪。”

“这就确定是意外事故了吗?”

“我亲自去了现场，岛的西海岸非常陡峭。你知道，被雨水打湿了的岩石是很滑的。技术鉴定员提出了这样的假设：依冒宁的高倍望远镜从三角架上掉下来，他去接时没留神，脚下一滑就摔倒了。嗳，你为什么问这些？你认识他吗?”

“认识。但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了。”

那段时间，正是我休妈妈假的头两个月，只要一想起哈瑞的死，我就心烦意乱；还经常半夜从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圣诞节来临，才开始好转。哈瑞在我的记忆中渐渐地远去了。

在我们航海前，查看航海线路图确定航行线路时，我就建议到瑞兹盖尔岛上停留一下，我想亲眼看一看我以前的男朋友去世的地方。

海水是灰绿色的，就像被污染了的豌豆汤似的。动身前的那天晚上，我们花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寻找没被海藻覆盖的地方停船登陆。我们不打算游泳，主要是担心储存箱内的淡水不一定够洗餐具和依旦的屁股。安迪曾经心有余悸地回忆他年轻时用清澈的

① 在芬兰，人迹罕至的地方都有一间空房子，供过路的人休息或过夜用。

海水煮土豆的事。今年夏天特别地热，所以海藻长满了沿岸的大部分水面，甚至连埃司堡的海滨游泳场都有。人们在酷暑里都喜欢以游泳和喝啤酒来解热。

离海岸还有半公里的时候，我们就降下了帆。我无法区分那些险峻的峭壁和岸边水域中间露出的半截岩石，到底哪里是安全的登陆地点。安迪说，他知道哪里可以登陆。最后一段行程，我们启动了马达，帆船"噗突噗突"地迎着东南风前进。由于风吹得猛，我们的船差点撞到岩石上去。安迪沉着地把船驾到岛的东海岸，在岩石的后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小码头。依旦正在吃饼干，我抓起缆绳，做好了跳到码头站台上去的准备。这时，从岸边的岩石上传来了喊声：

"把缆绳扔过来!"

我抬头看见岸上站着一个健壮的男人，嘴里叼着一个烟头。

"现在刮的是东南风，把船头的缆绳拴在这里，把船尾的缆绳拴在站台上，撞击就会少一些。"

我把一捆缆绳扔给他，他轻而易举地接住了，然后他大声地指导着登陆的要领。一群海燕在我们的头顶上空自由自在地飞翔，我抬头仰望海燕，阳光直直地刺入我的眼睛。岩石散发着酷热难耐的高温。

"玛丽娅，你先上岸，我抱依旦。"

我们的接待员忙着检查我们的船尾缆绳拴得结实不结实，与此同时，我则站在船沿上，估计着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能力跳到陡峭的岩石上去。他可能猜到了我的疑虑，在我起跳之前，他已走上了陡峭的岩石，准备保护我。着地时，我感到脚下的土地很硬，碧绿的地衣散发出阵阵清香。我们从船上搬下随身物品没有费多大工夫，因为还不知道夜里是歇在船上，还是歇在岛上的夜宿屋里。这个船码头正好在风口上，可想而知，夜里睡在船上一

定会像睡在摇篮里一样。在这码头上，除了停泊着我们的以沙盖拉·玛丽娅命名的帆船外，还有另外两艘船。一艘是豪华的游艇，它的缆绳在拴船柱上缠了好几圈，牢牢地固定在船台的西南角上。另一艘是十米长的木制帆船，非常漂亮。我顾不上停下来欣赏这艘木船，因为我注意到在岩石的后面，有一撮时隐时现的会移动的绿草。等它慢慢地升起来时，我才看清楚那是一个染了绿色头发的小伙子的脑袋。他上身穿着一件草绿色的野战军服式样的长外套，下身穿着一条又肥又大的野战军式的裤子。他不说话，只是用警惕的目光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然后拔腿就往回跑。他脚上穿了一双红色的软底网球鞋。

安迪把依旦放进婴儿提篮里，我们一起沿着陡峭的斜坡往上走。在海上，我一直看不清楚这座旧城堡的构造，因为总有这样那样的障碍物遮挡视线。现在这座城堡的建筑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三米高的城墙上筑有射击孔，有棱有角的“U”字形的两层楼房，楼房的中间筑有圆柱形的灯塔。楼房的南面和西面有小块的草坪，还有几株在风中摇曳的桧柏。背阳的一面，也就是北面，有几棵桦树，叶子正在风中窸窣作响。树基底部的四周，长着抗寒的野萝卜花，这时还开放着最后一些小白花。蒲公英的花已变成了一朵朵的小绒球，使人想起一颗颗的冰糖葫芦来。

当我们刚刚跨进城堡敞开着的大门时，迎面走出来一个娇小玲珑的黄头发女人，她的皮肤被太阳晒成了深棕色：

“欢迎光临瑞兹盖尔岛！你们打算在这里过夜吗？”

安迪点头称是。女人走近来，伸出瘦小的手与我们相握，说：

“安奈·麦瑞瓦拉。夜宿屋里还有一间空房，我们有五个人在这里。桑拿浴已经准备好了。”

这女人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岛上的主人似的，事实上她就是。安奈·麦瑞瓦拉是麦瑞瓦拉公司的股东之一，是总经理尤哈·麦瑞

瓦拉的妻子。我们也向她作了自我介绍。当安迪说到以前来过瑞兹盖尔岛时，安奈·麦瑞瓦拉变得更加热情了。她带领我们走进城堡，边走边向我们介绍，好像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导游似的。夜宿屋里的木质地板，散发着熠熠光泽。内墙也是木板的，虽然年代已久，但看上去还不错。

“这里是厨房，有普通的液化气灶和电冰箱。这里还有饭厅。”

卧室里有两张看起来很简易的双层木床，可我深信它们的造价十分昂贵，因为这是匠人的手工活。室内还有一张漆成蓝色的木桌、两把椅子和海员用的木箱子。从小小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海平线。

安迪从背上放下依旦，又返回船上去取睡袋和晚餐的用具。我站在窗前向外张望，这是多么迷人的景色啊！夕阳把岩石映成了玫瑰红色，海面闪烁着无数面小光镜，折射的阳光直刺我的眼睛。依旦扯乱了我的头发，挡住了半边视线。我希望安迪不要忘记带上一瓶威士忌。在这岛上过夜，“拉夫劳爱加”① 是最能令人心境愉快的了。

晚餐已经在厨房里准备好了。在船上吃了两顿饭后，感到这顿丰盛的晚餐就像节日的盛宴一样：不仅有土豆、鱼、炒猪肝，还有熏比目鱼、沙拉、面包和奶酪。

依旦喜欢吃芥子酱鱼，我喂了她一块，她还要第二块。随后她又吃了两个土豆、几块炒猪肝，在喝了一杯牛奶后，她的头终于像鸡啄米似的抬不起来了。依旦瞌睡了。正在这个时候，那个绿头发、妖怪似的小伙子走了进来，依旦的精神突然又振作起来了。

---

① 酒名。

“母亲吩咐我来问你们洗不洗桑拿浴。芮佳和达甫沙愿意替你们照看孩子。”小伙子很粗鲁地说道。

“谢谢。我们等依旦睡觉后再去。”安迪对小伙子说。他肯定就是小麦瑞瓦拉了。他敞着衣襟，衣服的下摆在瘦麻秆似的身体两侧随意晃动；脸上仍还透着孩子般的稚气，但声音已变成了男人的声音。我估计他的年龄大约在十六岁左右。他没有进行自我介绍，只管打开冰箱，取出一瓶东西，看上去像是家庭自制的甜酒。他接着说：

“母亲现在正在洗桑拿浴，接下来轮到芮佳和达甫沙。如果你们的孩子睡着了，你们可以排在我和米盖的前面。”

安迪去哄依旦睡觉了。我喝干了啤酒瓶，开始收拾厨房。按照不同的垃圾分类收集的要求，厨房里放有五个不同的垃圾桶：会腐烂的有机物、易燃物、硬纸盒、玻璃制品和空罐头，这就要求我要仔细认真地对号入座。我正在洗碗的时候，背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嗨！我是芮佳·麦瑞瓦拉。你们愿意我来照看一下你们的孩子吗？”

我转过身来，看见一位婷婷玉立的高个子姑娘，大约二十岁。她微笑的表情和她的妈妈一模一样。芮佳的头发是棕色的，剪成短短的青年头，两颊显得有点苍白，这也像她的妈妈，就是接待我们的女主人。我向她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同她握手，她的手又短又凉。

“依旦睡觉不需要人照看的。不过，如果有人在这里看着点，那会更好。”我说。

“现在轮到我和达甫沙去洗桑拿浴，等我们洗完，我来叫你们。”

麦瑞瓦拉家的女性和那个绿头发的小伙子，在接人待物方面

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我想，刚才帮我们拴缆绳的那个男人，也许就是达甫沙。如果达甫沙和芮佳一起洗桑拿浴，那他肯定就是这姑娘的男朋友了。这样看来，那位女主人可能会挑剔这位上门女婿的年龄大了些——他可能和我的年龄差不多。

安迪还在给依旦哼催眠曲。我在杯子里倒了两指深的威士忌酒，然后端上酒杯走出去。海风吹乱了我的头发。岛的东面，海浪汹涌澎湃。我凭着直觉，顺风走向西海岸的峭壁。克烈密战争时期，枪林弹雨射在城墙上，使城墙倒塌了一个豁口——哈瑞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

八月的傍晚，站在炎热的阳光下，很难想像在那个十月的阴雨连绵的雨天的破晓时分，正好有一群大雁呱呱叫着飞过岛的上空的景象。还有一点比较难以令人相信的是：直到第二天早晨，哈瑞的血液里仍还能测试出酒精的浓度。在我们同居的时候，哈瑞很少喝酒，最多不过两小杯红葡萄酒。唉，看来人是很容易改变生活方式的。我想站到悬崖的边缘上去，亲自体验一下走过那里滑倒的滋味。但是，从五米高的地方掉下去，准保会没命的。所以，最好还是坐下。

我蹲在悬崖的边缘上，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观赏在金色的海面上跳跃着的太阳。我陷入沉思中。突然，我听见背后有脚步声。我满心希望来的是安迪，可转身一看，站在我背后的却是帮我们拴缆绳的那个人。

“我不想强迫你离开这里，可在这悬崖上一定要加倍小心。”这人说话时瞥了一眼我手中的酒杯。

“这是第一次，”我不耐烦地说，“我不喜欢受到监视。”

“既然这样，那我就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了。我不善于表白自己。我叫米盖·休白格。”

“玛丽娅·加里奥。”

休白格长时间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脸上的表情像风云突变的天气，麦茬似的头发被太阳烤得几乎成了白色，眉毛和眼睫毛也都是同样的颜色。我毫无顾忌地举起酒杯喝了一口，休白格皱了一下眉，然后毫不犹豫地拿过我的酒杯也喝了一大口。

“心情不好？有什么烦心事吗？”

我点点头。休白格在我身旁的岩石上坐下。我们俩谁也不说话，只是看着太阳从海平线上一点一点地落下去，默默地喝着杯子里的威士忌。当我们喝干最后一滴酒的时候，看见岩壁上映出了一个又长又窄的人影，是安迪来了。

“依旦睡着前，我躺在她旁边陪她睡了一会儿。马上就要轮到我们洗桑拿浴了。”他说。接着他向休白格作了自我介绍。当休白格说出自己的名字时，安迪的脸上流露出似曾相识的表情：

“米盖·休白格！航行全世界的航海家！您好！刚才上岸的时候，我就觉得您面熟。您还记得吗？在 1981 年，我们一帮年轻人曾驾驶斯库纳帆船阿斯曲第号从高特加航行到汉高。”

米盖表示还记得这么回事。于是他俩就开始交流起航海经验来了。我坐在那里，时而观赏平静的大海，时而观赏暮色中的城堡。凉爽的晚风吹拂着我的脸颊。一小时后，安奈·麦瑞瓦拉过来说桑拿浴室已经空出来了。在威士忌的作用下，我的体温升高，通体都感到舒服。我在怀孕期间滴酒未沾，又恰逢现在哈瑞的死因不明，这始终是个谜，使我百思不解，这都使得我的酒量减小了。今天可能是夏天最后一个炎热的傍晚了，也是少有的一次机会，能和安迪一起悠悠闲闲地洗桑拿浴。这里有毛遂自荐的“保育员”照看熟睡的依旦。

桑拿浴室的窗户朝西面开着，从窗口望出去，只能看见一派荒凉的景色：燕鸥在空中比翼双飞，小鱼在海里欲跳龙门。安迪的皮肤上渗出了小汗珠，我尝了一下，有点涩，还有点咸，这种

怪味沾在我的嘴唇上去不掉……我们在桑拿浴室里追寻各自的爱的回忆：曾经和别的什么人一起洗过桑拿浴。回忆结束后，我走出去，扑通一声跳进海里去游泳。这是北面的一个小海湾，汹涌的海浪在这里得到缓冲。海里的水草，搔得我的肚皮痒酥酥的。东北风从海面吹来，已经有了凉意，使人感到了秋天的气息。当我们从桑拿浴室出来时，黑色的天幕上闪烁着第一颗星星。

绿头发的小伙子正坐在城堡的院子里，像是在等待什么。一看见我们从桑拿浴室里出来，他就开始大声地喊米盖，然后跑过来对我们说：

“今天夜里可能会很闷热。其他的人都坐在灯塔下面吃烧烤，欢迎你们也来参加。”

“我去拿威士忌，顺便看一下依旦。”安迪说。他很会照顾孩子，我可不愿意成天围着孩子转。我在妈妈假期间已经带怕了孩子，那时，我真正感受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孤独无助：我们住在埃司堡汉达地区的一幢年久失修的花园洋房里，离公共汽车站很远，这就像所有的朋友都离我很远一样。在这种闭塞的地方，如果没有电话，没有好书，没有两个孩子在身边围着转，这样的生活是很难想像的。然而我还是在这种地方度过了全部的妈妈假。这是我自高中一年级休完整个暑假后的又一次长假。除此之外，我打过无数次短工，这期间曾有过短暂的失业间隙的休假。在休妈妈假期间，我利用冬天的时间，快速阅读了许多惊心动魄的书籍。此外，我要带依旦出去散步，还要学钢琴。我姐姐来拿走了我当时的几张照片，说是为安排“妈妈假的娱乐”广告之需要。有时，我确实感到与人交往太少不是好事情，甚至很糟糕。偶尔性格孤僻的老同事贝蒂·斯切姆给我打电话——一般都是谈工作的事情——我都会感到很高兴。

瑞兹盖尔岛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岛，与该岛的主人们结识很值

得。米盖·休白格属于特别令人感兴趣的那种类型的人。我和陌生人坐在一起，感到有点拘束，只是在那里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威士忌，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些日常琐碎。由于我长时间地呆在家里，所以不曾遇到过什么美男子，从睡梦中把我唤醒调情取乐。

麦瑞瓦拉家的母女都坐在烤炉的旁边。我们虽然吃过晚饭没有几个小时，可是那些素烤对我的吸引力还是很大。依旦可以到第二天早晨都不再吃什么了，我可不一样，我消耗的热量要比一般人大，因为我的活动量大。生完孩子后几个星期，我就开始跑步和到健身房去锻炼——为了恢复体形。锻炼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跑步也就成了我不呆在家里的正当理由。等回到工作岗位后，如果有时候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这种可能性就少而又少了。

安奈·麦瑞瓦拉挪动了一下身子，在长凳上腾出一个空位来，让我坐在她的旁边。安迪边走边摇晃着手里的威士忌酒瓶。和他并排走来的是一个中等个子、肩膀很宽的黄头发男人。那人径直向我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

“达毕奥·浩勒玛。您好！您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

我为自己的误会感到好笑。我错认为米盖·休白格是芮佳的男朋友，还觉得年龄大了些，可达毕奥·浩勒玛至少有四十岁。我不由自主地马上把他同深蓝色的缎带[1] 和花边衣领联想在一起。几年前，在沙沃林那[2] 的歌剧联欢会上，我看过达毕奥·浩勒玛扮演的歌剧《道·卡劳克圣·尧屈高》中的包沙侯爵，他当时穿着十六世纪的服装，戴着宽而硬的绉领，扮演一个英雄形象。正当我沉浸在回忆中，安迪往我的酒杯里又倒了威士忌，众人都纷纷地把粉肠放到烤炉上去。但我们的民族歌星、男中音浩勒玛

---

① 芬兰的男歌唱家在参加较隆重的演出时，腰间要系一条深蓝色的宽缎带。
② 地名。

不做这样的事。他脚上穿了一双淡灰色的皱纹胶底鞋，是包沙侯爵时代的鞋样款式。这种土里土气的鞋曾经使道诺·巴劳[1] 大损魅力。我曾警告过安迪，如果他固执己见错误地买了这样的鞋，我就坚决和他离婚。

“由于工作关系，我在德国住了十来年。那里也有优质猪肉肠，可是我有时还是想念豪高[2] 的蓝色商标的粉肠。”达甫沙[3]说道，“这个以素食为主的家庭，不会对这些粉肠有太高的评价。”芮佳扮了个怪相，但从表情上可以看出，她是持赞同观点的。浩勒玛在她身边坐下，伸手搂住姑娘，显出非常恩爱的样子。我注意到安奈·麦瑞瓦拉把头扭过去看别的地方了，就趁机向她询问起岛史来。

“瑞兹盖尔岛上的城堡建于1813年，也就是芬兰被沙俄统治后不久。那时候这个岛既是海上公安，又是海军基地。克烈密战争期间，有一些残兵败将来到岛上，后来民族战争时期又来了一些。直到前苏联租赁了勃勒加拉，国防部驻军才被迫撤离岛屿，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起，俄罗斯部队就进驻瑞兹盖尔岛。1956年，国防部收复了岛屿，但不再使用，而被列为禁地。”

“岛子没有人看管，”安迪回忆说，“我第一次登上这个岛是在十二年前。那时我们都心惊胆战地怕后脑勺上挨枪子，可是没有，这里除了海燕，什么都没有。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是个鬼岛。你们知道吗？传说这里有一个俄罗斯军官的幽灵经常出现。”

没有人回答。安奈·麦瑞瓦拉转换了话题：

“烧烤都已经熟了，吃吧。米盖说要吃什么？”

“米盖要粉肠和土豆沙拉。”达毕奥·浩勒玛微笑着对我们说，

---

① 芬兰最著名的男演员。

② 芬兰的肉联厂。

③ 达毕奥的爱称。

"你们也来尝一点，还是全吃素菜?"

我们说，我们还是喝威士忌。我们请他们也喝点威士忌。浩勒玛在接受我们的威士忌之前，犹豫地看了芮佳一眼。我开始对他们的关系感兴趣了。达毕奥·浩勒玛的年龄和芮佳父亲的年龄差不多。

"是饭吗?"伊瑞那绿色的头发，在洗完桑拿浴后都湿了，看起来就像城堡后面草坪的颜色一样。米盖·休白格走在后面，手里拿着酒瓶和酒杯。麦瑞瓦拉家的母女都喝葡萄酒，男士们则喝啤酒。只有伊瑞满意地呷着自制的饮料，那是一种绿色的液体。安迪和米盖谈论着航海的事情，芮佳很礼貌地向我询问一些依旦的情况，好像这是她惟一感兴趣的事情。要是有人和伊瑞说话，他总是用简单的单音节词作回答。

夜已深了。满天的星星看起来显得很低，似乎站在灯塔的顶上就能够着似的。达毕奥·浩勒玛教芮佳认星星的名称。我在旁边听着，也偷着学。我感到自己的心情还是那样压抑和忧伤。现在好像只有埃司堡的大陆是确实存在的，其他一切都已虚无缥缈：我已经不在汉达的家里，不必再为日常的琐碎事情而奔忙。我现在不是埃司堡的警察，不必为星期一去上班而操心。现在只有大海、星星和睡梦中的依旦，还有我们这七个人。我们分享了烧烤后，烤炉里的火焰仍然像篝火一样在蹿跃，我的威士忌酒杯都被烤热了。远处传来鸟鸣声，我不知道是燕鸥还是海鸥，我就请教达毕奥——或者叫达甫沙，他要求别人都叫他达甫沙——他是鸟类爱好者。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瑞兹盖尔岛的鸟类上去了。我又喝了一杯威士忌，但我还不至于胡说八道：

"去年秋天在这里死了一个鸟类学家，他叫哈瑞·依冒宁，我认识他。你们中间有谁知道真实的情况吗?"

我没有料到随即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伊瑞"唰"地站起

来，朝码头的方向走去。安奈·麦瑞瓦拉的酒杯“当”地一声碰在石凳上。达甫沙两手紧紧地搂住芮佳。米盖拿着烟斗的手微微发颤，接着他回答说：

“啊，你认识哈瑞·依冒宁，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是尤哈和安奈发现他的。他们偶尔到这里来，对夜宿屋里怎么会有东西感到非常奇怪。他们谁也不知道，是我把哈瑞带到这里来的。”

“他在岸边的水里顺风漂荡。”安奈·麦瑞瓦拉补充道。接着，她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要去睡觉了。祝大家晚安！”

安奈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很客气的，但我已经感觉到，我的提问搅乱了气氛。当安奈的身影消失后，她的声音仍在我的耳际回响。米盖明哲保身地说：

“发现尸体，这对安奈来说是一次严重的精神打击。当时安奈颤抖不止，幸亏尤哈在她身边。”

“现在只要谈到死亡，妈妈就会歇斯底里发作。我总是劝导她：那是生命循序的客观规律。”芮佳表达了一个二十岁年轻人的自信。

“哈瑞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达甫沙底气不足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认识芮佳已经是今年开春了。但从安奈的言谈中我感觉到，这确实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

米盖接着说道，从去年夏天开始，哈瑞大部分时间住在瑞兹盖尔岛上。因为麦瑞瓦拉公司雇他绘制岛上的鸟类分布图——公司买下这座岛时，还包括附近的一些水域，在北面的水域中，分布着一些徙鸟喜欢栖息的小岛。如果岛上能飞来足够多的珍稀鸟类，尤哈·麦瑞瓦拉就计划申请自然保护区。

“哈瑞非常迷恋这座岛，因为在这里，他可以一人独处。他喜欢鸟胜于喜欢人。这样的性格中具有很多的逻辑学。”米盖吸了一口烟斗。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下似地隐隐作痛。我悔恨自

己怎么这么糊涂，从没有想到去了解哈瑞的性格。不管怎么说，这些年我或多或少也学到了一些处事哲学，知道夸夸其谈的人最终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

“你对哈瑞很了解吗？”我问米盖。

“他曾几次乘我的船去高特拉尼和黑德麻，有时候时间不凑巧，就会错过看到有趣的鸟。”米盖得意地说。笑容使他的眼角边生出了扇形的皱纹。

“你们和哈瑞很熟吗？”米盖敏捷地举杯喝了一大口，他似乎和我一样，也有喝威士忌的嗜好。

“我不认识他。玛丽娅认识。他们还有一段罗曼史呢。”

我对安迪的评价一直不错，他这个人不是吃醋一类的男人。他和男伴儿一起喝了酒以后也不惹是非，从来也不和朋友翻脸。现在他阴阳怪气地来了一句“还有一段罗曼史呢”，听起来是多么的刺耳啊！为什么要让米盖·休白格认为我的男人是“气管炎”(妻管严)？我可不愿意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米盖又喝了一大口，然后眼睛直视前方：

“啊！是玛丽娅……是的，哈瑞有时提起你。你是警察。”

我点头承认。我从不觉得自己的职业丢人。我在审理案件时是铁面无私的。有些喜欢泡吧的朋友，只要听到我的职业，就会闻风丧胆；更有人甚至会惊慌失措地掐灭正在抽的烟头，乖乖地等着我掏出手铐来。

“警察调查了哈瑞死亡的原因，结论是意外事故，这已经没有什么含糊不清的地方了。”米盖说着，伸过他的酒杯亮给我看，那意思是他喝“拉夫劳爱加”，也和喝啤酒一样。

“为哈瑞干杯！”我举起酒杯说。我知道这是一种可笑的伤感情调，可我控制不住自己。我的嗓子眼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堵着，我又喝了一大口酒，想把它冲下去。

“他是在我们今天坐过的那个大豁口滑倒的吗?”我一边问，一边往米盖的酒杯里倒了小半杯酒。他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我闻到了从烟斗里飘散出来的烟草味儿和从大海里蒸发出来的海水的香味儿。

“所以在那岩石上我已告诫过你。我不忌讳去那里，但那个地方确实有点邪乎。”

南面远远的海面上有一艘大货轮，只能从船头和船尾的灯光可以判断出它正在继续向远方驶去。

当安迪站起来的时候，他的头发在夜风中纹丝不乱。

“我去撒泡尿，顺便看一下依旦。你不要把威士忌全喝完了。”

灯塔的光柱扫射在海面上，烤炉里的火苗已经奄奄一息了，米盖烟斗里的火星也渐渐熄灭了。整个城堡就好像潜伏在我们后面。我猛一转身，不禁被那些大团大团的黑影吓了一跳。这些黑影的周围有许多蝙蝠在飞翔。我极想知道这个男人的一切，他就坐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和我一起分享着八月的夜晚。安迪称他为航行全世界的航海家。他到底是什么人?多大年纪?除了航海之外，他还干些什么?这些问题在脑海中产生，就像审问案子的初始程序一样:姓名、身份证号码、职业。我想向米盖提这些问题，可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因为我自己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找到答案:为什么这个该死的男人对我也这么感兴趣?

米盖很安静地坐在那里，我也不像往常那样喋喋不休——这种假模假样是很容易伪装的。安迪回来后，他们又开始高谈阔论航海的经验了。安迪的青春年华一半是在海上度过的，可是比起米盖来，他只能算是一个纯粹的业余爱好者。米盖确实曾两次航行全世界。第一次是和一些赛船的朋友们一起，第二次是他一个人谱写了世界航海历险记。十月份他又要启程了。

“你不想成家吗?”我提这个问题，不费吹灰之力就击中了航海家的要害。

“谁会嫁给我这样的流浪汉？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真心实意的人，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在这十米长的船只上，一个月去商店购一次物。”米盖的微笑很牵强，不难猜测，在他这样的表白下，一定掩盖着几个遗憾的故事。

第四杯威士忌喝下肚后，我感到不能再喝了。如果再多喝一点，明天就会像晕船一样难受。如果我不睡觉，就可以看着星星消逝，灯塔的光亮在朝霞中逐渐变得暗淡无力。但早晨，不喝两杯咖啡，头脑是不会清醒的。我在喂奶期间也不忌口，照旧喝白酒。因为我们家的数学家安迪证实过：喝酒不影响喂奶，因为乳腺分泌的乳汁中，不含酒精。

“风向已经转成东南风了，我们去英高是顺风顺水，不用着急走，我们可以先爬到灯塔顶上去高瞻远瞩一番。”

依旦睡了一大觉醒来后精力充沛，非要自己爬楼梯上去。女儿在九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扶着东西学走路，从上个星期开始，已可以不扶东西迈步走了。

天高云淡，晴空万里。放眼四望：南边隐隐约约可以看见爱沙尼亚；北边的航道上有一艘拖着一条驳船的货轮，正驶向波兰的方向；东北边传来“突、突、突”的马达声，是一艘轻巧的“布斯特”摩托快艇正向瑞兹盖尔岛驶来。

“我要去游泳。在我们出发前，吃几片黄油面包吧。”安迪建议说。在这顺水顺风的情况下，去英高要不了半天就到了，同时还能赶上依旦睡午觉的时间。

“布斯特”靠岸了，从船上跳下来一个精神抖擞的男人，他就是总经理尤哈·麦瑞瓦拉。只要他能抽出空，星期天总会到岛上来。

我把东西收拾了一下，就到厨房里去取黄油面包。抱依旦的手臂酸了，我就把她换到另一只手臂上。这时，尤哈·麦瑞瓦拉过来和我打招呼了：

“这位小妈妈是谁啊？”他假装幽默地问。我把脸藏到依旦的头发后面。“小妈妈”这个称呼，对我来说不算过分。

“玛丽娅·加里奥。埃司堡警察局的高级警察。[①]”我说着伸出手去和他握手，“你们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岛。”

“谢谢，高级警察……”尤哈·麦瑞瓦拉打量着我说。

尤哈·麦瑞瓦拉过分的平易近人的态度，引起了米盖·休白格的关注——他站在不远处，密切注视着我们“热情洋溢”的对话场面。今天我没有穿牛仔裤，上身穿了一件又肥又大的纯棉针织衫，是红色的，衬着细铜丝似的自然鬈曲的头发，这正是高级警察的形象。我的鼻梁上生有雀斑，眼睛是蓝色的。用现代警察的标准来衡量，我矮了七公分。因此，人们都看我比实际年龄要小。这使我很无奈。

我重新打量着尤哈·麦瑞瓦拉：大约一米八的个头，体型是属于经常运动那种类型的——向横里发展的趋势已经被控制住了；头发是黄沙色的，眼睛的颜色则像九月的海水；紧绷着的嘴唇，已经锻炼得能露出友好的笑意；身上穿着一套昂贵的航海服。总之，尤哈·麦瑞瓦拉的言谈举止都能表现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继承一个家庭公司，就像在船上作业一样辛苦。

“我听我的太太说，你先生以前来过这里，那时这个岛还被国防部列为禁地。实际上，这样的岛是应该对那些有航海经验的航海员全方位开放的。”

我在心里默默地自问，为什么那些驾驶帆船、航海技术精益

① 高级警察是职称，与中国的高级职称相当。

求精的航海员们如此仰慕这位总经理，他却驾驶摩托艇？我可没有这种仰慕之情。我不想和尤哈·麦瑞瓦拉再聊下去了，正好安迪回来了，男人们交换了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后，我们就去码头，准备启程。

伊瑞还是像昨天那样，站得远远地看着我们。芮佳和达甫沙依然紧紧地互相搂着脖子。安奈·麦瑞瓦拉说着客气话，对我们的光临表示感谢。米盖很少说话，他帮我们解开缆绳，又帮我们递东西。

“关于哈瑞的事，”等我们上了船，安奈突然说，“这个阴影总是笼罩着我……听说你也是警察，可是谁也没有告诉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不会……只是……自杀吧？”

“你们一直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吗？例如，信之类的东西？”

安奈摇摇头说：“如果哈瑞离家时……”

“明天我回去上班，会搞清楚的。”我安慰她说。安奈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如果你不介意……我到现在还一直做噩梦。”

米盖焦急不安地在岸上来回走动——他担心风把我们的船刮到岸边的岩石上，因为船头的缆绳一经松开，船尾的缆绳就很吃紧。

安迪发动了引擎。我挥手向他们告别，极力想控制住自己对这最后一天假期的留恋之情。

屹立在强劲的海风中的瑞兹盖尔岛，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每一艘帆船从它旁边驶过，渐渐地消失在远方的海平线上。

2

“我看起来像个当官的吗?”星期一早晨我问安迪道。我穿了一套藕荷色猎装款式的宽松衫——竭尽全力想把自己打扮成科长的模样——把头发拢到后脑勺上扎了个马尾巴，面部的化妆也尽量符合身份。

“非常性感的女警官。”安迪笑着说，“下楼吧，让我看着你精神抖擞地上班去!”

从汉达开车到基罗[①]要不了多长时间，我按正常的作息时间，提前了十分钟到达。实际上，我是没有固定工作时间的，因为暴乱事件的发生是没有时间规律可循的。埃司堡警察局去年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改革，这有效地促使我也要全力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积极主动的民警工作和给学校的学生分发有趣的基罗警察局收集的卡片都受到了表扬。我们这个部门也已经克服了一些呆板的官僚作风。这主要体现在对嫌疑犯和证人的审讯工作中。今后我必须带头以身作则，再接再厉。

我一走进我们科的走廊，就闻到了一种和以前一样的气味，那是由于长时间煮熬咖啡，从蒸气里散发出来的气味。透过玻璃窗，我看见布包宁正坐在咖啡室里。

---

① 埃司堡警察局所在地。

"科长女士，欢迎你来上班！准备从哪里开始？"

"从常规的星期一上午九点半的晨会开始。"我胸有成竹地回答道。布包宁走过来和我拥抱[1]，紧接着过来拥抱我的是高依吾：

"把科长抬到她的办公室去。不要忸忸怩怩，玛丽娅，你是当之无愧坐金椅子[2] 的人！"

走廊里的安静被打破了。全体科室人员都挤到我的新办公室里来了，咖啡杯子和草莓蛋糕也已摆在了沙发的茶几上。办公桌上还有一大束白红夹杂的玫瑰花。刑警处的处长达斯基宁也微笑着挤到我面前的第一排行列里：

"局里发给你一把新工作椅，"他指着一把崭新的红色扶手椅对我说，"以前那把椅子的规格尺寸只适合我和斯切姆。这把椅子可以调节高低。"

"我知道我很矮，两脚够不着地。"我笑得几乎像哭似的——这一切表明，他们是真心实意地希望我回来上班。

只有斯切姆例外，今天早晨还没有见到他。

"斯切姆病了，肚子痛。"赖岱说。他是斯切姆在科里惟一的朋友。

"贝扎[3] 有一个非常敏感的肚子。"我的话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这时有人要我第一个切草莓蛋糕，这样其他的人也可以开始吃了。

"即使斯切姆来了，他可能也要出去修理他的抽屉[4]。他不来也好，这房子里的空气可以新鲜一点，"布包宁抱歉地说，"他

---

① 芬兰人习惯施拥抱礼。

② 两个人用四只手握在一起，搭成"互"字型，让英雄坐上去，然后把他抬起来。这是芬兰的一种喜庆的风俗习惯。

③ 贝蒂·斯切姆的爱称。

④ 这是暗语，指喝酒。

是不管什么场合都要抽烟的。”

“玫瑰的香味可以湮没烟味。大家请吃这精美的蛋糕，吃完后各就各位去工作。”我希望我的话音中有一种命令的口气。

斯切姆的缺席是不足为奇的。为了这个科长职务，我们之间曾经有过激烈的竞争。我与他竞选的条件惟一不同的是性别。职务的定夺始于去年十月中旬，也就是依旦刚刚出生七个星期的时候。在我休妈妈假期间，斯切姆被任命代理，虽然他嘴上拒绝接受这项任命，但实际上，他还是接受了。在他代理了十个月后，我现在走马上任，接管了这项工作。

我已经听到了一些有关科里的风言风语。高依吾、布包宁和达斯基宁有时要到我家来坐坐，其他人有时也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他们一致反映斯切姆不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好领导。最糟糕的是，他欺侮越南人阿奴·王。她是科里招来的占固定指标的女警察。当她和斯切姆搭档时，经常受到他的“恶婆婆般的白眼”。当她和其他人搭档时，她却干得很出色。她是警察学校招收的第一个少数人种的女性代表。她现在已经习惯于离群索居。

斯切姆应该来参加这个晨会，因为每一件案子都是由他分派的，每一件没有办完的案子他都要检查，所以他对案情比较了解，有利于他控制全科室的局势。在我召集的第一次晨会中，大家都只轻描淡写地重复了一下案情。我要求大家继续按照贝扎的要求去工作。好在我的部下们手头的案子都不复杂，例如：一帮喝醉酒的中年人在马丁贵拉[①] 打群架；另一起发生在达毕奥拉[②] 沙姆色巷内的斗殴事件，有十个见证人。前两个星期，贝扎着手调查中夏节[③] 时发生在浩基拉丁海滨浴场的一起持刀行凶案，

---

① 地名。

② 地名。

③ 6月22日，相同于中国的夏至。在芬兰是继圣诞节后的第二大节日。

这要算这个夏天最严重的一起案子了。

开始工作的头几天，我每天要看很多材料。在这新的岗位上，没完没了的会议，总让人感到是一种极大的痛苦。斯切姆是星期三来上班的。他回到原来的办公室去了，也就是和赖岱同一间办公室。他没有过来和我打招呼。他有一只装文件夹的箱子遗留在我办公室的墙角里，一直到下午也没有来取，我只好走过去主动和他搭话。

贝扎显得有些萎靡不振：两颊因饮酒过度而有些发红；脸上的骚疙瘩惹得他心情烦躁；浅棕色的头发零乱地盖在头上。他戴着一副深色的太阳镜——这是警察的特征，以防别人认出他，手里还夹着一枝烟。

“嗨！贝扎，你的气色不错。我想召集一次会议，有很多事情要说。你明天有什么安排吗？”

“知道你的事情多。说吧，要我今天晚上和谁去拼命呢？”贝扎挑衅地说——他用这种阴阳怪气的态度来回敬我的问候。

“明天中午怎么样？我们一起去吃午餐，局里的快餐厅里设有雅座，供应不错，我请客。”我尽量表现得友好。

贝扎摇摇头说：“我有约会。明天中午十二点我要会见持刀行凶案子的公诉人。如果你一定要召集会议的话，可以安排在星期五下午三点。行吗？”

该下地狱的斯切姆，故意和我过不去！他是想考验我有了孩子以后，是否还愿意任意延长工作时间。他清楚地知道，如果在会议中要处理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至少需要三个小时。

“行。”我平静地说，“你现在正在和经济犯罪侦缉科的巴沙宁一起处理那起经济诈骗案，是吗？”

“是这么回事。他妈的，那简直是一起乱麻似的案子。现在我不想接其他的什么大案子，主要是我不想要助手，也省得我对

她翻白眼。她和布包宁总是和我拧着干，有些事情被他们搅得像可怕的麻花似的。”

“不要像对阿奴那样对我翻白眼！”我大声地呵叱道。但我马上反应过来上当了。贝扎是故意要把我惹急了，看我失态的笑话。这是他惯用的伎俩，当我们一起在警察学校同班学习时，他就干过这样的事情。

贝扎露出一副轻蔑傲慢的神情。他把烟蒂在烟灰缸里重重地顿了两下，然后把它掐灭，重新又点燃了一枝。

“你还有其他的事情，还是让我继续工作？”他这种选择式的提问方法是从电脑里批发来的——答案栏的方格里已经提前打上了记号。我敢打赌，在我来他的办公室之前，他肯定正在玩电脑游戏。

“那就说定了，星期五下午三点，在我的办公室里。”我抑扬顿挫一字一句地说。特意强调我的办公室，是为了突出我的权力和地位。那里我不允许贝扎抽烟。我当然知道这是为他好，而不是报复他。血液中的尼古丁若能减少，他就能恢复因过度抽烟而损坏的健康。

星期五早上临出门之前，我发现那条时髦的猎装裤有点脏了，便决定改穿旧的黑色长外套和牛仔裤，这时我感到裤子口袋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掏出来一看，原来是安奈·麦瑞瓦拉的名片。我曾答应过她，回来后给她打电话，把哈瑞死的情况告诉她，可我一头扎进工作中，竟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早晨例行公事完毕后，我赶紧找出哈瑞之死的原始调查报告来。报告写得非常地简短扼要，完全和高依吾去年秋天说的一样：由于岩石上滑的缘故，才引起了意外事故。从出事现场找到的哈瑞的物件和他家里的物件中都没有发现什么自杀的迹象。

我把报告看了两遍。午饭后，我在咖啡室里堵住了高依吾，要求他再谈一下案情。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开始回忆案情。这已经是十个月以前的事了，也就是瑞兹盖尔岛这个名字，才使回忆得到启发。

“那天我是坐直升飞机去那里的。这可没有什么含糊的，意外事故就是意外事故。我也去了依冒宁的家，那里也没有发现什么自杀的遗书。”

“检查他的电脑了吗?”我问。因为我想起了一宗案子：有一个专业的操作电脑的通讯网络的年轻人，一时想不开，在电脑里留下了自杀的遗书后，吊死在了电脑旁边。晃动的尸体上，有一只脚把电线从墙上拉了下来，竟没有一个人想到从电脑里找遗书。直到来了新的电脑操作人员，他才在软盘上的总目录里发现了遗书。

“电脑在岛上，是那种手提式的‘奥立凡特’电脑。电脑里只有关于鸟的日记和有关海洋生物方面的记录。一般的警察是看不懂的。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了。为什么这些鸟类学家不用通俗的语言，尽用那些见大头鬼的拉丁文呢?”

“你不也经常用一些暗语吗？那是一个道理。警察不是也有代号吗？在第二审讯室里受过审的那些家伙，在背后叫我‘猎鹰’，也许这有助于想像：这仅仅是一种印地安人的游戏，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可没有精力仔细地分析全部资料。这是很明显的意外事故。”高依吾活动了一下僵直的肩膀。在我进来前，他正在打健身球。

我给安奈·麦瑞瓦拉打电话，准备把新的情况告诉她。

“我是总经理麦瑞瓦拉。”电话中传来的是尤哈·麦瑞瓦拉那强劲低沉的声音。

“我是埃司堡警察局的高级警察加里奥。请问信息部主任在吗?”

“据我所知，她正在开会。我能为您效劳吗?”从尤哈·麦瑞瓦拉的话语中可以听出——他是一个好管闲事的人。

“是一些私事。”我赶紧说。

“安奈·麦瑞瓦拉是我的妻子。上个周末，在瑞兹盖尔岛上我不是见过你了吗?”

在岛上，尤哈·麦瑞瓦拉一看就是个见面熟的人，可在公司里，他却持另外一种态度。

“哦，是的。那你能不能转告你的夫人，要她给我打个电话?她只要给埃司堡总机打电话，就可以找到我。请告诉她，她要知道的那些问题都已搞清楚了。谢谢。祝你工作愉快!”我甜甜地说。

放下电话后我才想起，尤哈·麦瑞瓦拉也是发现哈瑞尸体的人之一，他有没有可能提供一些新的信息呢?高依吾曾经找他推心置腹地谈过话，他肯定从尤哈·麦瑞瓦拉那里得到了一些补充的信息，那么这些补充的部分又是些什么呢?

下午三点一刻，安奈·麦瑞瓦拉打来电话，这时，贝扎正好端着咖啡壶慢腾腾地最后一个走进我的办公室。我拿着话筒简短地对她说了一句:“哈瑞的死因和结论报告上说的一样。”安奈听后特别地感激，似乎在哈瑞死之前，她就已经担心自己能否泰然自若地面对一切。

贝扎坐在桌子的对面，显得很不耐烦。我不能过多地询问他手中的案子，这会被他误以为我是在故意找岔，将不利于新上任的领导搞好干群关系。

会议开得又长又激烈。斯切姆反正不急着回家。他在四年前离婚后，孩子都判给了妻子。现在不需要每隔一周的周末，亚尼

和耶娜住到他的单间公寓里来了。

会议结束后，我感到自己完全可以接受那些没有办完的案子的方案，也能接受斯切姆的工作方式。前两天晚上，在埃司堡市中心发生了一起芬兰帮和索马里帮之间的斗殴事件。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打群架了，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我按自己的意望，委派布包宁和王去处理这件事。从王的发言中获知，斯切姆是完全站在芬兰帮一边的，他厌恶所有的外国移民，可能只有爱杜德·哈麻拉宁[①] 除外。

客观地说，贝扎是一个十分精明强悍的警察。虽然大家对他个人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就对案情的总体把握来说，他还是掌握得比较好的。贝扎极力想向我证明，在他担任代理科长时，干得比我好，从来不像我这样拖泥带水地坚持分析、推敲方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也是一个隐瞒案情的高手。

"你自己开车吗?"在我们会议结束的时候，他问道。在会议期间，他喝了三杯咖啡，抽了大约十枝香烟。

我点点头。

"能不能把我带到火车站去?"

"当然。"为了搭便车，贝扎显得格外亲近。他有约会，不知是涉及哪一方面的情况。

"去赫尔辛基有何贵干?"我一边问，一边把车倒出停车场。

"我想调剂一下孤寂的生活，去看一场好莱坞的电影。黑沃宁肯定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斯切姆说。他提到的那个酒友是在化验室工作的。"现在我可以过一个比较轻松自在的周末，不再需要面对什么。你怎么样? 仍然是你老公照看孩子?"

"你说对了。我女儿叫依旦·维多利娅·沙盖拉。我照看了她

① 芬兰著名的体育健将。

一年，现在轮到安迪了。”

“原来是这样。我们有时聚在一起议论，一致认为你不是那种非要生男孩不可的女强人。”

“住嘴，我看你是想下去自己走路了。”我说，但是我没有生气。贝扎指桑骂槐地给我扣上了女权主义者的帽子，我回击他的是桃色新闻——他以一个体育运动员的体魄引诱女性。

贝扎讥笑安迪的护理假，这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他的桃色事件连我父母亲都知道。安迪的护理假一直要持续到圣诞节，这是一次很好的喘息机会。他在大学里的教学工作已经开始令他心烦了。他在家里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可我的心里不知为什么总是焦躁不安，总想铤而走险？

在瑞兹盖尔岛上遇见的那些人，总是纠缠着我，不让我安宁，即使周末也一样。星期六，我的公公婆婆来庆贺依旦的一周岁生日。婆婆带来了一本我没有看过的季刊杂志。

“你在瑞兹盖尔岛上遇见的那个歌剧演员浩勒玛，这里有关于他的一篇报导。”婆婆说。

文章的题目是《如何明确生活的转折方向》。被采访的有三个人，一个是得了胰腺癌的个体户老板；一个是不幸死了独生儿子的教堂的女牧师；再就是达毕奥·浩勒玛，一个因声带松弛而失声的歌剧演员。

达毕奥·浩勒玛，四十二岁。十六年前曾在铁木·穆斯达加里奥歌咏比赛中获奖。当德国歌剧院招聘优秀的男中音时，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教师的岗位。他曾在汉堡歌剧院工作过五年。他经常按时回来参加芬兰国家歌剧院的庆祝活动和沙沃林纳的歌剧联欢会。三年前，他在歌剧《道·卡劳克圣·尧屈高》中扮演包沙侯

爵的角色，把他推上了芬兰的歌剧迷们赞不绝口的歌星宝座。男中音歌星接着出演《岛姆·克劳宁和尧勒马·荷尼宁的足迹》，更是出类拔萃。当时追求他的人中，有一位柏林国家歌剧院的女演员——那是世界一流的歌剧院。可是，另外有一个人闯入了他的生活。

“去年夏初时，我已经注意到我的声带比以前容易疲乏。这种感觉已经有一年了。到夏末时，我在沙拉兹布基音乐会上演出《斯加宾·布克新·道斯卡》，唱到最后一场时，嗓子疼痛难忍，就再也发不出声音了。”

经五官科医生的诊断，浩勒玛的声带已经严重地松弛了。显然这是超负荷工作所造成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案是建议休息。浩勒玛休公假了。在经过将近一年的休假后，男中音仍然没有康复。看来只有动手术了。

“没有人向我许诺说，手术后保证能恢复到原来的嗓音。”达毕奥·浩勒玛平心静气地说，“因此，我还没有下决心去冒险。另一种解决方法就是在两年之内，让人们彻底把我忘掉。我不想再参与到激烈的竞争中去。”

在失声的同时，达毕奥·浩勒玛的生活中发生了另一次危机，这种痛苦现在已经缓解了。浩勒玛和德国女高音苏珊娜·浩孜格已经结婚十年了。在歌剧院中，男中音对女高音非常倾心。因为在歌剧《道斯卡》中，他与苏珊娜同台演出。剧情是这样的：男主人公斯加宾千方百计地想得到女主人公道斯卡的爱，竟不惜以男高音卡瓦拉道斯的生命作代价。道斯卡假装顺从，最后谋杀了斯加宾。

在现实的生活中，男中音还是败给了男高音。浩勒玛的妻子爱上了扮演卡瓦拉道斯的演员。

“我们的婚姻破裂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事到如今，我妻子的

这种移情别恋已经不会给我带来太大的打击。因为我是这样理解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要在短时间内达成一致，那是不太可能的。”

改变环境有助于减轻精神压力。达毕奥·浩勒玛回到了故乡埃司堡。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对鸟类特别感兴趣，现在更是兴味盎然。

“虽然我自己不能唱歌了，但我可以听鸟类唱歌。芬兰初夏的夜晚是无与伦比的。在奥召拉丁海滨的那些夜莺……幸运的是，建筑公路没有毁掉所有的树林。”

达毕奥·浩勒玛身边有一个新的恋人，二十岁的学生芮佳·麦瑞瓦拉。浩勒玛悄悄地说，认识芮佳完全是由于一次见义勇为，但他没有叙述详情。

“年龄的差异并没有成为我们的阻碍。芮佳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姑娘。她不仅教会我许多事情，还使我认识到：如果人有了足够丰富的营养，就能获得全身心的健康强壮。我们还不约而同地想到：如果有人能解决我的声带问题，那就更完美了。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要恢复声带难于上青天。但不管怎么样，只要活着，每天就还可以听到鸟类的歌唱，无论是海鸥还是燕鸥。”达毕奥·浩勒玛诚恳地说。

杂志上的照片中，浩勒玛站在海边，上身穿着毛衣，脖子上挂着望远镜，脸上露着怡然自得的微笑。不幸的经历并没有使男中音失去生活的信心。

“多灾多难的人生。”我对婆婆说。她正在用汤匙给依旦喂草莓酱，“浩勒玛的经历可以写一部歌剧。”

安迪没等完全听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哈哈大笑起来。他问我：

"你想不想等依旦睡觉后，去看看我那些在瑞兹盖尔岛上的老朋友?"

我当然想。我不由自主地发现自己的思想中有一种好奇的追踪感，就从安迪曾经提到他可能还保留着斯库纳帆船阿斯曲第号的幻灯片——那上面有米盖·休白格——开始吧。

八月的夜晚，在十点以前天就黑了。安迪挂上白幕布，架起幻灯放映机，然后望着厨房说：

"我要来点有劲的。还剩一点威士忌，你要吗?"

自从帆船航海好友尤加死后，安迪肯定再也没有看过这些幻灯片上的朋友。我们是在五年前认识的，也就是搞清楚尤加的死因后。不可思议的是，安迪当时曾是谋杀嫌疑犯之一。

"要一点。"

安迪把瓶子拿来了，我小心地给自己倒了一点。我盼望已久的这些幻灯片终于放映了。十年前，年轻的安迪理着短发。尤加的头发是棕色的。那种棕色好像是被烤焦了的颜色。他们在瑞兹盖尔岛上"禁止通行，驻军重地"的牌子前面扮鬼脸，在灯塔上戏耍玩闹，在海滨的崖石上喝卡帕达·莫加尼酒。瑞兹盖尔岛上的房子，用现在的眼光来评价，简直是破旧不堪。四周围到处都看得见垃圾。

"这些是第二年夏天拍的。我操，一转眼这也已经有十年了。"

我注视着这些年轻人兴高采烈的历险的画面，脑海中不由想起英年早逝的尤加和哈瑞。哈瑞在三十四年的生涯中拥有些什么?仅仅只有鸟吗?也许我在他的生活中并没有留下任何的色彩，只有观察夜鹳对他来说才是最大的满足——就像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得了奖牌，或者像是中了"劳道"彩票一样。

"这里是几张阿斯曲第号船上的照片。我没有带自己的照相

机。这张是我在爬桅杆。”

十七岁的安迪看起来是那样的热情洋溢和天真无邪。第二张照片是他正全神贯注地在洗手提箱。最后一张是全体照。

“米盖·休白格在后排的左边。”

青春期的米盖，脸上长满了粉刺。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照相机的镜头前扮怪相。显然是有人说了笑话，所以人人都笑得很开心。

“如果那时候有人对我说，你以后会和一个高级警察结婚，我肯定不会相信。因为我们这一帮人都瞧不起警察。”

“不要再提这些。”我一把将安迪推到坐垫上。从瑞兹盖尔岛回来的路上，他就逼问我：如果他和依旦加入居民们的行列，反对二环道高速公路的建筑工程向前推进，我将怎么办？是命令我的部下把他绑到警车上去，还是装做没有看见？

“这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去，那里有十幢房子。但你要把依旦留在家里，并要为她找好保姆。”我说。

“依旦算我这一边……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等依旦长大成人后，整个埃司堡都要变成柏油马路了。每次选举运动中，无论怎样大声呼吁反对开筑新路，都不起作用。”安迪叹息道。

“不要把这问题强加到我头上来！”我用接吻制止了安迪的群众观点。可在接吻中，我的感觉非常糟糕。前一天夜里，我梦见了瑞兹盖尔岛，有一个男人和我接吻，可那个男人既不是安迪，也不是哈瑞。这个人有两道浓密的大刀眉，从他的呼吸中，可以闻到烟斗的味道。

星期天，我们沿着海边骑自行车锻炼身体。在马丁贵拉[1]

---

① 地名。

的近海海面上，涌动着像绿色地毯似的海藻，它们在八月的秋风中，不断地分裂着。人和狗都在海边散步，愉快地享受着凉爽的新鲜空气。在回程的路上，我看见在尼德古布[①] 的“麦当劳”附近停着两辆警车，还站着许多人，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在示威抗议。我的职业好奇心油然而起。

“那里怎么啦？我去看看。你在这儿等着。不要把依旦弄醒。”

我把自行车和头盔留在“爱哨”加油站的院子边上。这情景看起来确实是在示威抗议。大约由三十个年轻人组成的示威队伍，包围了饭店并占据了饭店的汽车。从他们的标语牌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口号：“在这里吃饭是毁灭热带雨林”，下面的署名是“动物保护革命组织”；还有“吃肉是谋杀——动物保护革命组织”。队伍中没有人高呼口号，只有一个男孩子敲着非洲鼓，那咚咚咚的鼓声透过交通的噪音传向四方。

这里有两对警察都是我们局里维护秩序科的。有一对正在和两个示威者谈话。我走向另一对，他们是我认识的阿基拉和尹立阿遥。我在尹立阿遥的背上轻轻拍了一下。

“嗨！加里奥。”尹立阿遥向我招呼道。

“听说你已经回来上班了？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这些小家伙事先没有提出示威抗议的申请。”

这些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人包围了饭店，还在窗户上贴满了标语，“麦当劳”的值班经理就打了电话到警察局求援。星期天的下午，“麦当劳”里经常坐满了带孩子的家长，他们喜欢这种简单的午餐。今天下午四点，这里还安排了一个有二十个孩子集体过五岁生日的活动。

---

① 地名。

“这不关我的事。”我回避道。按照法律规定，没有被许可的、且已扰乱了社会秩序的示威活动，必须驱散。可我不知道对目前的情况该持什么态度，因为我有时也会到“麦当劳”吃汉堡包。安迪可从来不进“麦当劳”，他认为这种供应方式不好，动机也不纯。

“里面的客人真不少。”阿基拉说。他是局里的拳击专家，他认为拳击在工作中有用武之地。

一个年轻的矮个子男人，穿着饭店的工作服——绿条子衬衫和小背心，匆匆忙忙地从门里走出来。示威者们一下全都不说话了，只是相互交换着眼神，只有非洲鼓敲得更响了。那位“麦当劳”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犹豫了可能有十秒钟，然后果断地向我们走过来。

“命令这些小傻瓜们走开，他们干扰了我们的顾客。”他气愤地说。他胸前的名字牌上写着“伊密，值班经理”。

“我们的同事正在和他们对话。我们会尽最大的可能，把事情处理得圆满一些。”尹立阿遥安慰他说。

“圆满？这可不是能得到圆满的事情！”

“遗憾的是，警察不能为了饭店的利益去和他们打架。”尹立阿遥说。

“大家都不要再说了。”我息事宁人地说。因为这样继续下去，会越说越难听的。那个值班经理已经气得直喘粗气了。

另一对警察和示威者们的对话结束后向我们走来，他们俩也是我认识的，其中一个是局里资历比较深的女警察莉莎·拉西拉宁。

“怎么样？”尹立阿遥问。

拉西拉宁摇摇头，说：“他们不愿意离开，决心和警察纠缠到底。我被迫给局里打了电话，要求再派两辆警车来增援，然后

再看情况而定。”

“他们简直是在添乱！”阿基拉把警棍敲得砰砰地响。

我转眼向示威抗议的队伍看去：他们中有人穿着又肥又大的褂子，有人穿着牛仔裤，有人穿着蜡染花布的连衣裙。他们的头发都染得五颜六色的，头上扎着小方巾。他们现在的这种状况和我们十七年前为世界和平而举行的示威游行的情况像极了。那时，我们也都是些幻想主义者。我们想像着世界要改变，如果那些讨厌的法律能取消，我们的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后来通过实践证明，我们的世界观是危险的。

“谁接的电话？”我问拉西拉宁。

“高级警察哈奴拉。他答应来这里。”

哈奴拉是一个慢条斯理的人，也许他处理这种局面会适得其反，我还是回家为上策。我在马路两边找寻安迪，都没有找到。他可能以为我会参与这个事件，所以带依旦先回家了。

情况并没有好转，示威者们既不高声呼叫，也不做动作示意，只是围着饭店的窗户站着，举着口号牌相互说话。非洲鼓继续咚咚地敲着。来吃汉堡包的顾客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些人是在干什么。门口没有人阻止顾客进入，可有些胆小的人，见状怕发生什么不测，扭头便走了。

增援的两辆警车到了。从第二辆车中走出来的是高级警察哈奴拉。

“把每一个人的名字记下来，如果一直保持这种太平，不要抓人。”他说。随后他拿起麦克风向他们喊话，要求他们解散。情况看来有所改变，对峙有所缓和。我认为自己没有必要搅和到里面去，于是决定离开。我刚走到“爱哨”的院角，就听到了一阵玻璃的破碎声。我赶紧又转身回去了。

有人扔石头击碎了饭店的玻璃窗。

大部分示威者一看这情况，便乖乖地开始离开现场。但当警察过去抓那个扔石头的姑娘时，他们又一起围过来起哄、喊口号，并挥动口号牌打警察。一个绿头发的小伙子冲过来，企图掰开尹立阿遥和拉西拉宁的手，解救被抓的姑娘，可他被阿基拉一把捏住了后脖子。警察一共抓了四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回到基罗警察局去了。阿基拉粗暴地拖拽着那个绿头发的小伙子，那个小伙子在他手腕上咬了一口，他一脚踢在小伙子的肚子上，小伙子倒在了柏油马路上。就在那一刹那，我认出那个小伙子就是伊瑞·麦瑞瓦拉。看见小伙子自己从地上站了起来，我提起来的心才放下。阿基拉重又严厉地抓住他，这次准备给他戴手铐，伊瑞想抢夺手铐，但他不是比他高十五公分的拳击运动员的对手。

有两个警察开始心平气和地登记每一个示威者的情况。我从口袋里掏出警察证举到胸前，证明我的身份后，就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去了。有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冲过来还想继续打架。拉西拉宁和尹立阿遥已经把扔石头的姑娘押进警车里去了，接着又押进去两个。伊瑞被押进另外一辆车里，他极力挣扎反抗，但都无济于事。他骂阿基拉是“法西斯”。其他的人，轮流写下自己的简历后，迅速地离开了现场。敲鼓的人还在那里咚咚地敲。这些示威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三岁，他们站在这些强悍精干的警察旁边，显得是那样的稚气无邪。

“他妈的，这些孩子，”哈奴拉把伊瑞提起来塞进警车时抱怨道，“抓了四个。好在饭店里的顾客没有人被碎玻璃打破头。你搭车吗?”

“不，谢谢，我骑自行车。”

在半路上，我碰到了安迪和依旦。我向他解释了延误的原因。

“唉，这些警察还真地动用警棍、踢人哪。”安迪说。显然他是同情示威者的。

“砸石头确实是不明智的行为！碎玻璃飞出几米远，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和依旦一样大的孩子坐在里面，后果将会怎么样?”

“谁也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安迪说。我们各人的脑子里都在回想示威抗议的情节。一直到晚上，每一个电视频道都播放了现场报导。其中有“麦当劳”的值班经理和那些示威者的镜头。双方都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主要是双方世界观的差距有十万八千里。记者们想撮和，那是徒劳。饭店责有攸归地提出赔偿，理由是示威者砸碎了玻璃窗，扰乱了正常营业。

我可没有逃脱汉堡包饭店事件的纠缠。星期一早晨，我的办公桌上有张留言条：伊瑞已经做了体检，那是因为警察阿基拉在尼德古布踢了他的缘故。现在这案子就转到我这里来了。

3

“阿基拉还没有被起诉。”我对伊瑞·麦瑞瓦拉说。在审讯中，安奈·麦瑞瓦拉是完全支持她儿子的。当她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简直认不出她了。在瑞兹盖尔岛上见面时，她那被太阳晒成棕色的皮肤已经消失了。她穿着一套非常高档的深灰色西服套装，戴了一副价值几千马克的金丝边眼镜，完全是一副女商人的派头。

“为什么还没有？那家伙踢得我都发紫了。看！”伊瑞撩起黑色的衬衫，肋骨间淤血很厉害。

“你将被起诉，原因是你反抗警察执行公务。公诉人认为阿基拉那样做，完全是被你激怒所致。”我解释说。此案的公诉人不一定进行审理工作，我敢肯定他不会提出诉讼。值得深思的是：他是否正确？我认为阿基拉这样做确实太过分了。如果他是我的部下，我非给他几天时间停职反省。

“警察不能决定提出起诉吗？”安奈·麦瑞瓦拉问。

“当然不能。”

尼德古布事件中引起的体检事宜，经过了警察总署的中心实验室，事态就被缓和了。伊瑞所做的体检是那样地微不足道，其诊断的结果是：回家护理。星期一，安奈·麦瑞瓦拉直接给我打电话，就好像我是她值得信赖的私人警察一样。我不喜欢套近

乎。伊瑞被抓后的审讯工作已经安排好了。他在当天晚上就被释放了。尤哈·麦瑞瓦拉反对当初做体检，他认为伊瑞是在丢人现眼，企业家的儿子必须懂得不能扰乱他人的生活方式，也不能妨碍警察例行公事。

“尤哈认为伊瑞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汉堡包饭店的饮食文化。他可以先到‘麦当劳’去打工，然后争取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通过这样的实践，他将对企业管理有较好的体验。当然，这需要持续几年的时间。尤哈认为拥有这样的体验是改造世界观的惟一正确的方法。尤哈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安奈·麦瑞瓦拉说。

虽然我有许多其他的工作，但我还是决定先听听麦瑞瓦拉家的意见。我在星期二下午约见了伊瑞和安奈。安奈担心的是：如果伊瑞被起诉，是否会影响麦瑞瓦拉公司的声誉？一旦事情公布于众，那就意味着家庭公司的第二代继承人扬言生态危机的到来。相信那些有较高的环保信誉的船漆市场的开发商们，还不至于把那些热爱大自然的帆船航海家们支走。

我决定亲自作初期调查，并要求王坐在第二审讯室里作证人。

“我认为这样的审问可以结束了。”我说。因为我们的全部时间都纠缠在一个问题上：是谁先动手的？伊瑞还是阿基拉？双方都指责是对方先动手的，我简直不知道相信哪一边好。伊瑞这一阵子极力想表现为一个被警察扣押的乱世英雄的形象。

“两天后我会把这些初期调查的记录送给你签字，然后就送给公诉人。”

“你们官官相护，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那个踢人的家伙会被起诉吗？哈哈！你也是他妈的花钱买汉堡包吃的主……”伊瑞讽刺地说。

对这些脱口而出的脏话，我并不觉得可笑。当伊瑞进厕所去时，我和安奈·麦瑞瓦拉站在走廊里等他。

“你对这孩子说话必须严厉些。我和芮佳都苦口婆心地劝过他，可他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他从不对他父亲说什么，他骂达甫沙是歌剧小丑。惟有米盖例外，他的话，伊瑞惟命是从。可他又去希乌马岛[①] 航海了。”

“米盖·休白格是你们的亲戚吗？”

“他是尤哈同父异母的弟弟，他用他母亲的姓。”

伊瑞不声不响地从我身边走过去，安奈·麦瑞瓦拉立刻从后面追上去叫住他。我匆匆地把初期调查的记录收起来，希望不要再节外生枝，搅乱了麦瑞瓦拉家的事。

阿基拉没有被起诉。伊瑞被罚款七百马克，理由是妨碍警察执行公务。扔石头砸碎“麦当劳”窗户的姑娘被罚款一万马克，理由是损坏赔偿。但她拒绝付款。

埃司堡的秋天，空气中就像蒙上了一层香气袭人的面纱。工作计划开始一项一项地落到实处。我尽最大的可能去熟悉新加入的伙伴：阿奴·王和贝曲·布斯特亚勒威。布斯特亚勒威是从基勒高奴密[②] 调来的。他有强健的体魄和浅黄色的头发，年龄在四十岁左右，爱好打高尔夫球和采集蝴蝶标本。我已习惯了尽量减少安排和分派工作。我注意到我们领导小组的短会已减少了三分之一，原因可能是我冒昧地中断了另一个部门负责人的森林犯罪侦破案，并要求他移交案子。

在处理日常的事务中，我很希望能得到前任上司于勒基·达斯基宁的协助。我们每星期一和星期五碰面，并共进午餐。这样，九月底在警察局里就传开了谣言，散布谣言的人并不难猜

---

① 爱沙尼亚西边的岛。
② 地名。

出。斯切姆曾经说过，我当上领导是走了前任上司的后门。事实上，我和达斯基宁之间仅仅是说说话和交流交流思想而已。有时谈话的内容也很俗气，不是谁的领带平整啦，就是用树叶可以擦干头发啦等等。就这些也能给人留下话柄。

安迪还是老样子按部就班地生活。依旦白天睡觉已改成一次了，有将近三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安迪不是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去，就是陶醉在仰慕的诗人的诗词中。在依旦醒着的时候，他就一边照看孩子，一边弹钢琴给她灌耳音。他每星期还去一次奥拉瑞音乐厅。安迪曾心满意足地说：

“孩子并没有带来什么妨碍，我还是和大学里的其他老师一样。能直接与人打交道，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十月四日是星期六。早晨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个日子听起来这么耳熟？我马上醒悟到，这是哈瑞去世一周年的忌日。

这一整天我都处在一级战备中，因为我是刑事犯罪部门的值班警察。行使职权范围，我可以抓人，有必要时，还要到局里去安排事务。星期六从半夜起，打来的电话尽是些醉酒事件和酒吧里的胡闹事件。我拿着手机在楼下睡觉，因为我怕吵醒安迪和依旦。我在两星期前已经停止了早晨喂奶，因为我在值夜班时，经常说走就走，根本不知道回来的时间。停止喂奶后，我有点伤感，觉得依旦不再是一个吮奶的小婴儿了。她已经会走路，会说几个单音节的词，这就使我们成了普通的妈妈和孩子的关系了。

十月四日早晨，天空灰蒙蒙的，还下着毛毛细雨。电话铃在七点半时响起，传来了布斯特亚勒威的声音，他在局里值夜班。

“瑞兹盖尔岛上发现一具尸体。”

我是否还在睡觉？我是否还在梦中？这正是一年前哈瑞死的日子！不，我没有在睡梦中，梦幻已经从我的眼睛里消失了，就像杨树的花粉随风飘散了一样。

“有没有死者的身份情况？”

“有。总经理尤哈·麦瑞瓦拉。1951年出生。”

这迫使我的脑子分秒必争地思考着。

“是否已经有人去那里了？”

“现在正等着高依吾和摄影师，还有直升飞机驾驶员。技术鉴定员已经坐船去了。”

“等着，我也来乘直升飞机。我将在一刻钟内赶到。”我关了手机，冲进厨房，插上咖啡壶的电源插头。我按预计的时间，花了十四分钟半到达局里。这些时间包括洗脸、穿衣、喝两杯咖啡和吃几片面包，超速驾驶几公里，最后准时赶到直升飞机的停机坪。

我坐过一次直升飞机，那还是在警察学校学习期间，坐的是实习飞机。我很害怕飞行，当直升飞机向上升起，飞过曼加[①]和浩基拉丁[②]后向西南方向飞去，我的肚子里就像翻江倒海似地难受。大海被濛濛细雨笼罩着。我的护耳罩无法隔绝所有的噪音。我做了几次深呼吸后，要求布斯特亚勒威再介绍一遍从瑞兹盖尔岛得到的报案情况。

“不必大惊小怪。就是岸边有一具男尸，但不是淹死的。”布斯特亚勒威在麦克风里大声说。那讨厌的噼里啪啦的杂音震动着我的耳膜。

“谁报的案？”

“一个叫达毕奥·浩勒玛的男人。”

哦，是达毕奥·浩勒玛。岛上显然只有麦瑞瓦拉家族的全体成员，还有米盖·休白格。当直升飞机一摆动，向低处飞了两米时，我的肚子又胀得难以忍受。

---

① 地名。
② 地名。

我透过晨雾，俯视空旷的海上岛屿和灰蓝色的波涛滚滚的大海。在我们飞过崩达拉[①]和斯道拉海劳[②]后五分钟，我突然看见天边有一束光，那是瑞兹盖尔岛上的灯塔射出的灯光穿透了浓雾。我在一百米的高空看见码头上停泊着两艘和八月份时看见过的一样的船：一艘豪华的游艇和一艘木制的帆船。这都是属于米盖·休白格的私有财产。

桦树随着西风摇曳。直升飞机缓缓地向下降，最后降落在二十平米的草坪上。噪音引来了灯塔的守望者传人：芮佳·麦瑞瓦拉和达毕奥·浩勒玛、伊瑞、米盖·休白格——他正在直升飞机螺旋桨刮起的强风中划火柴点烟斗。还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深棕色头发的胖女人，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风把她的紫罗兰色的外套吹得像鼓起的斗篷。

我们走出直升飞机，米盖第一个迎上来，急切地说：

“早上好！你们来得真快。”他没有伸手和我们握手。

“大家好！我是埃司堡警察局的高级警察玛丽娅·加里奥。这是刑警贝加·高依吾和贝曲·布斯特亚勒威，这是刑警摄影师爱勒基·曼莱。”

穿紫罗兰色衣服的女人过来和我握手，并自我介绍叫塞娅·莎莱拉。接下来是浩勒玛过来问候。芮佳和伊瑞只是站在一旁，缩着脖子盯着我们看。

“贝曲，你到里面去找个地方，我们可以开始审讯工作。”我对布斯特亚勒威说，“记下每一个人的身份简况。谁能带我们去现场?”

达毕奥·浩勒玛是报警的人，肯定也就是发现尸体的人。可是米盖·休白格搭话说：

---

① 地名。
② 地名。

“是我在西海岸发现尤哈的。”

我还来不及赶上问，尸体发现的地方是不是和哈瑞同一个地方，米盖已经开始大踏步地穿过被雨打湿后很滑溜的草坪。我、高依吾和摄影师曼莱随后跟上。讨厌的地衣厚厚地伏在岩石上，上面一层干枯了，马上又被新鲜的一层覆盖上了。米盖加快步伐走过几个星期前我们一起喝酒的地方，他把我们带到海边，那里强劲的西风把海浪掀起足有一米五高。

尤哈·麦瑞瓦拉俯卧在海边的石滩上，海浪时不时地打到他的身上。他的手和脚都泡在水里，当大风吹过来的时候，他的腰和大腿的后部就从石滩上稍稍翻起。我鼓足勇气走到了悬崖的边上。从五米高的地方掉下去，听起来不是很可怕，可当你从海面上朝这里看的时候，你保证会相信，掉下去是肯定没有活命的。

“你去过那下面吗?”我问米盖。

“去过。我从这边上滑下去，直接到了海边。”

米盖的左手掌上贴了止血胶布，下巴上有乌青块。

“我们下去，小心点。”我对高依吾和曼莱说，然后慢慢地向下走。岩石上滑得要命，肯定前两天的大风把海浪掀起了两米高，再加上毛毛雨，才使这些岩石像遭了水灌一样。

走到近处看，尤哈·麦瑞瓦拉左边的太阳穴向里凹进去了，后脑勺和脖子上都有乌青块。高依吾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但他没有说话，因为米盖·休白格在场。

“几点钟发现他的?”

“差一点儿七点。我去检查‘兰达’，也就是我船上的缆绳，因为昨天夜里风向转了。我看见南边天空中的云块已经散开，就想到灯塔顶上去看朝霞。我从窗口向外看，注意到海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我首先想到的是鬼。”米盖扮了个鬼脸。我很理解他的这种心情，因为我自己也有同感。“我赶快跑到悬崖上来，看见

水里躺着的不是哈瑞，而是尤哈……”

尤哈·麦瑞瓦拉的穿着整齐：布裤子、水手服和航海员的鞋子。尸体显出他的强壮和高大。湿冷的空气已经使尸体变得僵硬了。

“你碰过尸体吗？”

“碰过！”米盖大声地说，“是我把他从水中拖上来的，我检查了他的脉搏，并做了人工呼吸，尽管我知道这已无济于事了。无论怎样，这是首先要做的事。警察搞侦破不也是这样的吗？”

“这里还有其他人来过吗？”

“我把达甫沙叫来了，我们用他的手机向警察局报案。虽然我们想到应该把尤哈的尸体再抬上来一点和用什么东西盖上，但我们再也没有碰尸体。”

米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斗。这时我感到他应该离开现场了。

“谢谢你的帮助。你可以走了。”我想对米盖多说几句客气话，或者拍拍他的肩膀表示友好，可是我没有。

“掉下来……滑倒该是毫无疑问。”高依吾猜测说。此时米盖已经走远了。

“这里确实是太滑了。但我相信尤哈会注意到这一点的。我觉得头上的乌青块发人深省。如果是滑倒，磕着后脑勺是应该的，但不该是前额，然而现在脸颊上都有。”

我戴上乳胶手套，很小心地抬起尤哈·麦瑞瓦拉的头。脸已经被血模糊了，鼻梁骨断了，脑浆已经流在了石滩上，也就是米盖把他哥哥拖上来的地方。如果是在岩石上滑倒，会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一般的滑倒是背着地，这逻辑也适用于哈瑞。有没有可能脸上的乌青块是掉进水里的一刹那出现的？人死后是不会再流血的。尤哈到底是怎么从高处掉下来落到水里的呢？好在刮的是西风，海浪一点一点地把尸体推向了岸边。

这确实是一次重大事件。两个男人死在同一个岛上，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日子，只是时隔一年。

潮湿的空气让人感觉哪儿都是粘粘糊糊的。毛毛细雨虽然停了，可是空气中的湿度比例仍然和下雨时一样。我向高依吾建议，我们回房子去。摄影师仍然留在那里，对尸体可疑的部位拍特写快照。布斯特亚勒威已经把人都集中在了厨房里，在防风灯的灯光下，房内洋溢着一种家庭的气氛。深棕色头发的女人正在炉灶边煮茶。

“我深表哀悼。”我沉痛地对大家说，可得到的回答却是含糊不清的喃喃声。

“有两个女人还留在卧室里。”布斯特亚勒威为难地说。

“姓名?”

“是妈妈在那里，还有米盖的妈妈在那里安慰她。”芮佳抢着说，“真是太过分了，先是哈瑞，然而刚刚一年之后就轮到我爸爸……好像这岛上有什么……”

“胡说八道。”塞娅·莎莱拉说，她把茶壶端到桌子上，“这个岛上能源贫乏，只有些克烈密战争前留下的石头。”

“塞娅，不要说了。”米盖突然把手按到女人的手臂上说。

“大事化小事为好。你是否也去陪你妈妈说说话?”米盖对芮佳说。

“我去看看。”我说。

我离开众人，一边喝茶，一边敲门。芮佳为我作向导。

“请进。”一个女人的声音应道，她不是安奈·麦瑞瓦拉。我推门进去，房间里布置着一套特别讲究的家具。这显然是麦瑞瓦拉夫妇的卧室。安奈·麦瑞瓦拉侧身卧在双人床上，她旁边坐着一个大约六十岁的女人，个子矮小，体态匀称，皮肤略显棕色。她那粗糙的齐耳短发已经灰白，但是不同于芬兰人的那种银灰

色。

“你们好！我是埃司堡警察局的高级警察玛丽娅·加里奥。”我正在考虑是不是应该说瑞典语，安奈·麦瑞瓦拉迅速坐起来，大声地说道：

“是你啊！太好了。现在肯定一切都能进入轨道了。”她把两腿伸到床沿下，但那灰白头发的女人马上拉住她说：

“安奈，冷静些。你不要出去。”

她说的芬兰语里带着瑞典的口音，但又不是我熟悉的埃司堡瑞典人的口音。她把纤细匀称的手伸给我说：

“加曲娜·休白格，死者的继母。”

握手显得冷淡和敷衍，这不禁使我想起她儿子米盖的握手是那样的热情和真诚。她的眼睛是海蓝色的，但她的目光总有些闪躲。

“你们二位可以回答几个问题吗？是什么时候见到尤哈·麦瑞瓦拉活着时的最后一面？”

“我可以回答。”加曲娜·休白格说，“安奈是不是也一定要现在受审？我们其他人知道的和她一样。安奈是十一点钟去睡觉的，她不知道尤哈是否来和她同睡。一直到米盖来报告尤哈的死讯时，她才醒来。”

我有些纳闷，为什么加曲娜要为她的儿媳妇辩解开脱？要知道，安奈是一个颇有主见、颇为独立的女性。

“如果有问题，我还可以回答。”加曲娜说完，就离开了。

我点点头。也许她还不明白我们到底是侦破谋杀案件呢，还是只是搞清楚死亡原因而已。

外面传来突突突的轮船马达声，是技术鉴定员到了。我希望多几个见证人说，尤哈·麦瑞瓦拉是自己绊倒后掉下悬崖的。我还希望所有的人都说，尤哈·麦瑞瓦拉是在酩酊大醉中发生了不

测事故的。可是我知道，技术鉴定员是不会如我想像的那样快速做出判断的。他们要搞清楚死亡原因，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也许还要更长的时间。

马达声渐渐消失了，我又回头看着安奈·麦瑞瓦拉，说道：

“你们为什么要来瑞兹盖尔岛？这样的天气不是很诱人的。”

没想到安奈·麦瑞瓦拉露出微笑说：

“是来庆祝我的生日的，就是昨天。上次发现哈瑞的尸体，也是我和尤哈来这里过我的生日的。这使我经常做噩梦，我开始害怕过生日了。可尤哈说只要事先吃点药，就敢来这里了。现在这……”

安奈没有继续往下说，只用眼睛凝视着窗外。

“事情的经过正如加曲娜说的那样，我感到累了，也困了，十一点的时候我就去睡觉了。我吃了两片安定，没有做噩梦。当米盖来叫醒我时，我好像还在睡梦中。”

安奈的声音哽咽了，我不想再给她增加痛苦：

“今天就到这里，注意保重自己。你也住在埃司堡，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我会尽力而为的。”

我从包里拿出纸和笔，问安奈是想一个人呆着，还是想请什么人来陪伴——在我们离岛前约一个小时，我一直陪伴着她。

“我不害怕一个人，我不再害怕什么了。这种倒霉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她有气无力地说。

“我深表哀悼。”我没有再说什么，轻轻地把门关上，回到厨房里去了。那里的气氛冷冷淡淡的。伊瑞正在桌子上转动着手里的茶杯。米盖站在窗前望着窗外。达毕奥·浩勒玛两手搂抱着芮佳的肩膀。

“爸爸到底是怎么死的？”芮佳问，“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

“我说过了，尤哈是从悬崖上掉下去的。”达甫沙轻轻地说。

“掉下去的！？那又为什么来这么多警察？”

“芮佳，你先过来一下。”我说。尽管这是纯粹地走过场，但我不想尽听那些好听话。芮佳现在心情激动，所以，从她那里也许能得到一些被隐瞒的情节，这会比从其他人那里来得容易些。我有八九成的把握肯定，这帮人在警察到来之前，有足够的时间统一好口径。

我们走进一个房间，这就是六个星期前，我和安迪、依旦住过的房间。那时候海水是湛蓝的，阳光是灿烂的，可现在，一切都被笼罩在灰色的朦胧之中。床还在原来的地方，床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墙角里放着旅行箱和背包，桌上有两本书和一个化妆盒。

“说说，你们为什么这个周末要来这里？”

“昨天是妈妈的生日，爸爸要在这里举行庆祝晚会。伊瑞不想来，被爸爸严厉地批评了一顿。达甫沙当然乐意来，他已经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员。米盖打算出海时经过弗格娄，把他妈妈送回去，然后直接去南边远航。”

我不知道弗格娄在哪里，但我记得米盖·休白格在八月份时曾说过，他打算今年冬天经马德里① 去非洲远航。

“塞娅·莎莱拉是什么人？”

“塞娅是米盖的朋友，准确地说也是妈妈。塞娅这一次也许要留在这里，一直到米盖去远航。”

这听起来倒挺有意思。我又进一步提了些问题，了解到了如下的情况：

麦瑞瓦拉全家和达毕奥·浩勒玛是乘摩托艇在中午时分到达

---

① 西班牙首都。

瑞兹盖尔岛的。休白格母子和塞娅·莎莱拉是坐“兰达”帆船过来的。帆船到达时，已经过了下午的喝茶时间。五点后开始做晚饭，点燃桑拿浴炉子。八点钟的时候，洗完桑拿浴的人都集中到厨房吃晚餐。

“四十五岁的生日不是什么大的庆贺日子，但爸爸还是为妈妈致了贺词。然后大家就吃呀，喝呀。我、妈妈、伊瑞和塞娅还是像平常一样吃蔬菜和熏鱼。甜点是豆蓉蛋糕和豆腐奶酪，伊瑞喜欢吃这个。大约十一点时，妈妈开始打盹了，她说要去睡觉了。那时候伊瑞也打算退场了。每当家里举办家庭晚会，他就头痛。”

接下来我又问这些人是怎么睡觉的。安奈·麦瑞瓦拉和尤哈·麦瑞瓦拉睡在那个房间，就是我刚才去找安奈谈话的房间。我们现在坐着的房间是塞娅和加曲娜睡的。米盖和伊瑞睡在隔壁房间。达甫沙和芮佳睡在东边的房间。瑞兹盖尔岛上再没有多余的房间，因为东北边的城堡还没有修复。

“我就知道这些，因为我和达甫沙大约刚过十二点就去睡觉了。”

“你爸爸喝了多少酒？”

芮佳想了想，说：

“吃饭的时候他喝了点葡萄酒，吃蛋糕时又喝了点威士忌。这是一般的酒量，他是大男人，不会轻易喝醉。”芮佳皱了一下眉。我的担忧是多余的，我等待的眼泪，压根儿没有落下来。

最后我问，夜里听到什么特殊的响动没有？芮佳说没有。但当她站起来时，又说：

“在晚会上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每一个人好像都不对劲。他们都在忙着什么事情，爸爸、妈妈和米盖也都一样。虽然表面上他们都极力表现为和睦喜庆的一家人。”

整个谈话过程中，芮佳只字没有提到哈瑞死的事情。这就很奇怪，难道芮佳会忘记那件正好发生在她妈妈去年的生日庆祝晚会上的事？

下一个是达毕奥·浩勒玛。他在门口拥抱芮佳说：

“你妈妈要你到她那里去。”

浩勒玛叙述的事情经过和芮佳的一样。不同的是，他感觉到每一个人都很高兴，他们共同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

“现在的问题是，哪些鱼是我们的弟弟伊瑞能吃的。这孩子特别古怪，生活方式与众不同。”

达甫沙后面轮到塞娅·莎莱拉。她四十九岁，是失业的建筑描图员。她住在埃司堡基湾拉丁。她穿着一件宽大的、紫罗兰色的蜡染花布衣服，两鬓的头发已经灰白，后脑勺上盘了个发髻，耳朵上坠着两只大耳环，手上戴了几枚天然宝石戒指。塞娅·莎莱拉最初把这个海岛上的城堡想像成博物馆了。说话中曾提到岛上能源贫乏，对此深表遗憾等等。但这并没有影响莎莱拉的情绪，她的心情看起来还是恬静的。

“尤哈和其他人相比，他是醉得比较厉害一点，可我们每个人也都差不多。”她说，“大约一点钟时我去睡觉，加曲娜和我一起离开。米盖说他还要到船上去取两本书。据我所知，尤哈也去睡觉了，但我没有看见。恕我直言，我不是特别欣赏这个男人。”

“为什么？”

“他是有许多优点——他是真正地爱大海，爱大海的环境保护，可他同时考虑的又是钱。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他从小就是被当做麦瑞瓦拉公司的继承人和领导人来培养的。有据可证：是他改变了公司的基本管理方式，开始开发生态产品。这都是令人钦佩的。但他不能因此骄傲自满、自吹自擂。”

我点头表示赞同，我对尤哈·麦瑞瓦拉也有同样的看法。接着，我问塞娅·莎莱拉，她和麦瑞瓦拉家是什么关系？

“我在这里完全是米盖的食客。”塞娅的脸红了，“我认识米盖已经好几年了。那是 1991 年，建筑公司倒闭，我刚刚失业。我想，自己不能游手好闲，坐吃山空，必须学习新的技能，我就到职工业余学校学习海滨船舶管理课程，可我对船一窍不通。米盖是我们的授课老师，渐渐地，渐渐地，我们就熟悉了……”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和米盖·休白格同居了？”

塞娅尴尬地笑着说：

“没有。我们是好朋友，米盖有时候带我去航海。最近一次是八月份，我们去了希乌马岛。我来这里是和米盖一起度最后一个周末，然后他就走了，整个冬天都不回来。”

从她的语气中可以听出，她是不反对和米盖同居的，我凭直觉感到，问题可能出在男方身上。

技术鉴定员哈加拉宁进来说找我有事，我就让莎莱拉走了。我走出去从直升飞机上取出雨衣，然后跟在哈加拉宁后面去海岸。

“我已经从莫农宁[①] 那里订了飞毯，”哈加拉宁开玩笑地说，“它可以接住每一个从悬崖上掉下来的人。”

那里只有一个人的脚印，但这些脚印又不符合情理。

“这很有可能是米盖·休白格在发现尸体时留下的。”他一边说着，一边磕磕绊绊地往海滩走去，想要搞清楚：麦瑞瓦拉是怎样去那里的，他是在哪里滑倒的。

哈加拉宁指着尤哈·麦瑞瓦拉的尸体，说：

“他的头颅被击碎得很厉害。海水已经把伤口冲洗得干干净

---

① 神话故事中的主人公。

净了。大部分骨头的碎碴和脑浆都已被海水带入大海了。”哈加拉宁转过身，背着风点烟。他打着打火机，在被风吹灭之前，他点着了香烟。第一口烟，他吸了长长的一口气，然后心满意足地慢慢吐出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塑料盒，用来装烟灰。他从来不在侦破现场留下一点多余的痕迹。

“你有什么高见吗?”我问。

哈加拉宁摇摇头。他从来不说模棱两可的废话。他所说的事，那肯定是百分之百的准确无误。

“谋杀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是吗?”

“是的，我在这里没有找到滑倒的痕迹。等到尸体解剖后再说。我怀疑这里不是发现尸体的第一现场。”

布斯特亚勒威急急忙忙地朝这里走来：

“玛丽娅，正找你呢。休白格母子要走了。”

“什么？他们可不能离开。”我说着就朝城堡走去。

加曲娜正站在厨房里的风干机前，风干她的手。她在生气：

“警察来管一下这件事，我们要走了，我必须在星期四下午回到弗格娄。”

“弗格娄在哪里?”我不解地问。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在阿维南马群岛[①] 的东边。我住在那里。星期五我要到图书馆去值班。”

“我很抱歉，你们现在还不能离开，因为所有在场人的调查审问还没有搞完。”

“这要多长时间？警察给不给我付回阿维南马群岛的船费?”

我刚要说这要请示科长，可我马上反应过来，我现在就是科

① 在芬兰的西南边。

长。

“付。我看我们最好还是回埃司堡去。到局里去搞你们的审问工作。”

实际上，阿维南马群岛的警察也可以处理加曲娜·休白格的事，但我想自己处理。

我转向米盖·休白格，说：

“还有你……我知道，你是要出国几个月，现在看来必须推迟起程了。”

“多长时间？”

“我现在说不准，最快需要两天。”

米盖无奈地耸耸肩。很难说，他和案子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是当然的，我还要给尤哈送葬。”他像局外人似地说。

我开始安排大家回陆地了。安奈·麦瑞瓦拉、加曲娜·休白格和我一起坐直升飞机，我想尽快地把安奈送回家去休息。她和伊瑞的受审可以安排在稍后。伊瑞正坐在厨房里发呆。米盖站在旁边，把手搭在他背上表示安慰。可他毫不领情地把米盖的手拨拉掉。伊瑞、芮佳和达甫沙坐警察的巡逻艇，由布斯特亚勒威保驾。髙依吾和塞娅、米盖坐“兰达”帆船。

“启动发动机，这样的顺风会更快一点。”我在登上直升飞机前对米盖说。

“不一定——如果没有足够的燃料的话。”他噎了我一句。

“真不可思议，像你这样还要到非洲去远航。”我回了他一句，米盖笑了。他撑船离岸而去。我坐上直升飞机就想把思想集中起来。当飞机飞向大海的上空时，我扭过头再看一眼瑞兹盖尔岛，尤哈·麦瑞瓦拉的尸体正被担架抬到码头上去。

4

直升飞机上很安静。安奈·麦瑞瓦拉坐在那里闭着眼睛，脸上渗出了些许汗珠。加曲娜·休白格看着窗外，雾蒙蒙的天空挡住了视线，向下看不见船上的灯光。

我在岛上的时候已经给局里挂了电话，要求布包宁和王来增援，等我们直升飞机一到，马上就开始审问。我想预先在脑子里拟出提问的草稿，可这飞机摆动得太厉害，把我的脑子都晃晕了。当我们飞到苏维岛上空时，雾开始渐渐地消逝了。突然，安奈在麦克风里大声说：

“尤哈总是知道该干什么。去年，当我们发现哈瑞时，他马上知道该往哪里打电话，他还知道不要碰尸体。现在不再是尤哈……”

我和加曲娜·休白格交换了一下眼色。我马上意识到犯了一个错误，不应该把安奈和她的孩子们分开。我们到达目的地肯定要比船快，安奈不能一个人回家，我必须找人护送她。

从直升飞机的窗口看沙吾伽和基湾拉丁，就像玩具城市一样。随后我们急转弯，向东北方向飞去。飞经汉达时，就到我们家的上空了。

熟透了的小红果都从山楸树上掉下来了。我想起我们原来定好今天要去采摘小红果，回来后就开始自酿甜酒的，但这样的雨

天是不适合采摘的。不过安迪和依旦肯定是要出去的，他们根本不在乎下雨，因为婴儿推车上有遮雨的篷帐。

阿奴·王已经站在直升飞机的停机坪上等着了。我相信派她护送安奈·麦瑞瓦拉要比赖岱和布包宁强。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并没有考虑阿奴的性别问题，只是考虑到她的为人。她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高依吾也懂这种处世哲学。我要阿奴送安奈·麦瑞瓦拉回家，并在那里一直等到伊瑞和芮佳回来。我做出这一安排后，自己又感到纳闷：为什么不考虑麦瑞瓦拉家的孩子需要得到妈妈的照顾，而是恰恰相反，要等孩子去照顾妈妈？这大概是由于安奈·麦瑞瓦拉长得太小巧玲珑，显得有些感情脆弱。她比我还要矮两公分，至少比我轻十公斤。她的手腕纤弱得像小孩的手腕一样。芮佳继承了父亲的遗传，高个子，自信，还有反抗精神。具有这些特点的一般都是长女。

布包宁已经在第二审讯室里等着了。乘坐直升飞机后，我特别想喝一杯咖啡、吃一块咸的黄油面包。我请厨房的人给我送来。加曲娜·休白格可能也饿了。

布包宁装上录音带，先录下审讯的时间、地点、受审人名字，然后，我要求加曲娜叙述自己的简历。

“加曲娜·威黑米娜·休白格。以前姓麦瑞瓦拉，休白格是我自己的姓。1934 年 1 月 25 日出生在阿维南马群岛的弗格娄，也是我现在的住址。职业是手工业者，搞编织、干花插花艺术，顺便也做些手饰。有时担任教堂里唱诗班的领唱。每周一次义务去地区图书馆值班。”

她再一次强调星期五的图书馆值班，看来她是不能耽误。尽管她对继子的死感到震惊，但她对警察的例行公事感到不高兴。能使她高兴的事，也许就是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对于突然死亡的案子的处理，是要花较长的时间，警察的审讯是必要的程序。

“你们为什么不怀疑尤哈是死于心脏病复发，而不是什么意外事故？”加曲娜·休白格先发制人地问。

“为什么是心脏病复发？他有心脏病吗？”

“去年冬天他曾两次心脏病发作。引起他这种病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压力太大，其二是遗传，我们这个家族的男人都有心脏病。”

这个情况安奈和芮佳都没有提起过，是不是她们知道死亡的原因不是心脏病发作？厨房里的人一送来咖啡，我就迫不及待地抓起了一块鸡蛋、鳀鱼夹心的黄油面包，加曲娜选了一块熏肉夹心面包。我们都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你们这个家族……你是你前夫的表亲，是吗？”我直呼她加曲娜，因为她也直呼我的名字，这是瑞典人的习惯。

“我是他的小表妹，我们的爷爷是兄弟。休白格家族是弗格娄地区最老的海员家族。我爷爷的父亲就是船长，我爷爷和我的伯父后来也都是船长。”

“家族的姓氏中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芬兰人的姓氏？”

“是我丈夫的父亲，他深深地迷恋上一位芬兰朋友的女儿，结婚后他改成女方家族的姓，后代就继承下来了。”

加曲娜干巴巴地笑了一下，她继续说尤哈·麦瑞瓦拉的母亲是死于肺结核，当时孩子只有八岁。那时候加曲娜已经二十五岁了，此前两年她从哈曼林那[1]“卫特赫夫”手工业师范学校毕业了。她曾经在赫尔辛基最好的一家缝纫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想建立自己的作坊。

“我们休白格家族的人都是能抓住机遇的人。我找小表哥马丁合伙，因为他认识很多的有钱人，我可以通过他开发市场。马

① 地名。

丁是个死了妻子的鳏夫，比我大十五岁，是个非常固执的人，他的钱全都花在买花和晚上的饭店里。那时我真傻，我把马丁看做是一个悲剧的典范，深深地同情他的遭遇，就不顾自己的利益嫁给了他。婚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之间有了矛盾，在1961年春天，我们反目为仇，在一次持续一个星期的激烈争吵之后，我流产了。”加曲娜又不自然地笑了一下，“结婚后我没有马上怀孕，马丁就把我不看在眼里。可我知道，我不适合当一个家庭主妇，因为我有太多的主见和自尊。我曾尽最大的努力想给尤哈多一点的母爱，可是没有成功。第二次怀孕，推迟了我离婚的计划。直到1964年秋天，我才抱着刚满一周岁的米盖离开了这个家。我们住在赫尔辛基，这样便于米盖和他父亲、哥哥见面。我和马丁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僵。”

加曲娜端起咖啡杯啜了两口，又继续说：

“马丁死于1982年，同年米盖考上了大学。孩子继承了父亲的一半财产，也就是四分之一的麦瑞瓦拉公司。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作为孩子监护人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就一个人回到了这个思念已久的故乡岛上。”

我看着眼前速记摘要本上的潦草的字迹，尽是些姓名和年代，情不自禁地在脑海里描绘出一幅休白格——麦瑞瓦拉家族的家谱来。然而这个家族的成员和公司的股东们的关系就像一团塞在我脑子里的乱麻。我希望录音带和布包宁的记录，能帮助我理出头绪来。

“昨天你从弗格娄来，是为了参加安奈·麦瑞瓦拉的生日晚会吗？”

“我们才没有这么亲近呢。我是来看两位朋友的，当然还有我的儿子。米盖建议我坐他的帆船回阿维南马群岛。到瑞兹盖尔岛来，是顺便路过。米盖的航海计划总是没有定数，这次出航可

能要长达两年之久，所以我们能见面，最好还是抓紧时间见见面。”

加曲娜的语调有点伤感。她好像突然显得有些苍老无助。

“你听说没有，去年安奈·麦瑞瓦拉的生日晚会是怎样结束的?”

“米盖告诉我了。我和哈瑞·依冒宁见过两次面，他是一个性情开朗的小伙子，不是混屎。”

“昨天的生日晚会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气氛中?”我拿起第二块黄油面包问。

“非常一般，尤哈对安奈的态度是心不在焉地谦恭，伊瑞是闷闷不乐，芮佳和达甫沙则在闹别扭。我们其他人还是尽量把气氛搞得热闹点。”

我提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想得到尤哈·麦瑞瓦拉喝醉酒的证据。虽然我还不知道解剖的结果，也就是说，还不知道死者血液里的酒精含量。如果尤哈确实是由于心脏病发作而坠下悬崖，那就可以结案了。

但这头颅骨的粉碎是很异常的，高依吾的看法和我的一样。我这时才想起来，高依吾是不习惯海上生活的人，他怎么能乘坐帆船回来?要是米盖·休白格不借给他雨衣的话，他站在甲板上就会全身湿透，那只好呆在船舱里，但那样又很容易晕船的。

“你是几点去睡觉的?”

“一点十二分，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上床的时候想：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像今天这么晚睡觉的?我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一般晚上十点半睡觉，早晨五点过后就醒来。”

加曲娜还提到尤哈·麦瑞瓦拉是和她同时去睡觉的。她考虑了一会儿，又说：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也许

是不习惯和生人同睡一屋。大概到了三点钟，我听到有走动声，想必有人到外屋去了。又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外面传来马达声。”

“马达声？你的意思是有船开到岛上来？”

“我说不准，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我感到奇怪的是，这声音越来越近。”

如果夜间真有人来岛上，那就会给破案增加难度。我决定把枝节问题先搁下，继续搞清楚岛上的问题。我问加曲娜·休白格，她的继子和他妻子的关系怎么样？

“唉……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总的来说相处得不错，因为婚姻已经维持了二十多年。可是最近几年安奈变了。她年轻时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貌不出众的矮个子女孩，商校毕业，但是运气不错，嫁给了一个财产继承人。后来，她也没有完全丢下家庭主妇的责任不管，只是把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到公司的业务里去了，而且很少休假。尤其是近几年，她变得越来越圆滑和老练了。她学会了用新的理念来观察事物，她提出了船漆的生态理论，而且把孩子们的愿望也都影响得和她一样，与整个环境保护密切相关。我认为安奈和尤哈在思维方式上是有分歧的，对尤哈来说，自然环境和海都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休白格家族的传统，我们可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

加曲娜·休白格端起杯子，喝光了咖啡，又从保温瓶里倒了一点。

“我感到很累。”她说。有一点咖啡洒到了垫杯子的小碟上。“还需要多长时间？”她脸上的表情就像变化多端的天气，这一阵显出疲倦的样子，凹陷的两颊上堆起了深深的皱纹。

“你打算在哪里过夜？”我问。

“这个问题问得好。一般情况下我在伽达的米盖家里过夜，但今天我不想去那里，因为他已经把房子出租了，我不知道房客

是否搬进去住了。安奈肯定已经睡下了。我也不想去那里，因为去那里就得安慰她。我最好还是等我的儿子，如果没有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睡在‘兰达’船上。什么时候我可以回家?”

现在，她的脸上又露出了愉快的表情，她的眼睛里闪烁着芮佳那个年龄段年轻人才有的神采。

“如果不走运的话，得两天以后。还有一个问题，你儿子米盖继承了四分之一的麦瑞瓦拉公司的股份，尤哈从父母那里得到了四分之三的财产，这种状况是否一直持续到现在?”

加曲娜·休白格摇摇头，说：

“米盖在几年前就已经把股份卖给尤哈了。他在波里[①]学习轮船技术员课程，毕业后他没有兴趣在海运公司工作，只对航海感兴趣。我对麦瑞瓦拉公司现在的股份情况知道得不太确切，只是大致知道尤哈仍然是大股东，但他不是惟一的股东。米盖卖给他的股份很便宜。尤哈在九十年代初又扩大了财产所有权。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对加曲娜·休白格的审问结束了。由于她还没有睡觉的地方，我就把她安排在一间休息室里。米盖到这里最起码还要一个小时。

我站起来走出审讯室，朝我们科的走廊走去。我想刷刷牙，然后发一份传真到工商管理局，调查麦瑞瓦拉公司股东们的情况。我吩咐布包宁回家，等“兰达”船最后到达后，我可以和高依吾一起审问米盖·休白格。

现在是星期天下午三点钟，大楼里很安静。前一天打架斗殴的那些人都审问完了，大部分已释放了，情节严重者仍坐在拘留所里等待判决，明天我们就可以从法官那里知道结果。

---

① 城市名。

救护艇马上就会到岸。如果值班的法医立即开始工作的话，第一份报告单晚上就能出来。法医还不能估计出尤哈·麦瑞瓦拉精确的死亡时间，只是如已经知道的那样，大概是在早晨一点半至七点之间。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是什么东西击中了尤哈·麦瑞瓦拉的太阳穴。

电话铃响了。

“我是布斯特亚勒威。嗨！我在沙吾伽码头，这些人现在怎么办?”

“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让他们走吧，告诉他们审讯安排在晚些时候。”

“好吧，我有点头晕，因为昨天夜里是我值班，刚才在船上就止不住地打盹。”

真没有办法！布斯特亚勒威下过保证：一不怕苦，二不怕累。我本想听他说说在船上的旅途中，是否又有些什么新情况。

“那你就回家吧！这里没你的事了。”

“我要来取汽车。”

“那就到我这里来一下，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的。”

布斯特亚勒威曾经说过他是价廉物美的老警察，实际上他还不到四十岁。在基勒高奴密，他已经熟悉了那个地区的惯犯、小偷、醉鬼和夜盗，还经常和他们打交道。但我百思不解的是，他在那里呆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调到埃司堡来？我曾经有两次注意到他被那些凶恶的职业惯犯搞得狼狈不堪，不过他愿意去适应与这些社会渣滓们打交道。第一个星期，布斯特亚勒威曾对局里的女领导持轻视小看的态度，但后来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怎么样?”当他在我宽大的办公桌对面坐下时，我问。

“什么怎么样?”布斯特亚勒威反问道。他是累得失去了大脑功能，还是真地不明白我想问的问题?

“船上旅途怎么样?”

“非常安静。绿头发的小伙子躺在前舱里听耳机。那姑娘时而哭，时而把握着舵轮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似的。浩勒玛大部分时间呆在驾驶室里，他和姑娘的年龄相差太大了，我冥冥中感到姑娘父亲的亡魂是不会喜欢这种关系的。”

布斯特亚勒威在途中睡了一会儿觉，当驶到苏维沙瑞岛时，他才醒来。醒来后，他听见达毕奥·浩勒玛亲吻着啜泣的芮佳说，现在你爸爸已经死了，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住到我那里去了。

这倒挺有意思。一般的情况，女儿长大成人后，就不能限制她的自由，她想住哪儿就可以住哪儿。传真回来了，那上面是麦瑞瓦拉公司的股权信息。尤哈·麦瑞瓦拉是明显的大股东，他拥有百分之七十二的股份，安奈·麦瑞瓦拉拥有百分之十六，剩下的百分之十二是在一个“马来·诺斯曲姆”股份公司的名下。这个公司的详情不得而知，我又发了一份传真。

雨停了，但阴云密布没有一丝空隙。人们感觉到秋天的气息已经有两个星期了，白天越来越短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真想花钱晒几个小时太阳。实际上，我喜欢黑暗，喜欢坐在烛光融融的酒吧里喝威士忌。今年秋天的阳光特别少，很多人都在抱怨。再过几个星期，早晨起床时，天还是黑的。一个月以后，我这长条形的办公室的窗户里就照不进白天的亮光了……

我摇晃了一下脑袋，想把那些混乱的思绪甩掉，然后我开始从电脑里查找，在瑞兹盖尔岛上的这些人有没有犯罪前科。工作被笃笃笃的敲门声打断了。门口出现了高依吾发青的脸。

“啊呀！是海鬼来了。”我开玩笑地说。

“不要胡咒！他妈的，我从今以后再也不坐这种小船了，有一半路程我都是趴在船舷上呕吐不止。”

“下一次带上药。莎莱拉和休白格在哪里?”

高依吾表情惊愕地问：

“你不是允许莎莱拉回家吗？”

“是。”

“休白格在楼下。看样子是要马上审问，要不要我作陪？”

“要。”我说。我至少有一百次和高依吾合作的经历。每次和英俊潇洒的高依吾合作，我都感到心情格外地舒畅。我们合作破了许多案子，起先是在赫尔辛基警察局的暴乱侦缉科，后来是在我的老家北加勒亚拉，我在那里是打夏季短工，高依吾到那里去，是为了追求一个女人，但罗曼史没有成功。我就引诱他一起到埃司堡来。高依吾既是我的朋友，又像是我的兄弟。他是我这些老同事中，惟一能和我心照不宣的人。

“我肚子饿得厉害，有吃的吗？”

“我已经多订了一些黄油面包。休白格吃过了吗？”

“在莎莱拉驾船的时候，他吃了一些牛排和土豆，猜猜看，当这些味道开始散发……”

“其他还有什么？他们说什么看法没有？”

“我没有听到更多的，因为我晕船，太难受了。”高依吾歉意地说，“莎莱拉试探地打听调查的进展情况，休白格则一直保持沉默。刚离岸的时候他很紧张，后来进入大海后，他就渐渐地放松了。”

米盖·休白格等在楼下的走廊里，身子靠在尽头的墙壁上。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他抬起头来，一脸的颓丧。下巴上的乌青块已经变成紫色，隐现在淡黄色的胡茬下面。

“嗨！我们又见面了。听说路上颠簸得很厉害？”

“也许是吧！当操纵调节器鼓帆时，船是摇摆得厉害。要是赶上逆风航行，那就更厉害，好在那时没有赶上。”

“你想喝咖啡吗？我们一起去第二审讯室。”

米盖拿起他的背包和风衣，跟在我们后面走进审讯室。他皱起眉头环视了一下室内，判断着这个地方是否安全，那神态就像在琢磨一幅大海的风景画似的。他脱掉厚毛衣，坐在我对面的扶手椅上。我喜欢这间审讯室，因为它比其他的房间要宽敞些，室内的色彩既温馨又协调。第四审讯室的情况就不一样，被带到那里去的人，一般都要受刑逼供。在那里，审问的人和受审的人面对面地坐在一张窄条桌子的两边，灯光直接照着那些负隅顽抗的罪犯的眼睛。第二审讯室里的高级沙发和扶手椅，给人的印象就像是审理案子累了，朋友们坐在这里休息一会儿似的。

“但愿你的计划不要被打乱。”我对着录音机作了一般的开场白后，对米盖说。

“航海中已经习惯了伸缩性，再说这是人命关天的事。”米盖说。我要求他直截了当地说正事，不要说废话，因此，话题就转到发现尸体的主题上来。他说的还是和岛上说的一样。

“也许是我对旅行过于兴奋了，”他承认道，“所以早晨醒得比较早。我想，在灯塔里呆着不会影响其他的人，因此，想上灯塔顶去观察天气，一般来说，根据朝霞可以判断白天会不会下雨。”

“你注意到外面有什么异常没有？也就是在你发现尸体之前。”

“没有。”米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我从信封里拿出几张尤哈·麦瑞瓦拉尸体的特写镜头照片，一字形摆在米盖跟前的桌子上。这些照片我是从摄影师那里得到的。

“你说过，是你把你哥哥从水里拖上来的，那你肯定确切地知道他的姿势。看这些照片全都很安详，说说哪一种姿势和你发

现时的姿势是一样的?"

米盖明显地表现出他不想看他同父异母的兄长死亡的这些照片。我看见他那瘦长的脖子上的喉节随着吞咽口水高频率地上下活动着。

有人敲门，是服务员送咖啡和面包来了。高依吾迫不及待地接过托盘，就像一个星期没有吃过饭的饿死鬼。米盖没有反应，甚至没有注意放到他跟前的咖啡杯。他空洞的眼神盯着什么东西，我们旁观者是看不见的。

"尤哈肚皮朝下漂浮在那块大岩石和海岸之间，两条胳臂横向张开，头上全是血。我下去的时候自己也滑倒了，差点滚到海里去。我下到水里，水很深，把我的裤腿都浸湿了，水下的石头都很滑，高筒雨靴里灌满了水。我把尤哈拖到岸上，放到不再会被海浪卷走的地方，才检查他的脉搏。我当时吓得六神无主，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跑去叫醒了母亲和达甫沙，而没有想到应该打电话向急救中心告急。我的手机在船上。当我和达甫沙一起奔向海岸时，他用他的手机打了电话。我们都认为，从尤哈的表情来看，他当时的心情是不错的，就像这些照片上看到的一样。"

我点点头，自己琢磨着：为什么有许多人，尤其是男人，都不承认在尸体旁感到恐惧？应该说这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死亡是客观规律，生命的长短也是命中注定的。每天晚上，从电视里看到的那些尸体都是不真实的，那些僵尸就和死苍蝇一样。

"尤哈的那些衣服……是不是和他昨天晚上穿的一样?"

米盖在回答前想了想，说：

"是的。当他和我们一起坐在厨房里时，没有穿风衣，也许是他走出去时才穿上的。"

昨天夜里，安奈是肯定睡在双人床上的，现在要搞清楚的

是，尤哈昨天夜里是否睡在那里？他们的床单和被套是否已经拿去洗了？尤哈睡觉的地方是否保护完好？技术鉴定员要检查所有的东西，以便找出蛛丝马迹来证实麦瑞瓦拉有没有睡在床上。

“你妈妈和塞娅·莎莱拉去睡觉的时候，你说要到船上去取书，你看见尤哈去哪里了？”

“他也走出去了，可能是去树林里了，等等……他穿上了风衣，我现在想起来了。我自己穿上了毛衣，因为外面风很大。”

“你在船上耽搁了多久？”

“没多久，大约五分钟，因为书很容易就找到了。要在外面航海旅行半年时间，所以必须带很多东西，每一件东西都会安置在一定的地方，避免要用的时候找不见。”

“你打算出去半年吗？”

“是这样打算的，我想去马德里，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一二月份间，那里的气候最适宜。”

高依吾吃光了所有的黄油面包，面包渣呛在嗓子眼里，害得他一阵干咳。我站起来捶拍他的背，直到他不咳为止。我仍然斜靠在窗户边，使自己的脸隐在阴影里，我注意到米盖这时的表情格外地好看。

“夜里你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伊瑞出去过一次，”话一出口，米盖马上感到这样说不妥——似乎有揭发、控告的意味，“但很快就回来了。我看见他出去，在他回来之前，我不能马上回到梦乡中去。小伙子出去了大约一分钟。”

我想起了马达的声音，那是加曲娜·休白格提到的。如果我向米盖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是多此一举。

“还有别的吗？譬如，其他人的走动，或海面上传来的声音，有什么特殊的……”

"海上充满了声音，那些运输船来来往往不断，我才不去注意这些呢，我睡觉很轻也很少。"

米盖的脸色苍白，他左手掌上的止血胶布渗出了血。这一对同父异母兄弟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年龄相差十二岁，他们从小没有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这也不至于他们相互不认识，到家里来拜访时，需要作什么记号。

"你在几年前把麦瑞瓦拉公司的股份卖给了你哥哥，为什么？"

米盖疲惫的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这一点非常像他的母亲，脸上转瞬间就完全变成了另一种表情。虽然米盖的脸型长得不像他母亲，可他的表情和结实的身体和他母亲一模一样。

"我认为我不是坐办公室的料。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是想继承父亲的事业，所以我立志去波里学习造船技术课程，可是我对理论一点都不感兴趣。当1988年我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清楚地知道，我不可能是家庭公司的继承人。我去海军服兵役一年，在那里我想了许多，也就是在那里，我作了决定，把股份卖给尤哈。"

"你做出卖股份的决定，不是因为弟兄俩一起做生意，在权益方面有什么不和吧？"

刚才我还回避领导权的问题，但现在提出正是时候。

"不，不是的。我只是想得到一大笔钱作环球航海。我是一个富裕的游手好闲者，有一大笔钱，但没有固定的收入。冬天我都是在南边的海洋上度过的，那时候的情景就像失业者排队领救济粮，而干活的工人正在冒雨抢修一样，闲的闲死，忙的忙死。"

米盖的声音里带有一点无奈的口气，就像他那时候说没有人看得上他这个环球航海家一样。

"那你卖股份的钱还在吗？"

“我明智地作了投资。有时候我也工作，写些航海旅行趣闻给报刊杂志投稿，有时组织航海学习班，给他们讲课。初夏时节，我把富有的日本人从赫尔辛基摆渡到塔林[1]，赚他们的钱。我在旅途中花费不多。我没有后顾之忧，我的行为准则是不伤害他人。”

除了嫉妒之外，我在心里想。有多少芬兰人都这样幻想过：丢下工作，到南边的暖水域去航海，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工作的牵挂。但是，那样的生活只有单身汉才容易实现。米盖是不是有女朋友在什么码头上等着他？他的情况到底如何，我不能追根究底。

接着我问有关尤哈·麦瑞瓦拉心脏病的问题。

“他有心脏病。第一次发作是在去年九月底，在我进行冬季航海前不久。那时，我还考虑是否要推迟旅行？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第二次发作是在新年期间，但也是很快就稳定了。尤哈开始去打健身球和吃素食。这些事情可以问芮佳和安奈。我一直到‘五一’才回来的。”

审讯室里的台式电话机铃响了，我拿起听筒，是法医打来的：

“我正在解剖麦瑞瓦拉，你马上就可以听到最新的消息。”

“好。请你等一下，我到另一部电话机那里去听。”我对米盖和高依吾说稍停一会儿，就到第一审讯室的空房子里去接电话。

“死亡原因清楚了，是猛击太阳穴引起的。死亡时间大约是最后一顿饭后五至八个小时之间。”

我迅速地算了一下，那大概是一点至四点之间。

“血液里的酒精度是千分之一点一。另外，没有发现有其他

---

① 爱沙尼亚的首都。

的毒品药物。”

“你可以告诉我颅骨粉碎的原因吗？是被击碎的，还是自己撞碎的？”我着急地问。

“伤势最重的是前额，也就是头的前半部分。如果这人是滑倒的，那很大可能性是背先着地，碰撞的应该是后脑勺。另外，如果这个人是从悬崖上掉下来的，为什么伤口处找不到一丁点石头的小碎碴？如果说海水已经把头部冲洗干净了，这理由是解释不通的。我猜测用来砸头的东西和石头差不多，但我还不能准确地说出是什么东西。伤口处找到两块玻璃小碎碴，这可能是从尤哈·麦瑞瓦拉的眼镜上掉下来的。找到他的眼镜了吗？”

“没有。这必须要到海里去找。有没有可能是心脏病突发后坠下悬崖的？这个人去年冬天犯过心脏病。”

“我还没有做内脏解剖呢。”法医有点不耐烦地说。从电话里传来刺耳的噪音，这明明是在向我提抗议：刚刚做完头颅解剖，你又想了解内脏。不过，他又告诉我说：

“你是想知道有没有可能排除谋杀？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到目前为止不能排除谋杀的可能性。只有等到明天，我解剖了所有的内脏后，才能分析出结果。那些现场拍的照片也可以提供帮助。”

当我回到审讯室时，高依吾会意地用眼神和我打了个招呼，他肯定已经猜到是法医打来的电话。我耸了下肩膀没说话。米盖·休白格好像在扶手椅里睡着了，头靠在墙上，眼睛闭着。

“今天就到此结束。”我说。我的话没有唤醒他，莫不是他真地在审问暂停时睡着了？但是没有，他睁开了眼睛，打着哈欠，然后弓起身子就像一只半睡半醒的猫。

“完了？”他惊喜地问。

“我们肯定还要反复做这些事，不过，今天就到这里。你妈

妈在休息室里等你。”

米盖开始穿毛衣，他的动作出奇地慢。我有些怀疑米盖有没有生活保姆？有些老同事，例如斯切姆，他就当面笑话我雇临时帮佣。根据我的经验，这对于在职的人来说是有好处的。

“米盖，你发现了尸体，”我说着，同时把手按在他的手臂上安慰他，“不要背包袱，我们会帮助你的。”

他那灰蓝色的眼睛里流露出忧郁的目光，久久地盯着我看，然后咧着嘴苦笑了一下，说：

“我到妈妈那里去了。”

米盖转身走向走廊，高依吾给他带路。我立刻把脸埋在两手中默默地祈祷：但愿我是一个更理智的人。

5

星期一上午的碰头会上，大家都各自叙说着在上周末处理完的或是未处理完的案子。我估计尤哈·麦瑞瓦拉的案子要拖较长的时间。然而当我发现斯切姆没有来上班时，这一闪念，打断了我的思路。

"这还不一定，一切主要取决于尤哈·麦瑞瓦拉的死亡是否属于犯罪类。"布包宁言简意赅地说。真是一个干脆直爽、聪明利落的年轻人。停了十五秒钟后，我接着说：

"技术鉴定员和实验室的实验员都答应今天下午再提供新的信息。但愿这是一起意外事故。就这案子够大家忙乎的。"我叹息地说。接着，我建议谈谈星期五晚上发生在曼加的斗殴事件的调查情况。我的话说完后，室内鸦雀无声。我反应过来，这案子在斯切姆的手里。

"贝扎在哪儿？有人见到他了吗？"我问。我可不希望像学校里的老师那样无视学生缺课的事。我环顾了每个人的脸，最后停留在面有难色的赖岱的脸上。

"你知道斯切姆在哪里吗？"

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向我跟前靠近了一点，说：

"我知道得不确切。但是……斯切姆的前妻在上周末举行婚礼了。"

我还没来得及问：是不是他的前妻去度蜜月了，他必须在家照看孩子？或者是问：他前妻结婚和他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不来上班？布包宁已经抢先开炮了：

“斯切姆有一个敏感的肚子，是不是现在又增加了一颗敏感的心？”

这一次没有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因为全科室的人都知道，斯切姆对四年前的离婚事件，至今仍耿耿于怀。事情源于斯切姆的妻子玛莉亚在家里休了很长时间的护理假后，斯切姆同意她回到约威医院的化验室去工作。上班半年后，他妻子就宣告要离开这个家，因为她爱上了医院里的一个技术员。在照顾孩子的问题上，他们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贝扎作了让步，把孩子托给了他们的母亲，因为警察的工作不适合照顾单亲孩子。

贝扎感到最难受的是，他的孩子们都爱他们的继父。玛莉亚再婚，也可能会再生孩子。那样的话，他的孩子有可能要受冷落。贝扎就是这种人，除了赖岱，他从来不对人讲他对前妻的不满。我曾在顷刻之间对斯切姆产生了同情心，但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大家都有干不完的工作，谁也不能享受特权——在周末休息后继续喝醉酒呆在家里。斯切姆或许会打电话来谎称喉咙痛。

我不会含沙射影地指责某人喝醉酒找借口休息，我总是就事论事地找贝扎谈话，从来不使他感到难堪。

中午的时候，我得到了第一份犯罪技术鉴定报告。打开电脑，通讯网络上有两位赫尔辛基的刑警前来咨询。网络通讯可以节约时间，但我还是愿意用电话与人交谈。不过，这倒提醒了我，应该查找一下麦瑞瓦拉公司是否也上网开设了自己的家庭网页。

我必须要通过基罗警察局的总网络查找通讯地址，那里的工作效率很低。我这种急脾气，不能容忍在电脑前等的时间稍长一

点，无论是在银行的取款机前，还是在家里的留言电话机前。

家庭网页上显现出两只航行的帆船对着空中的太阳的图像。目录上提供的信息包括各类产品，以及海运、生态和瑞兹尔岛上的灯塔的情况。我打开生态部分一栏。

每一个海员肯定都希望芬兰这美丽无比的大自然能得到很好地保护。成千上万个湖泊和风景秀丽的岛屿都是人民的宝贵财富，保护好这些财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我们麦瑞瓦拉公司竭诚为您提供节能的轮船配件，还有船漆和船底漆、厕所洗涤剂和各种润滑油。我们的科研队伍和产品开发部门都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我们部分工作人员同海员们有着深厚的友谊。帆船航海员们可以到我们公司所属的瑞兹盖尔岛上来接受培训。

如果您的船底油漆中含有有害成分，一定会污染水域，细流不堵，定会泛滥成灾。您知道吗？当您的船航行在淡水中时，它不需要船底保护涂料。如果在特殊的湖泊里，例如沙依玛水域里，航行的帆船只要使用麦瑞瓦拉公司的“甜又软”油漆就足能起到保护船底的作用。同样，我们公司生产的在咸水中运行的船舶使用的船底油漆中，也不含对海洋植物有害的锡元素。

从家庭网页上，很快就能得到由各部分组合而成的整体资料。我匆匆地继续往下浏览，看到了特殊的废物回收提示和咨询一栏：哪些是船主们值得买的环保信得过产品？只要是有利于环保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是很容易推销给那些爱护大自然的朋友们的。我似乎隐隐约约地感到这背后隐藏着一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有必要调查清楚。我对现代环保产品的商标总是混淆不清，不知道什么样的商标应该是什么价值。从家庭网页上可以看到，麦瑞

瓦拉公司已经为他们的油漆申请了欧共体的环保产品商标。

汽车唰唰唰地从我办公室的窗下开过。巡警从车房里开出警车后，就拉响了警笛。但愿不是打架事件，我这样想着，电话铃响了。法医断定：根据肺部的解剖检查，尤哈·麦瑞瓦拉在坠海之前已经死亡。

"是不是心脏病突发引起的?"

"尤哈·麦瑞瓦拉的心脏是不太好，但他的死亡不是由心脏病引起的，就像昨天说过的那样，问题是由颅骨粉碎引起的。从他的头上又找到了几块有形状的东西，从太阳穴上发现了锈迹，从伤口上找到了玻璃的碎片。他是因遭受猛击引起颅骨粉碎致死，然后被一个力气很大的人把他扔到海里。尸体上其余的伤肿都是掉下去时碰撞出来的。坠入高度大约五米，是吗?"

我走神了，没有立即回答。法医虽然没有说什么"你不要死钻牛角尖"的话，但这第一起复杂的人命案对我这个新上任的科长来说，已经感到很够呛了。然而我还是要追究哈瑞的死因。为什么我要自找麻烦？为什么我不能解脱自己？哈瑞曾经指出过我的缺点：欠考虑，无责任感和自私。我认为这些缺点都已经被克服了。

"你还在听吗?"法医不满地问，"从皮肤上的淤血来判断，尸体是在死后几个小时才被转移的。"

"是发现尸体的人把他从水里拖上岸的。能不能根据淤血来判断尸体在水里的姿势?"

"这个人掉下来时很可能是肋骨着地，脖子歪了。如果你过来看着尸体，我解释起来就容易多了。"

"好吧，如果我能抽出时间的话。"我叹了口气说。接着我问法医："能不能估测出这个谋杀者的体魄和力度?"他不愿意作这样的猜测，因为击碎颅骨是不需要很大力气的。他也不愿意作尤

哈被发现时是何种姿势的猜测。从伤口的形状来判断，这凶器是一件笨重的、带有棱角的东西。

那天，技术鉴定员在瑞兹盖尔岛上一直搜查到天黑，始终没有找到谋杀的凶器。初期的侦破报告中提到，尤哈·麦瑞瓦拉的衣服上有其他的纤维物质，他西服的领章上有其他的指纹，但这些也有可能是以前留下的，只是一直保存到现在。我把高依吾叫到办公室来，说：

“出事的那天晚上，凡在岛上的所有人的指纹，你都去取来。另外，把他们那天穿的衣服都收来，我要到迪古瑞拉[①]去做他们衣服的纤维化验。布斯特亚勒威可以和你一起去收那些衣服，也许他还可以帮助回忆那天早晨谁穿什么衣服。”我后悔自己整整晚了二十四小时，也就是说，直到昨天我才对怀疑谋杀有了明确的概念。

我的日历上工作安排得满满地。下午一点是刑警处各科室科长的周会，我必须到会。我派高依吾和王去审问麦瑞瓦拉家的人。当我走到自动咖啡机前，才想起来王和赖岱正在第二审讯室里处理曼加的斗殴事件。我对高依吾说起瑞兹盖尔岛事件是谋杀案时，他并没有大吃一惊。

“我们是坐直升飞机第一批到达岛上的人。他们这些人中间肯定有一个人是谋杀犯。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长时间地保密下去。”

“这个浩勒玛很可疑。”高依吾皱着眉头说。

“他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歌剧演员。”我惊讶地回答道。因为我知道高依吾喜欢欣赏最近的歌星邦恩·约维亚和爱甫·瑙玛丽。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在档案卷宗中突然看到了这个档案资料袋，才记起这是今年四月份时，我参加处理的一个案子。”

① 地名。

我没有时间查看浩勒玛的犯罪前科，因为我压根儿没有找到他有超速驾驶罚款之类的记录。

“浩勒玛在基湾拉丁救了一个年轻姑娘，使她免遭强奸。”高依吾说。

我记得在那时的一次采访中，达毕奥·浩勒玛对此津津乐道，那神态就像是现实中的活英雄似的。

“那姑娘的名字叫芮佳·麦瑞瓦拉？”

高依吾点点头，说他已经从索引中摘录了这个案子的初期调查记录。他一直跟踪着这个案子，因为这个企图强奸的罪犯在两星期前参与了一次严重的斗殴事件，这案子是高依吾负责处理的。

我从自助餐厅里取回了午餐，这样可以节约时间，在开会前快速翻看一下这个强奸未遂案的初期调查记录。我像打仗似地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个奶酪夹心面包和一小罐水果酸奶，然后把门关上。

我已经有几年的经验积累，可以把审讯记录中的分散部分归纳集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偶尔也会由于观点不一致而搁浅。现在我看这个案子的连环片段，就像在看一出泡沫剧似的。

四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芮佳·麦瑞瓦拉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的大饭店的舞厅里跳舞。凌晨三点半大饭店要关门了。芮佳的一个老同学走到吧台旁对她说，他可以用汽车送她回家。

芮佳犹豫了一会儿，夜间通宵营运的公共汽车去埃司堡是环城运行，到达基湾拉丁的家最起码要一个小时，坐出租车回去要一百多马克。同学密高已经保证说那个开车的司机也曾是他们同校的同学。可是，芮佳不喜欢同他们在一起的第三个男人——垛莫·哈拉宁，他是一个武大三粗、汗毛浓重、文身刺花的家伙。

从他的眼睛里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经常喝醉酒的酒鬼。芮佳已经喝了五杯柠檬葡萄酒，这一刻，无法抗拒的倦意向她袭来。考虑到夜间西环路上车辆稀少，开车回家的路程最多只需要二十分钟，芮佳决定还是搭他们的便车。

芮佳和垛莫·哈拉宁坐在汽车的后座上。芮佳强烈反对垛莫在车里吸烟，她要求他把烟从窗户扔出去，可垛莫傲慢地笑着说，他有权决定这辆汽车的一切。芮佳开始害怕了。

汽车驶过马丁贵拉时，垛莫开始抱怨星期六没有"收获"。他问芮佳是否愿意做他的"收获"？说着，他就去摸姑娘的乳房，芮佳极力挣脱，可垛莫继续去抓。前面的两个人对此不闻不问，使芮佳求助无望。当汽车拐到基湾拉丁路上时，芮佳要求停车，可垛莫强行命令继续向前开往马瑞码头。他觉得芮佳的挣扎是一种刺激。

芮佳生气地想，为什么司机和密高都不制止垛莫的流氓行为？事后他们解释说，垛莫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中间商，他们俩欠他两千马克；垛莫的名声很臭，前年春天有一个人还不起钱，他就用烟头直接烫那人的眼睛。

当汽车开到老约瓦克赛街的十字路口时，必须减速，芮佳趁机跳出车外。但她慌慌张张地又跑错了方向。四月份凌晨四点钟的时候，路上格外地冷清和阴暗，空中下着濛濛细雨，远处只有一只鸟在鸣叫。

听说星期天破晓时分，有一批春季的候鸟将要迁徙，于是，浩勒玛决定赶到勃勒加拉半岛去欣赏这千载难逢的景观。他谨小慎微地在西环道上驾着车，因为他曾经在开往沙玛尔山的路上，轧死过一只兔子。在车灯的光柱中，他看见立交桥桥头的路上正在拼命奔跑的芮佳的后面，一个高大的无赖模样的男人正在紧紧追赶。浩勒玛马上警惕起来，看来有麻烦事了。他拨转方向盘向

老约瓦克赛街上开去。当垛莫刚刚抓住芮佳，一辆汽车就在他们后面紧急刹了车，刺眼的车灯照着他们。

“怎么回事?”浩勒玛从车里走出来问。

“我和女朋友吵了几句嘴。”垛莫镇定地回答道。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他要强奸我!”芮佳气愤地说。她敏捷地闪到达毕奥·浩勒玛的侧旁。

浩勒玛盯着比自己年轻二十岁、高十五公分的垛莫，喝令他走开。

“你自己滚开，我操你妈!”垛莫大声吼道。

这时，浩勒玛猛力地从汽车里拉出望远镜的支架。他已经习惯了在大都市里生活，他能迅速地做出判断：什么时候应该自卫，什么时候应该把钱递到持刀抢劫的吸毒犯的手里。由于天黑，垛莫看不清对方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决定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星期六的“收获”以彻底失败告终，他只能到他那些狐朋狗友那里去和妓女寻欢作乐。浩勒玛温柔地安慰着正在哭泣的芮佳，并把她送回家去，他要求芮佳去报案。

第二天，浩勒玛打电话询问了姑娘的情况。最后他们俩一起去报了案。他俩都接受了审讯，芮佳是当事人，浩勒玛是见证人。在强奸未遂的案犯一栏里，垛莫·哈拉宁是惯犯。

我从电脑里找到了法院审理案情这一栏，发现这案子在七月份就已经结案了。他们两人都没有去法庭作证。哈拉宁在这个案子中只被判了一点罚款。不过现在，他已经在监狱里坐了半年牢了，原因是做毒品生意和打架。

这样，达毕奥·浩勒玛就成了芮佳生活中的英雄。可惜审讯的记录中没有说他们发展成什么样的关系了。我开始理解芮佳为

什么爱上达甫沙了。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不起眼的矮个子、有着厚实肩膀的芬兰男人，但在舞台上，他就不一样了。我至今还记得他演包沙侯爵的形象。浩勒玛演悲剧中的英雄人物能催人泪下，他穿上那种傻里呱唧的带花边的高领服饰时，被衬托得非常英俊潇洒。可能芮佳也看过他在沙沃林那演的歌剧《道·卡劳克圣》。

还差几分钟就一点了。我往脸上扑了一点粉，就去参加刑警处的科长会议，但我心里还是放不下那起严重的谋杀案。

去年我们局里为分工问题一直争执不休。从年初开始，上面把西部新区的警察职责范围划归给我们，增加了工作量，重新调整了组织结构。民警科原来是属我们科的，从年初开始，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科室。会议上在座的有暴行犯罪第二科、民警科、经济犯罪科、毒品侦缉科、抢劫犯罪科和交警科的部门负责人。会议桌的顶端坐着刑警处的处长于勒基·达斯基宁，他是我们科的前任科长。我是会上惟一的女性，这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首创。局里的第二把手就是女的，她主要负责信息资料。

不是一个科室的人每天早晨都可以在顶楼的自助餐厅里碰面，可我很少有时间去那里。周会上不外乎是些紧急的毒品、抢劫、斗殴和民警科的一些案子，大家一个接一个地轮流着说。便衣警察科的科长花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时间，关注因种族歧视导致的冲突和极端分子增加的问题，这和我们科里的会议上提到的一样。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当民警科的科长拉埃南建议我谈谈尤哈·麦瑞瓦拉的案子时，大家一下都振作了精神。

“你们考虑过尤哈的儿子没有？这些环保激进分子越来越猖獗，会不会是儿子杀老子？”

“这不成逻辑，”我反驳说，“我刚刚看了麦瑞瓦拉公司的家

庭网页，他们做的都是对环保有益的生意。”

“对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什么逻辑可言。动物保护革命组织中最激进的顽固分子，也就是环保解放运动组织的成员，他们抓住环保部长哈卫斯岛，对他灌输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思想观念，迫使他对环保运动做出妥协。民警科的警察都知道这件事。”

“十七岁的儿子由于观点不同杀了老子？很难让人信服。”我反驳说。我和法医都怀疑尤哈·麦瑞瓦拉的死是打架造成的。伊瑞有可能会和他父亲打架，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在黑夜里的悬崖上？

会议的话题已经转了，可我还是沉浸在麦瑞瓦拉的案情中。毒品侦缉科任务一直比较紧急，几星期前在基勒高奴密破获了一个摩洛哥人的贩毒团伙。在审讯中，他们招认在首都近郊到处都有他们的据点。晚报上也时有报道外国人后裔的毒品团伙的活动情况。这就为埃司堡的“斯耿”组织[①] 提供了借口，他们在备勒加殴打了一个伊朗人的儿子。我隐约地记得这起案子是由斯切姆处理的。

“你明天有空吗？我们一起去吃午饭。”会议结束时，达斯基宁问我。

“我还不知道哩，希望有。明天上午我给你打电话。”

我刚刚走到办公室门口，手机响了：

“我们在麦瑞瓦拉家。布斯特亚勒威和技术鉴定员来取他们的衣服，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吵。”高依吾着急地说。

伊瑞没有去上学，他不愿意把自己喜欢的惟一一套衣服交给警察，那是他在跳蚤市场买的一套草绿色的野战服和一双网球鞋。芮佳和达甫沙都给他做工作，最后他终于答应合作。出乎意

---

① 种族歧视组织。

料的是，安奈·麦瑞瓦拉不是在家，而是在公司里。芮佳帮着找出衣服交给了技术员，她记得那是尤哈死的那天晚上，她妈妈穿的衣服。

“要不要今天提审麦瑞瓦拉夫人?”高依吾问。

“明天吧，明天也许我有时间亲自参加。”

“浩勒玛和麦瑞瓦拉家的女儿现在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带来行吗?”

“带来吧。”我说。我极想知道达毕奥·浩勒玛和芮佳·麦瑞瓦拉的罗曼史。我先占好了审讯室，然后强迫自己从自动供餐机里取了一份清淡的炒饭。我拨了贝蒂·斯切姆家的电话，我做好了斯切姆不接电话的思想准备。电话铃响了五遍之后，有人应道：

“我是斯切姆。”

“我是玛丽娅。嗨！你病了吗?”

电话里传来呻吟声。我可以想像斯切姆现在的表情：布满疙瘩痘的脸气得通红，断过两次鼻梁骨的鼻孔张得大大的，浅棕色的眼睛里流露出迷茫的神情。

“昨天跑步锻炼的时候，他妈的闪了腰。”

“是腰肌损伤吗？你去看医生了吗?”

“没有。我无法从床上起来!”

“那就得请医生到家里来。”

“别开玩笑了，加里奥。休息两天就会好的。你打电话来肯定是为了工作，决不会是问候我的健康的。有什么急事?”

我要他尽可能冷静地叙说一下正在办的案子。我想听清楚他的声音是不是那种喝醉酒后的嘶哑的声音。

“王和我一起处理阿拉伯混蛋的案子。”贝扎说。这正是我们要说的伊朗人和“斯耿”团伙的斗殴事件。“我们抓了一个女的，把她带到局里来，要她供出其他的同党分子。”

"王还是站在伊朗人一边，就像上次她站在索马里人一边一样。"

"为什么不让她去搞毒品案？那些黑社会的头面人物在过去都是显赫一时的。"斯切姆指的是春季破获的一起由三个越南人组织的贩毒团伙，其中成员有百分之七十是芬兰人，但说起来还是越南人团伙。他们非法倒卖大量的苯异丙胺[①]，把埃司堡人搞得人心惶惶。

我又叮咛斯切姆一遍，如果明天腰还痛的话，一定要去看医生。在原则问题上，我总是寸步不让，所以经常和斯切姆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他想随心所欲，没门！他和我作对的目的，也许是想调换工作，而他兴许还可以借口说是我把他排挤出埃司堡警察局的。

这时王来说，达毕奥·浩勒玛已经等在楼下，准备受审。芮佳没有来。

"高依吾说先不管那姑娘。"王用含蓄的口气说。高依吾最大的优点就是在警察生涯中能秉公职守，不会向妙龄女郎献殷勤。他是一个正直豁达的男子汉。

我又往鼻翼两侧扑了点粉，这可以掩盖一些雀斑，因为夏天晒成棕色的肤色已渐渐消退，冬天长时间地在室内工作，马上就会把皮肤捂白了。头上又出现了几根灰白的头发，我又该把头发染成棕红色了。我爸爸在四十岁时，头发就已经灰白了，看来我会是相同的命运。要知道那灰白的头发是会影响外表的美观的。

上一次我们见面时，达毕奥·浩勒玛穿的是布裤子、毛衣和军用大衣，今天他穿了一套裁剪得非常合身的黑灰色西装，系了一条黑色的领带，就像要登台演出一样。

---

① 一种毒品。

"你好！加里奥警察。"浩勒玛伸出手和我握手，"你……你负责调查尤哈的死因？"

"是的。"我带浩勒玛走进第二审讯室。那里已经准备好了咖啡，我倒了一杯。我在休妈妈假时，只在早晨喝一次咖啡，如果白天再喝，我的肚子就会提抗议。说也奇怪，我的肚子很快就能适应警察的生活习惯：多多地喝咖啡，少少地睡觉，不规律的吃饭时间，狼吞虎咽的吃饭方式，在二十四小时连续作战的情况下，也能保持最佳状态。我对着录音机说完开场白，还没等我开口审问，浩勒玛喝了一口茶，说：

"哪里有公道？警察一直不告诉我们死亡的原因，只是取走我们的指印，收走我们的衣服。这样对待悲伤的家庭，难道是对的吗？"

"据我所知，你现在还不是麦瑞瓦拉家的正式成员。你和芮佳同居了吗？"

"还没有正式同居，但芮佳很多时间是在沙代加瑞[①] 我的家里度过的。"

"尤哈·麦瑞瓦拉对他女儿和你的关系有什么看法？"

"这有必要说吗？"浩勒玛甩了一下领带说。

"有。一般的父亲也许都会嫉妒女儿的男朋友，尤其是你比他女儿大了二十岁。"

从身份证上我看到，达毕奥·浩勒玛生于1955年，他只比尤哈·麦瑞瓦拉小四岁。

"我直接说正事行不行？"浩勒玛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可他那不听话的头发一会儿又乱了。这样子看起来挺像《七个弟兄》[②] 中的一个。"我认为尤哈的尸体，很明显是从悬崖上掉下

---

① 地名。
② 芬兰名著。

去的。为什么就这些问题，每个受审的人都得说一遍?”

“你是不是麦瑞瓦拉家受欢迎的女婿候选人？你们的关系有着戏剧性的开端，是你救了芮佳，使她免遭强奸。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我不明白，这和尤哈的案子有什么关系？真是莫名其妙。是不是一定要像侦探小说里的故事那样生搬硬套?”浩勒玛坐直了身子，开始以救人英雄的口吻讲述事情的经过：

在四月中旬，浩勒玛被告知：如果不做手术，他的声带就不能恢复，于是，他就想用百鸟的歌声来充实自己空虚的生活。因此，他特别地热衷于春季候鸟的迁徙。四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的凌晨，他就赶去勃勒加拉半岛观看候鸟的迁徙。

芮佳的遭遇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必须负责把姑娘平安地送到家。当芮佳确认他是一个见义勇为的正派人时，才放心大胆地坐进了他的汽车。浩勒玛把自己的手机给她，可她拒绝给警察打电话。

一路上芮佳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了，到家门口时，她没有立刻从车里出去。浩勒玛把自己的名片送给她，并且再一次叮嘱她给警察打电话。芮佳害怕警察和她父亲，他们会指责她为什么随随便便搭小伙子的便车。

达毕奥去了勃勒加拉半岛，但他再没有心思观看鸟，满脑子都是刚才碰到的那个姑娘的影子。这就好像鬼使神差地让他碰到了这件事。下午他一回到家就倒头睡觉，三点的时候他被一阵门铃声吵醒了，原来，是花店的服务员来送十二朵白玫瑰花。花中夹着一张卡片，是芮佳感谢他这个救命恩人的。

浩勒玛立即给芮佳打电话，对她赠送的花表示感谢。同时，他又问她是否已经和警察联系过了，姑娘说还没有，他就自己和埃司堡警察局我们科联系了。当他获悉垛莫·哈拉宁已被其他的

犯罪案子起诉时，他又给芮佳打电话，要她和他一起来警察局。

芮佳还是犹豫不决，因为她除了听过浩勒玛的几张唱片外，对他一无所知。一起去报案，当然是再次见面的最好借口，但她想事先和浩勒玛交换一下意见。因此，他们约定第二天晚上，在达毕奥拉文化中心的咖啡厅里见面。

浩勒玛惊奇地感到自己对这次见面十分紧张，他选择衬衫花了半个多小时，他还一再把那不听话的头发梳了又梳。芮佳晚来了十分钟，他就坐立不安地在心里嘀咕着：不知道姑娘会不会来？当姑娘到来时，他竟不知道该怎样打招呼。最后，他选择了西欧人的习惯，行亲吻礼，这使芮佳惊讶得不知所措。

“这该不是白日做梦吧！”他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芮佳看起来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怎么能追求这么年轻的女孩呢？可她显得是多么的娇媚和成熟啊！

在去警察局的路上，由于芮佳还是犹豫不决，所以他们又没有成功。但是第二天上午，姑娘同意去了。高依吾受理了他们的报案，他已经为两个案子审问过垛莫·哈拉宁了，所以垛莫是个什么样的无赖，高依吾知道得一清二楚。

报案结束后，浩勒玛带芮佳去咖啡厅，就达毕奥的失声问题他们聊了很长时间。芮佳心血来潮地想学声乐。达毕奥想：即便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他也不能放跑了芮佳，必须抓住她。最后，他问芮佳，愿不愿意哪天晚上和他一起去看歌剧？芮佳高兴地答应了。达甫沙在心里默默祈祷：但愿这不是自作多情。等到分手的时候，他又勇敢地行了亲吻礼。

“首先碰到的麻烦是，芮佳还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开始时，安奈和尤哈都对我很友好，也许是要还我的人情债吧。”

“后来，尤哈·麦瑞瓦拉反对你们同居，是吗？”

达毕奥·浩勒玛皱起眉头，又理了一下头发。他已经不再是

幼稚的小伙了，完全树立起了包沙侯爵那样的自信。难道羞涩忸怩的十几岁的姑娘和四十岁的男人初次约会，只有他浩勒玛一个人吗？

“唉，是……尤哈不能接受我们相差太大的年龄，所以反对芮佳搬到我那里去住。我们这种事，根本称不上什么戏剧性。在我以前的生活中，倒确实充满了许多戏剧性。实际上，芮佳经常在我那里住。”

手机铃声打断了浩勒玛的话。我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因为他的手机铃声是斗牛士的咏叹调，取自《卡门》歌剧，听起来很可笑。剧中的斗牛士是男中音，这是浩勒玛喜欢的角色吗？

浩勒玛没有回电话，他把手机关了。接着，我开始问他尤哈·麦瑞瓦拉死的那天晚上的事。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议论过多次。我没有发现那天晚上有什么异常，尤哈为安奈献了很动听的贺词，并举杯祝酒。伊瑞一直是闷闷不乐，但这已屡见不鲜——他宁愿去吐尔库参加示威活动，反对裘皮模特表演会，而不愿呆在瑞兹盖尔岛的家庭宴会上。”

达毕奥·浩勒玛说他夜里睡得很沉，所以根本没有听到什么异样的声音。早晨七点十五分，当米盖来敲他的门时，他才醒来。

“他说了些什么？”我紧接着追问。

“米盖？他的嘴唇都白了，说尤哈从悬崖上掉下去了。他要找人帮助打电话。”

“你能肯定是这么说的吗？”

“怎么啦？我不能肯定什么，因为我那天早晨的情绪不好，我和芮佳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震惊得六神无主。”

如果米盖自己给警察打电话，他会担心警察怀疑自己，尤哈

的死不是单纯的意外事故；如果他想保护自己，他当然要给大家这样一个印象，即尤哈是坠崖身亡。米盖对前去取衣服的人是什么态度，在回家之前可以从布斯特亚勒威的报告中知道。

“你为什么要和休白格一起到尸体旁打电话?”

“他不想一个人去，他吓傻了，和我们大家一样。加曲娜·休白格是惟一镇定的人，她指挥塞娅煮茶，并安慰麦瑞瓦拉家的人。安奈想冲到尤哈跟前去，我们极力拉住她，并安慰她说：‘人死了，就不会再活过来了。’”

浩勒玛离开后，我打开电脑里犯罪记录一栏，在瑞兹盖尔岛上的这些人中间，除了伊瑞，其他人都是一清二白的。最后，我查看了尤哈·麦瑞瓦拉的资料。他的超速罚款一栏，简直可以和达巴尼·刚色[①] 相媲美。但是，我对这样的事不感兴趣。1991 年 12 月，尤哈的帆船撞了一艘摩托艇，那个驾驶员死了。尤哈·麦瑞瓦拉血液里的酒精度是千分之一点二。

① 芬兰的著名歌唱家。

6

星期二早晨，安迪对我说，下午他和依旦要进城去。埃司堡人说去赫尔辛基市中心，就说进城。

“我想去看自行车示威游行，”他说，“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那些非机动车和步行的人把马纳勒海明大街[1]堵得水泄不通。”

我听说过这回事，这使赫尔辛基维持秩序的警察被迫加强警备。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但有些汽车司机非常紧张，他们中间有些人串联一些私家车主一起攻击环保激进分子，瞅准了机会就向示威游行的人吐口水、扔石子。

“你要一直保持着微笑，并要注意保护好依旦的漂亮头发。那里保证有便衣警察在拍照。”我说。临出门前，我亲吻了丈夫和女儿。爱因斯坦[2]趁我出门时也溜了出去。它昨天一夜不得安宁，因为那些老鼠为躲避秋天的冷空气，都搬到我们房子的地底下来了，不断地发出窸窣的声响。现在，猫一定在琢磨：是不是该从外面过去抓它们？

没有下雨。这样的天气，我一般是骑自行车去上班。安迪曾建议把我们的菲亚特汽车卖掉，因为我有局里配备的公车，去年

---

① 赫尔辛基市的一条主干道。
② 猫的名字。

开的是“沙巴”[1]。有时候在下班回来的路上，顺便去超市买点菜，自己开车还是感到很方便。我在休妈妈假期间没有开过车。安迪去买菜或带依旦去听音乐会，乐于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我也许是受了他的影响。

走进我们科的走廊，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正僵直着身子走路的斯切姆。他听到我的脚步声，慢慢地转过身来，手里端着的一杯咖啡，洒了一点到地上。“嗨”一声，是最一般的招呼语。

“可以来上班了吗？”我谨慎地问道。

“还不行，但不得不来，他妈的，案子全都耽搁了。听说又要分配年轻的警察来，是吗？”

“近几个月是没有可能的。下一批是补充经济犯罪侦缉科。”

由于资金不足，我们局里的许多固定编制都空缺。我们科缺一个年轻的警察编制已有三年了，贝扎和达斯基宁为这事争论过。但新的财政预算没有给警察增加拨款，所以编制只能永远空缺。由于人手短缺，我就必须马不停蹄地工作，无论是撕纸的小事，还是审讯的大事，我都得亲自出马。

“由此可见，这些搞财政预算的混蛋们搞的什么把戏！为什么没有人把警察资金短缺的事实公布于众？既然如此，当警察不得不向被包围的罪犯开枪时，就让他们呜里哇啦地去叫唤吧！”

斯切姆这是在重提热门话题。那是发生在一年半前的一起案子，一个越狱逃犯劫持了我们一个同事，把他带到很远的人迹罕至的一幢别墅里作人质。那时我们局里有人不止一次地问，到底在什么情况下，警察才有开枪的权力？我们的同事巴洛和逃犯哈都宁都在那次包围冲突中死了。那天的执勤队长和向哈都宁开枪的北极熊小分队的队员都被起诉了。但这件案子至今还没有了

---

① 芬兰汽车。

结。因为在审讯期间，我临近产期，紧接着我就休了妈妈假，案子就这样中断了。贝扎毫不妥协地坚持，起诉的理由不充足，哈都宁是自己找死。

“要当心你的腰，别让它越来越严重了。还是去看看医生吧。”我说。

“这些医生，你猜怎么着？药丸往你手心里一拍说，干活去吧！前面的病人给了‘利特灵’，同样的药又给后面的病人治痛经。”贝扎讽刺地说着，推开了自己办公室的门。

我把参与麦瑞瓦拉公司案子的人全部召集到会议室，高依吾、布斯特亚勒威和王是从案子一开始就在这里工作的；布包宁是来加强实力的；另外又从经济犯罪侦缉科调来了冈代立宁，他负责调查麦瑞瓦拉公司的财政情况。

“那个岛上有假象，这一点十分明显，”布斯特亚勒威疑惑地说，“这个公司这样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首先想知道尤哈·麦瑞瓦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对破案肯定会有好处的。除此之外，在初期的审讯中，提到那天夜里有人上岛，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从海上公安处得到新的消息了？”我问布包宁。

他摇了摇头。瑞兹盖尔岛不是太靠近海岸线，所以不进行常规性的巡逻，岛上很有可能出现不被注意的陌生船只。因此，我不能片面地相信加曲娜·休白格所说的情况。所谓的船的故事，可能只是保安人员的巡逻而已。

麦瑞瓦拉公司的办公楼坐落在芬诺尼德。我们的汽车开过埃司堡市中心后，就拐弯上了狭窄的芬诺路。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距离全国第二大城市[1] 的市中心只有两公里的地方，居然是

---

① 埃司堡。

一派田园风光，可它们在突然间变成了建筑工地，转眼间有些农田就变成了两层楼的楼房，更有些变成了小洋楼。住进这些楼里的人，给人的印象就像住在大自然中间一样。在我们住的汉达地区，也在盖新楼，那噪音就像雨夜的青蛙叫似的。有时我不免忧心忡忡：哪里有这么多的人来住这些楼？

麦瑞瓦拉公司的办公楼的式样，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那种盒式的工业大楼的建筑设计师的杰出代表，只是他们后来做了一些改进，用三种不同的蓝色涂料粉刷了外墙。在这个时代，经济发展是一种典型的奇迹。

安奈显然已经获知警察的汽车驾到，所以她已经在门厅里等候着我们。我感到纳闷的是：星期天她刚刚受了那么大的打击，怎么还能继续在这里工作？虽然一身黑色的套装更加衬托出她的温柔贤惠，但她说话的声音仍是一副职业妇女的腔调。

“你好！高级警察加里奥，欢迎到我们麦瑞瓦拉公司来。”安奈完全像没那回事似地说，“到楼上会议室去吧，在那里你们可以说你们要谈的事情。”

安奈走起路来很精神。她的左手一直握着拳头，好像拳头里有什么东西。我们和她一起走进电梯。这幢办公大楼一共有三层，最上面一层是一个宽敞的统间。从拐角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波拉尼德[①] 已经枯黄了的田野。

“你们可以找我们任何一位员工谈话。这是尤哈的秘书鲍拉·莎尼奥，她愿意协助你们。”安奈向我们介绍了一位高个子、深黄色头发、精力充沛的女人。

“好吧！这位高级警察冈代立宁想要看看公司最近的财务报表。”

① 地名。

“可以。不过，这是为什么呀?”安奈·麦瑞瓦拉有点惊慌失措地问。

“我很抱歉，你丈夫的死有谋杀的嫌疑。”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软心肠，可现在看到安奈瘫倒在椅子上，我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她很快地松开了左手，手上是一块翠绿色的、直径大约五厘米的石头，石头的表面已经被磨得光滑圆润。

“谋杀？这意思是有人杀了尤哈？可是瑞兹盖尔岛上没有其他人像……我们中间谁想杀害尤哈?”

“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考虑这个问题。”我建议说。随后我开始作案情摘要，同时，冈代立宁查看公司的账目，王和高依吾、还有布包宁、布斯特亚勒威向员工了解情况。麦瑞瓦拉公司不是什么大公司，生产部门有二十个职工，科研部门和新产品开发部门有五个人，办公室的科室人员有七个。

当我向部下们进行工作安排时，安奈·麦瑞瓦拉坐在那里，神情惶惑地在桌子上摆弄着那块翠绿色的石头。等我的部下们和秘书一起走出去后，她把石头拿起来递给我看：

“这是一块玉石。是塞娅给我的。这石头可以给我力量和坚定的信心。”

“你是不是感到困惑?”我在安奈的对面坐下。

“有时候。但是我有坚定的属相。我要定夺一件事情，在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结果之前，总是要从多方面考虑再三。”

“你相信属相和石头?”

“我相信。我还相信尤哈现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活着。”安奈严肃认真地说。幸好布包宁不在场，如果他听到这话，肯定要说尤哈现在正如一棵狗尾巴草般地继续活着。

“我能找到一点自我安慰，那就是尤哈也许会变成一只海鸟，

这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坚信哈瑞已经变成了一只海鹰。”

海鹰？哈瑞是喜欢海鹰的。我清晰地记得：有一天上午他出现在我面前时，是多么地兴高采烈、容光焕发。他那时刚刚在汉高半岛西南边的树林岛上，观察到有一只鸟巢里孵化出了两只雄性的小海鹰。哈瑞一直为环境污染而悲哀，担心生存条件恶劣，会引起海鹰绝种。后来他还痛心疾首地给《芬兰大自然》杂志写了一篇十分尖锐的批评文章。

“尤哈会变成什么鸟？”我问。我认为这样的谈话纯粹是浪费时间，我只是想让安奈先得到点安慰，因为我马上就要向她提出一些不易回答的问题。

，安奈看着石头摇摇头。她还没来得及考虑好这个问题。她清楚地知道在社会上有这样的人，他身体魁梧，声音洪亮，可他会把鸟巢里的雏鸟赶出去。她是站在中间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的，所以，在生意场上必须要坚强果断。

早晨我用半升的杯子喝了一杯咖啡，现在又想喝了。能不能向她们要一杯咖啡？不知道这里的咖啡供应是属于办公楼食堂的呢，还是个体户的？我正这么想着，门被打开了，尤哈·麦瑞瓦拉的秘书端着托盘走了进来。鲍拉·莎尼奥给我们杯子里倒上了咖啡。我很想亲自找她谈谈，因为一般说来，秘书知道上司的其他事情不比他的妻子少。莎尼奥对我们说了一句“点心都是胡萝卜馅的软饼”，然后就转身出去了。

咖啡可以提神。我喝完一杯后瞥了一眼安奈，她正在强迫自己吃胡萝卜软饼。

“生日庆祝会上是什么样的气氛？”

安奈咽下嘴里的饼，回答说：

“非常地轻松愉快，尤哈表现得很出色，使每一个人都感到很高兴，使我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间忘记了哈瑞，这是很不容易

办到的。在那段时间里，我一直不敢看米盖，因为我知道他也还记得哈瑞。当然，葡萄酒为气氛增色不少。”

“尤哈的血液中验出过量的酒精度，他是不是喝了很多?”

安奈认为尤哈是喝得过量了。平时他很少喝醉，那天主要是餐桌上有三种菜很对他的胃口，所以这就促使他在吃饭的时候多喝了几杯；加上祝酒时喝的白兰地，还有当水喝的中度啤酒，他从下班后，在回家的路上就开始喝了。

“酒对他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安奈又否定说，“我认为星期六那天尤哈不算喝得特别地多。也许是哈瑞的祭日对他的情绪有影响。”

“尤哈对芮佳和达毕奥·浩勒玛的关系持什么态度?”

“达甫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男人，也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安奈又咬了一口胡萝卜软饼，用薄荷茶把它冲下去了。

“是女婿的候选人吗?”

“这段罗曼史的时间不长，等到达甫沙的声带恢复，也许芮佳对英雄的崇敬心情就凉了，事情就会烟消云散了。”

是不是安奈·麦瑞瓦拉用同样的话安慰过她的丈夫？当我问及，安奈承认，尤哈是特别不喜欢女儿的男朋友和老子的年龄差不多，但并没有为此事争吵，因为芮佳已经是成年人了，她有权利和她喜欢的男人同居。尤哈反对芮佳搬出去住的主要原因是：两个人认识只有半年，相互还不了解；再说她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家。

“尤哈认为女儿必须先独立一段时间，而不是离开母亲直接到男人那里去。”

这种说法倒不是没有道理。接着我问伊瑞的事。安奈·麦瑞瓦拉以前因为尤哈不同意伊瑞参加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经常同尤哈闹别扭。

安奈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你说尤哈是谋杀，米盖说尤哈是从悬崖上掉下去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尤哈到底是怎么死的？”

“很抱歉，我们不能告诉详情。”

“所以，我和孩子们都是嫌疑对象，是吗？”

“是的。”

安奈站起来走到窗户旁，把石头装进左边的裤袋，然后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田边的柳树在风中摇摆，一群乌鸦在相互追逐玩耍。枫树的叶子已经红了，其他的树叶仍还是绿的。如果晚上有冷空气入侵，那么白杨树和柳树的叶子很快就会黄了。如果之后再下一场秋季的暴风雨，就足可以使树木的棕色盛装脱得一丝不挂。

“尤哈的死，对我们的打击已经是够沉重的了，何况还是有人把他杀了……这不会是真的吧？”

安奈转过身来对我说。今天她没有戴眼镜，眼圈周围的皮肤显得要比额头和脸白。这也许是戴太阳镜留下的痕迹。薄薄的嘴唇没有一点儿血色，嘴角已经刻上了细细的皱纹。安奈·麦瑞瓦拉仍还保持着苗条的身材，脸部表情一点也不迟钝，颧骨高突红润，鼻子秀颖挺拔，称得上是一个漂亮的模特儿。如果她再淡淡地化点妆，穿上色彩明快的服装，去做信得过产品的广告是没话说的。

“你怎么能想得出是伊瑞谋杀了他的父亲?！即使他是牛虻，也不会蜇自己的父亲。”

我没有回答。安奈清楚地知道我曾看见伊瑞和阿基拉打架的情景，但我没有提这件事。

“不提伊瑞了。你和尤哈的婚姻关系怎么样？你幸福吗？”

安奈又回到桌子旁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你所谓的幸福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可把我问住了。我只好端起杯子又喝咖啡。

“我不止一次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人为什么总是在寻找幸福。现实中我确实为平等力争过，但幸福……年轻的时候，我认为幸福就是爱，可看见的事实总是相反的。我曾天真地向往一种折衷的生活方式，那就是生活中既充满了贪婪，又贯串着爱。但这样的天方夜谭是不存在的，他们只能在不幸福中度过一生。不能盼望别人给你带来幸福，但你可以为自己创造幸福。”安奈喝了一大口茶后，接着说：

“对尤哈来说，幸福仅仅是在结婚的初期，他有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公司的进口贸易也很顺利。后来，幸福就在于沙吾伽海边的一幢新房和一艘大帆船。尤哈的幸福是和物质享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可以从芬兰湾驾驶帆船去弗格娄，五十个小时不睡觉。可是孩子的微笑和我的爱，对他来说不是幸福……”

安奈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有一滴眼泪慢慢地流到左边的脸颊上。

“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我的幸福，就是能使尤哈和孩子们都感到幸福。当然我还有别的新的追求——就像那时候我们一起发明了生态船漆，我从中真正地感到了幸福。”

安奈擦干了眼泪，勉强地微笑了一下，说：

“说实在的，我的整个心思都在芮佳身上。这孩子从小就是一个动物迷，但在她十岁的时候我们发现，她对所有动物的皮毛都过敏，比如猫、狗、马、腮鼠等等，这对孩子来说太残酷了。于是，我就开始调查引起过敏的原因，发现根源在于环境污染。可于此同时，尤哈考虑的只是麦瑞瓦拉公司的部分产品投入到油漆工业的竞争中去。”

安奈端起茶杯，一口气喝干了。她的手腕是那样地纤细，好

像端不动这盛了半升水的茶杯。这样的手怎么能打死一个人?

"去年，我们在观点上又是背道而驰。尤哈不懂人的价值，他也没有三思而后行的特长，只知道鲁莽地向前、向前，全部时间都是艰难地拖拖拉拉地向前发展。尤哈不认为大自然的价值和人类提倡保护大自然的价值是相等的。为这观点，他和伊瑞经常辩论，伊瑞认为，小河里的孑孓和它的成虫蚊子的价值是相等的。"

会议室里的电话铃响了。安奈看了我一眼表示抱歉，然后去接电话。很容易猜到，这是秘书打来询问有关生意上的事的。安奈说这件事推迟到下周。有关工作中的事情，她说起话来就像下命令，脸上的表情显得一本正经。我确实感到惊奇：丈夫死了不过几天，她就有能力管理业务了。可能她认为对尤哈的尊重和悼念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继承他的事业吧。

"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大的分歧?"等安奈放下电话后，我问。

"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干过什么事。尤哈对我的周末安排总是不感兴趣，然而在封斋期间，我也不可能和他一起去葡萄牙旅游。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们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了。视公司如家，这对四十岁的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

"四十岁的人还有性欲要求吗?"

安奈·麦瑞瓦拉没有回答。但我注意到她又开始抚摸身上穿着的孝服[1] 了。

"你们有第三者插足吗?"

"我没有。"安奈迟疑不决地说，"尤哈嘛，我知道得不确切……有可能他在旅行中或在什么会议上会遇到某个感兴趣的女

---

① 芬兰的孝服是黑色的。

人，但我不认为他有什么固定的情人。”

安奈·麦瑞瓦拉会不会被蒙在鼓里？她也许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了疑惑，所以又接着说：

“我是真心爱尤哈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矛盾的关键在于我们俩的性格差异太大。婚姻的前十年，我确实感到受了伤害，我怀疑尤哈有第三者。后来，我的思维方式改变了，认识到我不可能占有他的身体和灵魂，两个人的结合必须是心甘情愿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

此种态度的表白，不禁使我想到，安奈·麦瑞瓦拉是故意想给警察留下一个这样的印象：她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男人有其他女人，这样就可以排除情杀的动机。

我站起来，走到就近的窗户跟前，触景生情地联想到，从我自己的办公室的窗口望出去，是一片宁静的枯黄了的田地和吐尔库高速公路上永不停息的奔驰着的汽车。麦瑞瓦拉家住在海边，高依吾曾经感慨地描述过，从他们家的客厅里望出去，那真是视野开阔，一望无际，还可以看到太阳落海的景观。而他自己住在雷巴瓦拉[①] 的公寓楼里，从那里望出去，只能看见旁边的住宅楼和小得可怜的放垃圾箱的空地。所以，他长年累月地总是把百叶窗关着。

“安奈，这是谋杀案，任何企图隐瞒案情的行为都是愚蠢的，其后果可能会被起诉为协从谋杀犯。”我尽量使自己的话语不带威胁性，“我想尽快地审讯伊瑞，他今天放学后是不是在家？”

“伊瑞什么也不知道！”安奈的声音都变了，就如同第一次审讯时一样，“他放学后要直接去什么地方参加示威游行。”

“肯定是和安迪、依旦去的同一个地方。”我默默地在心里想

---

① 地名。

着，然后又问："伊瑞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

"很遵守纪律，就是要和老师辩论。评语上写着：他在思维方面学习超前了。但他还得去学校，因为他要上大学。他准备写一篇论文：《现代消费者的忍耐是有限的》。"

"啊哈，伊瑞也许是受他父亲的影响。"我说完，提醒自己在离开之前，应该抓紧时间和鲍拉·莎尼奥谈谈，因为回到局里后，还要开个碰头会。因此，我决定结束和安奈·麦瑞瓦拉的谈话。我又拿了一块胡萝卜软饼，因为我饿了，中午没吃饭，晚上还要去跑步，不吃东西脑袋会爆炸的。

"你丈夫在六年前出了一次船祸，死了一个人。"我最后说，"这对他有没有困扰？"

起初，我挺热衷于这起船祸。但审讯记录上详细的调查报告已经公布于众，结论是，过失不在尤哈·麦瑞瓦拉。在1991年的时候，醉酒的极限是千分之一点五。水上交通局的人证明，是在船祸中溺死的阿劳·高保宁开着摩托快艇撞了麦瑞瓦拉的帆船。那天，勃勒加拉的海面上浓雾弥漫，再加上高保宁的血液里有千分之二点几的酒精度，尤哈·麦瑞瓦拉实事求是的叙述是公道的：高保宁醉得糊里糊涂的，根本没有看见其他的船。那船就是尤哈·麦瑞瓦拉的船，船中还有两位朋友。

安奈愣愣地看着我，好像没明白我的问题似的。

"啊，这个，"她结结巴巴地说，"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那件事对尤哈没有什么困扰。是那个人在大雾中直接撞过来的，尤哈还跳到水里想救他，自己差点淹死。"

在我还没有调查清楚阿劳·高保宁的背景细节前，报仇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鲍拉·莎尼奥的办公室位于尤哈·麦瑞瓦拉的办公室和门厅之间。我敲了敲玻璃门，看见莎尼奥正在一边对着手机讲话，一边

操作电脑。她闻声向我点点头，表示请进。我跨进她的办公室，直接向尤哈·麦瑞瓦拉的办公室走去。冈代立宁正在里面把电脑里的资料储存到硬盘中去。我满心希望能从这房间里，意外地发现尤哈·麦瑞瓦拉的个人隐私和麦瑞瓦拉公司的经济秘密。

我打开门边的衣柜，一个衣架上挂着深咖啡色的毛料西服上装，同色裤子挂在裤架上。另外两个衣架上挂着衬衫，一件是白色的，另一件是淡黄色的。两件衬衫都被熨得没有一丝褶皱。三条领带——深咖啡色图案花纹的、蓝黄碎花的、蓝白相间有铁锚图案的都挂在领带夹上。衣柜里还有一双深咖啡色的网眼皮鞋和一副网球拍。我从架子上找到了一副深蓝色的拳击手套、一条白色的网球短裤、一件白色的翻领网球衫、一双深咖啡色的袜子和一双价值七十马克的网球袜。这些东西的旁边放着一副护肘，是打网球时保护肘关节用的。架子下面，有一双阿第达的名牌新款网球鞋。

我把手伸进西服上装的两边口袋，左边口袋里有一枚十分的硬币。然后掏胸袋，那里是空的。裤子口袋里也没有找到什么，网球短裤里也一无所获。

我打开下一个柜子的门，里面是清一色的文件夹。从文件夹背脊上的标注可以知道，里面都是些交换信件和新产品开发的资料。

“我把这些都录完了。”冈代立宁慢条斯理地说。

“发现什么特别的线索没有？”

冈代立宁摇摇头，说：“我只是照猫画虎，把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交到局里去。你在找什么？”

“动机。”我叹息道。我走到桌子跟前，打开最上面的抽屉，里面有一枝钢笔和一本厚厚的《时间管理者》手册。我把它们拿到手里，就好像是抓到了线索似的。尤哈·麦瑞瓦拉的办公桌上，

有一张微笑着的全家福。照片是在帆船的甲板上照的，很明显这是几年前的留影，因为芮佳和伊瑞都留着长发，看上去还是天真无邪的孩子。

第二个抽屉里都是些纸张，有公司的各种资料、年度报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下面的抽屉里，有达毕奥拉网球场和体育中心的介绍，还有前一次举办的船只展览会的小册子。桌子下面是两个垃圾篓，一个是装废纸的，另一个是装废物的。废纸篓里是空的，废物篓里只有一把折断的塑料梳子。

墙上有两幅镶着镜框的黑白照片。一幅照片上的绅士留着石板形的圈脸大胡子，戴着眼镜，照片下面写着：米加尔·麦瑞瓦拉，1874 年—1947 年。另一幅照片上的绅士是窄脸，凸出的喉节分外眼熟，我不用看下面的字就知道，他是马丁·麦瑞瓦拉，尤哈和米盖的父亲。他健在于 1919 年—1982 年。

我记得加曲娜·休白格在审讯时，把他们的家谱摆得非常清楚，米加尔·麦瑞瓦拉的父亲和哥哥都是船长，他从阿维南马群岛到赫尔辛基就读工程师课程。米加尔因痴心地迷恋上一位芬兰朋友的女儿，结婚后，他便改姓芬兰人的姓了。他先是做麦芽糖浆的生意，赚了足够的钱后，就创建了麦瑞瓦拉公司，生产轮船的配件。马丁·麦瑞瓦拉是米加尔的独生子。马丁继承了公司，但他不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生意人，在父亲去世两年后，他就被迫卖掉了公司的一半股份。

买主是古斯达·恩克尔，他有一个比马丁小十岁的女儿弗莱杰嘉。生意成交后不久，恩克尔就死了。马丁灵机一动，心窍顿开：和财产继承人弗莱杰嘉结婚，那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就又可以回到自己的公司来。马丁和弗莱杰嘉在 1950 年结婚，第二年尤哈出世了。他们从此再没有其他的孩子，因为弗莱杰嘉不久就染上了肺结核，于 1958 年去世了。

八岁的尤哈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公司的一半股份，但马丁控制着尤哈的财产。不过，当时有一个总管委员会，他们要求监管尤哈的财产。在整个六十年代，公司的生意兴隆，因为人们掀起了一个航海热潮。

无论是米加尔·麦瑞瓦拉，还是马丁·麦瑞瓦拉，都是意志坚定、颇有主见的人，他们从没干过被人戳脊梁骨的事。从这两张照片下面注明的生卒年月可以知道，尤哈·麦瑞瓦拉的照片出现在这个行列里是太早了点。

书架上有一些地图册、几只奖杯和帆船的小模型。我拿起一只奖杯看，那是1978年在汉高的划船比赛中得的一等奖。其实尤哈·麦瑞瓦拉的帆船航海技术不如米盖，但米盖从不参加什么比赛，只是凭自己的兴趣航海。

地图册之间夹着一些有关鸟类的书籍和一些英语的大部头书，大都是些关于海运方面的指南。其中有一本小说，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曼·梅威尔的《莫彼迪克》[①]。书架上还有一个精致的镜框中嵌着一张照片，是一个含笑的女人。这个女人我从未见过，但从五十年代的发型和衣领的款式，我可以判断她是弗莱杰嘉·麦瑞瓦拉。芮佳长得和她很像：微微向前翘起的大下巴、细长的脖子和弯弯的柳叶眉。尤哈·麦瑞瓦拉就说不上哪一部分长得特别像他的父母亲。

“电脑里有没有什么个人的隐私？”我问冈代立宁。

“没有。这些磁盘我还没有检查。你要找什么隐私？给情人写的信？”

“也许是吧，无论什么隐私都行，只要能证明尤哈·麦瑞瓦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

① 系译音。

我又回忆起在瑞兹盖尔岛上匆匆一见的情景，我特别反感有人用“小妈妈”的字眼来称呼我。尤哈·麦瑞瓦拉自我暴露了他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虽然他在进行自然环境保护工作的合作中也很霸道，强人所难，但他意识到了大自然就像一些懦弱的女性，她们的贞操一旦被挽救，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到大自然中去享受迷人的景色。

鲍拉·莎尼奥敲敲门走了进来。她确实是一个高个子女人，足有一米八，还穿了一双七公分高的高跟鞋。深黄色的短发吹得蓬蓬松松的，像一个戴在头上的钢盔似的。身上穿了一套男式的白垩隐条的休闲服，被宽宽的肩膀撑得很合身。她的胯骨很窄。她看上去有三十多岁，左手的无名指上有两枚细细的钻石戒指，耳朵上也有一对小小的钻石耳环。她的嘴唇涂成浓浓的深棕色，其他地方的化妆倒不是那么引人注目。

“现在我有时间回答你的问题了。”她的声音很低沉。我敢保证，当你在电话里听到这样的声音，肯定会感到特别地高兴。

我走回鲍拉·莎尼奥的办公室，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从背包里拿出记事本。

“你在麦瑞瓦拉公司工作多长时间了？”

“五年。前任秘书是尤哈父亲时期的秘书，已经退休了。”

“你喜欢在这里工作吗？”

“非常喜欢。”鲍拉·莎尼奥在她的工作椅上坐下，跷起二郎腿，两手抱住膝盖，她的手指甲都涂了红色指甲油。

“总经理尤哈·麦瑞瓦拉是个什么样的人？”

“要求非常严格，工作目的必须明确，不能有半点马虎；工作效率要高，不能优柔寡断。”

“你工作肯定做得很好。你们的关系怎么样？”

“我们的关系？”微笑立刻从她的嘴角上消失了。她那巧克力

色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看，“你的意思是问我们之间有没有超出老板和秘书之外的其他关系？答案是：没有。不错，在我刚来的时候，他是有邪念的。因为他听说有的男人以愿意承担一切责任的大度，来检验自己对新认识的女人的魅力，所以他蠢蠢欲试。不过他不得不承认，第一次就碰了钉子。”

我点点头，又问：“尤哈·麦瑞瓦拉有没有第三者？”

“我不认为他有固定的情妇。有时候生意上有应酬，他也难免要花钱召女人。我有时赶趟也给他在饭店里订过桌子。”鲍拉·莎尼奥轻蔑地撇了一下嘴。

“安奈·麦瑞瓦拉知道这些事吗？”

“我认为在老板夫妇间搬弄是非是不忠诚尽职的表现。”她说话像开机关枪似的，能听到砰砰的声音。

“我理解。但我们现在是在调查你们老板的死因，恕我要求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

鲍拉·莎尼奥想了一会儿，说，她相信安奈是知道尤哈在外面寻花问柳的风流事的。从去年开始，这对夫妇给人的印象就好像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工作中，两人相处还算融洽，可在业余时间和休假期间，他们就分开过。瑞兹盖尔岛对安奈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可是哈瑞的死，也是在这个时候，这多少削弱了她对这个岛的爱。

“安奈提出了企业管理的道德准则和人的因素第一。可对尤哈来说，这些都是束缚手脚的教条，会妨碍生意的。这样双方就顶上了牛，僵持着谁也不作让步。”鲍拉·莎尼奥说，“很遗憾尤哈死的不是时候，我们的产品正准备出口到德国和丹麦。国内市场的萧条时期已经过去了，正在开始复苏。公司要兴旺，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头人，安奈不是那种人。我看这个公司迟早要卖掉，不然的话，会有很多的麻烦。现在，已经有两家大油漆厂

和一家瑞典的轮船公司都等着要买哩。”

这个公司大概估价能值多少？这件事情要问问冈代立宁，这笔生意中有芮佳和伊瑞这两个年轻人的财产。伊瑞会不会把钱都捐给动物保护革命组织？

下午，我不想继续坐在那里开什么组织发展工作会议，看见达斯基宁坐在我旁边打盹，我递给他了一张“无稽之谈”的纸条。他回敬我的也是“无稽之谈”。会议上有一个空缺的编制，因为钱还不能满足老的需求，所以新的就免谈。

我在回来的路上敲了斯切姆办公室的门，从里面传来一声可怕的吼声，我猜想这意思是让我进去。我推开门，斯切姆正在“修理”桌子最下面的一个抽屉①。

“曼加的那起持刀抢劫案进展怎么样了？需要布包宁继续在那里吗？”

斯切姆慢慢吞吞地站起来，坐到椅子上，他的表情一片茫然，好像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没有找到证人。这必须交代给维持秩序科，在他不接电话的情况下，早晨六点就去堵他。”

“腰怎么样了？”我走近他问。斯切姆把头转向另一边，开始点烟。

“还是痛，想坐的时候不能马上坐下去。”

斯切姆吐出第一口烟。烟的臭味直扑我的鼻子，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从他呼出的气息中，可以闻到新鲜的酒味。

---

① 他正在喝酒。

7

五点钟过后，我回到家里，吃了一根香蕉，就把衣服换成了跑步的运动服。安迪和依旦还没有回来，只有我们的家猫爱因斯坦在我脚跟间攀缠，我弯下腰去，在它脖颈下面挠了挠痒痒，然后就出门向埃司堡中心花园跑去。跑了几百米后，喘气就规律了。秋天的空气湿润，便于呼吸畅通无阻。我迫使自己不去考虑工作中的事情，可是有两件事情总是在脑海里交替出现，怎么也挥不去。

一件是麦瑞瓦拉公司的案子还没有结果。

另一件是贝扎违反制度，上班时间喝酒。

我曾直接问过他喝酒的事，他矢口否认。我要求他打开桌子最下面的那个抽屉，他反驳说，那里面的东西不属于我管。由于我急着要去开会，所以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这件事情还得追究。我是一科之长，不能不闻不问地放任自流。我猜想，斯切姆在上班时间喝酒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敢肯定他是故意做给我看，想检验一下我是不是铁面无私的包青天；二是他确实有什么烦恼之事，所以这样以酒浇愁，使自己生活在醉生梦死之中。如果换一种设想：当初他若被提拔到科长的位置，也就是我今天的位置，那他的一切就会风调雨顺。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斯切姆在过去的几年中闹的是什么别扭，但凭

直觉感到，他对我抱有敌对情绪已经很长时间了。偶尔他对我表示一下虚情假意地友好，反而使我很尴尬。

我转弯跑到一条小路上，从这里可以通向奥拉瑞[①]。毛毛细雨把小路上的低凹处都变成了泥泞的小水坑。我的运动鞋湿了，我觉得左脚跟好像被什么东西硌着，那感觉实在令人难受。但这倒可以使我分散注意力，暂时忘却工作中的事情。过了一会儿，我停下来，脱下鞋，把袜子往上拉了拉，又用手巾纸叠成小方块垫在脚跟处。

在我下班之前，冈代立宁把已经整理好的麦瑞瓦拉公司的调查报告交给了我。公司的员工一致认为，尤哈·麦瑞瓦拉是一位严厉的、但又很得人心的老板。公司的统一协调很好，全体员工都把自己的命运与公司的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大男子气十足的经济经理告诉布包宁，他曾两次陪同尤哈·麦瑞瓦拉出席生意场上的交际应酬。在那种鸡尾酒会上，除了咖啡和白兰地之外，还有陪酒女——都是些长着迷人大腿的摩登女郎。经济经理至今还十分留恋那种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直听得布包宁这个色情饭店的老主顾都不断地点头。

奇怪的是，以保护大自然的提倡者自居的公司，竟打着提高发展的保护伞，用会议的活动经费支付性服务费；更奇怪的是，安奈·麦瑞瓦拉竟会默认这样的事情。

由此可以联想到，麦瑞瓦拉公司在经营中可能还有别的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在整个跑步过程中，我始终无法把工作中的事情抛开。回到家里，我已经是汗流浃背了。安迪和依旦还没有回来。我打开电视，画面是腹肌锻炼运动。我换了一个频道，新闻刚刚开始：叶

---

① 地名。

利钦访问南斯拉夫。龙卷风席卷佛罗里达州海岸。伦敦又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欧共体屠宰牲畜前不人道的运输方法。在许多年前，当我听到有关屠宰牲畜前不人道的运输的新闻报道时，就会情不自禁地勃然大怒。电视新闻播音员的表情，比他看到在南斯拉夫或是在卢旺达境内发生的内战和饥荒还要难过。接着播音员发出警告说，下面的镜头不适合孩子和神经脆弱的人看。播出的是一些瘸腿猪的画面，以及很多猪一起被残忍地关在封闭式的大拖挂车的车厢里，它们一个挨着一个，一个上面摞着一个，密密挨挨地挤在一起。它们的粪便流得到处都是，看着真是恶心极了。肯定有许多吃猪肉的人在看到这个镜头后，再也不吃猪肉了。

我倒没有感到特别恶心，只是感到万分悲哀的是，前两天在同样的电视新闻里播的阿尔巴尼亚的难民，冒险偷渡去意大利，那船上也是挤得水泄不通，甚至还有人被挤到海里去了。可播音员当时并没有警告说，这样的新闻不适合某些人看。

“在芬兰也有示威游行，”新闻播音员用平静的口气继续说，“赫尔辛基的警察今天在马纳勒海明大街上，驱散堵塞交通的自行车和步行的示威游行队伍。他们反对在市中心驾驶私人汽车。高峰时间安排这样每月一次的示威游行，惹恼了这些汽车司机，因为他们的时间被耽搁了。由于出言不逊，引起了武斗，街上的石头在汽车司机和示威者之间横飞乱击。有两个示威者受了轻伤，有五个被逮到警察局去了。”

我不由得担心起依旦来。这个该死的安迪，怎么能把一岁大的孩子带去参加示威游行？那石头是不长眼睛的呀！新闻的镜头转到警察组成的人墙上，他们一个挎着一个的胳膊。他们旁边晃过一个熟悉的绿头发的脑袋。父亲的死，并未能阻止他来参加示威游行。镜头拉近一个年轻姑娘，她的鼻子上戴着鼻环，黑头

发，身上穿着年轻人流行的长裙和南美洲人的毛格呢斗篷。她的脸上流着血，背上还被愤怒的汽车司机扔的石头击中了。

“社会对车主们太苛刻了，”一个长相很帅的男人接受记者采访时，夸张地说，“每次上税都有我们的份，我们付的汽油费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可在市中心却很难找到停车位，即使有，价钱也很高。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只要看见警察拿着警棍站在那里，就知道又要停车受检查了！”

我抓住右腿的脚脖子，使大腿的肌肉放松。新闻已经转成报告什么比赛结果了，我心情烦躁，便关了电视。这时，门开了。爱因斯坦一蹦子从沙发上跳下来向前面跑去，那样子就好像安迪给它带来了美味的猫食似的。依旦咿呀学话的声音在门厅里响起，我赶紧走过去，把正在反复叫“妈——妈”的孩子抱起来，紧紧地搂在怀里。依旦挺拔秀气的高鼻子和自然鬈曲的蓬松头发，都来自于我的遗传；深色的眼睛和眉毛，则长得像安迪。孩子身上散发出香蕉的香味，我把鼻子贴在她身上使劲地闻，使劲地亲吻她。安迪在前面搂抱我们，使女儿夹在中间像夹心面包似的，逗得她高兴地叽里呱啦乱叫。

“现场有新闻实况转播。”我说。

“他妈的真有混蛋扔石头！好在我带着依旦一直在安全的地方走或者骑自行车，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下一次把依旦留在家里。你看见伊瑞·麦瑞瓦拉了吗？”

安迪点点头。从他的叙述中可以听出，他对这个失去父亲的伊瑞深表同情。小伙子没有过来和他打招呼，只顾穿过马路加入到对面示威游行的队伍中去。安迪抱着依旦也没有跟过去和他打招呼。安迪打抱不平地想：双方都扔了石头，为什么车主却一个也没有被抓起来？

我快速地冲了个澡，就开始做饭。菠菜和鳄梨腰果酱都是依

旦喜欢吃的菜肴。她吃饭的时候必须要用两把汤匙，一把由喂她吃饭的人拿着，另一把她自己拿着，结果总是搞得一塌糊涂，把座椅下面弄得脏兮兮的。但她是一个自理能力很强的孩子。爱因斯坦很失望地卧在椅子边上，显得有点生气，因为这顿晚餐没有肉丸和鱼丸，全部都是蔬菜。

九点半，等依旦睡着后一会儿，我也去睡觉了。我没有梦见工作中的事，却梦见了波光粼粼如镜面一样平静的海面，海面上航行着一艘长长的帆船，其速度之快不亚于摩托艇。早晨醒来，心情感到有些压抑，我不想回忆梦中到底是和谁一起航海，又是谁逗得我哈哈大笑。

我穿上一套新款的套装，把头发梳在后脑勺上绾了个发髻，脚上穿了双高跟的高腰皮鞋，这双鞋是我在一时冲动之下买的。现在穿上这鞋走路不太方便，但这后跟能使我高出几公分，就只能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晨会上，我感觉自己格外地神采奕奕、精神焕发。斯切姆戴着一副墨镜坐在桌旁，嘴里无精打采地嚼着尼古丁泡泡糖。我不愿分散精力，虽然几次想停下来，但我坚持一鼓作气地把工作分配安排下去。

"阿拉加勒达诺路的殴打妻子案……这个男人是有前科的。谁负责西尔芭·威达宁和阿瑞·威达宁的审讯工作？"

"他又打老婆了吗？"斯切姆大声吼道。

"他妈的，不把他关起来才怪呢！我负责这个案子。"布包宁坚定有力地说。

"同时给公诉人打个电话，叫他和你一起去医院审讯西尔芭·威达宁。我已经看过威达宁的材料了，看后使人不得安宁。阿瑞·威达宁已经是第三次把老婆打得住医院。他老婆一次也没有自己来报案，只是给约威地区办事处的人说了一下。他们夫妇俩

有三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昨天夜里，他又把老婆的两根肋骨打断，下巴骨粉碎性骨折。孩子已被送到立巴亚勒威的收容所去了。”

“贝扎，你和公诉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就地判决？高依吾，你和我一起去找伊瑞·麦瑞瓦拉和米盖·休白格。”

麦瑞瓦拉家里没有找到人，伊瑞去埃司堡湾的高中上学了，要到那里去找他。我们又去伽达的米盖家，在那里碰到了他的母亲：

“米盖在芬兰湾海港码头的船上，我在这里等警察的通知。是不是可以回阿维南马群岛了？我已经订了今天夜里的船票，行吗？”

“你对星期天所说的情况还有补充吗？”

“没有了。我要去参加尤哈的葬礼。”

“米盖说过几点钟回来没有？”

“吃中午饭的时候，大约一点钟。”

我给米盖留下了我的手机号码，然后我们开车向埃司堡湾方向驶去。在教师路上，坐落着一幢高大的红砖砌成的学校大楼。

“啊哟！”汽车停下时，高依吾叫道，“你通知我去学校时，我心里就发怵，我小时候在老家加亚尼刚上学的时候最害怕上学，还经常吓出病来。我们一定要见校长吗？”

我被他逗笑了。我想，教导处肯定最了解伊瑞在校的学习情况了。我们走进回声很大的走廊，里面可以闻到一股烤鸡块的味儿。走廊里的长凳上四仰八叉地仰卧着一个男生，他头上戴着一顶腈纶帽，穿了一条裤腿特别宽的裤子——他的一条裤腿就够做我的裙子了。我问他教导处在哪里？他嘴里咕噜了一句含含糊糊的话，又用手指了一下，算是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们自己沿着走

廊走了一圈后就找到了。校长不在办公室里，一位胖胖的上了年纪的教导主任惊讶地看着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当我说明是来找伊瑞·麦瑞瓦拉时，她的表情马上就变了：

“伊瑞……等等，我不敢肯定他是不是在学校，因为他的父亲在上个周末去世了。”教导主任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因为灯光刚好在她的头顶上方，“你们是为尤哈·麦瑞瓦拉死的事情来找他的吗？这确实是属于警察的事情吗？”

我们又不得不从头至尾地叙述一遍案情的经过。尽管我们局的消息发布员已经在记者采访时作了尽可能详细的介绍，一直到记者们明白为止。我是在第二天的晚报上看到这篇报道的，记者还提到了哈瑞的死，也是在一年前这个相同的日期。但我不同意最后的结论：引起意外事故的原因是岩石上太滑了。

“我们要调查几件私事。如果伊瑞·麦瑞瓦拉在学校里的话，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让我想想……伊瑞在高二B班，他们在上体育课。到健身房去看看吧，我可以为你们带路。”

健身房里空空如也，但有一股还没有散掉的汗臭味，从这一点可以判断，刚才这里是有人的。有可能他们去旱冰场或者排球场了。

“也许他们都在外面，让我想想……先到图书室去看看。”

教导主任在前面带路，我们在她后面跟着。突然，我们听到从一间教室里传出来一阵刺耳的破碎声。教导主任摇着头，说：“这些不遵守纪律的学生！这里就是。”

教导主任打开图书室的门，里面很暗，有一个女生穿着长裙、披着穆斯林教徒用的大围巾，正借助从窗户外射进来的一窄溜的亮光看书。

“嗨！法蒂玛，我们要找伊瑞·麦瑞瓦拉。他是不是在图书馆

里?”

女生摇摇头。从大围巾中露出的黑色脸蛋是秀气的。

“伊瑞今天在学校吗?”

“在。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去游泳馆了，我想他是喜欢在游泳池里消耗精力的。”法蒂玛说着不太流利的芬兰语。见她不敢看高依吾，我就纳闷，如果是个男老师上课，她怎么能好好学习?

教导主任走出来关上门后，解释说：“由于信教的缘故，法蒂玛不能去游泳。其他的学生都在那边埃司堡湾的游泳馆里。”

我们把汽车留在学校的院子里，走路穿过体育运动场去游泳馆。太阳暖洋洋地在空中照耀着。夜里有霜冻，使一些柳树的叶子都变黄了。由于穿的新皮鞋走路不跟脚，害得我走出了一身臭汗。我解开了脖子上的丝巾。

“唉，法蒂玛不能去游泳。”高依吾惋惜地说，“我就不明白，游泳有什么不好？她不能和同班同学一起活动，肯定会感到很痛苦的。”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但我的全部心思都在伊瑞·麦瑞瓦拉和他父亲的事情上，所以我没有在意这些少数民族的问题。可是，高依吾继续说：“我想阿奴也是这样，就是王。当初她立志上警校时，她的父母也不是特别支持的，越南家庭的观念，警察不是女人的职业。他们也不喜欢阿奴把名字改成芬兰人的名字。她原来的名字叫‘娣’或是‘丹’，而且名字是倒过来叫的——‘王娣’。”

我好奇地瞥了他一眼，阿奴·王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她自己的这些事情。高依吾和王在工作中合作已经很长时间了。

我向游泳馆的门卫出示了警察证，他就让我们进到潮湿闷热的内厅去了。我喜欢游泳，但我不喜欢在游泳池里游，因为那里

面有消毒剂的味道和永不停止的喧哗声。游泳池里有二十来个年轻人和几个退休老人，他们发出的高兴的欢闹声直灌耳朵，听起来好像玩具狗发出的吠叫声。有一部分学生在五十米的游泳池里，那里的男生分成两队，正在打水球。伊瑞的绿色头发出现在儿童游泳池的边沿上。高依吾的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一位体形特别优美的十几岁的女生，她正穿着金黄色的紧身三点式比基尼泳衣，从更衣室里走出来。我凭直观断定，那个在打水球的队伍中指手画脚的男人是体育老师。他看上去有四十来岁，身上的汗毛很重。我把鞋脱掉，慢慢溜下去，走到游泳池边上，对他说：

"我是埃司堡警察局的高级警察玛丽娅·加里奥。你好！我们想找你的学生伊瑞·麦瑞瓦拉谈话。"

"又是伊瑞？为什么总是在体育课上？"老师生气地说，"真没有办法，唉！他正坐在那儿呢，他不喜欢在室内游泳，但我不能在十月份还带他们到海滨去游泳。"

在游泳池的边沿上坐着的伊瑞仍是一脸的稚气，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同班女同学高高耸起的胸部看。他自己的肩胛骨和肋骨都清晰可见地裸露在游泳裤的上面。他的皮肤很白，一点都没有留下被夏天的太阳晒过的痕迹。

"嗨！伊瑞，走，到外面去。"我尽量使自己说话的声音婉转温柔。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像小孩子似的犟头倔脑地对我说："为什么？"

"我们必须找你谈谈你父亲死的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你去穿衣服，跟我们一起到警察局去，完事后我们再把你送回学校来。"

伊瑞的同班同学全都跟在高依吾后面，到更衣室来瞎起哄：

"你们要把伊瑞抓走吗？"一个女生问。她的眼圈上涂了足有半个钱币厚的白色眼影，指甲全部染成灰蓝色，肚脐眼上、舌尖

上和下嘴唇上都穿孔戴了环。

“不，是找他谈话。”

“是有关他父亲死的事情吗？是有人谋杀他吗？”

我一边点头，一边向门口走去，压根儿不想理身后七嘴八舌的议论。我在门外等了五分钟后，看见伊瑞和高依吾出来了。伊瑞走在一米九的虎背熊腰的高依吾的旁边，下巴向上翘着，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我们向汽车走去。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有伊瑞在场，我们很难找到合适的话题。即使到了警察局后，不外乎又是把相同的问题重复一遍，尤哈·麦瑞瓦拉在瑞兹盖尔岛上的心情怎么样？夜间，伊瑞有没有听到什么特殊的声音？大部分对怀疑对象和证人的审问都是大同小异地重复相同的问题，然后再从他们的破绽和自相矛盾中找出蛛丝马迹的线索来。

如果假设伊瑞杀害了他的父亲，他能够隐瞒真相吗？

高依吾啪啪地转换着收音机的频道，他想选择可听的音乐。古典音乐的频道上有一位男中音正在歌唱，他很可能是达毕奥·浩勒玛。高依吾突然又把频道转到下一个，“善良的心还没有找到”——这是芬兰民族歌唱家加来·阿赫拉正在演唱，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哼起来。伊瑞坐在后座上正在听耳机，从耳机里传出来的隐隐约约的乐音，就像示威游行的人发出的无助的呻吟声。

汽车开过芬诺路上的麦瑞瓦拉公司后，伊瑞突然出人意料地说：

“我昨天在示威游行的队伍中看到你的丈夫了。你自己是警察，怎么能让他到那样的地方去？”

“我为什么要限制一个成年人的自由呢？如果我没有工作的话，也许我自己也会去。可我手头上有你父亲的死因调查工作要做。”

虽然我坐在前座，伊瑞坐在后座，但当我提到“死因”的字眼时，仍可以感到他有些惊慌失措。难道安奈·麦瑞瓦拉没有告诉孩子，警察怀疑是谋杀吗？

“你能肯定确实是有人杀了我父亲吗？可是……可是谁也没有被逮捕啊！”

我转过身，看着伊瑞，他那湿漉漉的绿头发全贴在脸上。

“谁应该被逮捕呢？”伊瑞没有回答，我转回身，再没有说话。

我们走在通向审讯室的走廊里时，我问伊瑞，是否想吃些什么或者喝些什么？他摇摇头。高依吾给我们每人端来了一杯咖啡。这杯咖啡比往常的要苦一点，而且不太烫，我就一口气把它喝完了，这样就不会聚积咖啡因。正巧，口袋里还有一块口香糖，它可以消除嘴里的苦味。

第四审讯室里有大声的吼叫声，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辨别出那是斯切姆的声音，哪怕听不清所说的话，我也知道他是在处理打老婆的阿瑞·威达宁。伊瑞蹙着眉头，扫了一眼第四审讯室的门。

“这是我第三次走进这走廊。”他说。我装作没有听见。

“听说有一种人，他根本就没有勇气走进这里来。”我冷淡地说。然后带伊瑞走进第二审讯室。

“我们还得从头开始。”

伊瑞没有脱外衣就倒在沙发上，像霜打的茄子——无精打采的。高依吾还在喝咖啡。我开始问伊瑞上一个周末的事情。

“我们在吐尔库也搞了示威游行，反对新开张的裘皮商店。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去了。我勉为其难地去了瑞兹盖尔岛，使父亲感到很满意。他说，他不愿意再为我付任何罚款。”

从伊瑞的话中，我得到这样的印象：他去瑞兹盖尔岛，主要是考虑到母亲。虽然伊瑞想按自己的愿望生活，但母亲的幸福对

他来说还是十分重要的。

“自从一年前哈瑞死后，母亲一直很害怕去瑞兹盖尔岛。她总是要我和芮佳在她眼跟前，就好像我们还是小娃娃似的。但这可恨的塞娅愣是哪壶不开，专提哪壶！”

当着伊瑞的面，塞娅·莎莱拉对大家说，她相信在意外事故中死去的人是不得安息的，他的阴魂不散，总是在出事的地点徘徊，尤其是在周年的祭日，表现得更甚。

“母亲很相信塞娅的谬论，塞娅就更来劲了，东拉西扯地又说了许多，直到米盖说有事要跟她说，她这才停止了胡说八道。”

伊瑞不喜欢呆在生日晚会上，总想找机会溜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十一点钟时，当安奈说要去睡觉了，伊瑞顿时感到，陪同的历史使命完成了。他想放松一下，便走了出去。外面的无月之夜黑沉沉的，他在悬崖上走了一会儿就回去睡觉了，时间大约是差一刻十二点。

在对米盖的审讯中，他曾经说过伊瑞夜里出去过一次。我问及此事，但没有提米盖的名字。

“那可能是我出去小便。一般来说，我睡觉睡得很死，甚至可以在睡梦中走出去都不会醒的。所以，你再要问什么夜间有没有其他的活动或者有没有听到什么，那都是徒劳。我只要睡着了，即使三只闹钟也吵不醒我。母亲经常要用凉水激我的脸，我才能起床去上学，不信你可以去问。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是不是和哈瑞一样，滑倒后坠入了悬崖？这不奇怪，因为他们都是酒鬼！”

伊瑞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响，现在已经是学校的开饭时间了。不知道他每天在学校吃什么样的饭？是否偶尔也到埃司堡市中心去打牙祭？我是不是应该把自己带的饭给他？但那只是些没有上过化肥的胡萝卜和从西班牙空运来的西红柿。

“你父亲不是死于意外事故，是谋杀。你愿意承担谋杀者的罪名吗?”

“狗屁！我怎么会是谋杀者!?”伊瑞气急败坏地大声喊叫道，同时把手叉在腰上，两只手都被过长的衣袖盖住了。

“父亲是个坏蛋，他所提倡的自然保护方面的事情都是烟幕弹，他考虑的只是钱，干的都是伪造假象、假公济私的勾当。我不知道是谁杀害了他、是什么原因。等你调查清楚后，请告诉我，我会感到高兴的。”

伊瑞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好像是在检验他的慷慨陈词的效果怎么样似的。我也回盯着他看。当他重新鼓起勇气的时候，我又问了他几个问题：

“为什么恨你父亲？他是不是干了什么对不起你或者你母亲的事?”

伊瑞瞪了我一眼，没有回答，他把脖子缩进他的外衣里去了，那样子就像打摆子感到冷似的。可是审讯室里的温度至少有22℃。

“你和父母的关系怎样？是不是经常和他们吵架?”

“这他妈的关你什么事?”伊瑞踢着桌子说，“母亲不是谋杀犯，她从来不伤害有生命的东西，她也不干那样的坏事，不像父亲！你可以去问达甫沙，生日晚会那天，他在洗桑拿浴时和父亲吵什么？最后是谁先动手打的人?”伊瑞又提供了新的线索，但他已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

“桑拿浴？几点钟？是白天还是夜里?”

我一连问了三个问题后，伊瑞才说，他们俩拌嘴，从下午就开始了。为了节约时间，桑拿浴男女轮流洗。女的先洗，等她们全部洗完，天还没有黑。伊瑞和米盖在女的洗完后，第一批就洗了。当尤哈和达甫沙还没有洗完的时候就要开饭了，加曲娜就派

伊瑞去叫他们。小伙子刚走近桑拿浴室，就听见里面正吵得天翻地覆的。

“父亲大声地对达甫沙说，要他放弃芮佳。达甫沙寸步不让地说，芮佳已经是成年人了，她可以做任何她愿意做的事。我没有听清楚达甫沙下面说的话，但听到里面响起了打架的声音，我就不能再袖手旁观了，赶紧推门进去，对他们说了声吃饭了，转身就出来了。达甫沙把父亲的鼻血打出来了。这样，他们就休战了。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夜里又继续开战了？父亲是个一惹就急的人，要找他吵架很容易。”

有必要再找达毕奥·浩勒玛谈谈。但我想先找米盖谈谈有关凶器的事，也就是打死尤哈·麦瑞瓦拉的凶器，这是破案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证据，也许米盖没有看见这件已被转移的凶器。

“我可以走了吗？五点十五分我们有英语考试，五点钟我必须准时赶到学校。”

“还有一件事，伊瑞，有人把做裘皮的动物从饲养园里放跑，结果它们都死了，你对此有什么高见？”

伊瑞暗暗地吃了一惊，但他还是强词夺理地答道：

“如果死几只动物能拯救几百只动物，或者迫使饲养园老板破产，不再杀害动物，那就死得值得。怎么啦？上个周末我没有去吐尔库，所以，什么也不知道。即使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他妈的这些饲养园的老板扬言要杀害这些放跑动物的人，你们警察对此有什么看法？”

“残杀总不是好事。”我面无表情地说。伊瑞的挑战是那样地针锋相对。最后，他拒绝坐警察的车回学校。这样我也就不需要车了。从基罗到埃司堡湾有公共汽车，不过要换三次车。

我无心再计较小伙子的习非成是的性格，因为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我告诉高依吾，我要去瑞兹盖尔岛。现在这种天

气，六点钟天已经黑了，最好是尽可能快地动身。我要他和我一起去，还有两个技术员连同米盖·休白格。

“我们坐船去。你不要做怪相，带上晕船的药，这保证管用。”现在我最迫切的事情是吃饭，我得到楼下的咖啡厅去解决。

我和高依吾一走进走廊，我的肚子就开始唱空城计了，正如刚才伊瑞一样。从第四审讯室里传出的激烈吵嚷声，使我们停住了脚步。里面有大声的呵叱声，有乒乒乓乓的碰击声和劈劈啪啪的打人声。

“斯切姆，住手！”是布包宁急切的喊声。我和高依吾对看了一眼，忙冲了进去。高依吾推开门就大喝一声，斯切姆一拳正打在阿瑞·威达宁的脸上。布包宁极力想把他拉开，可白费劲。威达宁的鼻子里瞬时流出血来，他抬起手捂住鼻子。斯切姆抓住他右边的肩膀使劲往桌子上压。正当他还要打的时候，我和高依吾冲过去帮助布包宁把他拉开，两个男人抓住他的手臂，我抱住他的腰。

“贝扎，冷静些！”

斯切姆把愤怒的面孔转向我，脸上粗大的汗毛孔里渗出了汗珠，急促的呼吸中带有甜甜的酒味：

“你他妈的又来捣什么乱嘛！”

我不和斯切姆废话，因为每一个警察都知道，在审讯时打人，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阿瑞·威达宁的脸已经红肿，鼻子也破了，血已流到桌子上面的旧审讯记录本上。

“高依吾，把他带到医生那里去。”我说着，伸手从桌子上的盒子里抽出几张纸巾递给威达宁，让他把鼻孔塞住。他擦脸的时候，痛得龇牙咧嘴地嗷嗷叫。高依吾抓住他的肩膀，把他带走了。

“到瑞兹盖尔岛去，推迟到明天！”我在他后面大声地喊道。

这件事看来也不会很快解决。

“十二点零四分审讯中断。”布包宁平静地对着录音机说，然后把它关了。贝扎还在喘气，他的胸围和肚子在上个月又加大了一圈，现在正随着呼吸上下起伏。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布包宁。他瞟了一眼斯切姆，有点犹豫。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在我们科里，布包宁最讨厌斯切姆，这是众所周知的。

“是他说话像放屁似地激怒了我。”斯切姆自己说，“你自己听录音吧！我可没有精力向你解释，我要去抽烟了。”

“抽完烟回来。”我说。但愿尼古丁能帮助他冷静下来。

我向布包宁点点头。他开始把录音带倒回去，过了一会儿，房间里就响起了阿瑞·威达宁蛮横无理的声音：

“这个不要脸的婊子，她说她只去了商店，不错，她手里是提着两升牛奶，可是去牛奶店根本要不了一个小时。她又说在店里碰到了一个邻居老太婆，在那里说了一会儿话，这纯粹是瞎话，我根本不相信，准保她是去和哪个骚老头睡觉了。”

“就因为这，你就打老婆?嫌她在商店里耽搁久了，是不是?”贝扎恶狠狠的声音并不比威达宁的弱，话中带有威胁，从录音中也可以听出恐吓的成分。

“你老婆的事我也知道，斯切姆，她不也是在几年前跟了别人了吗?女人都是一样的婊子，我也嫖女人，把她们的……”

这时，威达宁挨了一拳，打断了他的话。录音里可以听到打架的声音、疼痛的哀号声和布包宁的劝架声。“狗日的，我毙了你。”这是斯切姆在录音里录下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在我们冲进来之前。

布包宁说，审讯进行得很不顺利，威达宁的逻辑是打老婆不犯法。因此，他只要看不顺眼老婆，就把她打一顿，这就导致了

这个女人的逆反心理，经常给别的男人脱裤子。威达宁直言不讳地说，他老婆不敢提出离婚，因为他曾经威胁说，只要她提出离婚，就把她和孩子统统杀掉。我想公诉人就是根据这话，上一次把他关了几个月。像他这样的屡教不改分子大有人在。

不管威达宁的犯罪行为有多么严重，斯切姆也不该在审讯室里打他。

“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已不是第一次。但每次斯切姆都可以蒙混过关。”布包宁说。在斯切姆闹离婚期间，他被停职反省了两个星期，原因是他用手铐打了一个拘留审查的嫌疑犯，使其眉毛部位被打出了血。在执行公务中发生的斗殴事件，当时就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议论话题。从那以后，他再没有犯过，可现在又犯了。

“这一次不能保密了。”我像是在对布包宁说，又像是在对自己说，“你愿意在调查时作证吗?”

“最后会不会开除斯切姆?”布包宁问。但他的声音听起来没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样子。

“这不是我所希望的结果，我也不希望他停职反省。但这是警察局长的事，我得先找达斯基宁谈谈。”

贝扎回来了。他没有看我们，只是站在门口，从他的呼气中可以闻到更加浓烈的酒味。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他又去喝酒了。

“这里还没有大人物来发话吗?”他故作潇洒地说，但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惊慌的神色。

“还没有。但你自己意识到没有，这一次是纸里包不住火了?”

“那当然，小科长保证会跑去趴在达斯基宁的肩头上哭诉，她有一个多么可恶的下属。”

“我不会一个人去哭诉，你和布包宁也一起去。”我用手机拨通了达斯基宁的号码。很幸运，他在大楼里。公开斯切姆的所作所为，我一点都没有津津乐道的兴味。

下午召开的科室会议上，达斯基宁和局长都来参加了。威达宁的鼻梁骨被打断了，还有肋骨也骨折了。他趁高依吾不注意的时候，从医院里给晚报社和专门捕风捉影的地区期刊社打了电话，这些记者们得到消息后，马上就行动起来了。局长除了下令斯切姆停职反省外，没有其他的招。

“我们科已经缺了一个编制，如果斯切姆再离开，工作就不好开展了！”我对着局长大声抱怨，“我想就斯切姆停职反省的事，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明天再定？因为我们没有地方可以找到这样的刑警来解决现在的燃眉之急。当然，年轻的警察可以找到，可我们手头的案子，至少有两起是谋杀案。”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要说的话都说完后，才感觉到我的潜意识中好像有什么东西迫使我这么说。

我一直无法相信哈瑞是死于意外事故，尽管调查的结果是鸟类学家在悬崖上滑倒后坠崖身亡。我怀疑谋杀尤哈·麦瑞瓦拉的动机，不是在家庭的吵架中产生的，谋杀他的人，也就是谋杀哈瑞的人。

8

第二天上午，高依吾和我们一起坐在一艘警察的大巡逻艇的船舱里。强劲的海风，使船颠簸得很厉害。高依吾已经吃了晕船的药。

昨天，局长的决定没有改变，斯切姆又一次被停职反省。警察总署的刑警开始作初期调查，要我和高依吾、布包宁去做证人。随后，我们一行到饭店里去喝了一通酒。高依吾邀请阿奴·王一起去。我回家后告诉安迪，我喝了两杯黑啤酒，另外还喝了一些清纯透明的大茴香酒。我睡觉的时候很不踏实，睡梦中，斯切姆用哈瑞的望远镜打伤了尤哈·麦瑞瓦拉。这会儿在船上就感到一阵一阵地头痛，好在我带有晕动宁，这是出海必备的随身药物。

高依吾的头抵在我的肩上，他已经进入梦乡了。昨天晚上，我十点过一点儿就离开达毕奥拉的匹克威克饭店，赶末班公共汽车回家，其他人则一直坐到半夜。早晨，王还是一如既往朝气蓬勃地来上班，昨天她喝得很少，但高依吾和布包宁今天都萎靡不振。我意识到，要批评斯切姆上班时间喝酒，自己就得以身作则，否则就是伪君子。

船舱里和我们一起在座的有技术员哈加拉宁，他看着正在打盹的高依吾直乐。潜水员和另一个技术员，还有达毕奥·浩勒玛

正在后舱里打扑克牌。米盖·休白格在甲板上和舵手坐在一起。

我要求米盖和浩勒玛一起来，是因为他俩在警察到达之前看见了尤哈的尸体。完全有这样的可能：他们俩攻守同盟，隐瞒真相，或者销毁证据，把凶器扔进了大海。我觉得已从麦瑞瓦拉家的孩子那里得到了一些有关他们俩的暗示，除此之外，在审讯室以外非正规受审的情况下，我还希望能从达毕奥·浩勒玛那里了解到更多一点的情况。

早晨的时间很紧张，我只是匆匆忙忙地看了一眼熟睡中的依旦，觉得很对不起她，不免产生了歉疚：昨天晚上我应该呆在家里和孩子在一起，而不是和同事们在一起喝酒。可是我身不由己，必须和他们在一起。对于贝扎大发雷霆后犯错误被停职反省的事，安迪不可能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但这些同事都能理解。正是由于这种理解，才把我们撮合到一起。我们还有共同的语言，从即将开始的冰球赛一直聊到电视节目。当话题转到斯切姆身上时，大家都哑口无言了。王和布包宁曾经都希望贝扎调到别的科室去。阿奴的苦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斯切姆对待她的态度还是那么恶劣。布包宁说，这一次他可以理解斯切姆，因为审讯阿瑞·威达宁时他在场。他对待妻子和孩子的那种态度实在是令人气愤。

但是，警察还是没有权力打人。刑事判决也分成几个步骤，就像审讯室里一样。

贝扎极力要求他受审时公诉人在场，但他的要求没有被批准。根据法律规定，威达宁的初期调查必须马上开始，因为拘留审讯时间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布包宁为贝扎辩护说，现在的法律保护坏蛋多于保护受害者；贝扎不是无缘无故打人的，他是被威达宁的话惹急后，才动手教训他的。

船舱里渗进来一股汽油味。我的头发上有昨天晚上熏的烟

味，昨天在座的只有布包宁一个人喝多了就不停地抽烟。我决定到甲板上去呼吸新鲜空气。我想把高依吾扶平放下，他睡得像头死猪，一下子倒在板凳上都没有醒。这个样子很像依旦睡在汽车上的安全椅里一样。

夜里已经出现霜冻，海面上很冷。深蓝色的海水已经恢复了原来的面目，清澈透明。夏天时浮在海面上的绿色藻类植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和煦的阳光当空照着，我抬起头，把脸转向太阳，贪婪地吸吮着阳光的热能。斯道拉海劳[①] 在西边的海面一闪而过。空气是那样地清新澄净，以至于可以看见南方那模模糊糊的塔林的轮廓。

米盖·休白格是昨天下午一点半给我打来电话的，那时我正和达斯基宁、局长一起研究工作，他同意和我们一起去瑞兹盖尔岛。加曲娜·休白格已经乘昨晚的轮船回阿维南马群岛了，因为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拖延她回去。哈瑞死的时候，加曲娜没有在现场。她继子的死，她也不是主要的怀疑对象，虽然从她的神态来看，是有可疑之处的。

“多好的天气啊！”我像是一半对着米盖说，一半对着船舱里的人说。此时的风速是每秒钟三公里。这风就好像要吹透我的皮夹克和毛衣。如果我能像米盖那样有先见之明，戴上一顶滑雪帽就好了。夜间的冷空气已经使西北方向的景色换上了红色的盛装，倒映在海面上，当我们的船驶过时，这些倒映的画面被冲破，眨眼工夫，在船尾的波浪后面又出现了，就好像海水中映了一汪鲜血似的。

米盖坐在一只木箱上，我在他旁边坐下。早晨，当我们在芬兰湾海港码头见面时，他告诉我，他听说伊瑞和安奈被怀疑是谋

---

① 岛名。

杀犯。米盖的脸绷得紧紧的，显得很疲倦。他一直呆在甲板上，好像有什么秘密压迫着他。我敢断定他知道尤哈是怎么死的。因为那天潜水员反映说，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控制自己，神情十分反常。当我们的船驶过苏·维沙瑞岛的关隘进入大洋时，他的心情才松弛了一点。达毕奥·浩勒玛一直是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是跟我们一起去浏览观光似的。

瑞兹盖尔岛开始出现在海平线上了。奇形怪状的岩石和各种各样的建筑物（其中有灯塔和围墙），使秀丽的景色更加壮观。这一切就像在我们前方的海面上出现了海市蜃楼一样。

“现在刮的是东风，在这里登陆没问题！”米盖大声地对船长说，他的声音盖过了马达的突突声。我们的“玛丽娅”号帆船开进岛来是很安静的，可是警察艇这突突突的马达声淹没了其他所有的声音，还有它的汽油味也掩盖了秋天的海水那带点咸味的清香。我一下理解米盖为什么不喜欢使用船上的发动机了。摩托艇随着波浪的起伏一会儿掀到浪尖，一会儿又沉落到浪底，颠得我晕头转向，好像大海都不存在了似的。

“我们从西边转过去，那边看来平静一些。顺便我们可以从海上看看出事地点的悬崖。”我对船长说。我已经查看过航海图了，西边没有太大的岩石，所以不必太靠近岸边行驶。

从西边看，瑞兹盖尔岛显得更加巍峨，陡峭的岩壁高得望不到顶。当然，如果想上去的话，还是有可能爬上去的。但和大海相比，它就显得渺小了。如果想神不知鬼不觉地从西边海岸偷偷地溜掉，那是很容易做到的。我们的船开到南边的码头，我听到哈加拉宁正在唤醒高依吾。米盖第一个跳到岩石上去，我紧跟在他后面。好在早晨我有先见之明，把那双新的高跟鞋换成了旧的运动鞋。

高依吾打着哈欠走出船舱，眼睛还是迷迷糊糊的，他赶紧从

口袋里掏出太阳镜戴上，然后蹲下身子噌地一下就跳过来了。这时，潜水员才想起来放下梯子，这样上岸就比较容易些。

“高依吾，你把浩勒玛和休白格带到里面去，我马上就来。”我对高依吾说，顺手把城堡夜宿屋的钥匙递给他，这是星期天留在技术员那里的。

“现在要寻找的是凶器。据法医说，那很可能是一件不规则的并带有一部分玻璃的东西，因为从麦瑞瓦拉的头部伤口处找到了玻璃的小碎碴。”

“他戴眼镜吗？”哈加拉宁问。

“戴。但已经失踪了，要到海里去找。”我对潜水员说，“我尽量以这凶器为把柄，向休白格施加压力。”

高依吾已经把米盖和达毕奥带到了厨房里。这间朝北开窗的屋子因照不到阳光，室内很暗，米盖点亮了风灯。高依吾举起可口可乐瓶，把剩下的可乐一饮而尽。我后悔没有多带一个警察来，这样我和高依吾审问一个人，他就可以在同时间内审问另一个人。虽然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人审讯是不允许的，但在特殊情况下还是可以的。

“走，我们去洗桑拿浴。”我对达毕奥说。他先是吃惊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从板凳上站起来。米盖也跟着站起来，我示意他坐下，说：

“就我们两个人去。”

“芮佳现在怎么样？”我们向外走的时候，我问达甫沙。他摇摇头，说：

“她的心情很不好。在她父亲死的前一天，她和父亲吵架了，所以她感到很内疚。”

桑拿浴室的门没有锁，里面充满了烟味，从烟味中可以闻到干杨树叶的清香味。室内的温度已经超过了我所需要的温度，这

使我想起上一次和安迪一起在这里洗桑拿浴的情景，那次也是温度太高，洗到一半，我们俩就赤身裸体地像两只小宠物似的跑到海边去了。那是八月份的一个夜晚，感觉中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但实际上，时间才过了一个半月。

"你认为芮佳会和她父亲吵架吗？"我在更衣室的板凳上坐下。有人把用过的浴巾揉成一团，扔在墙角的地上。我提起一条浴巾，发现上面有深褐色的污迹，可能是血。达毕奥·浩勒玛迅速地扫了一眼浴巾，忙把脸转向另一边去了。我没有提污迹的事，默默地把浴巾整齐地折叠起来，发现在浴巾的一端绣着两个非常漂亮的名字缩写字母：J·M。星期天怎么没有人把这个拿走？难道技术员压根儿就没有到这里来过？关于吵架的问题，我盯着浩勒玛，迫使他回答。

"我认为芮佳会和她父亲吵的。因为尤哈曾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不喜欢我们的关系。他曾问我，在和他女儿的关系中，是否有真挚高尚的品德？"

"那么你有吗？"我问。

"如果高尚的品德是指打算结婚的话，那么我是有的。"他又抬起手理了一下头发。我不知道他在歌剧演出中做不做这个习惯性的动作，"我知道芮佳年轻，但我愿意同她分享生活和生儿育女。苏姗娜，也就是我的前妻，我们在一起时有约在先，我们不要孩子，因为有了孩子会影响我们俩的事业。那时候，我们把事业看得比孩子重要。现在我的观念改变了。"

浩勒玛看着窗外，又说："那边屋檐下，在春天的时候飞来了一对燕子，在那儿筑了窝，窝里孵出了一群小燕子。我们来岛上的那个星期，正赶上小燕子们出来学飞，它们成天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现在冬天快来了，它们都飞走了，只留下一片寂静。"

我没有去接浩勒玛的话茬，继续问：

“星期天早晨你去了尤哈·麦瑞瓦拉尸体的现场，你有没有考虑过除了意外事故外，还有什么别的可能？”

浩勒玛摇摇头，说：“我怎么想那都是不可能的——有人会杀害尤哈。除了歌剧中，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他故作轻松地说。但我没有回他以微笑。他继续说：“我从米盖的表情来判断，其中肯定有不寻常的事情，但除了意外事故外，他没有漏半句口风。”

我把浴巾摊在达甫沙面前，他尽量回避看它。

“你知道这上面的血是从哪里来的？”

浩勒玛没有回答。他凝视着窗外，不停地抚摸着头发。

“星期六晚上，你和尤哈·麦瑞瓦拉在桑拿浴室里打了架。”

“谁这么多事？”浩勒玛的声音像漏气的皮球。

“不管他是谁，你得说说打架的经过。”

达毕奥·浩勒玛很长时间沉默不语。我又到里面蒸气室去寻找可疑的线索。伊瑞说过，他们动用了柴火棍。但尤哈·麦瑞瓦拉的颅骨不是被柴火棍击碎的，也不是在蒸气浴室里出事的。蒸气室里双层板凳的下层木板上也有深色的血迹。

“这真他妈的犯傻，”达甫沙突然停顿了一下，“两个大男人打架就像两个小男孩似的。”

“谁先动手？”

“我。”浩勒玛很难为情地说，“是我先动手打人，但是尤哈先找茬吵架的。”

尤哈说了些什么，浩勒玛不肯说，那肯定是属于个人隐私方面的事，涉及到芮佳是毫无疑问的。浩勒玛挥拳打尤哈，尤哈拾起柴火棍抵挡；浩勒玛第二拳打在尤哈的鼻子上，鼻血就流下来了。正好这时伊瑞来叫他们吃饭，尤哈就用浴巾擦干了鼻血。

“这件事你为什么不早说？”

浩勒玛狡辩说，像这样的小事不足挂齿，他不愿意在对尤哈的印象中抹上污点。这样的解释倒不是没有说服力。

“伊瑞当然会告诉芮佳和安奈。”浩勒玛叹了一口气说。

当我们从桑拿浴室出来，在走回城堡的路上，他又说：“你那可爱的小女孩怎么样啦？你上班的时候谁照顾她？她还不到上幼儿园的年龄吧？”

“她爸爸休公假了。”我简短地一句带过，看他还有什么离奇的话可说。达甫沙又说：

“我也可以这样做，如果我的声带不能恢复，我就在家里看孩子，让芮佳安心地学习，不要因为有了孩子就扰乱她的生活。”

高依吾和米盖仍然坐在厨房里，他们先喝了一点可口可乐，然后一起研究航海图。

“我们去灯塔吧。”我向米盖建议说。他没有问为什么，只是站起来跟在我后面就走。我们踩着石头阶梯向上攀登。风比先前小了些，平稳的海浪，一浪推着一浪，不断地向前涌进。海平线一眼望不到边。

“这样的天气，一刻都不想呆在房子里。不过，秋天的暴风雨季节马上就要来了。”米盖伤感地说。

“毫无疑问，你一直在做出海的准备。”

“是的。”米盖目不转睛地看着大海，眉毛压在黑白相间的滑雪帽下面，高凸的颧骨下面现出一小片阴影。

“但一定要等到尤哈的葬礼后，因为他是我惟一的哥哥。”

“尸体解剖今天就可以搞完。但是，阻止你离开的原因，除了葬礼外，还有别的事情。”

技术鉴定员们这会儿一定正在尤哈尸体的现场忙得不亦乐乎。不过从这里看不见。

我指了一下西海岸，那里有红色的花岗岩、绿色的青苔和褐

色的地衣，把沿岸的岩石点缀得五彩缤纷。但从这里看不见悬崖峭壁。

“你撒谎——你说你发现尤哈的尸体，是在你爬上灯塔来看日出的时候。”

米盖恶狠狠地转向我，使我暗暗地有点害怕。他张了张嘴，但没有说出话来。我鼓足勇气盯着他的眼睛，就好像要看穿他的内心世界，然后搞清楚他到底有什么秘密。我盯得非常坚决，米盖不得不把脸转过去，我看见他的脸红了。

“我没有撒谎，只是踌躇不决……”米盖用一个肩膀靠在墙上，把脸转向背阳的一面说。

“那天晚上我喝了混合酒，又喝了啤酒，所以，睡觉的时候就翻来覆去地睡不好。我听出风向变了，就起床去检查‘兰达’的缆绳。这时，我忽然想起塞娅说的有关死人的事。我不相信这些，但……”他抬起头想看我的眼睛，但又没有勇气，“去年我把哈瑞带到岛上来，冬天我们又一起去航海旅行，顺路去弗格娄拜访了我的母亲。可是，对于哈瑞的死，大家都无动于衷。我是在元月份才听说这件事的。那时我正好在葡萄牙，因为船龙骨损坏，我被困在那里几个星期。我收到塞娅的信，她告诉了我这件不幸的事。我当时犹豫不决，是不是该赶紧回来给他上坟？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自己产生了不可饶恕的犯罪感：正是因为我建议他来绘制瑞兹盖尔岛上的鸟类分布图，他才遭到了这样的厄运。”

我一直静静地听着米盖滔滔不绝的独白。我不忍心打断他的话，要求他长话短说。尽管我们在这起谋杀案的调查中，不幸的命运已经把我们俩分成对立派，但我在表情中不想流露出丝毫的对立情绪。我尽可能地对米盖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他也持相同的态度，好像不管谁审讯他都一样。

“星期六我一直都想去看看哈瑞出事的地方，但我不想刺激安奈回忆起这件事。星期天早晨，我觉得是个好机会，就我一个人，我就向那边海岸走去……起先，我还以为看花了眼，再定睛一看，浮在海面上的确确实实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我惊惶失措地乱了手脚，一下滑倒了，差一点掉下去。尤哈再也救不活了。然而，我必须回去告诉家里人。我……我是发现尤哈尸体的人，天啊！这太可怕了！”

米盖靠在探照灯的玻璃罩上，右手搭在前额上。这时我很想说些其他的什么话，但我没有，我依旧继续审问：

“你发现尤哈的同时，在海滩上还发现其他的什么东西没有？”

“什么意思？”

“你哥哥的太阳穴向里凹陷，这不是自己造成的。我要找凶器，你见过吗？”

“海滩上没有。”米盖的声音听起来单调乏味，我敢肯定他在说谎。另外，我还有一种怀疑：去年，米盖就是在那个周末把哈瑞带到瑞兹盖尔岛上来的，会不会米盖把哈瑞推下悬崖后扬帆远航，逃之夭夭？我为什么要这样推理？他有什么理由要谋害哈瑞？

“你喜欢你哥哥吗？”

“当然喜欢。尤哈在夏天的时候教训过我一顿。”米盖从口袋里掏出烟斗，用一块手帕很仔细地擦了擦烟锅，“尤哈特别不喜欢我的生活方式。他说，我年轻时环球航海，他能理解，但现在已是三十四岁的男人了，应该安定下来成家立业了。冬天时他心脏病复发，使他忧心忡忡，他想说服我回到麦瑞瓦拉公司来，担任副总经理的职务。”

“但你没有同意？”

一艘大货轮出现在海平线上，我把手搭在前额上做凉棚，想看得清楚一些。可是，我没有成功，强烈的太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猜想高依吾这会儿肯定在想：他们怎么会在灯塔上逗留这么长时间？但是我还不想下去。

“秋天一到，我就开始出海，躲避芬兰的冬天。塞娅说我像奴斯加水里的莫高鱼似的。”米盖笑了，“夏天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能比沙瑞斯岛的海面更美丽。可是今年夏天，海面上漂浮的绿色藻类物，有损美观。我讨厌这些脏东西！”

米盖把烟锅擦干净，重新装进烟丝。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潜水员助理报告说：潜水员在海里找到了眼镜。

“我来看看。”我让米盖带我们去发现尤哈尸体的海滩，并要求他走和星期天早晨相同的路线。他头也不回地大步流星地穿过草坪向前走去。由于夜间的气温低，草坪都已经枯黄了。我没有时间招呼高依吾一起去。

“你是在什么地方看见尸体的？”当我们走到悬崖边上时，我问。

“也许是在这里，也许是在刚刚可以看见海岸的地方……我吓糊涂了，记不清确切的地点。”

技术员又搜寻了一遍海滩。哈加拉宁认为，凡是要找的东西，星期天都已经全部找到了。潜水员在那里休息，他穿着潜水服，背着氧气袋，就像一个从未见过的怪物似的。技术员们都穿着安全服。这一切都加重了破案的气氛。

“你说过是你把你哥哥的尸体拖上岸来的，现在请你说说，当你发现他的尸体时，是什么样的姿势？杜鲁宁！”我叫潜水员，“你能不能扮演一下尸体？哈加拉宁！准备拍照。”

杜鲁宁磨磨蹭蹭地下到水里。我非常小心地溜到下面的岩石上，这时米盖的脸色变了，就像刚从海里打捞起来的蚌壳一样。

"下来指导。"我对米盖说。他站在我旁边，紧紧地咬着牙关，脸上鼓起了两坨疙瘩肉，就像吹喇叭的人一样。

"稍微靠左边一点，两臂张开。在左边的那两块大石头中间，两腿叉开，再开一点……"

我感到自己像个暴君，要求米盖再演示一遍是怎样滑下来的，又是怎样把他哥哥拖上岸的。他滑下来的动作看起来很危险，蹚过那么深的水，雨靴里不免也灌进了水。他猛力地一把拉过杜鲁宁，很轻松地就把他拉上来了，如同拉一个玩具人似的。

"拖他和拖尤哈不一样。"他大声地解释说，"他是活人，他可以配合我的动作。"

"就这样！到此结束。"我说，米盖松开杜鲁宁的脚脖子，马上捂住了自己的脸。我吩咐杜鲁宁站起来，自己转向哈加拉宁。他正盯着一个塑料袋里的东西看，那是一副蓝色镜框、款式新颖的眼镜，很明显是男式的。我极力回忆尤哈·麦瑞瓦拉戴的是什么样的眼镜，遗憾的是，我回忆不起来。看来这一定要问米盖了。

"这是尤哈的眼镜。"他瞥了一眼后，说道，然后马上就走开了。我的手机又响了。高依吾问下一步该干什么？

"能不能给我们拿点吃的？我快饿死了。"他抱怨地说。

"我们有面包，你先到海滩来。我们可以开始推理案情了，因为潜水员还没有收拾完。"

我跟在米盖后面说，他可以进去到达甫沙那里去。因为他还没有意识到可以离开现场了，我就这样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米盖和达甫沙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不能准确地评价他们两个人，谁的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比较接近尤哈·麦瑞瓦拉的所作所为。他们俩之间应该说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如果他们想联手要阴谋诡计的话，那么一定要过很多次了。

"我快饿得昏过去了。"高依吾来到海滩后继续抱怨，"现在如果我能吃到牛排、法国炸薯条或者是意大利比萨，那该多美啊！"

"不要废话。现在你只能吃奶酪黄油面包。再仔细看一看麦瑞瓦拉掉下来的地方——很明显，他的头部受到重击后，先在这里倒下，然后才从悬崖上滑落下来。凶手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谋杀地点，因为这里正刮着西风，尸体很可能随着风浪漂向大海，那样就永远也找不到尸体了。"

"可不可以这样假设：谋杀者不是特别善于辨别风向，他只是认为海水会把尸体从岸边冲走？"

"也许。"我说，"岛上的这些人里，只有达毕奥·浩勒玛是惟一的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很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者有没有这种可能：有人从外面来岛上作案？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人是谁？为什么？"

"多么漂亮的大炮射击口，"高依吾指着城堡的石墙说，"是在什么战争中，这些射击口发挥过威力？是持久战中吗？"

"我认为还要早一些。你还记得《奥拉尼战》这首歌吗？战役一直打到这里，南边的海岸上还有更多的射击口。早在1855年夏天，英国国王的船队就经过这里的城堡关隘，可是芬兰的国防部队坚持不让他们登陆。这是安奈·麦瑞瓦拉作的历史笔记上说的。"

我陷入了遐想：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到140年前的瑞兹盖尔岛是什么样子的？可能从南边的海岸上可以看见有三根桅杆的战船，甲板上站着一个海军军官，他戴着高帽子，举起右手，命令道："开炮！"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寒颤，塞娅·莎莱拉是怎么说来着，关于死人和亡魂的事……

我不相信这些邪说。推论要综合考虑理论和人为的因素，这

样才有利于破案；而不是凭主观想像“可能”“大概”怎么样，更不能借助迷信巫术。这就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反复论证，要有了确凿证据后，才能起诉某人杀害了尤哈·麦瑞瓦拉。

“你说有面包。”高依吾打断了我的沉思。

“在船上的食品袋里，自己去拿。如果运气好，夜宿屋里还有咖啡和茶。记住带水壶，这里没有淡水井。”

达毕奥·浩勒玛躺在夜宿屋里听耳机，米盖还在研究航海图。我打开厨房里的柜子，找到非洲咖啡和三种不同的袋装茶。我问他们俩，想不想喝点什么？

“尝尝胡椒薄荷茶吧。”浩勒玛高兴地说，“那里可能还有黑面包。我们在这里还需要呆多长时间？”

我说，不知道。其实我也不想在这里耽搁久了，因为局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处理呢。高依吾走进来，手里抱了一大堆东西。我开始点液化气炉子。

“我来做，”米盖自告奋勇地说，“不必劳驾高级警察。”

我听出他的话是在揶揄我，但我还是对他微笑了一下，他也回了我一个微笑，然后问我是喝咖啡还是茶。他主动推荐说：“这是安奈那个理想主义者的咖啡，味道不错。”

“以前我在大学的咖啡厅里，这样的咖啡一次能喝一升。”说完后，我就走出去和技术员一起聊天，谈论像我这样一个从事警察工作的女人，每次都要干得很成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潜水员在那里发牢骚，抱怨海水混浊，海底泥泞。因为不是大面积搜寻，所以就不需要更多的潜水员和助理员。在我们还没有明确到底要找什么具体的东西时，没有必要浪费开支。

“手电筒是合乎逻辑的凶器。”杜鲁宁提醒说，“形状相符，它又有玻璃，在打击时会破碎，加上谋杀是发生在伸手不见五指

的黑夜……”

这和我的想法一样。手电筒的体积小，又是普通的日常用品，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把它从岛上带出去。我们在这里寻找，纯粹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我们决定吃一点东西后，就离开瑞兹盖尔岛。我到岛的南边又去转了一圈，那里美丽的风景使我迷恋：蔚蓝色的天空下，巍巍的灯塔矗立在红色的花岗岩上，白炽灯光照射在波浪滚滚的海面上。可以想像到了夜里，大海将变得格外地宁静，分外地冷。我把手掌撑在岩石上，那上面的阳光不再炙热，一股凉意很快地传到我的手臂上来。我拣了一块有十马克硬币那么大小、白色石英镶嵌的彩色花岗岩石子装进口袋，然后回去喝咖啡。

杜鲁宁和潜水员正在谈论周末的汽车大赛，其他人则悄然无声。我注意到米盖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常常无意识地用一只脚磕另一只脚的脚脖子。在船上，他们继续打扑克牌，高依吾服用了“晕动宁”，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借了高依吾的长围巾包在头上，然后走到甲板上和船长、米盖呆在一起。瑞兹盖尔岛渐渐地模糊了、变小了，最后消失在海平线上。相反，埃司堡南端的岛屿渐渐地出现在前方。我在米盖身边坐下，我想说话，可是突突突的马达声太大，我就靠近他说：

“我要找塞娅·莎莱拉，到她家就能找到吗？”

“她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下一个你们想围攻塞娅了吗？”

我没有回答，只把脸转向太阳。太阳似乎很低，就像竖在海面上的一块圆圆的光斑。一对海鸥在我们头顶上空飞翔。我的鼻子冻红了。

“你说尤哈的尸体已经解剖完了？”

我点点头，把大衣紧紧地裹在身上。照理说我可以进到船舱里去暖和暖和，可我的性格使我从来不按一般的常规行事。

“尤哈的尸体可能要火化。他曾经说过，要把他的骨灰洒在大海里。现在可以这样做吗？”米盖说。

“可以。”

“我也想死在海里，但不是哈瑞和尤哈的这种方式，而是风暴。遇到风暴和海啸，大海也会残害生灵的。但是，如果我继承了家族遗传的心脏病，那我就会死于心脏病发作。”米盖苦笑了一下。他抬手举起当凳子坐的木箱，垫在背后当靠垫。我感到他提一只木箱就像拎一只小鸡似的。

“你在海上从来不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

“有过那么两次糟糕的情况。一次发生在 1990 年的印度洋上，那是我第一次单独环球航行。在查戈斯群岛的东边，我得了细菌性痢疾，发了很多天高烧，肚子里留不住一点东西。病倒的第四天，从西南方向刮来了台风。我虚弱得一点力气都没有，哪里还能把握住船？只能随着凶猛的海浪不断地起伏。那时候，我只能听天由命了。后来我挣扎着把锚抛到海里，这才得救。另一次是在西班牙北部的比斯开湾，船尾坏了，‘兰达’就失控了。幸亏海上巡逻艇及时赶到，使我在漂入大西洋前得救了。”米盖停了半分钟，然后看着我的眼睛，问道：

“你呢？你在工作中有没有生命危险？”

我没有回答。我的手机响了，是布包宁从局里打来的，他问一件由斯切姆负责的案子该怎么处理。因为他给斯切姆家打电话，没有人接。我快步走到前面的甲板上去回话。等我把事情解决完，我们也到岸了。我给塞娅·莎莱拉打电话，她说她整个下午都在家。我记得自己答应过今天要早一点回家，因为安迪要到电影院去看一部四十年代的法国影片，这是难得上演一次的。高依吾仍在耿耿于怀地抱怨说，他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吃过一顿饭。我向他许诺，在去找莎莱拉之前，请他到游船餐厅“契考斯”吃

一顿。

米盖·休白格大步流星地走在浩勒玛的汽车后面，我出神地盯着他的背影。高依吾在我背上捅了一拳："玛丽娅，"他警告我说，"记住，你已经结婚了。那家伙可是个嫌疑犯。你自己说过，他隐瞒了什么实情。"

"你昨天一直把王送回家去，还是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回家的?"我以牙还牙地回击了他，然后向我们的汽车走去。高依吾对我太了解了，我们之间是没有秘密可言的。

9

“我不是特别喜欢尤哈·麦瑞瓦拉。”塞娅·莎莱拉把手里握着的像小婴儿拳头那么大的一块杂色紫晶放下说。我们总算如愿以偿地在她家里找到了她。她住在沙吾伽的上庄园支路上。两间大大的房子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石头和打磨石头用的工具。莎莱拉挪了一下放着白色石英石的椅子，从厨房里搬出两只凳子，可是腾出来的那一点可怜巴巴的地方，几乎放不下两只凳子。卧室的门开着，可以看见床上蒙着紫罗兰色的床罩。

“有人谋杀尤哈·麦瑞瓦拉，你没有感到惊恐，是吗？”

“惊恐？当然感到震惊和害怕。”塞娅·莎莱拉有着一副深沉的歌唱家般的嗓音，介于男中音和女低音之间。除了打磨石头外，她是不是还有唱歌的爱好？

莎莱拉说过，打磨这些石头和做手饰，对她来说仅仅是一种爱好而已。她学的专业是建筑图纸的描图，但在六年前，她就失业了。现在做的这个石头生意虽然不是很兴隆，但由于这是作为第一职业，所以她的失业津贴就得从这些收入中扣除。我从侧面看，她似乎没有一点被伤害的不满情绪。对于五十岁的女描图员来说，再要找到新的工作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塞娅·莎莱拉的生活，她总是精神饱满地忙碌在这些石头中间。

问及个人情况，莎莱拉说，八年前她就和丈夫离婚了，她有

一个成年的儿子和女朋友一起住在吐尔库，所以，她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她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她可以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

“我认为尤哈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对自然保护的演说是令人信服的，但他那些过激的言词，对那些大型运输货车的司机和裘皮动物饲养园的老板们的影响很大，几乎要砸了他们的饭碗。所以，像我这种类型的人，对尤哈都是敬而远之的。”

塞娅·莎莱拉使劲擤了一下鼻子，又掏了一下发痒的耳朵。她穿了一条墨绿色底子、黑色图案花的健美裤和一件长到膝盖的紫罗兰色与绿色相间的宽松衫。看见她的眼睛，就使人想起朱古力豆糖，脸上的酒窝使她看起来总像是在甜美地微笑似的。

“尤哈的观点是失业人口要减少，但不包括我，因为我是一个又老又胖的毫无使用价值的人。加曲娜为我辩护说，塞娅的嗓音是很动听的。”

“老？他只不过才比你小三岁。”

“尤哈对女人年龄的衡量标准不同于其他男人，他总觉得自己还处在风华正茂的年龄。同样，安奈才比他小一岁，他都觉得她老了。他经常挖苦安奈说：‘你要多喝点牛奶，才不至于像其他同龄的老太婆那样要去接受骨疗。’凡是超过四十岁的女人，在他的尺度范围内，都属于老太婆、老妪、老不死的。而男人，他认为到死都是小伙子。我虽然没有工作，也没有丈夫，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过日子，这就是对他的观点一个有力的回击。”

塞娅·莎莱拉瞟了一眼高依吾，他听我们俩的对话，有点感到不耐烦了。但塞娅还是继续说：

“早先我面对两个男警察并没有这样数落尤哈，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些有关他怎样提高自己男子汉威严的事。他敦促伊瑞有

朝一日能成为一名运动健将，无论是游泳还是网球，或者是滚大石头的。可伊瑞和他背道而驰，无论在权力还是经济方面，尤哈都不能够再控制他了。”

塞娅好像突然发现自己信口开河说了不该说的话，所以她把话打住，问我们想不想喝茶，说现在是她的喝茶时间。我们点点头。因为刚才吃饭的时候，菜吃多了，所以现在感到渴。

“胡椒薄荷还是玫瑰草莓？”塞娅问。

“胡椒薄荷，谢谢。”我回答。高依吾在这些小事上很随和，从来不挑剔，所以每次都是我说了算。

“你说你是通过米盖·休白格认识麦瑞瓦拉一家人的，那你现在也是他们家的朋友了，是吗？”我问塞娅，她正在厨房里忙乎。

“米盖和安奈一直是礼尚往来的好朋友。尤哈他不随便接纳女朋友，他在公司里给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清洁工。我认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清洁工也是一份体面的有价值的工作。可是对于尤哈·麦瑞瓦拉的曲里拐弯的小肚鸡肠，我可受不了！我婉转地对他说，我已经得到了另一份低级的工作。他认为我伤了他的面子，所以大肆攻击说什么‘女人干清洁工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嗤之以鼻地“哼”了一声，有人竟敢断言搞清洁是女人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本能行为，真是岂有此理！我就不喜欢干那样的工作。现在是没有办法，有时候不得不做一下清洁。因为依旦在学步车里吃饭，就像播种机似地撒一地，有时她还会把书撕坏后扔一地。

“你现在是安奈·麦瑞瓦拉的好朋友了，她会对你说一些夫妻间的事。他们的关系怎么样？”我问。

塞娅·莎莱拉把一只装有石头的箱子从桌子上搬到地上，然后在桌子上摆上一套墨绿色的陶瓷工艺茶具，又在两只深盘里分

别放上蜂蜜罐和盒装的饼干。从盒上的说明可以知道，这是一种对健康特别有益的饼干。高依吾对这些甜食只是撇了一下嘴。

“他们的关系还可以。他们俩一致认为他们的生活价值观念不同，但还是愿意这样维持下去。安奈十分不满意尤哈对待伊瑞的态度，但他们几乎没有为什么事情大吵大闹过。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我和安奈之间也没有说得太多。”

我没有继续问她们之间还谈论些什么话题，我怕她嫌我多管闲事。我接着问，尤哈·麦瑞瓦拉和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关系如何？

“哼，尤哈既瞧不起米盖，但又十分嫉妒他。瞧不起是因为，他认为米盖对家族的公司不负责任；嫉妒是因为，米盖自由自在，无后顾之忧，还有航海的声誉——在航海员圈内，米盖是大明星，如果他自己愿意这样称呼的话。”说到这里，塞娅·莎莱拉那低沉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她那得意的神情十分引人注目。

“米盖什么时候可以启程？”她问，“他确实希望能赶在秋季风暴之前启程。你们可不能怀疑是他杀害了尤哈。他没有什么理由……”

“休白格对待他同父异母的哥哥的态度怎么样？”我打断她的话。塞娅从厨房里取来茶壶，往每一个茶杯里倒，一股幽幽的清香扑鼻而来。她回答说：“有时候他见到哥哥很高兴，有时候又很拘束。米盖说，见到尤哈就会使他想起父亲，他就感到非常地难过。所以他们不经常见面。请喝茶，请！”

高依吾心急，慌忙喝了一口，结果烫了他的嘴。我开始问尤哈死的那天晚上的情况。塞娅·莎莱拉说，那天晚上她怎么睡都睡不着，同样，和她同睡一屋的加曲娜·休白格也是在床上翻来覆去地进不了梦乡。

“我这个人睡觉很警醒，只要附近有一点点动静，我就会醒

来。那天夜里确实是有动静的。”

“是从什么地方、或是从哪个人那里发出的？”我想把塞娅·莎莱拉所说的情况和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综合起来分析，然后找出这个对尤哈·麦瑞瓦拉恨之入骨、最后把他杀害的人。

“是尤哈自己发出的。”塞娅说。她不想公开更多的情节，只是简单地说，那天夜里她听到城堡周围有人走动。最后我问：是不是有外面的人来岛上？她支支吾吾地说：

“我不能完全肯定……那时，我的睡意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我不敢出去看个究竟。我好像听到有船靠岸的声音。那时是深夜，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外面是漆黑一团。”

当我问塞娅·莎莱拉，据她猜测是谁杀害了尤哈·麦瑞瓦拉时，她毫不客气地说，这是警察的事情。她的电话铃响了。从莎莱拉的说话中，我猜测是她的儿子打来的。

“我家里现在有客人。这不是什么真正的客人，是警察。不，不不，我挺好。是关于一位朋友死亡的事情。可不可以我过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塞娅放下电话后说，一个小时后她在达毕奥拉有一个约会。我在来之前给她打电话时，她并没有说她有什么约会。但我又一想，是我们有求于她，想从她那里得到更多的有关瑞兹盖尔岛上的情况。那就这样吧，我们告辞了。

回到家里，我已经累得疲惫不堪了。在我开门之际，爱因斯坦急速地溜出门去，像是在逃避噪音的灾难似的。因为安迪在弹钢琴，依旦在敲钢精锅的盖子，敲得还很有节奏感。空钢精锅能给她带来无穷的乐趣。我也无法呆在这些噪音中，正想逃避到楼上去，依旦已经看见我了。她放下手中的钢精锅盖子，摇摇摆摆地向我跑过来：

“妈——妈！”她的脸糊得像个大花脸。吃饭的时候肯定没有戴围兜，因为胸前的衣服上也糊得脏兮兮的，一看就知道吃的是

锅焗肉和稠粥。我把女儿从背后抱起来。

“安迪，这孩子太脏了。”我大声说，但我的声音还是被巴赫的乐曲声盖住了。

“怎么啦？现在又没有人看见。等一会儿又要吃饭了，我才不愿意现在给她换衣服。”安迪没有中断他的弹奏。

“但是……”我正想发作，可又忍住了，心想，这没什么。我没有普通母亲那种通俗的观念：什么孩子一定要保持清洁和整齐之类。无论是休妈妈假时，还是现在上班时，我都不能坚持每次把洗干净的衣服熨得平平整整的。当然，安迪也做不到这样。我把依旦抱到楼上，给她换上干净衣服，主要是不想让她把其他地方糊脏。我自己换上运动服，然后倒在床上和依旦疯玩了一阵。

“心肝宝贝。”我边说着，边用床罩边上的吊穗挠依旦脖子的痒痒，她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我在生孩子前，曾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学习怎样护理孩子的课程。最初的六个星期，不能对孩子大声说话。所以，我在给孩子喂奶或换尿布时，都是轻声细语地跟她说话。但作为有生灵的动物的后裔来说，总是有大声喊叫的本能，这往往是在我感到很压抑的时候，不免要大声喊叫。每当我一着急想对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或者是满脑子搅糨糊似地搅着工作中的事务时，安迪就会过来，帮忙把孩子带走。这样，一眨眼工夫我就会平静下来。我知道自己的毛病：缺乏母爱。现在我上了班，情况就颠倒过来了，安迪成了受气包，依旦会对他发脾气。我呢，我也不是温柔体贴的依人小鸟。

板凳的承受力令人惊讶，十公斤重的孩子很不老实地坐在上面高兴地笑闹，它竟然不散架。我休妈妈假时，我们母女一起去参加产后锻炼，在那里我们学会了几项运动。依旦学会了推术，不管什么东西在她周围，她都要推开。在安迪出差的时间里，我

找不到保姆，每天跑步的时候，就把孩子的婴儿车推在前面。

“我在奥拉瑞的S超市看到斯切姆了。”当安迪来看我们玩什么把戏的时候，他告诉我说。

“噢？怎么样？”我把依旦抱到腿上。

“他没有认出我来。他买了一箱啤酒和四包‘万宝路’。”

“真有意思。”我漫不经心地说。我不想为这事费心，但我的思绪一会儿想到斯切姆，一会儿又想到尤哈·麦瑞瓦拉的死。惟一能使我摆脱工作中的烦恼的方法，就是回忆最后一次在秋天的森林里度过的那段美好的时光。夜间的冷空气就像画笔似的把草地和树叶都刷上了它们自己的颜色，然后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大画面。枫树的叶子火一样地红，像阳光的色彩，旁边的那些植物都分享着它的光彩。银柳的叶子都变成了深棕色，就像巧克力糖的雕塑品似的。这些五颜六色的色彩似乎都进入了我的血管，随着血液的流动，产生了一种能量，这种能量可以在我的头脑里长出想像的翅膀。我沉浸在这些五彩缤纷的色彩中，感到无比地幸福。

安迪和两个啤酒朋友一起去看电影了。等依旦睡觉后，我就试着给斯切姆打电话，但他家里的电话没人接。我记得曾经有一次，贝扎蔑视我的仔细认真为小题大做。

第二天上午，晨会显得有点异常，除了斯切姆缺席外，王和布斯特亚勒威也没有到会——他俩是准了假的。在我们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值班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报告：

“消防队来电话说，位于高克拉丁工业区的玛立宁屠宰场着火了，而且还有人冲进去打架。”

“下星期有熏火腿减价了。”布包宁开玩笑地说。我马上提了一个问题，堵住了他的嘴：“为什么消防队要通知我们暴行侦缉

科?”

“那里有外人进入，怀疑是谋杀纵火。”

我看了一下四周，除了布包宁和我，其他人都要分秒必争地办自己的案子。我今天的计划是，去沙吾伽海滨的麦瑞瓦拉家里找芮佳谈话，现在看来只能先放下了。还有，今天下午两点，我和达斯基宁已经约好一起去餐厅就餐，现在看来也得取消。

我们迅速地赶到消防队，可是扑了个空。两分钟后，我和布包宁开车直奔高克拉丁。在车上从急救中心得到消息，目前现场有埃司堡消防队和基勒高奴密[①] 消防队，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和经济犯罪的警察。屠宰场的保险公司已经派人及时赶到，并开始着手他们自己的调查工作。着火现场有多少人，现在还不知道。上白班的工人有二十个，他们按常规从早晨七点钟开始干活。差一点儿七点半的时候，火从职工的更衣室里着了起来。

“等等……我是不是记得正确?春天的时候，是不是玛立宁屠宰场运输货车的轮胎被割破，废物箱被点火烧着了?是不是破坏现场还贴有标语，署名是动物保护革命组织?”我问布包宁。他正驾驶着汽车在埃司堡路上飞跑，警报器在车顶上闪烁。

“是有割破轮胎一事，不过这案子不归我们管，因为没有涉及到人。现在这谋杀纵火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布包宁摇着头说。我这个沙沃[②] 出生的老搭档是个活宝，没有一次不说笑的。

早先屠宰场不在高克拉丁，那里只有肉联加工厂，屠宰场在基勒高奴密。每天肉类牲畜先进基勒高奴密的屠宰场，然后再被输送到高克拉丁的肉联加工厂。玛立宁公司生产的猪肝肠、粉肠和冷熏腊肉都是别有风味的，价钱也要比一般的同类食品高出几十个百分点。前两年，这个公司还曾得过埃司堡商会颁发的优秀

---

① 地名。
② 地名。

企业奖。我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今年春天，麦瑞瓦拉公司获得了这个奖项。我看到过最新的获奖单位的名单。

西风把又浓又长的黑烟吹到高克拉丁田野的上空，烤糊的肉味在汽车里就能闻到。屠宰场位于火车站南边的工厂区内。到汉沙路去的交通中断了，马路上排着车队。我们的汽车像游鱼似地见缝就钻，超到车队的前面去。我们开的是我那辆深蓝色的公车——“沙巴”，它看不出是警车，但车顶上的警报器可以使路上的汽车给我们让道。

透过烟雾首先看见的是消防车，那里停了好几辆。他们得到了赫尔辛基消防队和万达[1] 消防队的增援。火焰从屠宰场的房子里直向外蹿，隔壁的房子也有蔓延烧着的危险。房子的上空隆隆地盘旋着两架抢救中心的直升飞机。

“我们没有必要钻到那浓烟里去，我先打电话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对布包宁说。在屠宰场前面停着的还有消防队的救护车，有两个消防队员正灰头土脸地从屠宰场的后门出来。趁布包宁在选择收音机的频道时，我观察了一下四周的情况。我注意到南边的田野上拉着“禁止通行”的标带，在这标带的后面站着一群人，但是他们不像一般的看热闹的人，因为他们手里举着标语牌，不过标语牌上的字我看不清。我从手提箱里取出望远镜。

我并没有对标语牌上写着的口号大吃一惊，上面写着：“吃肉是谋杀——动物保护革命组织”“杀死屠夫”等等。这群人大约有二十来个，我认出其中的两个姑娘，她们曾出现在尼德古布的“麦当劳”门前示威抗议的队伍中。我还看见在边排的中间有一团绿色的头发。这些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成员好像在等待着警

① 赫尔辛基的另一个卫星城，比埃司堡小一点。

察去抓他们——他们都非常安静地站在那里，其中有一个人在敲非洲鼓，但听不见声音，因为直升飞机的噪音太大了。

一辆救护车鸣着警笛向约威[1] 方向开走了。这时，布包宁接通了无线电报话机，我插上麦克风。从现场了解到，起火的原因还没有搞清楚，但从这强劲的火势和蔓延速度的迅猛来判断，很可能房子的周围被倒上了汽油。有两个工人在冷冻库房里受了伤。那里储藏着从基勒高奴密拉来的待加工的牛肉和猪肉的半成品，它们虽然被储藏在安全措施严密的冷冻库房里，但空气还是不能绝对隔绝的，所以，这些半成品还是受到了烟熏的威胁。刚才从这里拉走的两个库房保管员都是二级烧伤和烟熏窒息，但他们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我在读警校时，想学消防专业。”布包宁突然开口道，“但有人说，消防队员的工作就是等待和打扑克牌。我想这不适合于我。现在看来确实不适合，光这种味儿就会使我倒胃口的。”

布包宁的皮肤很白，比一般白种人的皮肤还要白，因此脸上的雀斑就特别明显。他的头发是胡萝卜色的。

“车里没有防毒面罩，我到维持秩序的警察那边去取，你等在这里。”

我从车里一出来，烟味就像一群牛虻似的向我袭来。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向人群那边走去。那里我认出有消防队的队长和维持秩序的警察。

“我是暴行侦缉科的高级警察加里奥，你们好！由于怀疑是谋杀纵火，所以通知我们来这里。现在纵火者有线索吗？”

一个看上去训练有素的高个子男人，没有戴任何面罩，他热情地和我握手，并自我介绍：他是高克拉丁肉联加工厂的经理加

---

① 地名。

来拉，也是玛立宁屠宰场的场长。

“今天的这些肇事者肯定是春季的那帮恐怖分子。那时候警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加来拉停顿了一下又说，“现在的社会上真是无奇不有：食品发展受到限制，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而那帮人现在正站在那里幸灾乐祸哩。不能把他们关起来吗？”

我和维持秩序的警察一起在着火现场搜查，但没有找到任何与动物保护革命组织有关的蛛丝马迹。示威游行者是在火着起来的时候才到达这里的，所以不可能有纵火的嫌疑。

“啊哟！里面有人！”加来拉气急败坏地大声喊道，“他们可能就是谋杀犯，把他们抓起来，他娘的！”

我把维持秩序的警察召集到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把这些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成员带到局里去审问。我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到底在这起案件中他们干了什么？在“麦当劳”饭店前面扰乱社会治安和割破轮胎，这些都属于较轻的刑事犯罪。当然，警察也可以接受另一种说法，那就是破坏私有财产，但是，故意危害人的生命，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此外，我还在想，伊瑞·麦瑞瓦拉在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活动中显得那么活跃，那么他会不会受到组织成员的煽动去杀害父亲？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这一系列的示威反对活动，到底是谁组织安排的？英国的动物解放组织的后台，据说是一个什么恐怖组织，芬兰的这个动物保护革命组织该不会是受外国的什么组织领导的吧？

我考虑片刻，认为尤哈·麦瑞瓦拉不可能被列为环境保护的头号敌人；恰恰相反，他是和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保护大自然的。

抢救中心的直升飞机的螺旋桨旋起的风，把烟直接吹到了我的脸上，我想尽力屏住气，但没有成功。烟迷了我的眼睛，呛了我的喉咙，甚至进入了我的肺，晚上我一定要彻底地洗一洗，包

括头发和所有的衣服。防毒面罩很快就能得到，当务之急，是要安排人带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成员回警察局去审问，有两个人在冷冻库房里遭浓烟窒息已是铁证如山，无须我再证明。

我从消防队员那里接过两副防毒面罩，一副给自己，一副留给布包宁，他还在车里坐着呢。消防队已经控制住了火势的蔓延。有三个警察正向田边站着的示威者走去。他们的肃静意味着更大的威胁和仇视，就像他们的反对口号一样。

我拉开车门：

“把那些人带回局里去审问。”我对布包宁说，“跟我来。”

我们行驶在泥泞的田埂上。那三个警察在我们前面约一百米处，我在无线电报话机里向他们发指示，要求他们尽量避免发生冲突。我把防毒面罩挂在脖子上，布包宁则已经把面罩戴在脸上了，就像小画书上的红头发大昆虫一样。当三个警察走近示威者时，情况发生了：

示威者一共十五人，其中大部分是女孩，他们把手里的标语牌往地上一扔，拔腿就跑——有一部分向东跑，我示意布包宁跟在我后面。我穿着步行鞋，跑在潮湿的草地上，把草地都踩出水来了。

“站住！我是警察。”我一边大声地喊着，一边追赶四个穿着短大衣的女孩。她们急忙回头看了一下——看看我是不是拿枪对着她们。我们不是刑事犯罪警察，所以没有手枪；同样，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没有。在着火现场负责维持秩序的两个警察这时也跑过来帮忙。由于他们的加入，使我们追赶的这些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年轻人聚集到一起，就像一群逃命的狐狸。如同上次在尼德古布的情况一样，最后大部分人都跑脱了，抓住的也都不反抗了。惟独有一个在他们中间看起来年龄比较大已不太年轻、高个子、头发稀疏的姑娘，反抗得很厉害，但在强壮的男人面前，她

还是白费劲，维持秩序的警察于利阿赫一直拖着她走，因为她自己不肯走。

天开始下雨了，这倒是求之不得的及时雨，因为它可以帮助灭火。浓烟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好似架在高克拉丁田野上的屋顶。一部分示威者发出了怪叫声。布包宁还把防毒面罩紧紧地扣在脸上。我的新鞋已经踩得不像样子，可我顾不上这些了。还有两个切割肉的工人仍然被困在冷冻库房里，我强迫自己暂时不要想这件事，可是做不到。从无线电报话机里我得知，消防队员们正在竭尽全力把他们尽快地抢救出来。好在冷冻库房里的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了，可谁也不知道他们俩是否还活着。

“把每一个人的身份简历记下来，十五岁以下的孩子请家长来领。到三楼的领导办公室那里找一间房子，把他们都带到那里去，我马上就来。”我对维持秩序的警察说，同时让布包宁跟他们一起去，以便协助他们审问。从表面看，他们中间没有几个十五岁以下的孩子，但是人不可貌相，我再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光了。等我老了以后将是什么样子？我自己也很难说清楚，因为十几年的变化是很大的。

我走到屠宰场的北面，那里成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抢救中心的破坏性纵火专家和保险公司的纵火特别调查员正在一起讨论案情，最后一致认为火是从房子内部燃起的。

“你们的意思是我们的工人纵火!?”总经理加来拉争辩说，“这样的论点太高明了！到最后起诉到我头上来了!”

“上个月你们雇临时工了吗?”我不慌不忙地问。

“没有，都是自己工人干的。”加来拉皱着眉头说，“嘿，九月份有一个星期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来实习劳动……”

“是哪个学校的？是这里的高克拉丁中学吗?”

“不是。是埃司堡湾中学的。其中有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

在那边办公室里帮忙最多。"

埃司堡湾中学有高中，伊瑞·麦瑞瓦拉就在那里就读。那有可能是里应外合。我要了实习劳动的学生和这里职工的个人资料，然后就打算回局里去了。

"消防队员冲进去了。"抢救中心的队长对加来拉说。

"这次抢救工作的最好结果，估计会怎么样?"保险公司的调查员问。

"百分之六十。因为现在损坏的程度还不知道。如果他们的生命有危险的话，那……"消防队队长把两手一摊，意思是那就厉害了。加来拉听了这话咽了一口口水。我感到自己的腹部肌肉有一种压迫感，好在我有充分的理由离开现场回局里去。我现在还不能得到损坏程度的数据，但最起码我已掌握了整个案情的第一手资料。

我驾着车直奔尼丁大桥，姆喇拉[①] 周围的烟已渐渐地消散了。开上吐鲁高速公路后，我打开了车窗，换换新鲜空气。在正常的情况下，每天这个时候我就开始饿了，可现在，除了蔬菜，其他的饭我想起来就恶心。

九点半时，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成员都坐在巡警处的大会议室里了。于利阿赫说，他们闭口不言，看来是害怕了。伊瑞·麦瑞瓦拉坐在角落里，两腿盘在椅子上，手里玩弄着外套下面的带子。敲鼓的男生时不时地砰砰敲两下。

"这玩意儿不能带到学校去吧?"于利阿赫疑惑地问。

"可以的。你有他们的简历表吗?"

有两个小姑娘不到十五周岁，尽量争取把她们的家长请来。其他人的审问可以马上开始。我走到会议室前面的讲台上，站在

① 地名。

白色幻灯屏幕的旁边，像老师讲课似地开口道：

“大家好！我是高级警察玛丽娅·加里奥，我负责玛立宁屠宰场的纵火侦破工作。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怀疑，这是一起蓄意破坏的纵火事件。你们被带到这里来，是因为有参与纵火的嫌疑。在这次火警中有人生命垂危。你们中有没有人可以说一说，怎么会来屠宰场示威游行，而又刚好赶上了火警？”

没有人回答。我把他们一个个地审视了一遍，这些幼稚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大部分人的眼睛都看着地上，只有一个姑娘盯着我看。

“你们每一个人来这里是受审，你们可以被拘留四十八小时。谋杀性纵火是非常严重的犯罪，嫌疑犯可以被判刑。我想你们都不愿意到埃司堡警察局的拘留所里去呆几个星期吧？我希望你们能很好地配合。”

“不要异想天开！”有一个男生大叫一声。敲鼓的男生把鼓击得砰砰响。我大衣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先我想把它关掉，可我的第六感官迫使我回话。这是抢救中心的值班员打来的，他说那两个切割肉的工人已被抢救过来了；火势已进一步得到控制。我听完电话，刚把电话关掉，心中便不由得升起一股无名的怒火：我对无政府主义是那么地深恶痛绝。我抬起头重新看着这些动物保护“革命分子”。在说话前，我用脚踢了几下桌子：

“屠宰场的纵火犯和谋杀犯没有什么两样。值得庆幸的是，消防队员及时把昏迷的切割肉的工人从冷冻库房里抢救出来，使他们脱离了生命危险。上帝保佑，案子的性质可以转变为没有死亡的良性案件。”

我又踢了几下桌子，没想到鞋上的泥巴干了以后很容易脱落，我这一踢，一小块泥巴飞出去正打在坐在第一排的一个示威者的脸上。这一下，这帮子年轻人可活跃起来了。

“对不起，这不是故意的。”我对正在擦脸的姑娘说，同时迫使自己镇定。

“玛立宁屠宰场杀害无辜的牲畜，它们的生命和人的生命价值是一样的。”一个吊儿郎当的稀头发姑娘快嘴快舌地说。

“现在没有时间讨论谁的生命更有价值。芬兰的法律规定：肉食牲畜的屠宰不是犯罪，但杀人是犯罪……”

“这法律是错误的！”坐在那女生旁边的伊瑞·麦瑞瓦拉大喊一声。

“按你的意思，法律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否认人的谋杀，还是允许牲畜的屠宰？我真诚地希望是后一种。”我强压着怒火说。

“你们为什么总是盯着我们？你们为什么不抓那些到我们学校来卖毒品的人？”一个像小天使似的女生问。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毛线长外套，一直拖到黑色的雨靴口上。

“这是毒品警察求之不得的信息，你们在受审的同时可以提供线索。十五岁以下的学生，我们已经通知家长了。你们和家长可以一起告诉审讯你们的警察，你们掌握的情况愿意对谁说。你们有权利请监护人，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是不是现在有人愿意谈谈纵火的情况？”我问。但很难得到明确的答复，他们抱团抱得很紧，看来揭露实情只能在个别的审问中。

会议室的门打开了，门后面站着达斯基宁，我暗暗地吃了一惊。

“对不起，打断你了。你出来一下，玛丽娅。”于勒基态度和蔼地说。我走出会议室，看见走廊里还站着警察局局长。

“你还没有开始审讯吧？”局长问。

“还没有，我想先给他们讲一点法律常识。”我有点尴尬地说。

“我们负责的这部分调查工作被停止了，下面由便衣警察和警察总署的犯罪侦缉科接着做。”达斯基宁通知我说。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很担心我的反应。

“这是怎么回事嘛？真他妈的操蛋！”

“他们有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着手搞环境保护产品买卖的违法情况调查，这宗故意破坏纵火案也归他们。便衣警察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个动物保护革命组织是受一个外国组织控制的。”新局长说。他原来是警察局犯罪侦缉处的处长。万事开头难，他刚刚提升不久，工作开展得就不是很顺利。这个苦衷大家都能理解，作为局长，必须一碗水端平，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一视同仁，还要把警察的活动经费分配得合理。在一年一度的秋季会议上，我已注意到这个新局长说话、办事都非常地小心谨慎。

按照约定俗成的老规矩办事的话，对我来说反而比较容易，我们科也不必把“谋杀纵火”这副重担压在自己的肩上了。但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之所以对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一系列事件感兴趣，不外乎是伊瑞·麦瑞瓦拉的缘故。

“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把这些示威游行的人都放了？”

“恰恰相反，”局长有点得意地说，“把他们都带到拉达路[①]去审问，那里保证不能蒙混过关。汽车在下面等着。”

“这里有两个十五岁以下的孩子，要请她们的家长也到那里去。”

“哼，如今的学校竟培养出这么捣蛋的学生！”局长生气地说。我想起尤哈·麦瑞瓦拉也曾说过这样的话。

“便衣警察所里谁负责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调查工作？”我

① 便衣警察所所在地。

问。局长没有马上回答，但后来在我的一再追问下，还是从他那里得到了约马那宁的名字。

我没有再回到会议室去，我为自己婆婆妈妈的说教感到羞愧。我直接上楼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马上给便衣警察所打电话，约马那宁接的电话。也许他正等待着这些受审的小家伙的到来。

“我是埃司堡警察局侦缉科的高级警察玛丽娅·加里奥，你好！我正在调查一起谋杀案，这起案子也许和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活动有关。我想从你们那里调取有关这起案子的所有资料。我对个人的所作所为不感兴趣，只是想要组织掌握的正规的资料。我马上就要，你可以从电脑网络上发给我。”

我不想听别人的反对意见，所以要求他长话短说。最后，约马那宁答应将资料用特快专递送过来，当天就可以收到。他不同意在网上发，怕泄露秘密。这时，我感到肚子饿了，决定先去吃饭，然后再找芮佳·麦瑞瓦拉谈话。我已经得到了搜查他们家的许可证，保证不会轻易放过伊瑞的房间。

10

蔚蓝碧波的大海，就像依旦的眼睛一样美丽。马加港湾附近的海风吹起海浪拍击着海岸，泛起一片片白色的泡沫。我在麦瑞瓦拉家楼上的客厅里眺望大海，这迷人的景色使我心旷神怡。这幢房子的地产最早是马丁·麦瑞瓦拉母亲家族的房产。在六十年代中期，马丁把老房子拆了，盖起了这幢临海的二层楼小洋房。式样是当时最流行的盒子式，客厅临海的整堵墙都是落地大窗户，厅内有着黄杨木的拼块地板和云杉木的仿古家具，整个结构就像是私人家具装饰展览会一样。

家里只有芮佳一个人。她面朝窗、侧面对着我们，脸色苍白，深棕色的头发垂在一边，齐眉的刘海盖在额前。她穿了一条黑色的针织长裙，一件灰白色的针织外套，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姑娘穿了妈妈的衣服似的。不知道芮佳·麦瑞瓦拉的穿着打扮一直是这么保守，还是因为和达毕奥·浩勒玛恋爱的关系？

"你们已经到我家来过一次了，拿走的我们的衣服和鞋子，什么时候能还给我们？"

"这要等犯罪鉴定技术员不再需要那些东西的时候。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妈妈去上班了，伊瑞去上学了。不过伊瑞很快就会回来，学校两点就放学了。"

高依吾示意地向我望了一眼，但我不能马上搜查伊瑞·麦瑞瓦拉的房间。

“芮佳，我们约一下审讯的时间吧！下星期一中午，你能来警察局吗？”

“下星期一中午十二点，我要参加音乐理论考试。我们不能现在就说吗？”

“我们可以现在谈，但这不算正式的审讯。”

我坐到一把鲜红的扶手椅里，本想把腿跷到前面的搁腿凳上，可是一想不能，因为在高克拉丁的田地里踩得鞋上尽是泥巴。我又考虑是否把鞋子脱掉，也不能，如果袜子上破了一个小洞，就会引起讽刺作家对警察的嘲笑。

“你认识哈瑞·依冒宁吗？”我的问题使芮佳感到惊讶。她猛一回头，使头发都披散到眼睛前面了：

“哈瑞？我只见过他几次，跟他不熟。他是米盖的朋友。有时候我想，达甫沙和哈瑞可能会有共同语言，可惜，他们无缘相见。”

“你听说你妈妈生日的那天晚上，关于你爸爸和达甫沙之间发生的事情没有？”

芮佳把头转回去对着窗口，把遮在眼前的头发捋到一边，说：“听说了。爸爸、伊瑞和达甫沙都告诉我了，但各人的说法都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伊瑞告诉我，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芮佳平铺直叙地说。双手压在膝盖上来回地搓，把黑色的毛裙都搞皱了。

“这是多么愚蠢……但我首先必须问清楚达甫沙，他是否确实对爸爸说了那些混帐话？”芮佳瞟了一眼高依吾。他用征求的眼光看着我说：“我到车房去。”

等高依吾走出去后，芮佳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一把扶手椅里。她脸上的皮肤和她妈妈一样雪白粉嫩——十年后，也将和她妈妈一样，眼角和嘴角周围会出现细细的皱纹；浓浓的柳叶眉修得整整齐齐，不需要描眉修饰。

“你对这些回忆不作记录吗?”她难过地问。我点点头。这不是撒谎，因为我不想作记录。如果芮佳·麦瑞瓦拉的叙述对她父亲被谋杀的破案有价值的话，我们必须回到局里的审讯室去作正规的审讯记录。

“在桑拿浴室里，爸爸对达甫沙说：‘那样的事你都和我女儿干了，真是可耻。’”芮佳的脸上泛起两朵红云，染得满脸通红。

“达甫沙回击他说：‘大家都认为是你自己把女儿干掉了。这是要受法律制裁的。’然后他们就打起来了。这时伊瑞刚好走了进去。”

“你爸爸和你亲热过吗?”

“没有!”芮佳惊得目瞪口呆，“爸爸不是那种不懂伦理道德的人。我不知道达甫沙为什么要那样说。”

“你爸爸对你以前的男朋友的态度也和对待达毕奥·浩勒玛一样表示反感吗?”

“从来没有过那种态度，因为我以前没有和男朋友同居过。”芮佳说得很快。我想到达毕奥·浩勒玛曾经说过要和芮佳结婚以及生儿育女的事情，我在心里默默地问：芮佳你是否和达甫沙一样，愿意这么快地定下自己的终身大事?

我改变话题，问芮佳星期六晚上有没有发现其他情况?她不能提供新的情况。我又提了一个从来没有提过的自己颇感兴趣的问题：她是否喜欢塞娅·莎莱拉这位不速之客?

“塞娅是妈妈的朋友，或者说她想成为妈妈的朋友。我对石头没有多大的兴趣，当然这些石头是很漂亮的。但我怎么也不能

相信，这些石头会有什么特异功能。塞娅给达甫沙几枚像扣子那么大小的石英石薄片，说是什么护身符，携带在身上就会恢复声带。石头能有这样的神通吗?”

“达甫沙也许为失声而感到悲观失望。”

“我想，如果你现在失去了腿，你就不可能再是警察了。”芮佳叹息道。

“他是不是已经决定去做手术?”

“他对自己的事情仍还犹豫不决，去私人医生那里咨询过多次，只听说美国有一个医术特别高明的医生，治疗过像达甫沙一样的病人，但是费用高得惊人……”

芮佳从父亲那里继承了麦瑞瓦拉公司的一半股份，如果她把所得的全部股份卖掉，大约能有一百万。莫不是芮佳和达甫沙为了这个目的而杀了尤哈·麦瑞瓦拉? 瞬间我又推翻了自己的假设：如果在瑞兹盖尔岛上的家庭宴会后的夜晚，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去两个人就是达甫沙和芮佳，那他们摸黑登上悬崖，然后把人从悬崖上推下去，似乎太不符合情理。没有人会有这样的胆量搞谋杀。

我站起来调整了一下鞋子，以便走起路来跟脚一点。

“你能带我去你爸爸妈妈的卧室吗?”

芮佳带路穿过宽敞的客厅，走向东边尽头的一个房间。麦瑞瓦拉夫妇的卧室很大，足有三十平米，窗户洁净明亮，外面是一片小树林，那也是麦瑞瓦拉家和邻居家的地界的分界线。卧室里的家具都是黄杨木的。床头的墙上挂着一幅安奈·麦瑞瓦拉的素描画像。房间里还有一幅别具风格的油画，那是一幅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品：在浩瀚的大海上，一艘帆船正驶过灯塔。我看画入了神，感觉到自己的衣服像着了魔似地在房间里鼓胀起来，如远航的船帆一样。

“你爸爸在家里没有设工作室吗？”我想从芮佳那里证实我的判断。这时高依吾还没有回来。

“没有。那些警察把我们家的柜子全都搜查过了。”

卧室的南墙上有一扇门，走进去就是衣服储藏室。尤哈·麦瑞瓦拉的衣服都是很高级、很正统的。套装系列里有一些休闲服，可以想像这些衣服是去海上或是去打网球的时候穿的。我并不指望能从他的这些出行的套装里找到什么秘密，但使我感到焦虑的是：如果不能从尤哈·麦瑞瓦拉的卧室里发现任何线索，那么怎样才能够解释清楚他的死因？

“伊瑞的房间在哪里？”我像突然想起来似地问，“便衣警察可能马上就要来这里。”

“那是怎么回事啊？”芮佳的声音里带着不满的情绪，但这生气的声调也掩盖不了她为弟弟担惊受怕的不安心情。我也不希望伊瑞是一个嫌疑犯。

“家庭搜查证中批准搜查整幢大楼。我一定要去那里。”

“在厨房旁边。伊瑞不喜欢有人不经过他的同意，就闯入他的房间。”

“玛丽娅！”高依吾在车房门前挥着手喊，“到这里来一下！”

我把芮佳留在那里收拾她爸爸妈妈的床铺，自己三步并作两步地向车房走去。车房里有两个停车位。据安奈说，麦瑞瓦拉家放弃了一辆车，改坐公共汽车。这样，空出来的一个车位，就停放着几辆新喷过漆的自行车，还堆放着一些缆绳、压力机和油漆桶。

“注意，这是油漆厂的车库，这里有很多油漆，足够油漆一整艘大西洋上的运输轮。”高依吾说。

“这些不是麦瑞瓦拉公司的产品，是迪古瑞拉油漆厂[①] 的大众油漆。”我戏谑地说，一边不停地翻找其他的东西。但除了工具之外，再没有找到别的什么东西。

“这里有外国的油漆桶，这是什么语的？‘沙吾高丁·诺·沙吾来斯·斯维少司……’”高依吾结结巴巴地念着，“‘苏旦丁斯……’这不是爱沙尼亚文，也不是波兰文。”

“是不是拉脱维亚文或是立陶宛文？我可分不清这些国家。奇怪的是，麦瑞瓦拉公司把车库作为仓库，存放竞争者的产品。你还有什么别的特殊线索吗？”我问。

“这里有一个手电筒。”他假装无所谓地说，但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我戴上保护手套，他拉起车库后边的隔门，里面隐蔽着一个铁架子，大约三十公分长，架子上有一个样式像警察用的手电筒，玻璃已经碎了。

“星期一我到这里来搜查过，可那时没有这个手电筒。”

我点点头。我和高依吾共事多年，彼此十分了解。他的思维方式往往和我是一致的。现在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把手电筒放回来的人认为，警察不可能再到麦瑞瓦拉公司的车库里来搜查了。

“拿到化验室去，检查指纹和上面的玻璃同尤哈·麦瑞瓦拉伤口处的玻璃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还能从手电筒上找到血迹，尽管这手电筒已经被洗过了。”

车库里再没有其他感兴趣的东西了。我和高依吾一起把东西收拾好，就像他第一次来这里时一样，然后我们回到房子里去。我走进去必须要经过厨房，那里亮着灯，厨房里的设备样样齐全，就像一个小巧玲珑的实验室：多功能的粉碎机、两个高功率

---

① 芬兰最大的油漆厂。

的切割机、制饮料机和东方人风格的餐具；窗帘盒下面垂吊着几盆花草。这儿给人的总体感觉是，这个厨房的使用率很高，在这里做的饭菜都是有利于健康的。

伊瑞房间的窗户已经拉上了厚厚的、黑色的窗帘，四周的墙壁油漆成深紫罗兰色，给人一种洞穴的感觉。我把灯一打开，吓了我一跳：墙上和床上面的天花板上整个是一组猫的电子连续反应显示器。猫的眼睛和鼻子发出荧光，嘴呈半张开状，好像在痛苦地呻吟；整个身体是张牙舞爪的。很难想像竟然会有人喜欢在墙上装饰这样的画面。

房间里其他的东西都很一般：少得可怜的家具，一张很窄的床，床上铺了一条灰色的毛毯——已经打了几个补丁了。书架上的激光唱片和录像带多于书籍。他口头上是反对浪费能源的人，但放像机、组合音响都很显眼地摆在架子上。伊瑞还没有电脑，只有一台老式的打字机。桌子上有一摞纸，在这摞纸中夹着一本生物教科书。我拿起最上面的一张纸，是一份传单，上面写着：为什么要抵制“谢尔”公司的石油产品；还有几幅图画，画的是尼日利亚被毁坏的自然保护区和肯·沙劳—韦瓦的谋杀案。这些消息对人们的影响不大，所以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可我认为这些东西很值得一看。第二份传单是另一种类型的，说是欧共体成员国的肉联加工厂的老板们大肆利用基因食品，使自己稀里糊涂地加入到谋杀者的行列里去了。第三份传单是呼吁支持土耳其的政治犯，号召大家不要到土耳其去旅游。伊瑞到底参加了多少种民族运动组织？

“我对这些录像带很感兴趣。”高依吾在我背后说。

一般十七岁小伙子的录像带，从架子上可以找到的是恐怖电影、摇摆舞系列，也许还有什么色情录像带，但伊瑞的录像带的盒子上贴着的名字纸条完全是另外一种内容：“时事新闻：报道

有关欧共体的肉食牲畜的运输”“会见肉食牲畜的谋杀者”“英国广播电台：动物解放组织和它的支持者们”“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要求立法：不许对牲畜采取暴行”。半数以上的录像带的内容都是有关动物权利的材料。录像带里另有几盒是有关有关运输和犹拉斯克公园的。

“我们把这些拿走，还是留给便衣警察?”高依吾指着那些传单问我。

“这些可能有用。便衣警察保证对这些也感兴趣。”我说。然而我自己又反省了一下：有关动物保护积极分子的对待问题，安排他们的审讯问题，以及最近的抄家问题，全都做得有点过火了。责任在于我自己。伊瑞的那摞纸里夹着一张化妆品的目录，那上面没有文字注明是做过动物实验的。在我把这张纸放回去的时候，像是茅塞顿开，突然明白了这份目录的用意所在。

高依吾打开电视。芬兰 MTV 频道总是播放观众青睐的录像和欧洲的体育运动。高依吾把一盘录像带放进放像机里，然后选择适当的频道。

电视机里发出刺耳的杂音，把我们俩吓了一跳。荧光屏上闪烁着雪花，画面很暗，一看就知道这是他们自己用小型摄像机摄制的。

画面上是一群肥得走不动路的猪，十分惊恐地在那里相互乱拱。有一个戴面具的人在那里大喊大叫，从体形上可以分辨出是个女的。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到铁栏杆上面，避免了遭猪蹄乱踩的噩运。猪一受惊，全都拱到另一边去了。这时，手拿摄像机的人也跟着在后边转移地方。另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把猪圈的后门打开了，那群猪就争先恐后地往外跑，边跑边大声地咕噜咕噜乱叫——不知是高兴还是惊慌。幸亏这里闻不到猪圈里泛起的一股股臭味。摄像者高兴地欢呼起来。录像中断了。

“真他妈的胡搞乱!”高依吾这么认为。

录像又开始了。有一个人用黑色的大垃圾塑料袋套在身上，站在外面，他的背景是一家大工厂的一片灯光。他说：“就在十分钟前，我们完成了一项释放猪的任务，我们成功地……”

“这不是芬兰的。”高依吾聪明地判断。我们继续听，这是动物解放组织的偷袭队的成员在说：在布赖顿[1]附近，坐落着一个很大的猪圈，被他们动物解放组织的成员放跑了几百头猪。他们始终攻击英国和整个欧共体，禁止猪肉的基因利用。我把录像机关了。

“呀哈，我还想留些猪肉粉肠，明天当点心呢。”高依吾讽刺地说。

“把你的事情先放一边吧！我们要去看足球赛了。这盒录像带是从哪里来的?”

我重新戴上保护手套，把录像带退出放像机。录像带上除了制作者的标记外，没有其他任何记号。我把录像带插进盒子里，又抽出几盘看了看——都是些英国人的动物保护积极分子制作的教学录像带，上面录制了他们怎么样冲击猪圈、裘皮商店、动物实验室等地的实况。

“对这些感兴趣的除了便衣警察外，还有学习英语的大学生们。”我掏出手机直接给拉达路打电话。我告诉他们，我们正在为一起杀人案的侦破搞家庭搜查，也是一个高克拉丁屠宰场的纵火嫌疑犯的家庭。

“他也在我们的花名册上。”便衣警察说。他们已经把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活动方式的备忘录寄给我了，这些年轻人干起这活来驾轻就熟。

---

① 英国南部沿海城市。

“把这些传单和录像带都归拢到一起，然后检查每一盘带子。‘运输’的那盘带子里可能会有猪罐车。”我对高依吾说，并决定把所有找到的有关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材料，全部都带到埃司堡警察局去，从那里我们可以直接发给拉达路。伊瑞还要受审，实际上，他的审问压根儿还没有开始呢。

“谁搜查过这房间？”我问高依吾。

“布斯特亚勒威。我搜查车库。阿奴搜查女人的房间。”

我这才想起来，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到星期一的麦瑞瓦拉家搜查的备忘录。也许它已经混夹在我办公桌上的那一大堆待阅的文件中了，那一大堆文件是我最感头痛的事。在一次科长级的会议上，我紧急呼吁：必须成立一个反对官僚作风的工作组，这得到了一部分老同事的有力支持。当我开始起草工作组的宗旨提要时，他们才醒悟到问题的实质所在。

伊瑞选择的这些激光唱片，向我揭示了两代人之间不可逾越的代沟，我一点不知道他喜欢的那些歌唱家的名字，除了其中一个名叫拉斯姆的。我扫了一眼衣柜，那里面几乎没有什么衣服，只是堆了几摞纸。高依吾到汽车里去拿大塑料袋了。写字台的抽屉里乱七八糟，有几副耳环，还有一些脏袜子。最上面的抽屉上了锁。家庭搜查许可证是允许撬锁的，但我决定还是先问一下芮佳，伊瑞把钥匙放在哪里了？

伊瑞房间的窗户开在房子的进出通道一面。我听见有汽车开进院子里来，便从百叶窗的缝隙里往外看，希望看见的是安奈·麦瑞瓦拉的车子，可是，院子里停着的却是一辆达毕奥·浩勒玛的深蓝色的桑塔纳轿车。我看见浩勒玛从车里出来的时候，差点和高依吾撞个满怀。接着浩勒玛问了什么事情，高依吾摇摇头。然后，浩勒玛打开房门，让高依吾先进来。我听见芮佳三步并作两步地迎了出去。

“他们都说什么了?”芮佳满腔热情地问。

“一会儿再说。警察在这里是不是因为伊瑞的缘故?”

“伊瑞?发生什么事了?”

“你没有听新闻吗?高克拉丁的屠宰场着火了。有三个人被烟熏得窒息，送到医院去抢救，有两个差点死了。警察抓了几个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成员，涉及到犯罪嫌疑。说不定伊瑞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们怎么没告诉我这些?!”芮佳急急忙忙地走到伊瑞的房前，砰地一声把门推开了。

“我们伊瑞是不是被抓了?!”激动的芮佳显出一副和她父亲一样的神态:微微向前撅起的下巴，竖起的两道坚毅的浓眉。

“是的。他由便衣警察来处理。”我一边回答，一边忙着把衣柜里的纸拿到床上。我不小心碰了一下损坏的衣架，从衣架上掉下来一件亚麻布的衬衫，像长袍似的。另外几件衣服伊瑞都是胡乱地挂在那里，有两条裤子、一件T恤衫和一件毛衣。那些袜子和内衣、内裤倒都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架子上，但都没有熨过，也许是伊瑞为了节约能源吧。

达毕奥·浩勒玛出现在芮佳的背后，用双手抱住她的肩，转过她的身子，把她搂在怀里。

“你好!病看得怎么样?”还没等他提及伊瑞的事，我就先发制人地问。

“非常顺利。我可能要做手术。伊瑞是不是真的参与了高克拉丁的案子?收音机里说那是一起谋杀纵火案。”

“至少，伊瑞和那些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积极分子们一起参与了高克拉丁事件。”

芮佳呜呜咽咽地开始哭泣。我不知道便衣警察是否已经通知了安奈·麦瑞瓦拉。伊瑞大概要关到星期天上午，我不想让便衣

警察提前释放他，我要亲自和他谈话。虽然过一个轻松的周末是我盼望已久的心愿——星期六晚上是芬兰对匈牙利的足球决赛，这是决定芬兰能不能出线参加世界杯比赛的关键赛，但现在这种情况怎么能去看？

“伊瑞真的是纵火者之一吗？”浩勒玛问我。

“这还不知道，我们的调查已经被中止了，下面由便衣警察来审问你们。芮佳，需要给你做一个正式的陈述录音，星期一怎么样？”

“我有考试。我什么也不知道！”芮佳把哭泣的脸庞转向我。浩勒玛用责备的眼光瞪着我。高依吾从他俩身旁擦身走进来，把伊瑞的东西都装进大塑料袋里。我们僵持的局面没有好转。

“芮佳，你知道伊瑞的备用钥匙放在哪里？”我得到的回答是气呼呼的“不知道”三个字。我放弃了撬锁的念头，把它留给便衣警察吧，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就让他们撬吧。

“你真有可能恢复声带吗？”我非常关切地问浩勒玛。他对突然的问话愣了一下，然后说：“也许有，也许没有。我的医生福尼亚特认为值得一试。如果我能尽快地做出安排的话，他答应和洛杉矶的老同学联系。像我这样的病例，在那里已经做了好几个了。”

“很好。可是你现在不能出国。”

“岂有此理！”我第一次看到温和的浩勒玛失态发怒，“这开的是什么国际玩笑！是因为尤哈……我没有杀害他！你们破案，不要让我们这些无辜的人遭罪！”达毕奥·浩勒玛转过身，拉着芮佳走了。高依吾看着我努了一下嘴，我也努了一下嘴回敬他。

“还要搜查楼下的桑拿浴室和芮佳的房间。”我对高依吾说，他正拎着大塑料袋出去放到汽车里。

桑拿浴室既宽敞又舒适，分里外两间，里间是蒸气弥漫的桑

拿浴，外间是现代化设备齐全的淋浴室。在淋浴室一侧的拐角上，镶有一个两米宽的壁橱，壁橱里装满了酒具和家庭的常备酒。大概是为了节约能源，全家人都不使用浴盆。桑拿浴室里是传统的烧木柴的桑拿浴炉子。宽宽的坐板上足可以躺下两个人。楼下还有家庭保健室——是整幢楼惟一没有窗户的房间。洗衣机和甩干机都是很高档的，这些都显示了家庭的经济实力。另外两侧的拐角上，则挂着“环境保护积极分子”的奖状。

这些情况能说明尤哈·麦瑞瓦拉什么呢？惟一能准确说明的是，他的生活方式是既追求舒适，又注意节约能源及保护大自然的。他家买的都是些结实的、昂贵的、质量上乘的商品；这房子的主人——或者他的妻子——都是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生活习惯的。对于这位主人的本身，能说明的就很少了。

很少，少得可怜。

我回到楼上。高依吾已经回来了，这会儿正在和浩勒玛谈论高克拉丁的火警情况。芮佳则在厨房里忙碌。我听见水壶在呼呼地响，突然感到特别想喝一杯咖啡。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了，这一整天的时间在工作中不知不觉地流逝了。但芮佳的房间还没有搜查。

楼上只剩下一个房间我还没有看过。我走过长长的通道，来到北边顶端的一个房间前，打开门。

一架大钢琴占据了房间的一多半，房间大约只有十五平米。四周的墙壁都是用淡绿色的墙布装饰的，墙布上有云杉树枝的图案。芮佳睡的是两用沙发床，现在白天是沙发。钢琴下面装有特殊的音响装置，还有，我感觉到门里面和两堵内墙里面都有隔音的特别装置。

乐谱架上主要是西贝柳斯[①]的抒情曲。打开着的练习曲乐谱是登·弗斯特·圭塞的作品。我也弹过这首练习曲，可和谐部分总是弹不出优美的旋律来。有时我听约勒马·海尼宁弹奏西贝柳斯的作品，弹到类似这样的和谐之处，就给人一种隐约可见的感觉。钢琴上另外还有古拉和莫扎特的乐谱，以及女高音的练习曲。然而，我的目光一下被书桌上的一只银质镜框吸引住了，镜框里镶着达毕奥·浩勒玛的照片，他微笑得很迷人。墙上贴着从杂志上剪下来的他的照片。浩勒玛确确实实是芮佳·麦瑞瓦拉心目中的偶像，而不是男朋友。

芮佳的房间里没有几本书。我发现麦瑞瓦拉家的人没有看书的习惯，不过客厅里还是放了几本装门面的名著，如《七个弟兄》和《无名战士》等等。芮佳的书架上摆着《天然化妆品指南》《音乐文学》和《爱情的浪漫史》——是由杜娅·莱迪宁翻译的达芙妮·杜·毛端的作品。我真诚地希望这姑娘以后能正确地对待现实生活中的角色，不要盲目地崇拜英雄主义。

我刚打开衣柜的门，芮佳就闯了进来：

“你是不是非得这么做——当着男警察的面，翻弄我的内衣裤！?”

我没有回答。让芮佳自己去思考吧：这幢房子为什么要被搜查两遍。

“我和妈妈都不太清楚伊瑞在外面所干的事情。但我们相信，裘皮动物饲养园里的小动物和肉食动物遭到残酷地虐待，这是事实，必须禁止。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伊瑞的不一样，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管好自己和亲属们的所作所为，不要扔石头砸人家的玻璃窗。”

---

① 芬兰最著名的民族音乐大师。

“你是不是要求达甫沙不要吃粉肠?”我一边问，一边打量着芮佳的衣柜。这是典型的小女人的衣柜：许多条长的窄裙和真丝衬衫，有两条名牌的牛仔裤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大学生套衫。

“我不会强迫别人做什么事，是达甫沙自己已经觉悟到了许多事情。”芮佳走到桌子旁，拉开抽屉说，“这些王已经都看过了，我是不是还有受怀疑的地方?”

我摇摇头，漫不经心地走过去。当我们搜查芮佳的房间时，她有权利在场。最上面的抽屉里有避孕套，这是不足为奇的。第二个抽屉里是五光十色的手饰。要拉最后一个抽屉时，芮佳突然阻止说：

“不要看这里面的东西，那纯粹是胡闹!”

我毫不犹豫地拉开了抽屉，里面除了一样东西外，别无他物。

那里有一张照片，是一张剧照，是在歌剧演出中拍的，女主人公穿着宽大的戏服，梳着高高的黑头发，嘴上露着微笑。但两只眼睛被剜掉了，心脏的地方也被剜了个洞。

我不认识照片上的这个女人，但从她的职业和芮佳这样对待她的态度，不难猜出她就是苏姗娜·浩静格，达毕奥·浩勒玛的前妻。

“都是为了苏姗娜，达甫沙才失声的。”芮佳激动地说，“声带是非常敏感和脆弱的器官，它受情绪的影响。如果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打击，声带就会失声。”

“是达甫沙对你这么说的吗?”

“不，是我自己这么判断的，也是我看了《声乐物理学》后得出的结论。苏姗娜不愿意为达甫沙生孩子，理由是有了孩子后会影响两个人的事业。但她现在怀孕了，是为了一个意大利的男高音生孩子。达甫沙是听汉堡的一位老朋友说的。”

“你不相信石头，但却相信这样的事情。”我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着，把照片放回去，关上抽屉，“下星期二上午十点半到埃司堡警察局来，在来访接待室里问我就行了。塞娅·莎莱拉或是米盖或是其他人在这个星期一以后来过家里吗?”

“他们是星期三来的，米盖在这里住了一夜，他的房子出租给别人了。妈妈说他可以住在后面的房间里，直到爸爸的葬礼那一天，可米盖说他宁愿睡到船上去。”

我走出房间向通往车库的门走去，从这里进车库不需要钥匙。我悄悄地溜进车库，去拿我们找到的手电筒。

高依吾在厨房里和浩勒玛一起喝咖啡。咖啡的香味非常好闻，但我没有时间留在麦瑞瓦拉家喝咖啡了。我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待处理的文件，有些还得带回家里去处理。我希望能赶在依旦睡觉前回到家里。

“他妈的这个周末又要泡汤了。”在汽车里我突然对高依吾说，“如果这手电筒是凶器，那么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哩。最起码这些嫌疑人都得审一遍：三个麦瑞瓦拉家的人，浩勒玛，莎莱拉和米盖·休白格。加曲娜·休白格在手电筒放回去的时候，已经回阿维南马群岛了。”

“塞娅·莎莱拉为什么要杀害麦瑞瓦拉?”当我们的汽车从内径路拐上芬诺路时，高依吾怀疑地问。

“也许这只是典型的芬兰人喝醉酒后，用酒瓶子互相残杀而已。尤哈·麦瑞瓦拉和塞娅·莎莱拉为白兰地吵架，最后莎莱拉用酒瓶子砸了尤哈。”

“但伤口处没有发现白兰地……”

“高依吾!”一般情况下，我是很爱护我的老搭档的，根本不顾什么流言飞语，可是现在，一整天的琐事已把我搅得心烦意乱了。

我目瞪瞪地盯着桌子上的那一大摞纸。便衣警察寄来的一个大信封袋，看起来至少有两公斤重。报告文件中有布斯特亚勒威的，还有赖岱的。地方刑警署的备忘录的提要没有列入目录中。还有警察总署侦缉科的咨询。我把这一切都匆匆地浏览了一遍。贝扎已涉及到触犯法律，被列入罪行条例。他因为在审讯中打人之事，被停职反省至今。现在看来威达宁是毫无疑问要提出起诉的。人事科也来了通知：斯切姆在停职反省期间不发工资。我狠狠地踢了一脚椅子：在往后的几周里，我要让其他科室也碰到点麻烦。

我把这些文件纸张全都塞进包里，决定先回家去。早晨我是坐公共汽车来的，现在驾驶我的专车，心里头产生了一种怪怪的感觉。穿过吐鲁高速公路，我就抄近路，沿着汉达的田间小路走。大卫村庄的西边显得特别地空旷，原来那绿色的田野，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堆又一堆一米高的土堆。每次我抄近路走时，必须得穿过一个筑路施工工地。我知道那里是不允许通过的，但我却明知故犯，懒得绕道。有两辆挖掘机在那里施工，有一个工人向我挥手，示意走开。但我装作不懂，继续往前走。

我们在汉达住了三年，周围的环境变化是日新月异。原来的空地全都盖起了小洋楼，在这些新楼的旁边，我们这些租住的一层半的小楼就像是流浪者的栖身之地了。春天的时候，高科技中心在汉达湾附近圈地几百米，把这个地区的树都砍倒了。安迪曾经加入了反对施工的抗议行列。虽然利尔曲斯克莫塞沼泽地的自然保护区已经从干旱化的威胁中得到挽救，但是，沿海湾一带的景观仍然令人悲观失望，溪水流域的芦苇荡已日渐沙质化。

爱因斯坦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了。在楼梯口放着的几只小鼹鼠，算是它向我炫耀的战利品。我不愿意伤害猫的感情，所以没

有立即把死老鼠扔出去。先让猫和家人一起吃饭，等到晚些时候再把死老鼠扔出去吧。记得从我生完孩子、抱着依旦从妇产科医院回来的那一天起，爱因斯坦就开始卖力地捕捉老鼠了。连着一个星期，几乎每天它都要叼回家两只小老鼠。它有时也会侵犯小鸟，迫不得已我们就在它的脖子上绑了一个小小的警报器，这使它感到很恼火。

我姐姐在依旦出生前曾建议我们把猫扔掉，因为怕它会抓小婴儿的脸，伤了眼睛；还怕它会跳到小婴儿床上，捂得孩子窒息。可我们不忍心那样做，但是为了孩子的安全，我们曾委屈过猫。后来一直等到依旦下地学走路时，爱因斯坦还是小心翼翼地和孩子保持一定的距离。直到我们两次把依旦喝的牛奶给它吃后，它才渐渐地敢接近孩子了。

楼下还是照例充满着嘈杂的声音，依旦在玩木头火车，安迪躺在地上，一边喝红葡萄酒，一边听着埃甫·诺马利的歌曲，“为什么一切美好的都是那样地天真烂漫，而现实生活中满是荆棘险情；为什么一切美好的都是逗人开心的玩笑，而幸运只是像废弃的衣物……”

“你和这首歌有共鸣吗?”我弯下腰把音响的声音调小了一点。

“你听说高克拉丁屠宰场着火的事了吗？肯定听说了。”安迪说。

“我在那里。你没有看见吗?”

“是不是那些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人纵的火?”

“我们的调查侦破工作被勒令停止了，案子转到便衣警察所去了。”

“真他妈的操蛋！他们意识不到这会伤害整个环保运动吗?处理这样的事情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安迪端起酒杯，喝了一

大口红葡萄酒。我走到他边上坐下，把依旦搂到怀里。

“有时候你的观点太片面固执。明天一起去看足球赛吧。我们单位发的票有多余的，把依旦送到达毕奥拉你姐姐家里，你妈妈可以帮助照看。”

安迪摇摇头说，他对足球不感兴趣。我对体育运动比较感兴趣，经常去看花样滑冰和田径赛，有时也看看冰球赛和精彩的足球赛。

“还有红酒吗?”我走过去倒了一杯酒，拿了一块黄油面包，一边吃，一边拿出动物保护革命组织成员的嫌疑犯的花名册来看。第一栏里的名单都是去年春天的，那时这个组织刚刚开始搞破坏活动，砸了几家肉店和裘皮商店的窗户和橱窗。我寻找伊瑞·麦瑞瓦拉的名字，但他那时候还没有被列入该名单。出乎我意料的是，在这名单中我发现了另一个熟悉的名字：哈瑞·依冒宁。

11

浓浓的烟味儿从空气中飘过来，直渗入我的肺部。马纳勒海明大街上的匹克威克大酒店门前人山人海，这情景好像是半个赫尔辛基市的人都挤在这里，等着入场去观看芬兰——匈牙利的足球赛。埃司堡警察局的拉拉队有四十个人，我们科几乎全到了——只有布斯特亚勒威愿意去打高尔夫球。达斯基宁摇晃着手里的芬兰国旗，布包宁在他瘦窄的脸上画了个蓝色的十字，这代表芬兰国旗。

“辣椒们必败!”布包宁大喊一声。他总是这样给反对派起外号，以示轻视。

“那我们就去喝酒。”达斯基宁带着官腔说。在比赛开始前二十分钟，奥林匹克运动场的大门口已被堵得水泄不通了。阴沉沉的天，整整一天都看着像要下雨的样子，现在终于开始下了。亏得我穿了雨靴，在雨靴里又穿了毛袜子，身上又穿着毛衣——这些都是明智的决策。

我很高兴能和同事们一起到体育场来看球赛。我想趁这个机会找到经济犯罪侦缉科的冈代立宁，因为我等着要的麦瑞瓦拉公司的财政情况的报告，他一直没有送来。冈代立宁是一个加班加点勤奋工作的人，所以在这种场合一般很难见到他。

瞎起哄、喝酒、互相开玩笑，从这一系列现象很难相信这是

一帮警察在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我们上身都穿着皮夹克，下身是牛仔裤或是裤腿宽松的裤子；有人戴着长舌运动帽，有人戴着滑雪帽；清一色的一次性雨衣——没有一个人穿深蓝色的警察制服。达斯基宁也把制服留在家里，身上穿了一套长跑马拉松的运动服。体育运动场的大门口设有安全检查，谁也甭想蒙混过关，有个别人还必须在雨中打开他的手提包接受检查。我们这些人中谁也没有赖岱想得周到——在口袋里装了一只袖珍望远镜。

我们走上四号看台的中间座位，前面的雨伞遮住了我们的视线。我坐在高依吾和达斯基宁中间，想借他们俩高大的身躯给我挡风遮雨。王坐在高依吾的另一边，他俩在小声地谈论着昨天晚上的电影。这么说，他俩昨天晚上一起去看电影了。当高依吾用手擦干阿奴·王额头上的雨水时，我注意到了那种温柔体贴的缠绵恋情。高依吾不但是我的同事，而且还是我的好朋友，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和王一起去看电影了？他是不是怕我说这是工作中的罗曼蒂克？

看台上的观众根本不顾下雨和天黑，一阵阵的高呼连续不断。于利阿赫要和我打赌最后的结果，我说 1 比 0 芬兰赢——这也是大家的愿望，都希望匈牙利队输。

“斯切姆没有票吗？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突然发现赖岱旁边的位子空着，就问道。

“他不来。”赖岱回避地答道，然后他只顾着去打开自己的望远镜。

“他是不是害怕糊一身鼻涕？”布包宁甩了一句，引起大家一阵哈哈大笑。

“你昨天见他了吗？”我追问赖岱。

“昨天我去‘渴骆驼’酒吧，看见他在角落里坐着。我喝两杯的工夫，他喝了五杯。”赖岱说着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重新

举起他的望远镜。

我昨天晚上给斯切姆打过电话，但他没有接。不知是他听到了什么事情正在生气呢，还是喝醉了酒。听说威达宁想做一笔交易：他不起诉斯切姆，我们也不要起诉他殴打老婆。这种无理要求是不能接收的，也没有人会和他做这笔交易的。

两队的队员同时入场了。大家对匈牙利队发出一阵轻蔑的叫嚣声，对本国队则报以热烈的吹呼声，特别是对足球天王亚瑞·立特马宁，我也跟着竭尽全力地高呼。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足球世界杯联赛是全世界最热门的体育运动比赛，如果芬兰能出线参加比赛，那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啊!

球赛踢得很精彩，但结果还没有出来。低温天气，把匈牙利的队员们冻得有点缩手缩脚的，芬兰队也有点错位。雨越下越大，雨水顺着雨披的帽子，流到我的鼻子上。翻皮手套只能保持暖和二十分钟。我借赖岱的望远镜看了一下这热烈的场面，感到了些欣慰。

“立特!立特!”布包宁急切地大声喊叫着。

“立特马宁真棒!”王微笑地对我说。

“是的，他踢得潇洒自如，但他不是我所欣赏的那种类型的男人。”我回答说。我们曾经把阿奴·王和莉莎·拉西拉宁做过比较，看谁的魅力更能使男人神魂颠倒。

“大家都清楚玛丽娅欣赏什么样的男人。那些男人从你墙上消失后都到哪里去了?”高依吾问的是那些原来我贴在墙上作为装饰的照片，其中有杰尔·莫恩、乔·包·约卫和亚勒冒·麦基宁，都是些汗流浃背的滚石[①] 大力士。

“适合于高级警察的这种类型不是不可视为适合于高级警察

---

① 滚石头是芬兰的一项民间运动。身强力壮的男人，把直径一米多的圆卵石推着、滚着向前走，走的距离越长，说明他的力气越大。

……唉呀，他妈的!不要让匈牙利人冲过来!加油！岱沃!”我大声高呼为守门员加油，因为他非常漂亮地接住了一个球。

中场休息时，我冻得像打摆子似地瑟瑟发抖。好在脚上是干的。真羡慕斯切姆有先见之明，呆在家里不用受罪。我敢打赌全科室的人都要得肺炎，一个星期不能来上班处理日常业务。达斯基宁给我端来一杯咖啡，这杯咖啡的热量可以维持到下半场开始。芬兰队踢得很顽强。踢到六十二分钟时，安迪·苏密拉射进一球。全场立刻像开了锅似地沸腾起来了，大声欢呼，相互拥抱。达斯基宁紧紧地拥抱我，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说过1比0。”当比赛时间还剩最后一分钟时，我得意洋洋地说。“继续进行!继续踢!他妈的裁判喊暂停是错误的!”当时间显示零的时候，我死气白赖地喊，但那些焦急不安的匈牙利队员感到这和继续进行比赛的压力是一样大的。

“不能让女人在足球赛上咋咋呼呼。”当毁灭性的灾难降临时，高依吾埋怨地说。

芬兰队把球射进了自己的球门。比赛踢平，出线世界杯联赛冻结。

我们无精打采地打着寒颤随着人流走出了体育场。我一遍又一遍地安慰自己说：不要像小孩子似的为足球赛的结果感到沮丧。可是这种伤感怎么也驱赶不走。我止不住地打冷颤，牙齿碰得格格地响。

“他娘的看我哭成什么样子了。”布包宁悲中作乐地说。雨水已经把他脸上的芬兰国旗图案淋花了，因为一次性雨衣只能遮到他的膝盖，所以膝盖以下的牛仔裤全都湿了贴在腿上。“我们去买一醉方休吧!”

“馊主意。”我反对说，“我再也不买爱格瑞毕加威瑞[1]了。”

“再没有比这些辣椒更操蛋的了。”布包宁失望地骂道。那腔调使我想起斯切姆，贝扎有一次在看台上攻击性地大喊大叫，并威胁说要杀那裁判员，那架势就像要吃了他们的球队似的。

我们决定到“雅诺宁劳黑”酒吧去暖暖身子。通常喝一品脱苦啤酒就可以解乏。

依旦在我身边一直睡到早晨八点。我心里十分内疚地感到：我是世界上最最糟糕的妈妈。我既不能每天按时起床给她做早饭，也不能精心地为她梳理头发。今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安迪就到森林里去长跑锻炼了，我就给孩子熬了点稀饭。白天，雨滴滴答答地下个不停。我在家里给依旦念幼儿画书——《海马爸爸和大海》，书的内容，孩子肯定还不能理解。趁依旦白天睡觉时，我迷迷糊糊地打了个盹，梦见了痛苦呻吟的猪群和哈瑞的尸体。我突然被惊醒了。哈瑞曾经是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成员，哈瑞和伊瑞……是不是这个原因哈瑞遭杀害？那么尤哈·麦瑞瓦拉呢？能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假设呢？那就是假设尤哈·麦瑞瓦拉捐资赞助了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活动？

星期一早晨是最最不尽如人意的时刻，各种各样的坏消息接踵而至。司空见惯的周末打架给我们科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这个周末还有三个人失踪：一个是四十岁左右的、从事经济工作的女人，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星期天下午她去森林里采蘑菇，就一直没有回家。另一个是失业人员，苏维拉地区的一个家庭的父亲。星期六去酒吧后就不见了。第三个是星期五晚上就失踪了的达毕奥拉人，已经参加过大学入学考试的阿尔杜·阿勒道宁。他

---

① 酒名。

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半夜里从一个家庭舞会上离开。从这个秋天开始，他曾几次对朋友说他想自杀。举行舞会的地方是在威斯特丁海边，他的朋友们都担心他会从奥朝拉丁大桥上跳下去。我把这个案子交给高依吾后，他就带领抢救中心的打捞员们立即行动起来了。

"三个人失踪，这说不定是系列谋杀。"由于感冒，布包宁的话音里带着浓重的鼻音。

"什么理由?"我严肃地说，"我们现在必须分工合作，打架斗殴的案子先放一放，失踪和谋杀案先办。布斯特亚勒威，你和赖道沃瑞一起继续搞那些高中生的审讯。布包宁……"

我不得不当机立断，因为案子实在太多了。由于实力不足，我现在特别想念斯切姆。对于侦破失踪案，他有着丰富的经验。布包宁一直对斯切姆的离婚持怀疑态度，认为斯切姆的妻子离开他的原因之一，是他要了太多的失踪的把戏。

人手不够，是我自己搞尤哈·麦瑞瓦拉的谋杀案最好的理由。开完会，我回到办公室就给便衣警察所打电话。伊瑞·麦瑞瓦拉已经被释放，因为法律规定拘留审讯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但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还需要提审他。便衣警察已经调查清楚：几星期前，在玛立宁屠宰场实习劳动的一个女学生是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一个成员的妹妹。这个十五岁的埃司堡湾中学的学生将被判刑入狱，因为她是偷窃屠宰场的钥匙和参与谋杀纵火的嫌疑犯。

依照法律办事，我不能发表太多的意见。我不想把尤哈·麦瑞瓦拉的谋杀侦破工作移交给便衣警察所去，因为这个案子也牵涉到对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怀疑。米盖·休白格是否知道哈瑞是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成员?

米盖船上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上午我试着打了两次都没有人

接。

布包宁报告说，已找到了一个失踪者，他是苏维拉地区的一个家庭的父亲。他在一个朋友家里喝酒，醉得不省人事。他妻子肯定特别讨厌他这个酗酒的恶习，所以就故意给警察报了案。

“你接着办基湾拉丁打架斗殴的案子。”我对布包宁说。他的鼻子里堵满了鼻涕，鼻头又红又肿。“你的感冒不轻啊!”

“我没有发烧，”布包宁吸溜着鼻涕说，“就他妈的这鼻涕像自来水管似地止不住。”

我批准布包宁回家休一天病假。然后，我打电话与经济犯罪侦缉科的冈代立宁联系。

“我是暴乱侦缉科的加里奥。麦瑞瓦拉公司的财政调查报告……”

冈代立宁在那头突然打断我的话说：

“我还没有顾上呢，我手头正在处理一宗贪污案。”

“我急着要，最好是今天上午就能拿到。”我用强调的语气说，“你是不是还想继续搁置一边?”

“不是的。但这个持股公司马来·诺斯曲姆真他妈的难找到线索。这里面纠缠着的两个公司的经济关系真是闻所未闻。”

“怎么样?”

“我现在就开始做，下午给你打电话。”

我挂上电话后，又试着给米盖打，还是没有人接。莫不是这个家伙逃跑了? 我径直向巡警请求帮助，要他们驾车到芬兰湾海港码头去检查“兰达”帆船还在不在。然后，我去参加每周一次的刑警处的科级干部会议。正走在路上，我的手机响了，是巡警打来的，告诉我说，“兰达”帆船停泊在芬兰湾的海港码头上。

“要我们抓什么人吗?”巡警海加拉热情地问。

“不，等我自己来处理。”

我又按了米盖的电话号码，可还是没有人接。会议上宣布了玛立宁屠宰场纵火案的决定方案。案子移交给便衣警察所，这是对我们的又一次打击。位于尼德古布的制药厂“奥瑞昂”上星期收到匿名信，匿名者威胁说要冲击药厂的动物试验室，放走所有的动物。高克拉丁的纵火事件后，那些私人老板一致要求加强警察的巡逻和保卫。

“我告诉他们直接找巡警科。”达斯基宁慢条斯理地说，“警察可不能替他们站岗。巡警科已经作了答复。巡警科已出色地解决了城市中其他好几处有可能发生事故的隐患。”

“喂，加里奥，你丈夫怎么那么积极地参加这些操蛋的活动？”巡警科的拉埃南出其不意地向我提问。

“安迪没有参加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任何破坏活动。”我毫不示弱地反击。

“你还不承认？上星期你丈夫没有带着孩子参加示威游行吗？”拉埃南竖起了眉毛继续攻击。他刚刚理过的像刺猬似的小平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那又怎么样？”我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警察的配偶不能参与犯罪活动，他应该认识到警察是中立的。”

“示威游行不是什么犯罪活动!公民不是有集会的自由吗？这也包括警察的亲属。我不能限制安迪的活动自由。我也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我很生气地驳斥道。

达斯基宁为了制止我们的争吵，他把话题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由于麦瑞瓦拉的案子没有进展，所以没有什么可说的。在会议结束前，大家着重讨论了毒品犯罪的案例。当达斯基宁宣布会议结束时，经济犯罪侦缉科的麦基宁问：

“斯切姆警察的职务怎么办？他是不是又要停职反省很长时

间?”

达斯基宁点点头。

“我希望案子能进展得快一点。调查工作的中断，是不是由于布包宁警察今天到警察总署去搞协作了?”达斯基宁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问。我点点头。

“我和高依吾警察明天要到迪古瑞拉去，我们保证到法庭去旁听至少两个案子的宣判：一个是打架斗殴事件，一个是严重滥用职权。”

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是布斯特亚勒威打来的，他要抓人的逮捕证，我马上就得去处理。达斯基宁无可奈何地在我后面叹了口气，因为多次一起去吃饭的约定都不能兑现，我只能对他耸耸肩。

下午两点过后，我才得空一边嚼着面包、喝着酸奶，一边翻阅便衣警察所寄来的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材料。在 1996 年春季的成员花名册上，除有哈瑞的名字外，还有几个其他的三十岁左右的人。但在新的花名册上，这些人的名字都消失了。哈瑞没有自己的个人简历。伊瑞·麦瑞瓦拉也没有。这小伙子肯定是被蒙在鼓里了，因为他不知道便衣警察为他列了这么多的罪状。动物保护革命组织中最年轻的成员只有十四岁，而且他还有自己的个人简历。

高依吾曾经与哈瑞的家属和朋友联系过。如果案子要重新进行审理的话，必定会给他们带来痛苦。我又给米盖·休白格打电话，还是没有人接。我看看外面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觉得如果亲自去一趟芬兰湾的海港码头，倒是可以振作一下精神。我不想带其他人去，因为这不是审讯。当科长的好处是，在办案中一切交通费都不需要自己掏腰包。

芬兰湾里的许多船只都已经停泊到岸上来了——因为天气渐渐变冷，不适宜航行了——只有个别的摩托艇在水面上荡漾。帆船只有两只。“兰达”帆船的中间是白色的玻璃纤维，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比我眼前看见的情况更加使我惊喜的——在和煦的阳光下，米盖·休白格正坐在甲板上看书。

“嗨!米盖。”我笑容满面地向他打招呼。

米盖站起来，走过来为我开门。这门对着船台，走进这扇小门，就像走进鸡笼似的。

“嗨!”他招呼得不是很热情。

“我给你打了许多次电话，可你都不接。”我说着跳到“兰达”的甲板上。

“我不想接。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来有什么贵干啊?”

“有，也没有。”我大步走向船尾，在船舵旁边坐下。米盖上午是不是航海去了？因为大帆还在船杆上，不过已经降得很低了。

“你喝咖啡吗？暖瓶里至少还剩有两杯。”

当我说“谢谢，我喝”的时候，米盖站起来打开了船舱的门。

“欢迎你来参观我这浮在水面上的宫殿。”他半开玩笑地说着，示意我进去。我从小楼梯上走下去，进到主舱里。里面的布置使我感到眼前一亮：一张折叠式的航海桌上铺展着一张航海图，旁边还有手提式的奥立凡特电脑和两本书点缀着。船上使用的微波电磁一般来说只能维持几个小时，那么米盖在船上到底干些什么呢?

“卧室在前舱。”米盖很坦然地说道，就好像我是一般的客人一样。“你要放糖和牛奶吗?”

“只要牛奶，谢谢。”我向前舱扫了一眼，里面也就是一张床的宽度。前后舱之间是厕所和没有门的衣柜。主舱的右边靠后角上是一个简易的厨房，厨房里有炉子和净水过滤器。主舱的墙上钉着架子，架子上摆满了书，有纯文学的、旅行的，还有鸟类和植物的指南。

“‘兰达’这个名字是不是取自于一部旧的侦探小说？”我问。米盖递给我咖啡，我用双手去接，无意中我的手碰到了他的手。

“你看过吗？”

“看过。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回答后想，米盖追求的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生活方式，他以安德鲁·加维的代表作中的主人翁的名字给他的船命了名。

“‘兰达’的主人翁至今仍是我最喜爱的英雄人物之一。”米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蓝色封面的旧书《沙宝》。

“我在旅行中还是喜欢阅读芬兰语的书，对其他语言的书都不感兴趣。有时候我的脑子里就像灌了糨糊似的，搞不清楚到了什么国家该说什么语言。你要巧克力饼干吗？”

我从来不拒绝美味的小点心。米盖坐到另一个沙发上，我坐在折叠桌的这一边。我一口咬了半块饼干，这几乎是纯巧克力糖。我就把这当做中午饭吃了吧。

“你是来谈伊瑞的事吗？”米盖一边问，一边用舌头舔着巧克力。

“不完全是。他被释放后，你见过他了吗？”

“我昨天去麦瑞瓦拉家了，是安奈邀请的。伊瑞在拘留所里呆了四十八小时，回家后一句话都不说，他对纵火之事只字不提。高克拉丁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情况，这期间米盖的表情很紧张，他一直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然后，他脸上急速地绽出一丝微笑，说：

“我有一个想法，喝完咖啡咱们一起扬帆去兜一圈，到黑沙拉，然后回来。怎么样?”

“坏主意。”我盯着咖啡杯说，没有看米盖。

“怎么啦？让你自己扬帆航行。有你监视着我，我不会逃跑的。”米盖笑得很亲切，我感到脸上发烧了。

“我有一件私事，想谈谈有关哈瑞·依冒宁的事，他也是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成员。”

“哈瑞？难以置信。他是那么——噢，对了，你自己知道。”狡猾的家伙。

“他没有参加过任何暴乱活动和纵火破坏活动。他大概只是参加过辩论之类的活动，就让便衣警察记到花名册上了。伊瑞和哈瑞之间相互不交换意见吗?”我说。

米盖表示否认。对伊瑞来说，哈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但有一次，他很认真地对米盖说，哈瑞确实是对大自然中的鸟类非常精通。对达甫沙来说，那些只是看热闹而已。

“这不都是发疯吗？开车几百公里去窥视那些金丝雀。汽油的废气污染了大自然，还口口声声地称自己是保护大自然的急先锋。”说完，我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米盖也跟着笑。接着，他又一次建议我们去航海兜风，我糊里糊涂地答应了。

“我把帆都准备好了。刚开始启航时不用扬帆，等船转向东方时，我们就赶上顺风了。你身上穿得够暖和吗？我这里只有毛衣和长裤。”

我穿着牛仔裤和皮夹克，这是上班的打扮，那会儿没有想到要去航海。我从口袋里掏出护耳套戴上。我们启动马达后，米盖开始自责自己是一个懒惰的人：

“我在你心目中是一个没有信誉的人，如果我提议航海去摩加港，你肯定不同意。”他开玩笑地说。我们起锚后驶出海港码

头，竖起桅杆向侧面的航道驰去。

“达甫沙昨天对伊瑞大发脾气，伊瑞针锋相对，小伙子谴责达甫沙杀害了尤哈!”

“什么?”风把我的头发吹得盖住了眼睛，使我看不见米盖在那一刹那的表情。

“纯属无稽之谈。尤哈和达甫沙在瑞兹盖尔岛上的桑拿浴室里打架，我是知道的。但那只不过是气头上动了手而已。”米盖从大衣的胸袋里掏出烟斗，他要我操纵方向轮，他好点烟。

“如果真有人杀害尤哈的话，那也怀疑不到芮佳和达甫沙身上去。真是莫名其妙!”米盖重新把握方向轮时，他的手又碰到了我的手，这瞬间的接触就像过电似地传遍我的全身。阳光照射在海面上，犹如许多银光闪闪的小碎片在跳舞。苏·维沙瑞岛沿岸的白杨树迎风摇摆着。我的眼睛被晃花了。

“你说过，那天夜里你听见了伊瑞出去，你敢肯定他出去只有一分钟吗？你是不是在睡梦中?”

“我可没有睡觉。”米盖说得很坚定，“每次我要出海前都像小孩子似地激动得睡不着觉，然而出海在外的时候，我的心情又是既兴奋，又惆怅。每次第一夜在船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死，像木头一样，因为这里就是我的家。”

米盖把目光转向我，说：“伊瑞是一个十分狂热的盲目信徒，但他不是什么杀人犯，伊瑞很爱他的父亲。据我观察，这孩子非要干什么蠢事不可。”

“已经干了。”我把头发捋到耳朵后面，用护耳套压住，这样就不会再到前面来遮住眼睛了。我的翻皮手套已弄湿了，手冻得厉害，看来得向米盖借手套了。

“偶尔我在想，你会不会把我扣留整整一冬天啊？不能啊!你可不能啊!我必须要走，我不能忍受一个月不出海的生活。”

阳光从海面折射到米盖的眼睛上，这一对眼睛是那么地深沉和忧郁。他吸了一口烟斗，然后喷出一股烟云，直呛得我一阵咳嗽，不得不跑到外面去。

我回忆自己十多年的警察生涯，曾与许多形形色色的人打过交道：有企业界的高级管理人员，有商界的巨富，有赖债的，有杀害亲生孩子的母亲，有精神变态者等等，在处理这一系列的案子中，我从来没有干过什么傻事。

在以前所有的案件审讯中，没有一个人能像现在这个人这样打动我的心。安迪没有，我的第一个初恋情人约尼也没有——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在我的老家阿勒毕贵拉市，他是我的一个怀疑谋杀的案子中的嫌疑犯。现在，这个米盖·休白格的魅力真的使我神魂颠倒。他是那样地英俊，他那精壮的体型是那样地健美，他那有棱有角的“国”字脸就像经过加工似的。我被这些迷恋得竟然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有夫之妇，而米盖又是我怀疑的谋杀同父异母的哥哥的嫌疑犯。

我可不能干这种一失足遗千古恨的事情，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上个周末我阅读了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基本纲领，它要求每一个成员都要有所行动。伊瑞会不会是他们指名道姓地要他杀害父亲?”

米盖脸上的肌肉不被人察觉地震颤了一下，他不回答，只是摇摇头。我可忍耐不住这样的沉默，便直截了当地问米盖：

“不是芮佳，不是达毕奥，不是伊瑞，难道是你自己？你认为你哥哥怎么样?”

米盖又喷出一股新的烟云，遮挡住了他的眼睛。他站起来急促地说：

“现在是改变航向的时候了，去摇辘轳。”我把帆升起来，按

照他的命令转向西方。

我悔恨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航海，这是多么不明智的决定！我有干不完的工作要做，而且这次航海还有可能会引起我包庇他的嫌疑。米盖等帆升到顶端时，把升降绳结结实实地绑在了桅杆上：

"太棒了！"

船转向顺风，帆被吹得像个鼓鼓的皮球挂在桅杆的一边。顺风没有掀起大浪，所以，"兰达"乘风破浪直驶向前。我们向勃勒加拉半岛驶去，瑞兹盖尔岛在前面显现为一个小红点。当米盖重新坐下来时，我继续问：

"你哥哥有没有可能杀害哈瑞？"

米盖的目光空洞，神情恍惚：

"哈瑞不是被谋杀的！"

"如果是呢？"

"怎么可能？真他妈的荒谬！"

"你说。"

米盖凝视着海平线上隐约可见的陆地：

"我们大家都认为哈瑞是一个温柔慈善的人。谁会杀害这样的人？"

"塞娅·莎莱拉认识哈瑞吗？"

"他们有两次一起乘我的'兰达'航海。这简直是荒唐的事，你根本不能想像到塞娅……唉！"米盖叹了一口气，脸上的肌肉抽搐着，脸色变得苍白。他用一只手掌重重地压着另一只手的手背，使手指都失血了。

当船航行到崩达拉和斯道拉海劳[1]之间，我们同时靠在了

---

① 均为岛名。

左舷上。米盖又把方向轮交给我，他去船舱里拿后桅帆，准备返航时用。我们默默地航行了十分钟，谁也没有说话，两人都贪婪地观看着沿岸的景色。黑沙拉岸边的一片树林已经变成五颜六色的了。一朵乌云从西边的天空飘过来。深红色的枫叶和淡黄色的杨树叶构成了强烈的色差。这一切使人会怀疑自己的眼睛，这到底是真实的风景呢，还是一幅水彩画？最后，米盖走到船头，解开帆绳，我转动着前桅帆，并绷紧帆，一切按照他的指示办。他用坚定果断的声音向我发号施令——这倒可以让警官班的学员来向他学习。“兰达”轻快地向前飞速行进，但很平稳，偶尔遇到一个大浪，它也能轻而易举地破浪向前。我可不敢怀疑大海的能耐。米盖把前桅帆收进船舱里去，然后装上后桅帆。

“风力增大了!很好!你是不是也经常在海上航行?”

我没有什么航海的经历，所以对一切都感到很好奇。米盖升起后桅帆，让它迎风鼓起，然后我们把它转过一百五十度。

“现在就回芬兰湾。”他低声地说道，然后砰的一声坐到箱子上，“可惜你不能旅行更长一点时间。你很美。”

“恭维话听起来总是让人心情舒畅的。”我高兴地笑着说。这时海风已经把我的脸吹红了。

“是这样的。如果你今天不跟着一起来航海，也许我就逃跑了。那会怎么样?”

“我就乘海上巡逻艇追上来。如果你说不出正当理由，我就把你的护照没收了。”

“如果尤哈的死因调查不出来呢？你是不是要把我扣留一个冬天?”

“会调查清楚的。”我十分自信地说。可我还从来没有这样断言过。我想方便了。我先向米盖问清楚怎样使用船上的厕所，然后就走进船舱去。在船舱里我忽然觉得船摇晃得很厉害，不过没

有一样东西移动错位，或是掉下来。在我们出海之前，米盖已经把手提电脑收起来放到了一边，把分散的书籍都归拢到了书架上。在我的想像中，半年时间生活在这十米长的船上既无比地迷人，又无比地可怕——船上的废物、垃圾都不能及时地排出。当我正要跨上甲板时，船猛烈地颠簸了一下。

"转过男人岛，驶过大牛犊岛，在这样的顺风顺水中是很容易的。你能不能把后桅帆再拉紧一点?"

我紧了一下帆索，感觉就像抽紧了我的脊梁骨似的。

"男人岛过后，航行情况非常良好。你怎么样？能坚持到最后吗?"

"能，能坚持。"我逞能地说。时间已经很晚了。这次航海旅游没有别的收获，只是增加了我心情的烦躁，让我更强烈地感觉到，米盖·休白格隐瞒了什么真情。但是用什么方法才能使他说出真情呢？还有一件使我意想不到的事就是，他竟会庇护达毕奥·浩勒玛。浩勒玛肯定不会与哈瑞的死因有关。

我们谈论着风的情况，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帆绳从辘轳上拉起了一点。我眺望着岛上星罗棋布的小别墅和海神庙。前年冬天，我曾和安迪一起在这附近滑雪。警察的眼睛就和猎鹰的眼睛一样，突然，我发现前面有不寻常的东西：

"船上有望远镜吗?"

"在船舱里。"

"快去拿给我!"

米盖毫不在意地拍了拍我的手背，然后跳到船舱里去了。在我拿到望远镜之前的几秒钟，真是让我心急如焚。我从望远镜里看到的情况非常严重。

大牛犊岛的东南角上漂浮着一具尸体。

"现在降帆!看!"我把望远镜递给米盖，他看后露出十分痛

苦的表情。他把舵推给我，开始降落后桅帆。我用另一只手取出手机，迅速地按了局里的电话号码，要求他们赶快派巡逻艇来。

米盖放倒桅杆，开始启动马达。他做这些事情非常利索，不愧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航海家。但我注意到他的嘴唇在颤抖。

"使用回声测探，这里的深度是一点六。他妈的，什么都没有带!"

我们找到了合适的登陆地点，离尸体有二十米远。我跳上岸后才想到：如果想不湿我的鞋，我就得从岸上匍匐着爬到尸体跟前去。

"船上有胶靴吗?"

"有。四十四码的。"

"缆绳系长一点，扔过来!"我吩咐道。我把船牢牢地绑在岸上的一棵松树上。

"接下来的事情都是你的了。没我什么事，我要先走……"

"不要走，呆在船上。"

米盖垂头丧气地呆在船上。我盼望巡逻艇能尽快地赶来，发现尸体的地方是不希望群众来凑热闹的。

我把胶靴套在鞋上，这样胶靴就不显得特别大了。我跑到海滩边，可以够到死者的衣服。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把尸体拖到海滩上，放在海浪打不着的地方，别的我就不能再干什么了。

"要我帮忙吗?"米盖大声问。

"呆在那里别动。船上有橡皮手套吗?"

米盖摇摇头。我又跑回岸上，给科里拨了个电话，刚好是高依吾接电话。

"这可能是失踪的那个参加过大学入学考试的年轻人。他的特征?"我问。

"高一米七十九，体型偏瘦，深棕色的直发披到肩上，浅棕

色的眼睛。文身……”

“失踪时他身上穿的是什么？”

“咖啡色的仿缎上衣和绿色的布裤子，阿迪达名牌运动鞋和……”

“够了，他漂浮在大牛犊岛的岸边。”

巡警的巡逻艇赶到了，随艇同来的还有技术摄影师。他要拍照时，我们都按要求全部穿上了保护服，把尸体从水中拉起来，并按摄影师的要求，把尸体翻过来倒过去。当我看见这个淹死的年轻人的脸时，就竭力把他想像成阿尔杜·阿勒道宁的样子。我敢肯定两者是同一个人。随后我搜查尸体，从上衣的胸袋里找到了一个皮夹子，塑料硬片的驾驶证上是一个芬兰小伙子的照片，姓名是：阿尔杜·阿勒道宁。出生时间：1979年10月21日。

“这个人是星期六凌晨失踪的，有自杀嫌疑。”我向巡警解释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犯罪的疑点。一切要等到尸体解剖后，才能得到准确的答案。

米盖从甲板上消失了。我走到船上去还胶靴，发现他正躺在前舱里，两眼透过天窗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天空，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你自己回码头去吧，我乘巡逻艇回去。谢谢你给我这次航海的机会。”我很温柔地说。

米盖坐起来，从我手中接过胶靴。

“那是怎么回事？”他有气无力地问，“莫不是你在睡梦中都会受到这些死人的干扰？”

“有时候。但是，如果热爱这一项工作，就力争去把这项工作做好，那就一定能做好。你不是这一行的专业人员。这是这个星期中的第二具尸体了。记住，你不需要这方面的经验。”

“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是谋杀吗？”

“我认为是自杀。”我不能再说什么了。

他同情地发出一声叹息。我把手压到他的肩上，他顺势把脸贴到我的手臂上。我抚摸着他的头发，他突然把我紧紧地抱住。我们俩默默地相拥着，直到摄影师叫我，他需要我的指示。

“我要走了。我把你的缆绳解开好吗?”

米盖点点头，站起来跟在我后面走上甲板。我们又相互对视了一眼。这时，我看见从岛的后面开过来一艘救护艇，我忙走过去迎接。我站在岸上看着米盖启动马达，然后慢慢地驶出狭窄的航道，向芬兰湾的海港码头开去。当他弯过岛后，又回头看了一眼。我向他挥挥手，他没有回应。

12

死亡通知书发给阿尔杜·阿勒道宁的父母亲的同时，也电传给了我和布斯特亚勒威。死者的双亲很悲痛，我在安慰他们时，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他母亲曾想方设法地帮助他排除心理障碍，可是没有见效。小伙子就这么年纪轻轻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第二天的晨报上登了一则短消息，说失踪的年轻人找到了，但他已经死了。这则就事论事的短消息，使我的心里又泛起了一阵难过的涟漪。

星期二早晨，赖道沃瑞打电话来说，他得了肺炎，发高烧三十九度，医生给了三天的病假，我不得不另派一个人去和王一起调查采蘑菇失踪的人。

“我自己一定要振作精神。”我像母亲教导孩子那样对自己说。下午，我得和高依吾一起到警察总署去把贝扎搞糟的事情解决了。我想另外再找一个人负责芮佳·麦瑞瓦拉的审讯工作，可是苦思冥想也找不出一个人来，只得自己亲自去做。

冈代立宁的关于麦瑞瓦拉公司的财政情况的调查报告终于摆在了我的办公桌上。在晨会前，我匆匆忙忙地看了一遍。公司的财经情况是稳定的，去年没有什么大的投资项目，收支平衡。公司的领导成员有尤哈和安奈、经济经理海基·哈罗宁和马古斯·恩克尔——这个人我估计是尤哈·麦瑞瓦拉亲生母亲的亲戚。惟有

一件事，冈代立宁在这后面打了一个问号，那就是麦瑞瓦拉公司的百分之十二的股份在马来·诺斯曲姆的手里。这个人的情况在麦瑞瓦拉公司的股东登记册上没有记载，在工商登记处的档案里也没有。惟一的线索只有一个古埃塞地区的邮政编码。

税收情况给了我一个提示。我拨了冈代立宁的电话号码，询问他的意见，可这位高级警察说，他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顶着大风去开会，看见会议室里高依吾和王并排坐在一条板凳上，就像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似的。看见他俩含情脉脉、情意绵绵，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我派赖岱和阿奴合作去调查采蘑菇失踪者的案子，高依吾和我下午到警察总署去。然后我还需要一个人和我一起审讯芮佳·麦瑞瓦拉。

“科长怎么那么碰巧就遇到了阿勒道宁的尸体？你是不是又到发生谋杀案的灯塔那里去了？”赖岱突然问。

“没有。这完全是偶然。”我敷衍了事地回答道。我想把话题转到下面一件事上去，可赖岱继续固执地问：

“你是不是和巡警一起在海上寻找这个小伙子？”

“不是。我在海上是为了麦瑞瓦拉的案子。”赖岱没完没了的提问惹我生气，“这个案子中的财经情况露出了马脚。公司对外公开的一面是财经情况良好，但是背面却有一个股东隐藏在暗处。高依吾和布斯特亚勒威继续和我一起审讯证人。赖岱你可以在公司的领导成员中找一个助手。这些情况都是我在开会前从冈代立宁的报告中得到的。高依吾，十点半到第二审讯室去。”

我像逃跑似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随手把门在身后锁上了。由于开会，我把手机关了，现在它的留言机里有六条新的留言，其中四条是家里的号码，安迪肯定碰上什么紧急事情了。

“闯祸了。”我丈夫粗声大气地说。在电话里我还可以听到依

旦在大声地哭喊着。“我找不到汽车的钥匙，才给你打电话的。依旦的眼角撞到钢琴角上，伤得很厉害，我得把她带到地段医院去。”

“唉哟!真要命!你一个人行吗?”我心急火燎地问。我当然知道安迪一个人是能行的。“我是个坏妈妈”的自责又折磨着我。我真想撂下工作不管，冲到马丁贵拉地段医院去，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可是我不能啊!

“看完医生，就打电话告诉我医生是怎么说的。我把手机开着。”我说。安迪急急忙忙地挂了电话，他要上路去医院。第二个电话号码是便衣警察所的。我立即给那里打电话，主要是想把依旦的事情暂时忘掉，因为我脑海里一直驱散不掉胡思乱想，依旦耷拉着眼皮被绑在汽车里的安全椅上的样子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便衣警察告诉我的关于伊瑞·麦瑞瓦拉的情况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和我一样怀疑，这孩子是不是想用杀害父亲的实际行动来赢得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信任，然后进入核心小组?便衣警察的论据还不完全确凿，但完全有可能。他们也感到蹊跷的是：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成员哈瑞·依冒宁死于一年前，与伊瑞·麦瑞瓦拉的父亲是同一天和同一地方。接下来我们双方就由谁去找伊瑞谈关于哈瑞的死因更为合适展开了争论。幸好我找到了一个理由中止了争论——我审讯芮佳·麦瑞瓦拉的时间到了。

高依吾在会议室里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技术鉴定室打来电话说，手电筒上的玻璃与尤哈·麦瑞瓦拉头上伤口处的玻璃不一样。伤口不是手电筒造成的，所以手电筒不是杀人的凶器。”

“唉，那当然不是。”我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还有其他什么情况吗?”

“尤哈·麦瑞瓦拉的外套领章上的指纹是安奈·麦瑞瓦拉的。

外套上找到了米盖·休白格毛衣上的纤维，这很可能是休白格把他哥哥拖上岸来时沾到上面的。”

“唉，都不尽如人意。”我很不高兴地说。线索又断了，怎么再往下进行？

“今天你不高兴吗？”高依吾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在我们一起去审讯室时，在楼梯口他问。

“你大概不乐意去警察总署吧？”

“为什么不乐意？把斯切姆开掉，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我们男同胞们去年一冬天都这么祈祷：希望你不要再生孩子休护理假了。阿奴祈祷得更多，更热切地希望领导核心中不要再给你制造什么麻烦。”

“她是基督徒吗？”

“谁？”高依吾愣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说，“阿奴吗？我不怎么了解，因为我们没有谈论过这方面的事情。”

“信仰佛教也许是很有趣的。”

“玛丽娅！”高依吾很不赞同地阻止我说，“阿奴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人，她具有女性的文静娴淑的性格。然而她是一个警察……”他突然停住了。我们看见达毕奥·浩勒玛和芮佳·麦瑞瓦拉正等在走廊里。

浩勒玛是来送芮佳的，他可能认为，警察局这种地方对芮佳来说是过于残忍了。也许他是来盯芮佳的梢的。

“你在走廊里或是去咖啡厅等。”我对浩勒玛说，“这里至少要一个小时。”

“达甫沙不能一起进来吗？”芮佳的两只手微微发抖，就像一个唱悲剧咏叹调的女高音歌唱家。

“芮佳有权利在审讯中聘请一个助理。”浩勒玛争辩说。

“不行。因为她本人并不是被怀疑的嫌疑犯。”我紧接着说。

浩勒玛没有再争辩。当我们走进第二审讯室时，他已坐在走廊里了。

芮佳战战兢兢地回答了最初那些常规性的问题。她那害怕的样子就好像警察的审讯室是可怕的地狱似的。她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富家女子，到这种地方来还是第一次。我们曾在瑞兹盖尔岛上见过面、谈过话，那时我就敢担保，芮佳不可能杀害她的父亲。

从她那高挑、苗条的身材中可以发现她具有坚定不移的坚强意志，但在精神力量上，她缺乏隐瞒真情的足够勇气。

“妈妈像一个工作狂似的不停地干活，她说这是爸爸的愿望，秋季的订货已全都发出去了。”

“你对公司的情况了解多少？哪些人是麦瑞瓦拉公司的股东？知道马来·诺斯曲姆公司吗？”

芮佳耸耸肩膀表示她不知道，压根儿没有听说过这个公司。她对经商是不感兴趣的，她只想唱歌。

“你现在继承了你爸爸的一半股份，这是很可观的一笔数目，难道你不想继承你爸爸的事业吗？譬如，积极地促进环保工作或是参与麦瑞瓦拉公司的业务？”

这些问题使她感到困窘，她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不完全是这样的，爸爸没有什么特别热衷的事业。妈妈说我吃素食可以使眼睛明亮，所以看任何事物都与众不同。但是，爸爸……‘你的女儿可以以你的学识为荣，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新世界将是属于他们的。’”芮佳引经据典地说。

“春季你遭遇到的强奸未遂事件，你父亲的态度怎么样？”

“我是不是非说不可？我想彻底忘掉这件事。”芮佳乞求道。但我不能同意。

“爸爸当然大发雷霆，他当时就想冲出去揍他们一顿。他责备我为什么不坐出租汽车，而要搭他们的便车。他是一个非常典

型的父亲，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女人必须首先检查自己。”芮佳的嘴唇抽搐着，“爸爸走了，我的感觉就好像是被抽掉了主心骨似的。他在我的心目中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健谈和那样的博识……”芮佳从包里拿出手巾纸，“爸爸不是很喜欢我，有时他还嘲笑我找不到男朋友。他说，现在的小伙子不喜欢年轻姑娘穿老阿姨的裙子，打扮得像个烧香婆似地老气横秋，没有一点迷人的魅力。他还是那种旧思想，好像女儿嫁不出去，老子脸上就无光似的！”

我的手机响了。我猜是安迪打来的，所以我向芮佳说了声“对不起”，就走到外面走廊里去了。浩勒玛仍旧坐在那里，他那副神情直让人觉得他是到警察局这个“地狱”里来保护芮佳的。

“依旦的眼角处缝了三针，医生给她打了麻药。医生说视力不受影响。”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依旦自己怎么会碰成那样？”说完后，我感到这种指责的语调不妥。

“我在弹钢琴，女儿在琴后面拍皮球，她可能踩到了什么东西，不慎滑倒了，头正好磕在钢琴角上。”

“那里应该包上一点软的东西。依旦现在睡着了吗？”

“她打了麻药还没醒。我们现在还在约威。从地段医院出来，我们就到这里来了。只要等她醒来，就不必为她担心了。我们马上就回家，你今天能早点回来吗？”

“尽量争取，今天下午还要到警察总署去。现在正在审讯。”

虽然我不是那种母性特别强烈的女人，但此时此刻的心情也是难以平静的。我站在那里定了定神，使自己冷静下来。我经常为自己的内疚感到痛苦，尤其是在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坐在女儿旁边，贪婪地看着她，直到她睡着。可是我在护理孩子的细节方面有些马大哈，例如，从来没有去留心把孩子嘴里的猫毛拿掉，

也没有教她怎样躲避马蜂螫人。我姐姐海莱娜送了依旦一件礼物，是一顶安全帽，她曾教我怎样给孩子戴上和取下，并嘱咐我让孩子坐自行车时一定要戴上，可我把它搁置一边，从来就没有用过。

“你们在瑞兹盖尔岛上消暑期间，你爸爸有没有向你介绍过陌生人?”当我走进审讯室时，高依吾正在问芮佳。

“有的。夏天大多数来这里的都是航海爱好者。但他们不全都是爸爸的朋友。”芮佳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有一些是碰巧路过上岛来的，这些人中间也有商场上的老世交。我没有一直呆在岛上，我在城里有高考前的辅导课和两个地方的声乐课。你们不相信，可以问妈妈。”

芮佳甩了一下头发，她的一头乌发像黑檀木一样发亮。她穿着黑色的紧身套头衫、黑色的短裙和黑色的连裤袜，显得更加纤细柔美，活像个黑天使。我忽然想起，她曾提到过米盖。

“伊瑞被拘留，你妈妈的态度怎么样?”

芮佳转过头看着我，像是要笑出声来：

“你认为她会怎么样?我真纳闷，妈妈怎么能忍受这一切?!还好米盖答应负责葬礼的一部分安排工作，塞娅也答应过来从头至尾地帮忙。幸亏屠宰场的那些人一个都没有死，伊瑞说他不知道这火能给人带来生命危险。但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

“你从来没有参加过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活动吗?”

“我参加过两次。一次是去年反对穿裘皮大衣的示威游行，另一次是大自然保护组织召集的抗议海水污染的活动。我可没有工夫参加他们的所有活动。”

高依吾又问了一遍尤哈·麦瑞瓦拉死的那天夜里的情况，他希望能从芮佳的回答中找出矛盾之处，可是，希望落空了。姑娘很坚定地说，她和达甫沙都睡得像木头似的。

审讯再继续下去就毫无理由了。我让芮佳出去了。由于门没有关严，我听到在走廊里，姑娘和浩勒玛发生了口角。

“到我家去吧，我们俩很长时间没在一起了。”浩勒玛央求说。

“现在不去。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芮佳不耐烦地说。

“我需要你，芮佳。我必须在明天上午之前做出决定，到底冒不冒这风险到那里去做手术？帮助我下决心吧!”

“我不管!我可不敢决定你的声带和你前途的事!”芮佳干脆利落地说，“送我回家，或者把我带到公共汽车站。”

走廊里响起了高跟皮鞋的橐橐声，芮佳头也不回地往外走去。过了一会儿，浩勒玛追上去了。

“最好现在就去迪古瑞拉，在路上随便吃点什么就行了。”我对高依吾说。他正在把整理好的审讯材料装进档案夹里，然后登记在目录表里。

“去麦当劳。”高依吾提议说。当我极力反对时，他惊得目瞪口呆。

“现在我不吃汉堡包了，谢谢!我要吃的饭，不会再被空想主义者们抓到小辫子了。就到食堂去吃点土豆泥算了。”

达斯基宁和民警科的拉埃南坐在一起吃饭。他们旁边有一株高大的室内植物。我挤过去坐在旁边。可高依吾嫌桌子小，放不下他的餐具托盘，他就坐到抢劫犯罪侦缉科的饭桌上去了。

“奥瑞昂制药厂又受到新的威胁。”达斯基宁说，“如果药厂不释放做动物试验的动物，他们近日就要来冲击。下面署名的威胁者是动物保护革命组织。”

“这些年轻人的行动真迅速。据我所知，他们中有一部分仍然被便衣警察关着。”

“嗨，加里奥，这可不是什么闹着玩的事。”拉埃南插嘴说。有一点土豆泥滴到了他那名牌的丝绸领带上，他忙不迭地擦掉了。

“我们为什么要开始保护奥瑞昂制药厂的实验室？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精力来保护家庭虐待中的受害者呢。”我争辩说。我想起了阿瑞·威达宁和他的老婆。在一次周末打架时，他老婆差点丧命。这个家庭的暴虐已持续很久了。

达斯基宁把话题转到斯切姆身上：

“贝蒂的情况很糟糕，他违反纪律的前科可以排成队。停职反省必须延长到法院开庭为止。他可能要被判刑。”

“你有什么看法？”我意味深长地望着达斯基宁灰蓝色的眼睛。我知道，与我相比，他更不喜欢斯切姆。

“贝蒂有缺点，所以他不适合当领导。他处理案子总是讨价还价。去年冬天，你们科有一半人都希望把他驱逐出去。他的人际关系很紧张。”达斯基宁回望着我的眼睛。如果拉埃南不在同桌坐着的话，他肯定要抓住我的手。

“我可以把威达宁的嘴堵住。”我生气地说。

“我也可以，但我们不能那样做。”

这个话题没有什么更多的话可说了，我站起来给了高依吾一个示意，我们就开车去迪古瑞拉了。汽车开到机场路的十字路口时，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安迪和依旦已经回家了，麻醉药的药效已经过去了，依旦彻底清醒了。她还是和以前一样活泼可爱，安迪给她喂炒熟的胡萝卜，她就像一个星期没吃过饭似的狼吞虎咽地吃。我答应尽量赶在四点以前回家。

我已经历过许多大案子的审讯工作，最后那一宗大案要算是越狱犯劫持我的老搭档巴洛，最后他们俩都在围剿冲突中死了。

现在，我的角色由审问者变成了受审者，自己都感到惊奇。审讯由两个警察执行，一个是苏勒伯，另一个是白道宁——他在整个审讯过程中都沉默寡言。苏勒伯[1]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高一米九，身体显得有些笨重，头发很密实，在黑色的头发中已现出了灰白的发丝。他就是属于那种不到六十岁头发就开始花白的人。

“很遗憾发生这样的事情。”苏勒伯的开场白就像在表示我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似的，“省公诉人毫无疑问地要提出起诉，特别是当发生的事件已经公开化了。先说说斯切姆警察的背景吧，你和他已共事三年，在这期间想必你们彼此比较了解。”

“八十年代初，我们是警校的同班同学，我们经常因为一些事情的观点不同而发生冲突，我经常取笑自己的措词不当。所以，我和斯切姆的不合由来已久。”

“斯切姆在早些时候就被注意到对待被拘留的人态度粗暴，你了解这些情况吗?”

我必须从谋杀嫌疑犯基莫说起：那是四年前，我在一家法律事务所里打短工。一次，当基莫正在进行玩弄女性的游戏时，被斯切姆当场捉奸，抓到警察局来时，只穿了一身外套。还有瑶娜·基斯底拉，贝扎曾害得她遭到一顿毒打。贝扎强迫基斯底拉控告警察的粗暴行为，可他自己却经常用暴力对待被抓的人。

贝扎比其他犯错误的警察更为严重。他已涉及到犯罪，这是应另当别论的。他现在就像落水狗似地在作垂死挣扎，想捞到一根稻草，保住性命。我把这些事情告诉苏勒伯后，他说真是闻所未闻。

“现在说说你自己。你和高依吾警察都没有在开始打架的现场，都只是在走廊里听见的?”

---

① 这名字的意思是大头。

我又开始说，一直说到我们怎么样把正在打威达宁的斯切姆拉开：

“我认为是威达宁激怒了斯切姆警察，才发生这样的事情。斯切姆早在一个季度前就落实了威达宁的虐待暴行，但威达宁没有受到处罚，是因为他老婆不想起诉他。威达宁只是作了一个认错悔改的保证。斯切姆的前功尽弃是有目共睹的。”

“看来你这个新上司是想保护斯切姆，但我们双方都必须按法律办事。在审讯中打人，是谁也保护不了的。威达宁提到斯切姆自己的离婚事情，这已是一年前的事了，为什么斯切姆还要发这么大的脾气?”

“我从来没有和斯切姆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猜想他不愿意说自己的隐私。斯切姆的前妻在两星期前的周末又结婚了。从斯切姆的主观愿望来说，他是不想离婚的，也是不想放弃孩子的。因此，当有人再次羞辱他的家庭时，他就不能容忍了。”

“你对你部下的心理状况了解得很透彻。显然，你是不希望斯切姆警察被开除公职啦?”

“这不是我们这次谈话的主题。”我立即答道。因为我自己还拿不定主意，对这件事情的态度究竟该如何。现在要开除斯切姆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我实在不愿意看见他那郁郁寡欢的神情出现在我们科的走廊里。

“在事件发生时，斯切姆的血液里有千分之零点六的酒精度。”苏勒伯警察告知说，“你是否知道，高级警察加里奥，他有酗酒的恶习?”

这是个阴谋，不仅是对斯切姆，而且也是对我来的。如果我说不知道，这显然是愚蠢的；如果我说知道，他们就可以抓住我包庇他的小辫子。

“我知道。我想在下一次谈话的时候提出这件事，并拿出帮

助斯切姆警察的具体方案来。我只是没有时间及时处理而已。等斯切姆回来工作时，我一定处理这件事。”

“理由倒是很充分。你认为酗酒的恶习可以继续下去吗?”

我摇摇头，向他解释我已一年不在局里了。我记得在我休妈妈假之前，曾在贝扎的抽屉里发现有空酒瓶，但那时我还没有想到他会在上班的时候喝酒。

“在你休妈妈假时，斯切姆警察代理科长，他是不是和部下们的关系很僵?”

我不解地盯着苏勒伯问：“这些事也要牵进斯切姆打人的起诉中去吗?”

苏勒伯两手抱拳交叉转动着大拇指，说：

“斯切姆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同事。他说，也许是有人付钱给威达宁收买了他，要他故意惹急了斯切姆后，才使斯切姆打了他。”

这个该死的斯切姆，他是不是准备在法庭上玩火自焚?!我当然要问清楚是斯切姆自己陈述的这种论调，还是威达宁强调的这一点。但苏勒伯拒绝回答。我不能在法庭上提出这样的问题使自己处于被动状态。

“我认为这种事情听起来都是很荒谬的。也许威达宁自己想以激怒的理由来减轻自己的处罚，但我不相信我们科里会有这样一个和他一起干这种勾当的人。”我理直气壮地说，但我还没有仔细地考虑过布包宁，他的确是非常讨厌斯切姆的，但也不至于和威达宁勾结，出谋划策来陷害斯切姆。

我清楚地知道，谁是真心实意地希望斯切姆能化险为夷的人，是我自己。如果贝扎走上审判台，这也是对我的嘲笑，他给我带来的压力太大了。谈话结束后，我的怒气仍难以消除。我走到警察总署的院子里，猛踢我们汽车的轮胎。然后，我给斯切姆

打电话，我等电话响了七声后，才把手机关了。接着我又打第二次，等电话响过八声后才关掉。我又打第三次，只响了一声，斯切姆就接电话了。

“我是玛丽娅，你怎么样?”我压制着激动问。

“他妈的我正在睡觉。”斯切姆骂骂咧咧地说。可以听出他是喝醉酒后还没有完全清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非要往这里打电话?”

“我正在警察总署谈有关你的事情。你指责谁收买了威达宁?”我很高兴在电话中和斯切姆说话。虽然他离我只有一公里之遥，但我用不着看他那气得吹胡子瞪眼的样子。

“你他妈的胡说八道什么呀!是不是有人故意制造事端?”

“关于这件事，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什么事?”斯切姆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火药味，“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提了。把这件事忘了吧!这可能是那些吃饱饭没事干的人胡嚼舌根!”

我不知道该相信谁。

“那你胡扯乱谈些什么?那些混蛋总是举着拳头想打人，迎上去好呢，还是回避好?”贝扎的声音听起来还是怒气冲天。随后我听见他打开冰箱的声音，然后是打开瓶盖的声音，接着就是啤酒冒气的嗞嗞声。

“我就说事情发生的经过，这里是实事求是的地方，完全没有大学里的那种异想天开的白痴!希望这一切都能尽快地解决，你可以早日来上班。”

“不要开玩笑了，玛丽娅。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可能再回来了。”斯切姆说完挂了电话。

我再试着打过去，可电话里只有忙音，他肯定把墙上的插头

拔了。我走到盖拉瓦河边，坐在草地上。我一边等着高依吾，一边抓紧时间打几个电话。

我这次抓到了冈代立宁，他建议五点以后开个会，因为这个星期的其他时间，他都安排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空余。我考虑了一下，没有同意，原因是我有时候给人的错觉就好像我是一个没有家庭的女光棍似的。

“明天早晨怎么样？我准备早一点来，七点半？”我向冈代立宁建议。他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不太情愿地同意了。布斯特亚勒威对这会议的邀请不是特别高兴。他解释说，他家住在基勒高奴密，要那么早赶来开会，他就必须在七点以前离开家。有时我真感到自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领导，凡事都要有充分的理由使我满意才行。

苏勒伯会不会问高依吾，我有没有可能贿赂威达宁去惹恼斯切姆？我脑海里思绪万千，再也耐不住呆在这里等高依吾了。我在车上写了一张留言条，说我已经走了，并通知他明天早晨开会，然后就步行向迪古瑞拉火车站走去。四周辉煌别致的建筑物沐浴在阳光中，就像宇宙中的仙境一样。在火车站的站台上，我的手机又响了，是塞娅·莎莱拉打来的：

“你是不是问了米盖关于哈瑞·依冒宁的事？他不是死于意外事故吗？”

“现在还很难说。关于他的死，你可以提供一些什么新的线索吗？”

“是的。不过现在说话有点不方便，我要赶在明天早晨之前把这些石头都打磨出来。”

“欢迎你明天到警察局来。”

“明天不行。我已和人约好，明天一整天去购物中心‘立布拉瓦’的土特产商店设摊，在那里卖我自己做的手饰。”

“那就看吧，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科里有人有时间的话，可以接待你。”我不高兴地说。我觉得自己今天很晦气，别人都很高兴。

“关于哈瑞和米盖的事，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找到的那个自杀的小伙子肯定是受到了什么严重的打击，要不然他为什么要自杀呢?”

“这不关你的事。”我不想再说下去了。

火车来了，我关了手机。走进车厢，我发现自己又遇到了一件倒霉的事。车厢里有一群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大声喧哗，相互打闹，其中有一个孩子还把鼻涕擤在了地板上。我的脑袋在不断地膨胀，胸腔里升起一股无名火。真想采用斯切姆的方法来对待自己：到什么地方去解脱一下。

我决定坐火车直接到赫尔辛基，找个地方去喝酒。但是坏妈妈的念头又冲击着我。我只得鞭策自己乘坐能赶上趟的最早的一班公共汽车回家，回到我孩子的身边。我查看了一下公共汽车的时刻表，时间还早，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光顾一下加依沙半岛路上的酒店。我买了一瓶大茴香白酒和一小瓶威士忌，在路上我就把那瓶威士忌解决掉了。公共汽车快速行驶着，窗外的景物飞速地向后闪去。我在月亮轮车站换公共汽车。离这里只有两个街区就是斯切姆的家。虽然我还有时间，但我不想去拜访。我只是在大汉达路上来回走动，使自己烦躁的心情平静下来。田野里夹杂着棕黄色和黄绿色，一群麻雀正在长着小红果的灌木上觅食。但这种田园的诗情画意被二环道的高速公路破坏了。正在施工的二环道上日夜不停地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还有爆破声，炸得尘土一直扩散到田野上，就像打仗的电影画面一样。

依旦蹲在门厅里，带着眼罩，看起来就像一个海盗娃娃似的。眉毛受了一点伤，还不太要紧。我把女儿抱起来，亲吻着她

那香喷喷的小脸蛋。

“我去休息一会儿，妈妈很累。”

“依拉，贝贝。”孩子会说话了，并且还会指着她的眉毛。

“什么？再说一遍。”我高兴地大声说。因为迄今为止，依旦一般还都是说一个字的单词，像这样说两个词句还很少。但她没有再重复说过的话。我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从厨房里拿了一个香蕉，给她分了半个。安迪正在客厅里看《芬兰大自然新编》，他站起来给了我一个吻。

“你有威士忌酒味。”他惊愕地说。

“是的，因为我感到很烦恼。我和依旦一起去稍微休息一下。”

“我要去散步了。你还记得吗？明天晚上我要到达毕奥拉去听交响乐。”安迪提醒我说。我喃喃地表示谦意说，我已经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我把依旦抱到楼上，边听着她那咿咿呀呀的儿语，边查看她小手指的指纹，有的是簸箕，有的是箩。随后，孩子便偎到我的身边，她把头紧紧地压在我的乳房上，就像还要吃奶似的。我给孩子喂奶的时间很短，在喂奶期间，我的情感是那样地充沛丰盈。奶水下来得恰是时候，两天之内孩子就学会了吃奶。每当给孩子喂奶时，我的心情就激动不已，因为我的体内有孩子取之不尽的营养和安全的源泉。我的身体就是孩子的又大又暖的安乐窝，从这里她可以得到最好的食物填饱她的小肚子。依旦第一次微笑是在三个月时，一天中午吃奶的时候，我看见她的眼睛里闪闪发亮，显得非常地活泼可爱，使人心醉。我所有的喜悦都来自依旦这一对会笑的眼睛。幸运的是，钢琴的角没有伤到中间……我亲吻着依旦的眼睛，嘴里发出满足的哼哼声。接着我又大声地和依旦逗着玩，直到我俩再也笑不动为止，我们互相亲吻着脸蛋，我不再需要打开大茴香酒了。

13

六点半闹钟就响了，这是因为我自己为了执行诺言，要提前赶去参加会议。一轮弦月挂在空中，朦胧的月光照在黑暗的还有霜冻的田野上。从温度表上看，气温是零下二度。我真心希望我们家的老伙伴菲亚特汽车还能为我效劳。昨天晚上我还没有觉得冷，所以没有把电暖气的插销插上。

我打开咖啡壶煮上咖啡，在炉子上熬上依旦的早餐粥，然后跑出去到信箱里去取报纸，一股冷空气突然向我脸上袭来，我一下睁大了肿泡的眼睛。从树林里吹来的空气中，已带有腐叶的气味。如果树林有顽强的毅力的话，它会散发出芳香来抵制秋天和死亡。信箱周围的落叶已经发黑腐烂，好在寒流为它们带来了一点色彩，在它们的表面涂上了一层白霜。

菲亚特车在发动了一会儿后就启动了。方向盘冰冷冰冷，不戴手套是握不上去的。开到曼加时遇到了塞车，我生气地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选择频道。这个时间没有十几岁年轻人的狂热音乐，可以使一些人免遭一大清早就要忍受痛苦的折磨。收音机里播放的是《圣经》中启示录的赞美诗乐曲，《不要宽恕》乐曲中的大提琴声，就像在闷热的夏夜吹来的一阵凉爽的风。

布斯特亚勒威和高依吾已经坐在会议室里了，各人面前都放着一杯咖啡。他们正在谈论昨天晚上的冰球比赛。

“你昨天从迪古瑞拉回来还顺利吧?”高依吾向我打招呼说。

“昨天刮那么大的风，我可没法在外面等那么长时间。他们把你留了很长时间吗?”

“三个人围攻我，提问非常激烈。他们尽问我这类问题：加里奥是不是有排挤斯切姆的企图？加里奥有没有可能收买威达宁迫害斯切姆？我对他们说，加里奥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强人，根本不可能和一个打老婆的人勾结干什么事。”

我冷冷地笑了一下。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如果不是斯切姆对苏勒伯说起这件收买贿赂的事，那又是谁呢？他们到底是要把谁开掉？是斯切姆，还是我？

冈代立宁迟到了三分钟。他首先简单地说了一下麦瑞瓦拉公司的财经情况，其中没有什么异议，公司已经明确了在九十年代初经济滑坡时受到了损失。从在此之前的账目上可以看出，公司的出口业务还是很兴隆的。这家传统的家庭公司，现在一跃成为现代的环境保护的先进企业，具有很大的影响。会计账目做得无懈可击，投资账目也一目了然。购买瑞兹盖尔岛是公司的又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有效的税务策略。惟一的漏洞就是股份公司马来·诺斯曲姆，这个公司在麦瑞瓦拉公司的资料上找不到任何记载，只有一个古埃塞区的邮政编码。

“纳税情况怎么样?”布斯特亚勒威问。

“这要看从哪一方面说。”冈代立宁答道，“在这十年中，麦瑞瓦拉公司没有给马来·诺斯曲姆公司分配红利，这对于一个持有百分之十二股份的股东公司来说，是损失了一大笔进项，粗略地估计一下，少说也有一百万。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他们冒这样大的风险来周转资金值不值得？如果纳税有问题的话，那就可以断定马来·诺斯曲姆公司的后台老板就是麦瑞瓦拉公司的后台老板。我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我忍耐不住地问。

"马来·诺斯曲姆公司买进麦瑞瓦拉公司的股票是在1991年，那时候经济萧条的趋势很甚，公司的股票跌得很厉害。然而，这个环境保护先进企业的船漆生产公司从卖股票中得到了一笔钱。正因为这样，公司里的资产总额没有变动。如果没有足够的智能，就不可能领会其中的税务奥妙。"

"公司里的领导人肯定都知道谁拥有公司的股票。"布斯特亚勒威生气地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兜圈子，而不去直接问他们，去问麦瑞瓦拉夫人?!"

"我可以到古埃塞去调查清楚这个神秘的邮政编码。"高依吾很有信心地说。

"不要光凭想像办事。什么传真啊、电子邮件啊，都是靠不住的，最可靠的还是我们这些老同事齐心合力地侦破案子。我们先去问安奈·麦瑞瓦拉和经济经理哈罗宁。布斯特亚勒威，你去找马古斯·恩克尔。晨会结束后，我和高依吾去麦瑞瓦拉公司。"

"你认为从这个马来……什么来看……股份关系有什么蹊跷吗?"布斯特亚勒威怀疑地问。

"很有可能。"尤哈·麦瑞瓦拉一点都不是我感兴趣的那种人。对于谋害他的动机，我认为不可能是由于家庭中的争吵而引起的。"马来·诺斯曲姆，不是有些罗马人把地中海叫做这个名字吗？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拉丁文不是我们学校规定学的课程。"高依吾不卑不亢地怼了我一句。冈代立宁开始整理他那些材料。我们委托他和伦敦警察厅的经济犯罪侦缉科联系，因为他和他们熟悉，通过他们揪出古埃塞的这个信箱公司的可能性就大一些。不管怎么说，每件事情都得试一试。

"这个恩克尔不是我们同时代的人。"冈代立宁一只手握着门

把说，“他生于1918年。这个星期你们就找不到我了，今天我要去法院，接着是加班换休。我是不是要求伦敦警察厅直接和你联系?”

我点点头。这次会议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其他案子的调查工作也都进行得很顺利。王负责那个周末采蘑菇失踪的女经济师的案子，她到那个女经济师的事务所去向她的同事们了解情况，她们反映说，上个星期事务所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一眼就可以看出是爱沙尼亚人，名叫道马斯。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老阿姨去采爱沙尼亚人的圆头蘑菇了?还是他们一起去采什么马勃菌菇了?”布包宁齉着鼻子打诨说。

王的脸红了，但她还是平静地说：“这个女人的护照没有找到。我和她丈夫一起找她的手提包，手提包也失踪了。我是不是去要一份塔林游船的旅客名单?”

“当然，很有必要。她穿什么衣服?”莫不是这个女人假装去采蘑菇，而实际上是和情人私奔?我这样琢磨着。

“假如她是去度这样的假的话，衣服是不需要……”

“布包宁，把嘴闭上。”我像妈妈吓唬三岁的孩子似地打断了他的话。“阿奴，去调查清楚道马斯，再询问一下爱沙尼亚方面，有没有发现无人认领的女尸。”

当我们刚要结束这些谈话时，达斯基宁闯了进来：

“好消息！玛丽娅。威达宁被起诉为屡教不改的残酷虐待狂。这次他非坐牢不可了。”

“太好了。”我不冷不热地说，“收买贿赂威达宁的事件是否已经把他明码标价了?”

听了我的话，达斯基宁感到一头雾水，莫名其妙。我告诉他在警察总署，他们是怎样逼问我和高依吾的。他静静地听着我

说，我看见他把薄薄的嘴唇咬得紧紧的。

“这件事到你办公室去说。”他说着，把一只手搭到了我的肩膀上。

“高依吾，一刻钟后我们走！开我的车。”我向搭档吩咐道，然后跟在达斯基宁的后面回办公室去。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发生过微妙的变化。现在这是我的独立王国，以前是他的独立王国，现在他又走进了这个独立王国。我想坐到沙发上而不是坐到桌子后面的太师椅上，可达斯基宁已经捷足先登，为自己选择好了位置。

“如果这些收买贿赂的话都是出于贝蒂之口，到时候起诉他时还可以增加一条诬告罪！”他生气地说。

“我了解了一下，这些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谣传而已，不是针对哪一个人的。贝扎不承认他知道这件事。”

“你直接问他了？他当然不会承认。不要这样轻信一个人，玛丽娅。贝蒂是不服气你这一次的提拔任命。他知道，他在这幢大楼里已经没有什么前途了，所以他要尽最大的可能损害你。”

“你是不是认为他会贿赂威达宁控告我行收买贿赂之勾当？不，我不相信。贝扎很讨厌这个人，他不可能和这样的人一起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买卖。”

有许多资历深名望高的警察，在工作生涯中和那些罪犯交朋友，学习他们的思考方法，可是贝扎总是把我们和他们的界线划得清清楚楚的，警察是警察，强盗是强盗。大家之所以讨厌他，是因为他总不能像警察那样以身作则，不能和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地搞工作，他心里总有那么一点小九九，为自己谋利益。

“也许苏勒伯只是想看看我们对处理他有什么反应。显然有人一说到斯切姆要离开局里就暗暗高兴。”我故作懵懂地说。达斯基宁看了我一眼，迷惑不解地问：

“对你来说，这不是件高兴的事吗?”

“我不知道!”我狡猾地说，“很抱歉，我在去麦瑞瓦拉公司之前，还要查对两个案子。”

达斯基宁像受到伤害似地站起来走了。当门在他身后关上时，我马上想到，这个世界上的事真是无奇不有。每当我为爱情或者荣誉发生争执时，贝蒂·斯切姆总是认为我会得到顶头上司的支持和袒护，这就难免会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我和达斯基宁有着超乎一般的特殊关系。有时候连我自己都怀疑，达斯基宁是不是真有谣传中所说的那种念头?但我敢保证，我是完全没有那种非分之想的。

高依吾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去和哈罗宁、安奈·麦瑞瓦拉谈话。我们分工合作，高依吾和哈罗宁谈，我想和安奈做一次姐妹般的谈话。我对她仍然是百思不解，她的丈夫被杀害，她的儿子被控告为企图谋杀纵火的嫌疑犯，她怎么还能继续工作?

楼下门厅里有来客接待室，接待室的主人要高依吾等着，说经济经理哈罗宁一会儿就到。秘书鲍拉·莎尼奥把我带到楼上去。她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台传真机，这时正好来了一份传真，可她连看都不看一眼来的是什么传真。安奈·麦瑞瓦拉已经搬到总经理办公室里办公了。这时，她正在用流利的德语打电话：

“是的，很好!非常感谢!斯古伯特博士。好，再见。”安奈硬是在悲伤的脸上挤出了一点微笑。她站起来和我握手。她脸上的皮肤光滑细腻，从脸颊一直到太阳穴都是绷得紧紧的。虽然她化了妆，但还是掩盖不住眼圈上的黑晕。

“鲍拉，斯古伯特博士要来参加尤哈的葬礼，给他订一个双人间，从葬礼的前一天到葬礼的后一天。我认为订在达毕奥拉的

花园饭店就行。现在把我的电话切断，给我们把茶端来。高级警察还要吃些什么吗?”

“不用，谢谢!”

“侦破工作进展如何?”

“一直在循序渐进。”我冒险撒谎。安奈点头说，这就好。虽然她打着官腔，但她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放在桌子边沿上的一块易碎的玻璃，随时都有可能掉下去，在石头地上摔得粉碎。怎么我又胡思乱想了?我摇晃了一下脑袋，提醒自己，我可没有工夫作这种遐想。我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然后开门见山地说：

“我想进一步了解麦瑞瓦拉公司的股东成员的情况，尤其是马来·诺斯曲姆公司，这个公司的老板是谁?”

安奈的眼神惶惑不定地在屋子里游弋，她偷偷地瞥了一眼墙上的照片，在尤哈父亲和爷爷的照片旁边已挂上了尤哈·麦瑞瓦拉的照片，但在这张黑白照片的下面，还没有注上姓名和在世的时间。照片上的尤哈望着远方，头上戴着船长的帽子，下巴微微向前翘起。

“这在公司的资料中没有吗?我们的全部资料你们都拿走了呀!”

“没有，真是很奇怪。这个马来·诺斯曲姆公司的地址只是一个邮政编码，而且从来不交税。你作为麦瑞瓦拉公司的股东和领导成员，是否可以说说谁拥有这个马来·诺斯曲姆公司?”

“这是一个立陶宛人的公司……也许他们已经从国内迁走了，因为生意很不稳定。”

“马来·诺斯曲姆公司买麦瑞瓦拉公司的股份是在1991年的春天，也就是说，在立陶宛独立之前。”我冷冷地说，“在前苏联时期，这样的个体经济是不允许的，这又作何解释呢?”

安奈被问得哑口无言，急得她额头上和眼角上都搐起了皱

纹。

“它最初可能是芬兰人的公司，后来卖给立陶宛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经济形势非常糟糕，尤哈没有能力购买米盖的股份，但他又不愿意公司的股份让家族以外的人买走，那时我们极力想让恩克尔买，可是没有成功。尤哈认识马来·诺斯曲姆公司的人是到果特兰岛① 航海旅行时，那一次我没有跟着一起去。”

“这怎么可能？在公司的全部资料中竟找不到这份股权交易合同书？”

“可能它在银行的保险箱里，问问经济经理，他肯定知道！”安奈如释重负似地轻松起来。这时，鲍拉·莎尼奥端着茶盘进来了。这一次从茶壶里飘出来的是菊花茶的香味。

“你确实不愧为公司的股东和领导人——知道马来·诺斯曲姆公司的背景。尤哈没有说起过这事吗？”

安奈噘起嘴唇碰了一下手中的茶杯，由于太烫，她没有喝。

“公司领导核心的会议，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要举行，因为海基，也就是经济经理哈罗宁，他是个唯命是从的人，尤哈说什么他就做什么；马古斯·恩克尔更是一个对尤哈忠贞不贰的人，他那时候没有能力购买股份，因为他要帮助一个表亲的孩子摆脱经济危机。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只是负责公司的公关业务，不管经济。”

“你能不能肯定地说，你确实不知道谁是马来·诺斯曲姆公司的老板？你确实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

安奈的眼睛里蒙上了一层迷离恍惚的薄雾，但她还是抬起眼睛看着我说，是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经济萧条，使一切都变得困难重重。

---

① 在波罗的海上，属瑞典领土。

我也像那些四十岁的人那样得了丧心病狂症。我开始苦思冥想，我这后半辈子到底怎么办？是断送掉这油漆生意，和尤哈一起同归于尽呢，还是选择另一条道路？我为自己寻找治疗的方法，阅读那些能促进精神力量的文学书籍，去参加斋期学习班，追求精神寄托。同时，芮佳对自然保护发生了兴趣，开始吃素食。这时，我又考虑是和尤哈继续生活下去呢，还是离家出走？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最后决定还是继续生活下去。既然从内心深处做出了这种决定，那就不能忽视一些其他的问题，就要继续和那些商场上的友人保持好关系。”

安奈的声音很轻、很冷，但我还是不能相信她。难道她真的对是谁购买了家庭公司的股份漠不关心吗？还是她采取了那些使用毒品的年轻人的方法，一问三不知，向家长极力抵赖“没有。没看见。不知道”？

为什么不能这样呢？也许我自己就是这样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例如对斯切姆酗酒的问题。

“马古斯·恩克尔也像你一样不知道吗？”我忽然想到布斯特亚勒威去找这老人谈话，纯粹是浪费时间。

“马古斯在两年前得了老年性痴呆症，他不能来参加尤哈的葬礼了。”

恩克尔是不能出庭作证了。安奈提到的经济经理哈罗宁肯定知道公司的详细情况。他是尤哈·麦瑞瓦拉的心腹。

“我经过考虑，决定等尤哈的葬礼过后，要哈罗宁出任公司的总经理，我无法一个人管理这个公司。不过，这还得和孩子们商量。我还有一个想法：想保留瑞兹盖尔岛，把其他的都卖掉。”

“瑞兹盖尔岛是麦瑞瓦拉公司的财产，但那里也有马来·诺斯曲姆公司百分之十二的股份。看来今天是来不及介绍其他股东了。”我站起来准备到高依吾和哈罗宁谈话的地方去，可安奈一

把抓住我的手腕，说：

“我不想让你把我看做像一个白痴一样，可尤哈是……”安奈把我的手腕抓得紧紧的，像是要迫使我坐回到椅子上去。我奇怪这个纤弱的女人哪儿来这么大的手劲。当我重新坐下后，她才放开我的手。

“和尤哈一起，生活就容易得多。如果遇到什么事，总有他顶着。他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办事总是认死理，这是他的性格。伊瑞现在和他们麦瑞瓦拉家族中的男人们一模一样。”安奈指着墙上挂着的照片说，“他同他的爸爸和爷爷像极了，但他自己不承认这一点。加曲娜就是因为忍受不了马丁的主观武断才离开他的。我有时和她一起闲聊，不知尤哈的母亲弗莱杰嘉是怎样维持婚姻的？也许是因为她有病的缘故吧。尤哈的思想和他父亲是一脉相承的——他娶我进门，既把我当做母亲的代理品，又把我当做下人使唤。那时候，在孩子们还小时，他经常称呼我‘妈妈’，不知为什么，我不喜欢这样。当伊瑞六岁的时候，顶了他一句：‘她是我们的妈妈，不是你的。’从那以后，他才不再那样称呼我了。”

“让尤哈随心所欲地管理这个公司，你很信得过吗？”

“在生意方面，我信得过他。怎么啦？是不是马来·诺斯曲姆方面还有什么问题？”

“隐瞒股份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安奈，如果你知道什么就直说了吧！”

“我不知道什么了！”安奈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尤哈已经死了，我强打精神使这公司正常运转，负责这些订货事项。谁也不知道伊瑞会遭到什么样的不测，芮佳又突然决定和达甫沙一刀两断。”

“什么？”我记得昨天姑娘说想一个人安静一下，“他们吵架

了吗?"

"我不知道他们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芮佳只字不提。我猜想，她是恨达甫沙在尤哈最后的那天晚上和他打架。芮佳在很多方面还像个小孩子一样。如果他们真地分开倒也好，我可没有精力去怀疑他是谋杀犯。"

安奈给她自己的茶杯里又添了一点菊花茶，然后端起来喝了一大口，就像我昨天喝威士忌，其效果是一样的。安奈使自己平静下来，让她的声音又回到了原来的高度：

"我很难接受尤哈被谋杀的说法，但我必须面对现实。在他的神经系统中有一根喜欢破坏的神经，现在遗传给了伊瑞。我不想再保护伊瑞了，我不能接受危害人命的伤天害理的行为，最好这孩子能吸取教训，就像……"

安奈又喝了一口茶，就好像要把脱口而出的话堵在嘴里似的。她在证实伊瑞杀人之前，她害怕他已经杀人了。

"米盖·休白格怎么样？他是不是也像他父亲和哥哥那样一意孤行?"我轻描淡写地问。

"米盖是休白格家族的后代，像他妈妈加曲娜多于像他爸爸马丁。有可能他已经发现自己有麦瑞瓦拉家的负面遗传，既自私又固执，所以他每年把自己拉出去，在船上过半年流浪生活。我对米盖不太了解，他跟谁都不亲近。"

我站起来，这一次安奈没有阻止。当我开门正要出去，鲍拉·莎尼奥一步跨了进来，说：

"这份传真是墓地管理处发来的，是骨灰盒和鲜花盛器的报价，你有时间看看吗?"

安奈点点头。我自己去找经济经理的办公室。在过道里，我给布斯特亚勒威打了个电话，他正坐在马古斯·恩克尔跟前，达毕奥拉一家私人医院的家庭病房里。他说老爸爸已经不记得最近

几年发生的事情了，但他还记得马丁·麦瑞瓦拉和他表姐弗莱杰嘉的婚礼。

“你到芬诺来，我们要对经济经理哈罗宁加强攻势。”

哈罗宁是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肯定是八十年代末的鼎盛时期考进财经学院的那种既想有锦绣前程又想飞黄腾达的人。在学习期间，世界经济滑坡和大学同学有钱买股票，给予他同样沉重的打击。海基·哈罗宁的穿着不是特别讲究，毛衣的质量也不是很好，类似一般的年轻的成功者那种消费标准，但是棕黄色的头发理得特别讲究，掩盖了开始秃顶的头皮。他的体形就像经常受训的体操运动员一样，比公司总经理的体形还要健美得多。

哈罗宁说他只知道马来·诺斯曲姆是一个外国公司，邮政地址在古埃塞，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因为股份交易是在他来公司两年前成交的，尤哈·麦瑞瓦拉没有向新来的经济经理交代股东们的股票事宜。还有一个理由也可以解释这不是哈罗宁的过失，就是股东们从来没有举行过公司的股东会议，也没有提出过什么要求。

“尤哈签署的这份股份交易合同书在银行的保险箱里，从那里就能知道谁是马来·诺斯曲姆公司的法人代表。”哈罗宁说着拉松了领带，他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困境，“钥匙肯定都在安奈手里。”

“你们俩去走一趟。”我对高依吾和布斯特亚勒威说。高依吾很想让经济犯罪侦缉科那个与伦敦警察厅的老朋友有联系的冈代立宁来办案，可冈代立宁这时候正在休假，不可能来。“有了情况马上通知我。”

我又回去上班了，心情很烦躁，那种感觉就好像怎么也擦不干净手上黏黏糊糊的东西。我心不在焉地在电脑上打出了六年前

发生船祸人的姓名：阿劳·高保宁。但这儿没有加注任何说明，也没有找到有关他的任何犯罪的记录。我又转到人口登记处找他的简历：阿劳·尤哈尼·高保宁，出生于1947年6月15日，于1989年离婚，儿子阿瑞·尤哈尼出生于1972年4月23日。

这个阿瑞·尤哈尼·高保宁会不会怀恨尤哈·麦瑞瓦拉呢？从人口登记表上看，他现在住在吐尔库。然后我的眼睛扫到了高保宁的前妻的名字：莎莱拉·爱勒维·塞娅·婿哈娜。

爱勒维这个名字使我大吃一惊，我再看她的身份证号码时，才知道塞娅·莎莱拉就是船祸中死去的阿劳·高保宁的前妻。

我立即又重新穿上外套，跑下楼梯，奔向车库。塞娅·莎莱拉说过今天要到购物中心立布瓦拉她朋友的土特产商店去摆摊卖货。我把车开进购物中心的停车场，从螺旋形的车道上溜下去，那感觉就像在游乐场的滑车上一样。立布瓦拉如同一个大游乐场，里面有饭店、吃钱老虎机、儿童游戏角，反正那里各种各样的娱乐能把你的钱包掏空。埃司堡南部正下着阵雨，这使得购物中心里挤满了学生和退休老人。土特产商店位于二楼，在体育用品商店的旁边。我倒是需要买一双运动鞋，但看了一眼今年秋季的款式，没有找到合适的。有一双标价七百马克的特别高级的网球鞋倒是非常诱人的，我想是不是让安迪来买了送给我，作为结婚三周年纪念日的礼物。

在海员土特产商店里总是卖一些特殊的营养品罐头、不上化肥的蔬菜、面粉和药草化妆品。有一面墙上是书架，从书架上可以找到秘传文学，如，占星术，纸牌算命，沉思功等等。四十岁以上的女人多半迷信这些书籍，想从中通过数字学的帮助，求知自己命运中的吉凶祸福。塞娅·莎莱拉的那些宝石手饰摆在第一层货架上，紧靠在柜台旁边，柜台上则摆着各色各样、大小不一的石头。这些石头都是可以加工为手饰的。我认出其中有玫瑰石

英石、紫晶石和一般的石英石。

“你好！警察。”我正在看一对小巧玲珑的镶有绿松石的银耳环时，塞娅向我打招呼。她坐在那里正在调整手饰上的别针。

“你现在能谈话吗？”我不动声色地问。

“这里可不能说什么保密的事情。”塞娅紧接着说。她是不是猜想警察还不知道她参与了谋杀尤哈·麦瑞瓦拉的案子？我走近柜台，那里的宝石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着五彩缤纷的光芒，就像民间故事的小画书中描写的海盗们的财宝似的。柜台的拐角上有一只直径半米的箱子，里面装满了做手饰的石头，这些石头标价为每块十马克。我一时找不到话说，只能伸手去翻看这些石头。

“闭着眼睛拿一块，看看你的手气怎么样？”塞娅说。

我可不想玩这样的游戏，赶紧把手缩了回来。

“你知道一些哈瑞·依冒宁的事。”

塞娅那又粗又短的手指捏着的手饰想要放回原位，看来不太方便，她就用一把微型的小镊子夹住，放进手饰堆里去。

“我认为在哈瑞死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很蹊跷。我不相信尤哈说的他是死于自杀，我也不能认同警察的结论，说他是死于意外事故。我相信那个岛上有邪气。那里曾经发生过你死我活的流血事件，那些冤死鬼的阴魂是不散的。”

“这也包括哈瑞吗？”我顶撞了她一句，因为像她这样相信超自然现象的人总是对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如果真有那种阴气存在的话，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是的，准确地说那里死的还有海蟹和海贝。”

“哪里有死海贝？”

“哈瑞死于十月初。在九月中旬的时候，米盖把我留在瑞兹盖尔岛上，他独自去试‘兰达’船上一个新的舵轮。那时天气很

好，我知道麦瑞瓦拉家的人不会在平常的日子来岛上，可我没有想到哈瑞在岛上。我们各人干各人的事，相互不影响。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一起喝茶，我突然看见厨房的角落里有一只死海蟹，吓得我惊叫起来。我责备哈瑞为什么把这死家伙拿进来，谁知道它会传播什么疾病。"

这时，有一位测字算命的女人走进商店来，要给塞娅算命，自我吹嘘说她算得很准很灵。

"她要二百三十二马克。"塞娅说。我看见她付给那女人二百五十马克，眼睛眨都没有眨一下。

"这么贵。"当那个女人走出商店后，我愤愤不平地说。

"是很贵。但人往往就是这样，愿意花大钱求得内心平安，或者是破财免灾。我可不相信这些算命的，但有人相信。我比较相信这些我自己摆弄的石头。你相信什么？你属什么的？"

"为什么哈瑞把死海蟹拿进屋里来？"我问。

"因为他发现瑞兹盖尔岛周围有很多死海蟹和死的小海贝，这些小海贝是海蟹的主要食物。他想把这只死海蟹带到大陆上去化验。"

"为什么？他是不是怀疑这些海类生物死于有毒物质？"

"他没有说，好像他信不过我。因为后来再也没有听说有关这方面的事情，我就把这件事忘了。当米盖告诉我，你怀疑哈瑞死于谋杀，我才又想起这件事来。"

这时，商店里拥进来一群十几岁的小姑娘，她们围住柜台欣赏着这些石头，并试用着药草化妆品。我感到这是转换话题的好机会。

"你这一辈子除用过塞娅这个名字，是否还用过'爱勒维'这个名字，爱勒维·高保宁？"

塞娅突然听到我这句问话，吓得一哆嗦，手里的夹子都掉了

下来。

“你是什么意思？我从来没有用过‘爱勒维’这个名字，我小的时候就不喜欢这个名字。”

“你为什么不说你的前夫死于船祸，而那次船祸的另一方就是尤哈·麦瑞瓦拉？”

“这没有什么可说的。”塞娅拾起夹子，拿在手上，夹住一个耳环的钩子安装到紫晶石的耳坠子上去，“在船祸前五年，我已经和阿劳分开了。阿劳是一个酒鬼，船祸的过失不在尤哈。”

“船祸发生的时候，尤哈也喝过酒的。”

“但他血液里的酒精度没有超出那时候的规定极限。如果他那时神志清楚的话，或许他会让路，也或许不会。也有可能是阿劳故意撞过去的。我可不管那么多，虽然阿劳是我儿子的父亲，但对我来说，他只是一个一般的客人而已。”

塞娅生气地对那些石头摔摔打打的，她又拿起另一块发着紫罗兰色亮光的紫晶石，继续往上安装钩子。有一个年轻姑娘进来买山金车草研制的护唇膏。我在想，是不是要塞娅一起到警察局去走一趟？但我没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

“你是诚心想和麦瑞瓦拉家的人交朋友呢，还是别有用心？”等那姑娘付完唇膏钱后，我问。

“我们是通过介绍认识的，这就是别有用心吗？”

“你在认识米盖的时候，难道不知道他是尤哈·麦瑞瓦拉的弟弟？”

“是同父异母的弟弟。我不知道。等我知道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这和案子没有什么关系。”

“米盖和安奈知不知道死于船祸的男人是你的前夫？”

“米盖知道，但我没有告诉安奈。她也很可怜，尤哈遭了人的暗算。”

那群小姑娘围过来看箱子里的石头了，我马上让到货架的后面去。

“这些紫晶石真漂亮，我想买一块。”一个小姑娘大声说。其他的小姑娘也都热衷于买石头。不可能再和塞娅说话了，因为顾客越来越多。我告诉塞娅，下星期一就到警察局来，我们科有人会为她做正式的审讯录音。

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请塞娅为我挑选了一块紫晶石，石头的名字叫“美好”。塞娅还给我讲了一段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古希腊有一位女勇士远征探宝，就是这块石头一路上为她辟邪护驾。我知道石头是没有什么特异功能的，但我摸着它感到欣慰。我离开商店，走下楼梯。我感到手里的这块石头既凉爽又温暖。我把这块石头装进外衣口袋，发现口袋里还有一块石头，那是一块红色的花岗岩石英石，是在瑞兹盖尔岛上随便捡的，和这块光滑细腻的紫晶石相比，花岗岩石就显得粗糙逊色了，但石英石更有暖意。

我买了一个双层巧克力锥形杯当午餐，这里面的热能肯定要比平常吃的主餐里的热能多得多。吃过午餐，我又回局里去了。我的思绪被塞娅·莎莱拉和死海蟹搅得一塌糊涂，理不出一点头绪来。着急也没有用，我还不如按照工作合同的许可，到健身房里去锻炼一会儿身体，这样保证会对思维有所帮助。我从柜子里拿出运动服和健美裤穿上，这里面不需要穿内衣裤。我在局里还放有一双旧运动鞋。我一边跑，一边把头发扎成马尾巴，等我跑到地下室那一层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我想起来应该把手机打开，如果高依吾和布斯特亚勒威搞清楚谁是马来·诺斯曲姆公司的老板了，他们会马上给我打电话的。这个公司会不会有联系人与动物保护革命组织通气？尤哈·麦瑞瓦拉是不是曾经通过这个秘密公司赞助过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活动经费？还是尤哈·麦

瑞瓦拉根本不知道马来·诺斯曲姆公司的后台老板就是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经济赞助人?

在健身房里，我先骑了一刻钟的健身自行车，然后开始打沙袋，嘭、嘭、嘭，我把沙袋当做阿瑞·威达宁狠狠地猛击。过去斯切姆有时间的话，曾和我一起来打过许多次，安迪也来过几次。打沙袋可以用音乐伴奏，爱甫早先的一些歌曲和《肯尼迪之死》等乐曲都是很有节奏感的优秀乐曲。现在，我只满足于击败这个不会溜的对手沙袋。有两个维持秩序科的警察正在榻榻米上练习柔道，他们都是运动俱乐部的一百公斤级的运动员，这时，双方正在拼命地顽强格斗。

我的胖大腿经常使我感到烦恼，还有过于累赘的腹部囊膪，这是生完孩子后还没有收回去的缘故。我又回到办公室，开始不要命地工作了。我先把哈瑞的档案袋找出来，还没来得及打开看，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是王打来的，她向我报告说，那个采蘑菇失踪的女经济师和她的男友道马斯星期一中午曾出现在百乐奴的市中心。这是爱沙尼亚的跟踪警察报告说的。

“我要不要去告诉她那位坐立不安的丈夫?”

“他听了肯定会高兴，他的妻子没有被奴克西奥森林里的狼吃掉，而是去度一个短暂的浪漫假期了。有没有关于这个道马斯的背景材料？这个经济师哈达娅会不会有危险?”

“我们没有道马斯的犯罪记录，但他在国内坐过半年牢，原因是多次行骗。”

“你要抓紧和爱沙尼亚的警察联系，这个道马斯可能对女经济师心怀叵测。”

“为什么那些聪明的女人都会和这样的骗子有瓜葛?”王疑惑地问。我可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高依吾可不是骗子，他倒是经常受骗，但愿他不要再受

骗。”

当王重重地挂上电话后，我马上醒悟到自己犯了傻病。高依吾的女人关我什么事？他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到目前为止，我只是答应过像姐姐一样的关心他，可我有什么权利说那些话去伤害阿奴·王？

我打开哈瑞的档案袋，把尸体的照片一张一张地铺在桌子上。我又看了一遍法医的报告，报告中清楚地写道，哈瑞是死于意外事故。然而这仍然有谋杀的可能：假如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从悬崖上推下去，而没有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怎样才能证实这一点呢？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了。

我又查看瑞兹盖尔岛的目录那一栏，在所找到的哈瑞的遗物中，有三脚架望远镜，挂在脖子上的小望远镜，照相机，手提式电脑，睡袋，两件毛衣，长裤，毛袜……暧，等一下。

电脑。手提式奥立凡特电脑。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台电脑？

在米盖·休白格的船上。

当然，这有可能是巧合。但我奇怪的是，米盖在船上要这台电脑干什么？玩纸牌游戏吗？首先必须搞清楚哈瑞的电脑里是怎么个情况。高依吾曾经利用奥立凡特的硬盘寻找过自杀的遗书，那么，这台电脑里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线索能揭露出哈瑞一案的谋杀犯来？

我从个人的简历表上找到了哈瑞父母亲的电话号码。如果我向他们介绍说，我是高级警察加里奥，他们肯定想不到我就是那个曾经和他们的儿子同居过几个月的法律系一年级的学生玛丽娅。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和他们只见过一次面，他们肯定不记得我了。

电话打不通，因为那边没有人接。当事情发生后，高依吾曾去拜访过他们，他也是对依冒宁的死因了如指掌的人。但怎么就

没有发现电脑？看来硬盘有可能已经倒空了多次，同样，软盘也是，那些软盘上也许有哈瑞复制的什么东西。

我正要到食堂去买面包，手机响了。

“嗨！我是贝加。”从高依吾抑制不住内心喜悦的招呼声中，可以猜到他已经搞清楚了什么事情，“我们要找的马来·诺斯曲姆的情况，在这个保险箱里已经找到了。它的原籍地址是古埃塞的沙特·贝特海港和立陶宛的维尔那。公司有三个股东，两个小股东是立陶宛人卫达立斯·拉马那斯加斯和以马兹·贝德斯，他们每人占百分之五的股份；大股东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人，他的名字叫尤哈·麦瑞瓦拉。”

14

工作中遇到了转机，我那郁闷已久的心情又开始舒畅起来。我请求立陶宛警察局把拉马那斯加斯和贝德斯的材料传过来。自动咖啡机那边传来高兴的笑声，对布包宁来说，我们科成了真正的国际侦缉科。这些案子在同一天里分别和爱沙尼亚警察局、立陶宛警察局还有伦敦警察厅取得了联系。

我希望回到家里后能和依旦一起度过一个家庭气氛浓郁的、十分宁静的夜晚，安迪要去听音乐会。高依吾答应再找哈瑞的父母亲了解电脑的事。塞娅·莎莱拉约定好星期五来，由高依吾负责审讯，我要高依吾也问问她关于米盖的奥立凡特电脑的事情。

我回到家的时候，安迪和依旦正在吃点心，依旦非要自己用汤匙吃黑草莓粥，有一小半都掉到了桌子上和地上。她眼角上的胶布已经弄脏了，嘴周围又糊了一圈黑蓝色，活像一个化妆没有化好的小丑。我亲吻了女儿的额头和丈夫的嘴。爱因斯坦缠在我的脚脖子周围，它在向我要饭吃。最后，我给自己切了一块黄油面包。

“数学系来电话问，我是不是不再继续申请新的助教职务了。”

安迪五年助教的合同到年底就期满了。

“申请期限到什么时候为止?”我嘴里嚼着一口黄瓜问。

“今天。系里的秘书打了电话来，她怀疑我的申请表在邮局里弄丢了。”

“你真的不想再继续申请吗？”

我把安迪的前途选择问题留给他自己，我不能替他做什么决定。安迪在三年前就完成了论文答辩，但他的职务一直停留在大学助教位置上。安迪为人正直，从来不搞拉拉扯扯那一套，他不需要什么后台，也不需要为自己留什么后路，他很讨厌大学里那套仗势欺人的作风。

“我有两份补助金可得，这你知道，所以，我想一直护理依旦到明年春天。然后……如果能够找到其他的有关数学方面的工作……”

“你会不会成为保险公司的一位数学家？或是穿上银行的制服？真是不可想像！”

安迪和我一样，最喜欢穿牛仔裤和毛衣。他的头发不仅黑，而且直，他有时让长发披到肩上，有时扎一个马尾巴；在他那瘦削的脸上，有一个挺拔的高鼻子和一张大嘴，这样的相貌不免使人怀疑他们沙盖拉家族有着印第安人的血统。

“我考虑的完全是另外一些工作。譬如，像自然协会啦，绿色和平组织啦，海洋研究所啦，如果那些单位需要数学专业的话，我就去应聘。有一次碰到密高，他谈起明年夏天欧共体要拨款对东海进行考察研究，那里也需要数学家。”

“是搞计划统计吧？”安迪的数学底子很好，不怕无用武之地。

“今年冬天我要抽时间复习一下基础数学。”

“你这就想成为一个改造世界的专家啦！”我笑着讽刺他说。我很喜欢丈夫的性格，他对世界和生活的态度都很严肃。有时候他的思维超前，有时候也会一连几天愁云密布，闷闷不乐。他一

这样，我就把他赶到楼上去。

“一辈子总不能老是站在边上当旁观者见死不救嘛！如果我能进入一个部门，成为一个特殊的角色，那么，你是怎么说来着？成为一个改造世界的急先锋。为什么不呢？你自己不是也在不断地鞭策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典范?”安迪走到我跟前，两手环抱住我。依旦急忙跑过来，也要我们拥抱她。我们就来一个香肠夹心面包——我们俩是面包，依旦是香肠。她身上、嘴上的黑草莓粥糊到我们俩身上，成了夹心面包里的果酱了。

“你认为警察的工作也是在改造世界吗?”当我们相互松开手时，我问。

“我没那个意思，我只是说，你对待自己的工作严肃认真。”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喜欢我这被人瞧不起的工作，我不想换工作。”我坦率地说，“也就是说，如果你找到工作去上班，我们必须为依旦请保姆。”我嘴上虽这么说，可心里却在打鼓：我们不能亲自照顾孩子，会不会被人称做不称职的父母亲?

每当我看到群众来信揭发检举那些不称职的母亲时，我的心就像被刀剜了似地痛疼。但我也清楚地知道，如果我放下工作留在家里照顾依旦直到她上学为止，我可以不考虑自己的人生价值，但这对谁都没有好处。我曾把自己的苦恼对我姐姐爱娃说过，可她责问我：当初你为什么要孩子？爱娃是英语老师，但她一直停职在家照顾孩子，一直到今年夏初她的第三个孩子上学为止。

依旦的脸涨得通红，嘴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想要去给她换尿布，可这孩子挣脱了我的手，嘻嘻哈哈地在客厅里满地跑，和我捉迷藏，一会儿躲到沙发后面，一会儿躲到扶手椅后面。我假装抓不到她，她就高兴得哈哈大笑。玩的结果是，屎巴巴糊到了她的两个裤腿上。我抱起孩子三步并

作两步地上楼，到厕所里去给她冲洗，还好，脚上粘得不多。我听到楼下的电话铃响了，安迪急匆匆地来到厕所门口，说：

“你的电话，是你的同事赖岱打来的。”

“我两手沾满了屎巴巴！再说今天晚上我休息！”

“事情很重要，赖岱很着急。”

“真他妈的捣乱！”我抱歉地对安迪说，“你来换。当心依旦，不要掉下来！”

我冲干净了手，跑下楼去接电话。今天晚上是赖岱在局里值班，他先为打扰我表示歉意，然后说：

“玛丽娅，现在情况十分紧急，斯切姆给我这里打电话，他喝醉了。他要我做电话录音。当我告诉他录音带已经放好了，他就说，他打完电话后就要用枪崩了自己，打这电话就是为了声明，这不关我们什么事。”

我的脑袋“轰”的一下先爆炸了。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他没有再说什么，紧接着电话里就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声响。当我再打过去的时候，他就不接电话了。”

“他是不是从奥拉瑞的家里打来的？”

“来电显示器上显示出是他家里的电话号码。我已经给两个巡警下了紧急命令。”

“好，我马上就去。你不要掐断电话，等我进一步了解情况后，我马上给你打过去。”

我没有再上楼，只在楼下大声告诉安迪，我必须出去一趟。我穿上鞋和皮夹克，又揣上了钱包和手机。在打开门锁的瞬间，我发现自己的手颤抖得很厉害。这个贝扎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嘛？我驾车拐上老汉达路，把车速打到九十公里。我知道，这无论对我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是危险的，但我顾不了这么多了。我的“沙

巴”车不是警车，所以车上没有警报器，不能为我鸣锣开道！在上山街的拐弯处，我差一点撞上一辆垃圾车，那司机下车来嘟嘟囔囔地骂着，气得直捶树，我可没时间向他解释为什么开快车。我一直在想着贝扎的事：在他停职反省期间，虽然要他交出了公务手枪，但这没有用，我记得他有持枪证，他自己有一把三八型的驳壳手枪。

贝扎住在圆月路上一幢红砖的公寓楼里，那是一个单间套房。他是离婚后搬到那里去住的。我曾经去过两次，但都是站在门口，没有被邀请进里面。现在，院子里停着两辆巡警车，老巡警莉莎·拉西拉宁站在那里挡住了我的汽车，不让开过去。当我从汽车里走出来时，她的表情马上变了：

“玛丽娅！你来了，太好了！我们也刚刚到。邻居说，三分钟前听到斯切姆的房里响起了枪声，有一个邻居已经报警了。”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院子里和旁边大楼里的窗户上都是围观的邻居，莉莎留在那里劝慰他们，其他的警察都已经在三楼上了。我惊慌失措地向楼上走去，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似地往下沉。

隔壁邻居家的门开着，一个穿执勤服的警察正在安慰一个头发灰白、神色紧张的男人，他就是听到墙后面响起枪声的人。其他的警察都和我打着招呼。见我来了，他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需要我指挥作战。

“已经摁过门铃，也用麦克风喊过话，都没有人回答。大楼管理员马上就来。”年轻警察哈格拉报告说。

“是不是能肯定枪声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邻居们都这么说。”

“给我麦克风。”我几乎是向哈格拉命令道。我一下抓过麦克风，举到嘴上说：

“贝扎！我是玛丽娅。不要干什么蠢事，你的孩子需要你！

我们科……"

我的喊话引起了一片空洞的回声，但没有回答。我打开门上的信箱口，除了能看见地上的广告和一块小的灰色塑料踏脚毯外，其他什么都看不见。我想把手伸进去开门，可是够不着，从里面正散发出来一股非常熟悉的火药味。

"试过没有，能不能从阳台上爬进去?"我问一个警察，我感到自己的声音是颤抖的。有救护车的声音传来，那是有人打了报警电话后，他们赶来抢救的。

"很困难，因为斯切姆的房子正好在拐角上。我们也不能用枪把门锁打开，那样太危险了。"

"有没有建筑图纸?"

"大楼管理员会送过来。不过从楼下的邻居房子可以知道，这里的房子结构都是一样的，过道进去，对着门的是厕所，左边是厨房，右边是房间。"

"有没有螺丝起子?把锁卸下来，要不就用枪打，这有什么危险的?如果你自己不敢打，把枪给我。"

我只想尽快地进去，也许斯切姆只是受了点伤，也许他还能抢救过来，这每一秒钟都可能关系着他的生死存亡。

"大楼管理员马上就到，他的办公室就在跟前。我们不能开枪，你是知道斯切姆的，要是他失去理智，喝醉酒开枪取乐，他还有可能会向我们射击。"

"我不相信他会开枪取乐。给我拿螺丝起子来!"

楼梯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大楼管理员跑上来，二话没说，就找出钥匙开锁。贝扎经常讥讽说，人是最傻的，全都不知道该怎样保护自己的财产。可他自己的门上却没有任何的保险措施，既没有安全链，也没有保险锁。门很快就打开了，我迫不及待地冲进去，眼前的情景使我愣住了。

房间里还有火药味。贝扎倒在房间里，身子一半在沙发上，一半在地上，带血的嘴张开着，半边头的后面在沙发上染了一大摊血迹，像一幅从来没有见过的地图。

“给我手套。”我低声对哈格拉说。我带上手套，走到沙发后边，在贝扎那只搭在沙发上的毫无血色的左手的手腕上测试脉搏，那里已经测不出脉搏了，脖子上也测不出了。

“他知道打在哪里肯定会死。”我自言自语地说。

斯切姆一定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才痛苦地选择了这种方式，用枪子来结束自己生命的。这颗子弹必须在靠近头的地方爆炸，他选择了口腔，子弹通过口腔，击到后脑勺上，这样可以保证面部不破相。他那啤酒色的眼睛张开着，脸上的毛孔都扩张着，脸色苍白。还没有人顾上把他的眼睛合拢，把他下巴上的血迹擦掉。

“请技术员和摄影师。”我吩咐道。然后我小心翼翼地从尸体旁走开。

这时，我的心情反而是格外地平静。例行公事马上就可以开始，因为这里不需要做什么侦破调查工作，这是再清楚不过的自杀案了。贝扎右手握着驳壳手枪，他射得很准，弹迹十分吻合。他在开枪前几乎把一瓶白酒都喝光了。酒瓶倒在他脚跟前的地毯上，这可以假设为是他开枪后，酒瓶被踢倒才滚到沙发这边来的。

我的眼睛就像例行公事般地打量着这间私人住房。房间里的家具摆得很紧凑。烟灰缸擦得洁净发亮。电视机和录像机放在恰到好处的位置，躺在沙发上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观看。饭桌和两把椅子是藤条编制的，这不是贝扎喜欢的款式，肯定是他贪便宜买的二手货。沙发的茶几上摆着最近出版的《警察和法制报》，还有填好了的彩票单子。睡觉的卧室是从房间里隔出的一块非常精

确的刚好放一张床的地方。

我知道自己是个典型的没有耐心等待的人，我不知道技术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来到这里。我往鞋上套上保护鞋套，穿上塑料薄膜的保护服，把头发塞进浴帽似的保护帽里。摄影师开始拍照了。救护车上下来的救护员证实：斯切姆确实死了。

我走进厨房，看见洗碗池的柜台上躺倒着两个啤酒瓶，看来是仓促所致。斯切姆的办公桌上一直保持得很整洁，纸张摆放得井井有条。接着，我走进厕所看见这里有两封信，生了锈斑的打字机放在洗衣机上。一封信是写给孩子亚尼和耶娜的，另一封信是写给埃司堡警察局我们科的。我把后面的那封信拿起来，贝扎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小写，什么时候该用大写，手写体看起来很困难。

埃司堡警察局暴行侦缉科：

我曾多次和你们一起抱怨那些自杀的人不留遗书，在破案前警察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最后的结果却是自杀。我不给你们添麻烦，我坚定不移地从这里离开，我并不真正地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枪杀自己是因为生命不再有生存的价值了。我失去工作后再也没有生活的信心了。我总是鞭策自己尽可能地做一个好警察，但在实际工作中是很难做到的。那些老老实实上税的人在马路上走路都要求得到保护。所以有时候我对工作没有信心，是因为现在上法庭的坏人要比好人多。就像威达宁，他保证会杀他的老婆，但警察却无力制止这种惨案的发生。

我被开除了，你们中肯定有很多人是幸灾乐祸的，但不要为我立大墓碑来报复我，这种愚蠢的想法是要不得的。谁也不要为我哭泣，这不值得。我不害怕死，我总想死得光明

磊落。本来我想在死之前先枪崩了威达宁和其他几个坏蛋，但又一想，让他们顺其自然吧！你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任重道远！

希望你们都能做一名好警察。

高级警察贝蒂·斯切姆

信的最后几行被水渍浸染，字迹模糊不清。可能是斯切姆边写信时，还在边喝啤酒。我大声地对技术员说，这是我找到的自杀遗书，我要他拿塑料袋来把这封信装进去。斯切姆写给孩子的信也打开着，我拿起来看。

亲爱的亚尼和耶娜：

虽然这一年我没有和你们生活在一起，但我是一直爱着你们的。我知道，即使我从你们的生活中消失，你们照样能和妈妈、加伊一起生活得很好。

亚尼可以得到我所有的一个警察拥有的东西。耶娜可以得到奶奶的一枚紫水晶戒指，它在我床底下锁着的手枪盒子里。把我其他所有的东西卖掉，所得的钱作为你们学习的花销，我没有为你们留下太多的东西。

这里发生的事，除了我自己，谁也没有责任，无论是你们，还是你们的妈妈。永远记住，要好好学习，做一个有用的人。不要为我悲伤，我希望一切更加美好。

爱你们的爸爸

技术员哈加拉宁来到厕所门口，我从他手里接过塑料袋。必须要派人给亚尼和耶娜送信去。我私自决定不把这信放进死者的证据库里去。我把信都装进塑料袋后，仍然把它们放到洗衣机

上。我在擦得亮晶晶的镜子前面照着自己。衣领上有黑草莓粥的污迹，我心不在焉地擦了一下。斯切姆把一条洗好的深咖啡色和绿色相间的条子长裤搭在挂淋浴隔帘的横杆上晾干，我努力想像斯切姆洗衣服的样子，可是怎么也想像不出来。他总是公开声明不愿屈尊干女人的活计。

当我听到门厅里传来布包宁的声音时，真是又惊又喜。大概是赖岱给他打了紧急电话。我走回那惟一的房间，那里技术员和摄影师正在出奇的安静中忙碌着。一般在犯罪现场都能听到他们的推理和谩骂，可现在这里都没有，即使有人在斯切姆当代理科长时曾几十次地诅咒他死。

“啊呀！天哪！”布包宁看着贝扎的尸体时叫道。然后他面带羞色地对我说：“玛丽娅……”

“你好！你怎么来啦？”

“有一个来接受审讯的家伙没带钱买公共汽车票，我只好驾车把他送回去。我听到汽车上的收音机里广播这则消息，我不能不来……”

“你来了就好。必须有人去通知斯切姆的前妻和他的孩子，我肯定是要去的，因为我是领导，但最好还有一个人和我一起去。怎么样，你想去吗？”

布包宁点点头。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巾纸。他比一般的人要白，只是鼻子仍旧又红又肿，大概是擦鼻涕造成的吧。

“这个案子不需要做什么调查，这是明摆着的事情。”技术员哈加拉宁吞吞吐吐地说。

“是的，但必须按惯例把案子处理妥当，不要留什么后患。我的意见，等你们搞完后，立刻把贝扎拉走。有人通知局里的赖岱了吗？”我问哈格拉。当他回答“还没有”时，我拿出手机自己打了过去：

“我是玛丽娅。很遗憾我们来晚了。斯切姆在打完电话后，立即枪杀了自己。”

“那他死了?”赖岱的声音变得很可怕，“这不……”

“不要再说了。你打电话请达斯基宁明天上午到科里来参加会议，比平时上班时间稍晚一点。”

担架抬进来了，斯切姆被放了上去。沙发上留下了一大片血迹。我默默地想，有谁来打扫这间房子呢?我这才想起自己虽和斯切姆共事多年，竟不知道他还有些什么亲人，比如，姐妹或是双亲。救护员把尸体盖上，尸体在狭窄的担架上显得格外地沉重。当斯切姆的尸体经过哈格拉面前时，他摘下了帽子。

“为什么他要干这样的傻事……”布包宁的声音发颤。我把塑料袋递给他，那里面是给我们的信。

“是不是斯切姆被开除公职了?”布包宁看完信后问。我不好回答。或许是斯切姆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可能得到宽恕，或许是他认为我对他的酗酒之事不会轻易放过。我把信交给哈加拉宁，要求他复印几份，明天上午开会用。我向布包宁点头示意，我们该走了。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这是大发雷霆的安迪打来的:

“你又跑哪里去了?”他大声地吼叫着，“一个半小时后我要到文化中心去!”

“我在斯切姆这里，贝扎自杀了。”

这个消息使安迪安静下来了。我告诉他，我大概一个小时后回家，如果他开车去的话，还能赶上音乐会。他说已经向他姐姐告急了，请她过来照看一会儿孩子。

救护车已经开走了，但院子里的人仍还围在警车的周围。就像赶上滑雪赛似的，我的车被挤在技术车的后面。坐到车上，我至少用了五分钟的时间来稳定自己，使自己冷静下来整理一下思

绪。

斯切姆的前妻和孩子、新婚丈夫一起住在曼加。这幢两层小楼原来是斯切姆没有离婚时和他们一起住的房子，现在，门上写着："斯切姆和黑尔威"。记得有一次斯切姆讽刺他这个情敌的名字说："加伊·黑尔威这个名字，就好像这个家伙分不清是非似的。"很快，我和布包宁就站在他们家的院子里了。对着院子的窗户是厨房，窗户上挂着钩着花边的窗帘，里面亮着灯光，映照着一个温馨的家庭。可有谁知道，这个伊甸园马上就要遭到打击。

曾经叫玛莉亚·斯切姆的玛莉亚·黑尔威来开了门。我以前在警察局的走廊里见过她两次，她是去和贝扎谈交换照顾孩子的事的。玛莉雅今年三十八岁，矮小的身材，棕色的皮肤，看起来像个时时需要保护的人。她穿了一条墨绿色的健美裤，金黄色的上衣一直盖到臀部下面，显得像个小姑娘似的。

"晚上好！我们以前见过面，我是高级警察玛丽娅·加里奥，这位是年轻警察布包宁。我们都是埃司堡警察局的。"

玛莉亚的脸色马上就变了。她曾经是警察的妻子，所以有经验，能看出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

"是贝蒂吗？"她马上问，"出了什么事了？"

我站在门口，可以听到里面的电视机里正在播放美国电视连续剧《美丽和勇敢》，那是一部无聊的爱情片。

"亚尼和耶娜在家吗？"

玛莉亚点点头。

"我很沉痛地告诉你，贝蒂在一小时前自杀了，当警察赶到那里已经无济于事了。你一定要用最妥当的方法转告孩子们。"

玛莉亚先愣了一下，然后，她咬了一会儿嘴唇才说：

"是枪杀。我并不对此感到惊讶。那时候当我要离开他的时

候，他曾用这种方法威胁过我。为什么他现在要这么干?”

“他被勒令第二次停职反省，因为他在审讯中打了人。”

“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前天晚上才从兰扎诺特度蜜月回来，孩子们都跟着一起去了。”玛莉亚转过身去侧对着门，我这才发现她已经怀孕了。从凸显的肚子看，大约有六个月了。“他们这个周末就要到贝蒂那里去，叫我怎么对他们说呢?”

“要不要我们……”

玛莉亚摇摇头。她知道该怎么对孩子说。我又问她斯切姆还有些什么亲属，她说他有一个哥哥，全家住在迪古瑞拉；他的父亲住在瓦麻拉；他的母亲三年前死于癌症。这些情况我都不知道，因为他到埃司堡警察局来工作后很少和亲属们联系。我告诉玛莉亚，他遗书中的遗愿是不希望举行大型的葬礼。我把斯切姆留给亚尼和耶娜的遗书交给玛莉亚。她强忍着悲痛看完信，眼泪就忍不住地流出来了。她用两手紧紧地环抱着自己，就像要抵挡住从门外袭进来的冷空气一样。她没有邀请我们进去多呆一会儿。

“这里有什么事吗?”一个男人走出来问。他肯定就是加伊·黑尔威。我见他不觉暗暗地吃了一惊，因为他长得很像贝扎，高高的个子，满脸的疙瘩豆，皮肤很糟糕。他把手搭在他妻子的肩上，瞪眼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是传教士似的正挨家挨户地在布道，使那些虔诚的教徒们都激动得眼泪直流。当玛莉亚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后，他的表情马上变了：

“去告诉孩子们。”他喃喃地说。

“玛莉亚，关于葬礼的事我们过两天再商量，比如，怎么安排，都有哪些人来参加等等。告诉孩子们，如果他们想知道爸爸的事情和他自杀的情况，我们这些同事随时都可以奉告。”

我把名片留给她，我们就告辞走了。

"你会这么干吗?"当我们一起走向汽车的时候，我问布包宁。

"你为什么要这么问?我最讨厌干这种傻事的人。"布包宁的鼻涕流出来了，他用手擦了一下，"虽然……斯切姆这么干是不希望让脑浆流在光天化日之下。明天见。"布包宁说着，打开了车门。

"明天早上八点开始开会。再见!"

我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去。我把汽车开得很慢，好像是对先前的超速驾驶将功补过似的。安迪的姐姐玛瑞达的汽车已经停在院子里了，但愿安迪没有告诉她我突然出去的原因。现在除了我的同事，我不想与任何人谈贝扎的事。

宁静的夜晚，空气中弥漫着腐叶的香味。我竭尽全力地做着深呼吸，一次，二次，三次。天上是一轮满月，月光既温柔又明亮。白杨树的叶子落到地上，薄薄地铺了一层，就像远古时期人们举行宗教仪式时铺在地上的毡毯。我出神地站了两分钟，直到自己感觉到心情确实平静了，才走进屋子里去。

第二天早晨，我赶到局里上班时，已经是八点差十分了。昨天晚上，我和安迪的姐姐东拉西扯地聊了些家常，聊的最多的是有关依旦和她两个十一岁的双胞胎儿子马丁和密高的各个成长阶段的话题。我尽量掩饰自己希望玛瑞达赶快离开的心情。我编了个谎话说，已经八点多了，我要哄孩子睡觉了，如果家里没有客人的话，依旦很快就会睡着的。当我给依旦念催眠故事时，玛瑞达告辞走了。我很奇怪自己遇到这样悲伤的事，竟没有流一滴眼泪。我喝了一杯大茴香酒，又喝了一杯威士忌。等安迪回到家时，我早已进入了梦乡。

早晨，我换上了一套黑色的丧服——这是春天的时候，为了

参加安迪叔叔的葬礼才买的。今天肚子一点都不觉得饿，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吃了一点早餐。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考虑着：贝扎不再来上班了，我应该怎样重新安排一下工作。

八点过一分我走进会议室，其他的人已经全部到场了，其中包括达斯基宁。

“早上好！谢谢你，赖岱，你把话传到了每一个人。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的工作伙伴贝蒂·斯切姆昨天晚上自杀了。大家都认为贝蒂不是那种随和的工作伙伴，我们中也有人曾经和他吵过架。这主要是他的工作方法有时和我们的不一样，这就使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他。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引起他自杀的原因。局里的心理学专家下午两点来。两点以后的工作安排暂时先取消，大家抓紧时间和他面谈。”

我清了清嗓子，因为声音里还带着隔夜味，不是十分清新。我看到这些老搭档们几乎全是清一色的丧服，都穿着深色的西装。高依吾穿着黑色的牛仔裤和毛衣。只有王穿了一套深红色的套装。

“贝扎留下了两封遗书，其中一封是给我们的，是给我们科的每一个同事的，早晨已经把这份遗书发给大家了。他在遗书中要求我们不要为他举行大型的葬礼，这事由他的亲属去决定。现在，我们为高级警察贝蒂·斯切姆默哀两分钟。”

我们科的人全部低下了头，布包宁强忍着不打喷嚏，赖岱不断地咽着口水。我还是没有哭。接下来是和平常一样的晨会。会上报告的大新闻是，经济师哈达娅和她的男友道马斯出现在萨烈马岛[1] 上。我和人事科打了半天嘴仗，他们为了掩盖资金短缺的羞涩，要把斯切姆的编制一直要压到葬礼后才解冻。我强硬地

① 在波罗的海上，属爱沙尼亚领土。

对他们说，下星期一我就要找人来顶他的缺。我安排清洁工从赖岱的办公室里搬走了贝扎所有的东西。我和贝扎的哥哥谈了葬礼的安排，我向他解释：贝扎不喜欢穿着警察的制服，那么一本正经地去教堂。下午，我坐在心理学专家召开的追悼会上，专心致志地听别人发言。我扪心自问，我的感情是悲伤的、难过的。

回到家里，我和依旦一起玩耍，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安迪想聊聊斯切姆的事，但我告诉他，我现在不想说。天黑后，我们出去散步，我拾了几片颜色深浅不一样的枫叶，回家后装饰在依旦房间里的墙壁上。

孩子睡觉后，我打开电视机，来回转了一圈选择频道。第一频道上是约马·黑尼宁在演出歌剧《斯古白特温特来西》。安迪过来坐在我旁边一起欣赏，他用手搂着我，好像这样我们就会产生共鸣似的。热烈、悲伤的男中音唱腔，唱得既柔情似水又悲戚感人。接下来是劳夫·高芍的钢琴曲，它的主题大意是：什么样的话不能泄露。音乐就像舒经活血的良药，传遍我的全身。最后演的是剧名为《路标》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说的是一个被爱情欺骗的男人觉醒后，踏上了旅程，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这时候我开始哭了，眼泪就像涌泉似地源源不断。

15

星期五上午立陶宛警察局发来传真说，卫达立斯·拉马那斯加斯和以马兹·贝德斯在两年前已经出国，两人潜往法国尼斯[1]，但没有具体的住址。拉马那斯加斯和贝德斯都是前苏联海军后勤部的官员。他们负责的部门是维修军舰、航空母舰和巡洋舰的。立陶宛独立后，这两个人一直在俄罗斯庞大的军队和自己的政府之间周旋，他们不想归属于任何一边。

我看着这份传真开始猜想：尤哈·麦瑞瓦拉是不是把生态船漆卖给了俄罗斯的海军后勤部？那么这个马来·诺斯曲姆公司又是干什么的呢？我又给立陶宛警察局发了一份传真，请求他们提供更详细的关于贝德斯和拉马那斯加斯在前苏联海军后勤部里的工作情况的情报。但我清楚地知道，这些情报是不可能传过来的。我给尼斯警察局也发了一份请求协助的传真。现在我更加确信，尤哈的麦瑞瓦拉公司是打着安全的幌子，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哈瑞是不是因为知道这些真相才惨遭杀害？塞娅·莎莱拉说到的“死海蟹”是什么意思？哈瑞要把死海蟹拿到大陆去化验，是哪里？是赫尔辛基大学生物系吗？

如果哈瑞和尤哈的死都涉及到另一个人，那么这个人肯定知

---

① 法国东南部沿海城市。

道尤哈的秘密勾当，是伊瑞还是安奈？到底是某个人杀害了哈瑞和尤哈·麦瑞瓦拉，还是尤哈先杀害了哈瑞？

我打开电脑，找到了麦瑞瓦拉公司的家庭网页。我想找欧共体的生态产品商标，使用这种统一商标的产品必须要经过多年的严格测试。想必尤哈·麦瑞瓦拉不敢冒这样的风险，因为这样就会把麦瑞瓦拉公司的秘密黑股份公司暴露无遗。他是不是在演掩耳盗铃的把戏，认为把马来·诺斯曲姆公司迁往古埃塞就不会露马脚了？真是自作聪明。

我把手撑在脸上，把眼睛都挤成了一堆。我学过法律，所以有关经济和经商的犯罪案子从来没有困扰过我，但比较起来，我还是喜欢办人际关系的犯罪案件。例如，调查一个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或者是调查一帮酒鬼的社会地位，或者是制止一群年轻人打群架，并且搞清楚他们的势力关系。钱是冷漠无情的东西，它不表示过去，也不意味着将来，它并不是人们所想像的刺激物，它只不过是一种循环使用的东西。

我又把思路转到尤哈·麦瑞瓦拉身上。我还没有掌握麦瑞瓦拉公司和马来·诺斯曲姆公司的偷税漏税的情况，所以还不敢断定他们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尤哈·麦瑞瓦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儿童时代，他八岁时失去了久病缠身的母亲。青年时代，他被确认为家庭公司的接班人。壮年时代，他瞒着妻子去亲近女秘书。他还想把儿子培养成和他自己一样的人。对尤哈·麦瑞瓦拉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家庭，大自然，商场上的声誉，还是钱？

我不受他外表的迷惑，认为他是什么先进人物的典范，他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个子高高的、精神饱满的、不拘小节的、声音刺耳的男人。昨天夜里，他的阴魂一直盘绕在我的脑海里，使我久久不能入睡。科里的同事都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地清理斯切姆的办公室，甚至连高依吾都不明白，为什么门上那熟

悉的名字和那擦得发亮的桌子都在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过去的许多时间里，我是很讨厌斯切姆的，尤其是他的种族歧视和目空一切。他怀疑一切新生事物，不信任所有与他交往的人。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不讨厌他了？也许是我的成见太深了吧。

当然，我也记得那些令人愉快的朋友般的友谊，例如，在我怀孕的时候和与那些纠缠不休的个体户打交道时，他总是帮助我；在我休妈妈假期间，为干扰电话生气时，他安慰过我；当我欠考虑做出决定时，他曾提醒过我。那时候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从今以后不必再和他一起共事，一切都要好一些，科里的气氛也会变得更好。实际上真正的矛盾焦点在于，我被提升为高级警察和斯切姆平起平坐了。还有，我干工作比他强。斯切姆骗取我的信任，在我休妈妈假期间由他来代理我的职务，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如果不是这样，情况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还有他酗酒的问题——我怎么就没有足够的勇气对付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只凭想像，认为在我回来工作之前，贝扎有足够的时间改掉自己的恶习？为什么我打电话，他不接电话的时候，我不亲自登门拜访？

该死的上帝怎么把我造就成这样的一个人？我能不能假设自己是可以阻止斯切姆的自杀行为的？

我强迫自己还是考虑尤哈·麦瑞瓦拉的事情。斯切姆的个人形象是粗糙的、不光滑的，我也不必费神去相信尤哈是完美无瑕的楷模。我百思不解的是，尤哈怎么会是一个既贪财又热爱大自然，既能维持神圣的传统婚姻，又能带着商界友人去逛妓女酒吧的人？很有可能这个马来·诺斯曲姆公司是麦瑞瓦拉公司的一个实体模型，尤哈认为在紧急情况下，毁掉这个公司不至于影响主

公司的形象。

一阵嗡嗡的蜂音器声打断了我的思路。科长的门上都有红绿黄三色信号灯，但我很少用，只有当我的办公室里有人在谈话时，我才揌亮红灯。和我一起共事多年的老搭档们，他们都习惯于敲门，只有斯切姆除外，他从来不给什么信号，直接就闯进来。我揌了蜂音器上的绿色信号灯。推门进来的是阿奴·王。

“嗨！玛丽娅，你这会儿有时间吗？”我说有，王就坐下继续说：

“我没有在晨会上说这件事，是因为我感到很为难，但是……”

王确实为难地欲说还休。她那黄皮肤的圆脸蛋上显出了皱纹，两条黑色的大辫子垂在后背上。王是个高个子，差不多有一米七，尤其是两只手，特别地修长，不像我的两只手，就像垂在两边的两把铁锹似的。

“怎么啦？”我温和地问。我极力想向她表示，对着我这个领导，她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可我在心里暗暗地祈祷：千万别问有关高依吾以前的女人的事情啊。

“我不想搞埃·哈依·阿沙达的案子了。”王吞吞吐吐地说，“我考虑了又考虑，想说服自己不要放弃，但不行，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在沙特阿拉伯出生的财贸硕士依斯马尔·埃·哈依·阿沙达企图卡死他十几岁的亲生女儿阿玛丽，原因是他的女儿偷偷地跑出去参加沙吾伽海滨的一个家庭聚会，并且她不穿长裙，不盖头遮脸地尊重民族风俗，而是穿着牛仔裤和普通的衬衫抛头露面。这是她父亲不能容忍的。女孩咬了父亲的手，逃出来给警察打了电话，她现在住在一个同学家里。贝扎要王负责调查这个案子，因为他的观点是，作为一个警察，什么样的案子都要锻炼一下，无

论是大人物的强权派，还是少数民族的平头百姓，无论他们是侵犯者，还是受害者，都要公正对待。

“为什么?”我问，“案情是很明显的残暴虐待。再说你已经搞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干得很好嘛。”

“但是，当……我总感到在审讯中我对付不了他，他瞧不起我。可能在他们的国家里，警察要比那些石油公司的老板们廉价得多。他们家有菲律宾女佣。当我第一次审讯他时，他都不用正眼看我。我们这些黄种人在他的眼里都是下等人！他认为审讯员是女的，对他是一种极大的伤害。有一次贝加和我一起审讯他，他就只对着贝加说话，根本不理我。昨天是最后一次审讯他，除了诽谤，他不作任何回答。”

她说完后，瞪大眼睛看着我，那眼睛里流露的一半是羞涩，一半是乞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王又接着说：

“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这是斯切姆说的。当他派给我这个案子时，我就信心不足，我认为自己不适合搞这样的案子。但这正像他盼望的那样，他可以看我的笑话！我和我们一家人已经努力了几十年，总是尽量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的风俗习惯，我父亲和他的亲属们为了逃避中国的革命，先是到了北越，后来又举家迁到芬兰来，我甚至把名字改成了芬兰人的名字。上星期六看足球赛时，你听见我高呼谁的名字了吗？还有谁像我这样自律向上呢?”

王是前年春天从警校毕业的。那时她刚刚二十三岁，她使我想起了自己十年前的样子：是一个年轻、热情的警察，充满了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征服全世界。大概以后还会有人来步我的后尘，仍然这么自信。这些年来，我看到了太多的事实——那些判了刑的罪犯是怎么样被释放的，然后又猪八戒倒打一钉耙，把罪刑强加到警察身上。有时候我真想调到法律事务所去，重新干律

师的行业，那样就可以把罪犯严惩法办。但律师也有律师的难言之隐，法律总是有被钻空子的地方。

“我理解你的处境。那么，你想怎么办？”

“我想和贝加换一个案子，我接着把雷巴瓦拉的强奸案搞完，让贝加来对付埃·哈依·阿沙达。我已经和贝加说好了。”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这个案子的情况我是从报告材料上知道的。那里已经提出了许多棘手的问题了。依斯马尔·埃·哈依·阿沙达是“蚬尔”石油公司芬兰分公司和沙特阿拉伯“穆哨尔”石油公司的代理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生意人。芬兰警察缺少他家庭生活的资料，不知道他是一个如此残酷的暴君。在宗教信仰方面，他的观点是，女人只能呆在家里盖头蒙面地操持家务。埃司堡的学校已经和他交涉过多次，要求他减轻对女儿的压力，阿玛丽才获得了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到中学去上初中三年级。

我想到高依吾和王背着我交换案子的事，是不是他们有点怕我？这是很可笑的事。埃·哈依·阿沙达受到残酷毒打女儿的控告，实际上这对阿玛丽今后的生活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但以后的问题就不归警察管了。

“我这样换案子，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挑剔？”王问。

我摇摇头，安慰她说，我第一年参加警察工作时，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那时候我也经常被案子所困扰。

“看你提了一个多么幼稚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知道，当时是什么动机促使你报考警校的？”

阿奴微微一笑，说：

“同样的问题，是什么动机促使另外一些人贩卖毒品和在公共场所的墙上乱涂乱写的？我这个人喜欢叛逆，总是和父母亲的传统习惯背道而驰。当时我想，如果像芬兰人那样当个女警察将

会怎么样？我就和班上最要好的同学妮娜商量，一起到坦佩雷去上警校。能离开家是我最高兴的事了。我实现了愿望，但妮娜却没有。”

“你父母亲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这是多么可笑的巧合，阿奴选择职业是出于对父母的反抗，这和以前的我一模一样。

“医生或者建筑设计师。我有四张得优秀的成绩单，我只是想尽最大的努力证明一点，那就是，作为一个女警察能对那些红颜薄命的女子的遭遇有所影响。我憎恨有时被人误认为是泰国的按摩女郎，有时被人误认为是某个男人的菲律宾老婆。每当我在街上执勤维持秩序的时候，我穿着警察的制服，显得神圣威严，我就感到无比地自豪。”

王看了一下手表，然后对我同意她换案子表示感谢。当门在她身后正要关拢时，她又折回来说：

“关于贝加，你不用担心，我是真心喜欢他的。”

“我也喜欢贝加。”我很别扭地说，因为我不习惯称呼高依吾的名字。“贝加就像我的弟弟一样，很高兴有你做我的弟妹。”

“等着瞧吧！”阿奴喜气洋洋地笑着，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然后门关上了，又留下我一个人沉浸到思绪中去。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我找过贝扎谈话……

为了从痛苦的自责中摆脱出来，我给芬兰鸟类协会的中心组织“鸟的生活”打电话，询问哈瑞从瑞兹盖尔岛上拿回来的死海蟹有可能送到什么地方去化验。

“鸟的生活”的这位朋友表现得很友好，他认识哈瑞。他说有可能送到兽医学院，或者食品公司的化验室；夏天的时候从芬兰湾拿回来的一些死得蹊跷的鸟，都是送到那里去的。我立即派布斯特亚勒威去调查这件事，他嘟嘟囔囔地抱怨说，不要老是揪

住这些死海蟹不放嘛！我看哈瑞的档案，那是高依吾整理的有关许多方面的资料，其中有哈瑞是鸟类协会成员的记录，奇怪的是，达毕奥的名字也在这个协会的花名册上。

达毕奥·浩勒玛和哈瑞是同一个协会的成员。

那么浩勒玛为什么要撒谎说他不认识哈瑞呢？如果他们是相互认识的，那么就可以解释为浩勒玛是故意来干扰我们对麦瑞瓦拉家作调查，不让我们搞清楚哈瑞的死因，而决不是他真正地爱芮佳——我在想像中得出了这样的逻辑推理，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我再看哈瑞的档案，遗憾的是，我无法再重新验证哈瑞是被谋杀的，因为他的尸体已经火化了，不可能重新作调查。我感到自己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愧对亡魂，我不能为他找出公正的死因和真正的罪犯。半个小时后，我又要去参加局里那没完没了的计划会议。这一次会议的主题是，怎样制止在墙上乱涂乱写的问题。我几次想说这个问题不关我们科的事，但我没有说，因为我听说这次会议有市委领导来参加，所以还给会议安排了一顿特殊的午餐。我认为埃司堡的市委是真正地忽视了环保的大问题，而在这个乱涂乱写的问题上吹毛求疵。我个人的意见，只要建立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短小精干的工作组负责这件事，保证比当官们开会有效得多。

趁开会前还有一点时间，我给安迪打了个电话。这时依旦正在外面睡觉[①]，安迪正在弹钢琴，我的电话使安迪中断了弹琴。

“说是有什么毒，毒死了一些鸟。”

“我可不知道这些事，我是数学家。就这个问题你问问生物学方面的人，怎么样？”

---

① 这是芬兰人的习惯，等小婴孩睡着后，把他的小睡车推到外面院子里或阳台上，每天一次。

“哈瑞在瑞兹盖尔岛上发现了死海蟹。油漆会不会是毒死鸟的罪魁祸首？有没有可能是那些营养丰富的鸟食受到污染后，鸟吃了以后就死了？”

“老的油漆配方里含有铅，当然有可能污染所有的东西，但是麦瑞瓦拉公司不可能干那样的事情。你到底怀疑什么嘛？”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像泄了气的皮球似地说。因为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得到贝德斯和拉马那斯加斯的详细材料，我不能光凭猜测来判断事情。安迪问我周末有什么安排，他建议我们一起去英高。他的父母亲去旅行了，海滨游乐场已空旷无人了，船还没有搁岸，如果天气允许的话，我们还可以去航海。我知道安迪是想让我换换脑子，不要整天想着工作和贝扎的事情。我也想这样，带着依旦去采采蘑菇啊，或者是坐在船里任船漂荡啊。

“好主意，今天晚上就动身。”我答应把手机留在家里。

在去开会前，我梳理了一下头发，抹了一点口红。我发现眼睛下面出现了新的皱纹，两鬓也渐渐地出现了灰白的头发。当我走过赖岱的办公室时，忍不住地要朝门上看一眼，名字取掉的地方显得有点凄凉。我感到自己迫不及待地把贝扎的东西从科室里搬走，想用这种方法来驱散脑海中对贝扎的记忆，看来是自欺欺人的行为。在开晨会的时候，我似乎仍然可以闻到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浓重的烟味。

午餐会议的最大诱惑是免费就餐。看着那些橡皮块似的炖大马哈鱼，我一点食欲都没有。从夏天开始，我们就不买鱼了，因为我们看到报道说，大马哈鱼的养殖场已被藻类植物所污染，并且面积还在不断扩大。也许是受安迪的环保知识的影响，促使我开始考虑更多的问题，比如，上什么样的肥料才使土豆长势喜人。但这样的问题从没有引起政府部门和技术委员会的重视，他们不会为这样的问题召集会议。

“一旦揪出这种玩忽职守的人，市委要作严肃处理的。想想看，这会给外国来宾留下什么印象——当他们从飞机场坐车行驶在这条最长的一环道上，看见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建筑工地。西环道上也是如此，这一点都不像现代化的高科技城市，完全像一个贫民区。”技术中心的工程师说。

“确实。这应该由犯罪侦缉处维持秩序科的警察来处理最好。市政府要设法使国家的财政预算给警察增加拨款。”我们的新局长接着说。

我尝了一点大马哈鱼，实在不敢恭维，我把鱼盘推得远远的。维持秩序科的警察说，学校应该加强文明教育，提高青年人的素质。但怎么样才能要求市委在这方面增加投资呢？没有人回答。我注意到他们在要求我发言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这是年轻人在向市委的决策者们挑战，要求保护环境，禁止破坏。这些阻隔噪音的围墙对那些乱涂乱写的人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长期以来，绿化地区被一点一点地啃噬殆尽，直到现在还在威胁着中心公园。一个城市不能这样被随心所欲地搞得乱七八糟。”

“警察部门不能修改犯罪的法律吧？”一个市委领导阴阳怪气地说，“城市搞基建是有法律依据的，不容人诽谤。”

我感觉到警察局长和我的老同事们的眼光全都投到我的脸上来了，我的怒气开始不断地往上升：

“那是你们这些政客拟定的法律。如果有机会改进的话，还是希望你们能多多地关心一下群众的利益。例如，你们可以留心一下，自行车道的界沿石要放低的问题，十公分的高度对汽车来说不会造成太大的危险，但对自行车来说，那就不堪设想了。不信？可以试验一下。有人还可能摔倒后伤着后脖颈，那时候就该是我们暴行科的事了。那些乱涂乱写的人不归我们管，所以他们

全都被放走了。前天我们科的一位警察自杀了，我很忙，不奉陪了。”

我猛地站起来，椅子发出吧嗒的响声。尽管我知道这时发脾气是不明智的，但我不愿把话忍在心里。门关上了，隔断了达斯基宁盯在我后背上的目光。大概他开始认识到提拔我当科长是一个错误了。他曾为提拔我而经历过一番斗争，因为我听说有些组织的某些人对提拔我持怀疑态度。例如，妇女协会和同性恋协会。我刚才的发言，可能会引起谣言，说我支持动物保护的激进分子和那些乱涂乱写的人。

我以惊人的速度冲下楼梯，跑回自己的楼层。我记得在办公桌最上面的那个抽屉里还有一袋薄荷片糖，它可以消消我的怒气。

“我正在等你。”坐在走廊门边的赖岱说。

“啊？我现在不想见任何人。”但我远远地看见在我办公室的门上靠着绿头发的伊瑞·麦瑞瓦拉。他是不是自愿来警察局的呢？我向他走去。当他注意到我的时候，表情又变得像以前那样无动于衷。

“嗨！伊瑞，怎么样？”

小伙子耸耸肩膀，跟着我走进办公室。他重重地倒在沙发上，头发的绿颜色比上一次见到的时候淡了一些，牛仔裤的两条裤腿上，在膝盖部位割了两道口子，露出了膝盖；随身携带的一个绿色的背包打开着。

“你不上学吗？”我用阿姨似的口气问。

“我不再上学了！到二月份我就满十八岁了。我有父亲遗留下的钱，我可以像米盖那样去周游全世界。”

我记得安奈·麦瑞瓦拉说过，伊瑞是多么想上大学。这是否仅仅是母亲的一厢情愿而已？

“我没有赶上参加三门课的考试，因为便衣警察把我在拘留所里关了四十八小时。可我什么也没有干。”

“没有吗？你们中间的其他人最后也都不承认纵火吗？你知道真相吗？”

“不知道。”伊瑞说。我敢肯定他在说谎。在玛立宁屠宰场实习劳动的那个女学生的姐姐和伊瑞是同一所学校的高三的学生，她和伊瑞一起被起诉为破坏性放火的纵火者。很明显她现在正等待着伊瑞的帮助，如果判决为罚款的话，伊瑞继承的那点钱保证全部完蛋。

伊瑞随意地坐在沙发上，郁郁寡欢的样子就好像他是被拉到警察局里来的，而不是他自己主动来的。我的电话响了，是布包宁询问一件日程安排的事，我只能大概地说一下，因为有伊瑞在场。他时而看着背包，时而看着他的鞋尖，然后又咬右手的指甲，可能觉得味道不好，又从嘴里拿开了。

等我打完电话，伊瑞仍旧静静地坐在那里。我打开电脑，找到尤哈·麦瑞瓦拉被害的资料部分，重新又看了一遍。我从抽屉里拿出薄荷片糖，往嘴里塞了两块，然后把袋子递给伊瑞，他看了一眼，有点犹豫——这袋糖的产品说明上写有三种额外的成分——但他还是吃了，吮了两口后，他开始说话了：

“在陈述父亲死的那天夜里的事情时，我撒谎了。我没有一直睡着，除了出去解手外，我还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折腾了一阵子，我回想起父亲和达甫沙吵架的事，那纯粹是父亲多管闲事，芮佳总归是要嫁人的！这事应该由母亲去操心。”

伊瑞的眼睛里闪着一种难以捉摸的眼神，说：“我还听到那间小房间里有动静。米盖从房间里走出去，我听到他在过道里和他母亲说话。”

“加曲娜·休白格？”我有点吃惊地问。因为母子之间不应该

有什么事情非得在半夜里说。

“他们说的是瑞典语，所以我敢肯定是加曲娜。”

“这发生在几点钟?”

“我没有看表，天还很黑。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感觉他们并没有出去。他们俩不可能……杀害父亲……”

伊瑞结结巴巴地语无伦次地说着。他不想直接告发米盖或加曲娜。他是不是已经察觉整个案子的动向，觉得警察已经注意到了他们中间的某个人？是不是伊瑞最担心他母亲是谋杀犯?

“还有一件事，芮佳和达甫沙睡在我们隔壁的房间里，母亲总是睡在离他们尽可能远的地方，好像生怕听到从他们房间里传出那可怕的声音。我听到那里有走出去的脚步声。从这脚步声判断是达甫沙，因为芮佳走路很轻。那天夜里只有母亲和芮佳没有出来。”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正等着这些事呢。我把谈话的话题转了，问起哈瑞·依冒宁参加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事。

“哈瑞是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成员？不可能，他年纪那么大，我们的活动没有比我们大二十岁的人参加的。”

我点头表示赞同。虽然说直接参加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这些活动，是不适合像哈瑞这样的和平主义者的，但他确实和组织有联系，因为便衣警察的花名册上有他的名字。于是，我要伊瑞再好好想想。但他看起来好像只对背包里的东西感兴趣，他翻出毛衣和网袋，网袋里有一捆胡萝卜，他从胡萝卜的下面拿出一样东西，握在手里，我看不清是什么东西。

“哈瑞是好人，他总是给人以安全感。并不是所有的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朋友都这样，但至少他们经常谈论这方面的事。我不止一次地想，父亲为什么不能像哈瑞和米盖一样？他为什么从

来不听取别人的意见而要一意孤行?”

我对伊瑞的谈吐和他愿意合作的态度感到有点出乎意料。是便衣警察挽救了他?还是因为他是屠宰场火灾的纵火谋杀犯?也许是便衣警察比我更加耐心细致地开导了他并理解了他。这情况只要去了解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是有一次,哈瑞参加了反对拿动物做试验的示威游行。”伊瑞像突然想起来似地说,“他还和我一起散发传单。那些穿得像小丑似的人起哄说,这个大男人急着想和狐狸精睡觉哇!”伊瑞笑了笑,“好像保护动物的事,女人有优先权似的。当我和父亲谈起哈瑞时,他也有这样的观念。他想测试哈瑞的政治观点,但哈瑞不跟他争辩,也许他怕父亲开除他。”

伊瑞又把手伸进了背包里。我发现他的内心起了一些变化,说话中流露出的满腔的激情仍然还在,不畏艰难的决心也没有动摇,但对于父亲的死,不可否认的对他这个儿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注意到在他绿色头发覆盖的额头下面那对眼睛依然炯炯有神,从那里再也看不到愤世嫉俗的神情。伊瑞的性格变了。我一时还来不及考虑,他是否不再仇恨我和那些为了和平而默默地做着贡献的人了。他打开背包口的扣襻,从里面拿出一只五升的油漆桶: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和父亲的死有关,但是……”伊瑞犹豫了一下把桶递给我。这是一只生了锈的油漆桶,桶上的色彩就和我曾在麦瑞瓦拉家的车库里看见的上面有立陶宛文的油漆桶一样,不过这个桶上的说明是俄文的,我除了字母什么也看不懂。桶的两侧涂上了油漆,被红油漆覆盖的死人头骷髅的有毒标记还隐约可见。我小心翼翼地拿着这只桶,就好像它要在我手里爆炸似的。

“这里面是什么？你在哪里找到的？”

“前年秋天在瑞兹盖尔岛上。那是九月初，哈瑞在那里观察鸟的秋季迁徙。

“哈瑞患了重感冒，腮腺肿大，米盖带他到大陆上去看医生。尤哈吩咐哈瑞休病假，周末过后再来上班。但哈瑞犹豫不决，因为他不想改变自己的考察计划。

“父亲直截了当地说，周末他有客人要来岛上，他不希望有人打扰。我不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星期天上午，米盖打电话来问我，想不想一起去送哈瑞到瑞兹盖尔岛上去？那天天气特别好，暖和得就像六月里一样。”

伊瑞跟着去了，因为米盖很快就要去冬季远航了。远远地，他们就辨认出在瑞兹盖尔岛的码头上有一艘五十年代的军用摩托艇。他们开始犹豫了，在尤哈·麦瑞瓦拉的客人离开之前，他们上岛去是否合适？他们沿着勃勒加拉岛慢慢地转了一大圈，然后才向瑞兹盖尔岛驶去。他们迎面遇到了那艘船上挂着立陶宛国旗的军用摩托艇。尤哈·麦瑞瓦拉很不高兴哈瑞提前回到岛上来。

“父亲醉得很厉害，他和客人一起喝了很多酒。厨房里堆满了俄罗斯的伏特加酒瓶。我想去把桑拿浴室的炉子点着。当我说要到桑拿浴室去时，父亲显得特别紧张。米盖问那里是不是有女人。父亲几乎是用手撑在地上跌跌爬爬地急着去了那里，然后他回来说，有一个老汉在桑拿浴室里吐得一塌糊涂，他要自己把那里打扫干净。我非常生气地一个人向海边走去，发现靠南边海岸的一小块草坪上有挖掘过的痕迹，不由得我开始想像每一个……”

伊瑞啃咬着指甲，显得很惭愧地说：

“我们家这个小庙，怎么盛得下大菩萨？！我毫无边际地想像着，如果在那里真有什么女人发生了伤天害理的事，或者她已经

死了，桑拿浴室里满地都是血，她就一定被埋在那块草坪下。我曾经看过一本书，那本书里就讲过这样的事情。我不是傻瓜，我马上想到他们为什么要把尸体埋到地下，而不把尸体抛到海里去——那样不是更容易吗？我先到桑拿浴室去检查，父亲没有撒谎，更衣室里确实有一摊臭气冲天的呕吐污秽。这么说，那里埋的就是其他见不得人的东西。我偷偷地把那块草坪挖开，但那里没有什么尸体，只有一堆生了锈的油漆罐和两只小的油漆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从中拿一只，把它埋到了西海岸的海滩上。也许这只是对父亲的惩罚。有时候我还在为自己的尸体想像感到惭愧，想彻底忘掉这件事。”

伊瑞有一段时间病了，一直到第二年的元月份，他才又去瑞兹盖尔岛。那时候，岩石上到处都覆盖着冰和雪。直到今年夏天，他才想起那些神秘的油漆罐，但一直没有机会把它们挖出来。八月的一个周末，也就是我们去到瑞兹盖尔岛上的那个周末，他挖开了那块小草坪，那些油漆罐都不见了。他找到了那只油漆桶。在一个周末，他把这只桶藏在他的睡袋里拿回了家。警察去搜查了两次都没有发现这只桶，是因为伊瑞把它埋在院子里的一块大石头底下了。

“我曾问过妈妈，父亲的那些立陶宛的合伙人是怎么回事。妈妈说，他们都是些财神爷，根本不管公司的油漆销售业务。我不知道该相信谁的。这油漆中有毒。哈瑞是不是发现了父亲的黑勾当？父母勾结一些俄罗斯人在暗地里低价出售有毒油漆，会不会为了这个原因，父亲杀害了哈瑞？”

伊瑞的脸上显出天真坦率的神情，就好像他是为了卸掉自己心头上的重负，才揭发了父亲的这些无法忍受的害人害己的不法行为：他毁坏生态环境，迫使那里的一切都改变了，其严重性就和导致两个人被杀害一样。

“哈瑞死的时候，你已经怀疑你父亲了吗?”我单刀直入的提问，使伊瑞直眨眼睛。他回避着我的目光，答道：

“那时候我怀疑过。哈瑞死的那天晚上，父亲不在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塔林出差去了。第二天早晨他七点钟回来时，手提袋里装满了香槟酒和鱼子酱，他说是为母亲过生日而买的，但我母亲从来不吃鱼子酱的！谁也没有在意父亲出差的次数，因为塔林的客户不断增加，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次。那天夜里他可能就潜伏到瑞兹盖尔岛上去了。”

“但你们的船……你妈妈肯定能看见，如果它不在的话。”

“去年秋天船都停泊在芬兰湾里，从今天春天开始父亲才靠到我们自己的岸上。”

我的头就像被人用针扎似地疼。油漆桶必须拿到犯罪技术鉴定科的化验室去。安奈·麦瑞瓦拉曾说过哈瑞的死给她精神上带来了很大的恐惧感，那就是说，她不相信哈瑞是自杀，而是谋杀？还是她知道哈瑞死的那天夜里，尤哈是在瑞兹盖尔岛上？

会不会是安奈为了报复尤哈杀害哈瑞，而杀害了她的丈夫？也许伊瑞最最害怕的就是他的父母双亲都是杀人犯。

“这个油漆桶可能有着非同寻常的特殊意义。这是麦瑞瓦拉公司那神秘的立陶宛的股权人的马脚。他们互相勾结着做什么黑买卖的可能性很大，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你父亲或你母亲参与了犯罪活动。”我很平静地说。

“全家人都是坏蛋，我也是。”伊瑞想表现得坚强一些，但他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慌，于是又赶紧把手伸到嘴里去咬手指甲。

“你妈妈怎么样?”

“她把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了，甚至连觉都不睡。夜里我常听到她在房间里踱步，喝菊花茶，但这也没有用；达甫

沙把自己的安眠药给她，但她没有要。芮佳不想再见到达甫沙了，也许她……”伊瑞又犹豫了，他看着我几乎是喊叫着说，“也许她认为是达甫沙杀害了父亲！她告诉了我达甫沙手腕上的伤痕，我认为这伤是他在桑拿浴室里打架留下的，但芮佳记得这伤那天晚上是没有的，而是第二天早晨才有的。”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懵了，什么油漆啦，死海鸟啦，解释不清的伤口啦，全都一股脑儿地拥了上来。我需要一个人安静一下。我对伊瑞撒谎说，五分钟后，我约好了有事情，我对他的合作表示感谢。当我和他握手告别时，他非常温顺地露出了微笑。

我把灯关了。天色阴沉暗淡。我躺倒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我想从头到脚地放松一下自己，可是思想怎么也倒腾不空，麦瑞瓦拉案子中的每一个人物和贝扎受过枪击的脸，就像发动机出了故障的旋转木马，不按节拍地在我脑海中显现。这样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时间已经是三点一刻了，我不能再为这些事情劳神了，必须回家去。我再稍躺一会儿，然后就起来……我刚打了一个盹儿，忽听到有轻轻的叩门声，接着，高依吾的头探了进来：

“对不起，你在午睡吗?”

“进来吧。”我疲倦地说。嘴里有股隔夜的口香糖味。

高依吾在我旁边坐下，我第一次发现他的眼角上出现了皱纹，看来小狗熊也不能永葆青春。

“我刚刚和阿奴一起审讯了塞娅·莎莱拉。”

“怎么样?”

“她对我们讲了一个小时关于她婚姻的悲惨遭遇。她二十岁的时候被迫结婚，男人除了钓鱼和喝酒外什么都不管。他们在八十年代中期离婚后不再来往，后只在儿子技校毕业时见过一面。莎莱拉对她的前夫一点都不在乎，所以她不可能为他而杀害尤哈·麦瑞瓦拉。”

我重新闭上眼睛。事情已经明确了，我认为是由于先前的船祸才导致塞娅和麦瑞瓦拉家交了朋友，虽然她有许多理由被怀疑为尤哈·麦瑞瓦拉的谋杀犯，但我一直没有完全肯定她是谋杀嫌疑犯。

“我和依冒宁的父母亲联系上了。猜猜看，当我说还记得他们死去的儿子时，他们高兴不高兴?”

“我不猜。”我坐正了身子。

“春天的时候，他们把儿子的电脑卖给了米盖·休白格。”高依吾看了我一眼，好像还要说些什么，但他却没有说。

“兰达”船舱里的手提式奥立凡特电脑，以前是哈瑞的电脑，为什么米盖不提这件事？也许他认为这样的事不值得一提，肯定他把哈瑞的信息资料的硬盘全部都清洗过一遍了。

我问高依吾信息资料的情况。他在哈瑞死后找到哈瑞的电脑时做过检查，但他记不起太多了。

“有一些鸟的分类。我对这些不是特别感兴趣，对我来说，只要能区别开喜鹊和乌鸦就行了。那里还说了环境污染的事，造成海鹰死亡的化肥和诸如此类的有毒物质。我认为这和瑞兹盖尔岛没有什么关系，但你可以问问休白格，依冒宁老夫人说，他把哈瑞·依冒宁的所有的旧软盘都买走了。”

16

我躺在温度只有摄氏七度的海水上仰泳，雨水不断地打在我的脸上。这时，整个大地都笼罩在黑暗中，只有桑拿浴室里亮着一盏灯。水是可以害人性命的，用水作皮下注射，只需半个小时人就一命呜呼了。我看着自己一对浮在水面上的又白又暖的乳房，它们再也不需要小心护理了，因为这里再也流不出孩子的口粮。我们的孩子正睡在桑拿浴室前面的摇篮里，呼吸着微寒的新鲜空气。

淹死的阿尔杜·阿勒道宁的父母亲曾经问过，从发现尸体的现场来看，他们的儿子是不是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后，才坠入海里去的？不过当他跳进海里的那一刹那改变主意——他想游上岸来时，却没有成功？我当时为了安慰他们，只好顺着他们说，但从现场来判断，阿尔杜在淹死前的确游了很长时间。

岸边木制的站台表面很光滑，现在已经被雨水打湿了。我猛地从水中一起身，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冻得我牙齿直打颤，鼻子里也流出了清鼻涕。我怎么也想像不出贝扎在扣动扳机时是怎么想的。自己枪杀要比淹死容易得多，但也残忍得多。后者总是要为后果担风险的，但是，贝扎在警校时是我们班上最优秀的射击手，所以他选择了这种死法。

我抓住木梯，两条手臂使很大的劲，才使我那充满活力的身

体升到了站台上。雨点无情地打在我的脸上，有种针刺般的疼痛，狂风像鞭子似地抽打着我的脊梁骨。我把脸转向大海，对着黑色的夜幕放声大哭，然后一头冲进暖和的桑拿浴室里去。

“那水里还能游泳吗?”安迪问。我把身体紧紧地趴在他的背上，从他的身体上吸收着桑拿浴的热量。他身上的汗水和我身上的咸味海水混合在一起，粘在我们两人的身上。冷的感觉从体内彻底驱散了，暖和的身子使我产生了要钻到他身子底下去的冲动。

我已经安排高依吾到米盖·休白格的“兰达”船上去取哈瑞的旧电脑，并吩咐布斯特亚勒威去找安奈·麦瑞瓦拉，约定星期一的谈话时间。然后我关掉手机，把它留在办公桌上后回家。局里没有我在英高的公公婆婆家的电话号码，只有高依吾知道，但这个周末对他也是休息日。

星期六整整一天都下着大雨，但这也不能阻止我们的活动。吃过中午饭，我们穿上雨衣，给依旦的推车罩上防雨套，就到附近的树林里去采蘑菇。在树林里一小块一小块的空地上，到处都长满了青苔。伞菌类的蘑菇很难找到。我沿着小路走到树林深处，看到不知道是哪个讨厌的家伙在地上扔了一个废弃的塑料袋，我把它捡起来，没想到却意外地在塑料袋下面发现了一片真正的伞菌类松菇。哈！蘑菇馅饼将出炉啰！

几乎一整天我都没有考虑工作中的事情，运气就特别地好。最大的收获是从依旦那里得到的，她的说话能力提高了，使我们惊喜不已。迄今为止，她都只说单字句，偶尔说一个两字句，但从今天开始，她可以说三字句了：“依拉吃饭”，“妈妈给奶”，我和安迪一起就像听诗人的小节诗一样高兴得心花怒放。依旦的一举一动都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最先是微笑，随后是爬、站起来，迈步走。我们经常整小时、整小时地盯着她那天真快乐的

脸蛋看个没完。我们虽然没有把这一切用录像机和照相机拍录下来，但这一切会永远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洗完桑拿浴，我打开电视机，四频道正在演神秘的谋杀案，这又要勾起我工作中的事情，我赶紧把电视机关了。

安迪已经睡着了，在我背后发出均匀的呼气声。我还可以听见依旦那轻微的鼻息声。我躺在床上没有一点睡意，静静地听着窗外大海的咆哮声。闹钟嘀嗒嘀嗒地已经走到了十二点半了，我决定起床到外面去走走。我穿上三件衣服外加一件雨披，这时温度表上显示的气温是摄氏一度。

风刮得又紧又冷。我爬上高高的海滨便道，几百米之遥的沙盖拉灯塔矗立在陡峭的崖壁上，它下面是一片看不到边的汪洋大海。西边的光亮处是英高发电站的双塔。东边是勃勒加拉半岛上的一片闪烁的灯光。大海和狂风作着顽强的斗争，它像和自己过不去似地不断地卷起大浪往海岸的岩石上撞。这可以使海里的绿色的藻类植物荡然无存，也可以称为是每年一次的冬季大扫除。去年十二月份我们也来过英高。那时夜里海面都结了冰，大海就像一头被驯服的动物在笼子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当冰层裂开时，可以听到令人愉快的砰砰声，就好像冬天是一个胜利者，正在骄傲地打开香槟酒的瓶盖。

我想到，尤哈·麦瑞瓦拉就在两个星期前死在了瑞兹盖尔岛的海滩上，那天夜里可能和今天一样，也是一个狂风暴雨之夜。会不会是尤哈也睡不着觉出去走走时，碰到了杀人凶手？我又想到米盖·休白格，他此时正睡在停泊在芬兰湾里的“兰达”船上。要不是他被扣留，也许现在已经在丹麦的西海岸上了。南风掀起海浪摔得啪啪地响，激起一股股白色的泡沫，它想把我也刮走，我伸开双臂把雨披撑得像翼翅，暴风雨像电流似地流进里面。如同晚上在海里游泳时那样，我又一次感到自己还活着，我有着结

实的肌肉、柔软的腰肢和浓稠的热血。我走回别墅，躺下后很快就沉入到深深的睡梦中去了。

晨报上刊登了尤哈·麦瑞瓦拉的讣告，通知送葬的人下星期天都要到来。安奈的悼文写得非常简短，并且不带任何个人感情。从这里可以看出，她实在是没有时间操办这件事情。可能她是让秘书鲍拉·莎尼奥起草的这篇悼文，而莎尼奥又是从赞美诗中抄了一段。这段赞美诗的大概意思是，没有什么地方会发生暴虐死亡。

是不是把贝扎的葬礼也安排在同一个周末？我不敢想像他那可怕的葬礼，因为参加那种仪式是很难控制住自己悲痛的感情的。我记得两年前，为我们科里的高级警察尤哈尼·巴洛送葬时，在领导讲话前我和贝扎还躲在角落里偷偷地说笑。但当领导说到巴洛的生平时，那历历往事就催人泪下了。我还记得在教堂里，贝扎坐在我旁边，在祈祷讲道时，他是如何抑制自己的感情而不断地咽口水。尽管贝扎在遗书里怀疑，局里的人不会为他悲伤，但我会哭的，肯定要哭的。当贝扎的东西从办公室里搬走时，我看到赖岱脸上也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贝扎的死折磨着布包宁和高依吾，因为他们以前很讨厌斯切姆，所以他们很容易谴责自己促使贝扎自杀。相互不了解，当然就不能配合默契。感到压力最大的是赖岱，他总是没完没了地谴责自己，如果他能在电话中说些什么，可能就会改变贝扎的决定。谢天谢地贝扎没有给我打电话。我知道，一旦下定决心要自杀的人是很难劝阻的，尤其是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我从不相信周围的流言飞语。在我休妈妈假前不久，发生了这么一个案子，有一个女人手持打猎用的来福步枪要枪杀她以前的情人，她怀疑这个男人谋杀了她的女儿。最终这个女人用很残酷的手段把男人杀死了。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案子会判无罪。记事是人的本能，但警

察的职能又要求我要学会忘记不愉快的事，我害怕自己这样又要被反对派嘲笑了。

安迪发觉我的脸颊湿了，把我拉到他跟前，好在他没有说什么。暴风雨过去了。太阳重新控制了整个世界。树林里清新的空气中有着浓厚的秋天的气息。白天我们把树叶耙成一大堆，然后趴倒在树叶堆上玩耍。看到依旦那宝蓝色的眼睛在红色的枫叶下闪闪发亮，什么悲伤都没有了。

星期一早晨又遭到了真正的"攻击"。桌子上的传真堆得像座山，周末发生的打架斗殴事件，受害者仍旧躺在约威的医院里。沙吾伽发生持刀行凶案。基罗发生枪击案。最上面的一份传真是哈帕沙卢警察局发来的，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女经济师哈达娅和她的男友道马斯去到盼望已久的百乐奴高级夜总会里寻欢作乐，女的因为没有达到快感而大发脾气。不过两人都平安无事。

这消息在晨会上引起了一阵嘻嘻哈哈的戏谑声和咚咚咚的踏脚声。但这种高兴的情景让人感到有些不自然，因为这里缺少了贝扎，大家的心情还是很沉重的。为了工作起见，我不得不把贝扎的案子分派给别人，比如基罗的枪击案，本来是铁板钉钉地分配给斯切姆的，因为他是我们科里最棒的枪击犯罪侦探专家。我在想，麦瑞瓦拉公司的全体员工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总不能忘掉总经理被谋杀，以及他的妻子——也就是以前的公关部经理是一个主要的嫌疑犯？

"高依吾，你拿到哈瑞·依冒宁的旧电脑了吗?"当我们最后讨论麦瑞瓦拉案件时，我问。

"拿到了。休白格说那里面除了他的航海计划外，没有别的。他消除了依冒宁的所有的情报资料，无论是硬盘还是软盘。检查这些软盘花了我半个晚上。"

“现在电脑在哪里?”

“我把它和所有的软盘都拿到经济科的电脑专家那里去了，并按你的吩咐要他们检查。休白格特别强调硬盘上的结构形式。看吧，从那里能得到什么情报。”高依吾耸耸肩膀。他不是电脑迷，所以从来不玩电脑游戏，也不热衷于网络上的色情网页。

“当你要电脑时，休白格的反应如何?”

“他很吃惊地说，并非我们所想像的那样，里面可能保留着什么有价值的情报，譬如依冒宁对瑞兹盖尔岛上的鸟类作的考察报告。他问，去取电脑是不是想证明哈瑞·依冒宁也是被谋杀的?我要他直接问你。”

高依吾的表情模棱两可的。

“谢谢。布斯特亚勒威，我和安奈·麦瑞瓦拉谈话的时间约好了吗?”

“下午两点在公司的办公楼里。”

会议结束的时候，布包宁问我，由谁来顶替斯切姆的工作?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就不让我喘口气。”我夸大其词地说。周末这些令人头痛的案子是一个有力的依据，要求局里赶快增加人手。我的观点是，不要找内部的人，可以通过国际网络招聘立志于当警察的人。

我回到办公室后极想知道应聘的情况，就立即打开了电脑。还真有几个应聘的人，其中有一个是我上法律系时的同学马库思·胡都宁，他是学特殊犯罪法的。他一直在万达检察院担任助理公诉人，是什么原因驱使他想改行当警察呢?另外还有两位应聘者的条件也不错。我得和人事科的人约好，一起进行面试。

传真堆里有一份是立陶宛警察局发来的，贝德斯和拉马那斯加斯曾在前苏联的海军后勤部工作，负责产品开发，他们有几个

特殊的部门是搞油漆的，自然而然地和麦瑞瓦拉公司有联系。这两个人目前的地址还没有搞清楚。尼斯方面告知说，他们在两个星期前到高西加和沙底尼亚去航海了。他们俩只不过是前苏联海军后勤部的一个普通官员，哪来这么多钱可以如此挥霍无度？

我给达毕奥·浩勒玛打电话，家里的电话没人接，我就给他打手机，他接了。电话里吵吵啦啦的杂音很大，还可以听到海鸥的呱呱叫声。

“我们可以谈谈吗？”

“现在不行，我在爱尔夫维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猬尾鸟。”

“猬尾鸟？”我知道的那些鸟的名字都是那个喉节突出的、淡黄头发的瘦高个子的男人告诉我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看见过真正的猬尾鸟，我不想打扰你的雅兴，但我们必须谈些事情。我能不能到爱尔夫维基来看猬尾鸟？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你？”

“是不是一定要谈？”浩勒玛扫兴地说，“那好，请吧！这里很潮湿，你最好穿上雨靴。”

我很幸运在储藏室里找到了一双大两码的雨靴，我穿着这双雨靴就可以踩到爱尔夫维基的大院里去了。乍听到这个地名，使我回忆起我和安迪的罗曼史来，我们的婚礼就是在那里举行的。那时候是十二月，树上都是些光秃秃的干树枝。现在树上的枝叶稀稀拉拉的像网似的，一部分已经掉了。那些小路看上去就像黄瓜上抹了西红柿酱似的粘粘糊糊。

爱尔夫维基那泥泞的空地上站着许多鸟迷，达毕奥·浩勒玛并没有站在前面显眼的地方，我只好挤在人群中找他。浩勒玛有一架很昂贵的望远镜，我很费劲地踩着泥泞的土路，小心翼翼地走到了他身旁。猬尾鸟群就在一百米远的地方，不用望远镜也能看见。浩勒玛的背上背着一个包，我能看见在背包的一侧装了一

只保温瓶，这可能是一个魔法包，能变出许多他想要的东西。

“嗨！”我亲切地向他招呼道。他吓了一跳。

“嗨！你看这儿有多美，从望远镜里看，可以看得更清楚。”浩勒玛把三角支架调到我的高度，我调节了一下距离。哈！看得可清楚了。那群鸟中有一些是纯白色的，背上带一点点黑色的花纹；有一些则是赏心悦目的棕色。那些漂亮的白鸟肯定是雄鸟，在鸟类王国里总是这样的。我曾经和哈瑞开玩笑说，男人们之所以爱好鸟类学，是因为雄鸟的羽毛有装饰功能，他们都想从中得到一些安慰。

“我的事情也涉及到鸟。”我说。要是我有时间的话，我也想安安静静地沉浸在猬尾鸟的欣赏中，完全不去受一环道和西环道上的噪音干扰。“你说过你不认识哈瑞·依冒宁，但是，你们却都是同一个‘战胜’鸟类协会的成员。”

浩勒玛转身看着远方的海湾，眼睛里闪过一丝慌张的神色。

“是吗？可我确实不认识他。我虽然是‘战胜’鸟类协会的会员，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活动，尤其是有危害性的活动。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德国度过的。”

“这是事实。但你们俩都是有十年会龄的老会员，哈瑞还是一个在鸟类学圈内的知名人士。你现在想起来了吗？”

一只白色的雄性猬尾鸟突然展翅向海边飞去，达甫沙赶快调节望远镜追随着它观看。

“嘴部形状特别好看。你要看吗？”

“谢谢，不必了。星期五我见到了伊瑞·麦瑞瓦拉。他说，你和芮佳的关系结束了。芮佳抛弃你，是因为她怀疑是你杀害了她的父亲。”

望远镜从浩勒玛的手里掉下去，还好，他用脚接住了。他抬眼看我的时候，他的脸上不再像男孩似地那般天真了。

“伊瑞在胡说八道。我们的关系中断了，谈不上谁抛弃谁，也不是受尤哈·麦瑞瓦拉死的影响。伊瑞当然希望我是谋杀尤哈的罪犯，而不是他母亲或者米盖。”

达毕奥·浩勒玛弯腰拾起望远镜，举到眼睛前看。一只白色的雄鸟和一只灰黑色的雌鸟在蓝色的天空中比翼双飞，当它们飞向岸边一片深黄色的树林时，它们的羽毛的色彩把蓝天点缀得更加美丽了。

“秋天观察鸟的迁徙是头等重要的事。夏天，它们的叫声一只比一只响，谁都想把别的鸟的声音压过。到了十月份，那些雌鸟的叫声听起来就像小夜曲一样悦耳。”浩勒玛轻声地说道，“当然，春季的迁徙也是振奋人心的时刻，那时候的世界里充满了鸟语花香，但比较起来，我还是对秋季的迁徙兴趣浓厚些。”

“芮佳结束你们的关系到底是为了什么？”

浩勒玛把望远镜转向我，这个动作完全像小孩子的恶作剧，我把望远镜推向一边——等他回答时，我想看清楚他的面部表情。

“这还不容易猜测吗？她嫌我年纪大呗！不过她也害怕我声带恢复后把她抛弃。医生们一致认为手术保证会成功，明年春天时，我的声音就会和以前一样。但我自己还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再回到那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去？那里是弱肉强食的地方，有人总是蛮横无理地霸占角色。塞娅·莎莱拉说我的声带失声是因为我主观上已经厌倦了唱歌生涯。也许她说得对。”

浩勒玛又理了一下头发，这个动作显得很沉重：

“我一直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关系是不可能无止境地延续下去的。二十岁的年龄差距是大了一点，我自己也不喜欢。但芮佳确实是一个没有性经验的处女，她以前从来没有和男人发生过关系。我现在说的意思不是我占了她处女身的便宜，但几乎……”

浩勒玛兴奋得脸都红了，“在苏珊娜之后，芮佳是惟一能使我有新鲜感和特殊快感的女人，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学校里的小男生似的……”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爱情能使人返老还童。你决定去那里做手术吗?”

“去，只要警察同意，我马上就去加利福尼亚。”

我猜不透浩勒玛是不是在执行一项罪恶的复仇计划：由于哈瑞的原因，他才潜伏进麦瑞瓦拉家中。但我现在还不能排除他的谋杀犯嫌疑，所以不能放他走。也许他在夜里还会去找芮佳求欢。

“我听说发生谋杀案的那天夜里，你的手臂受了伤，能让我看看吗?”

浩勒玛生气地瞪了我一眼后，才把胳膊举起来，上面有一道像铅笔画的黑痕，已经不像是伤口了。

“这是芮佳告诉你的吧！有些事情不能完全相信她的。这黑痕是在桑拿浴室里尤哈用长柄的舀水勺子打我时留下的。”

“芮佳说当你们刚刚睡下做爱时还没有呢!”

“芮佳没注意，我不喜欢吹毛求疵，再说那时候房间里很黑。”

“你说的话和她说的话是互相矛盾的。”

“就这么件事，到现在还没完没了吗?”浩勒玛很不痛快地问。他又举起望远镜看。我没有回答，只头也不回地向前走进深深的草丛里，向海湾眺望。十月末能在爱尔夫维基的沼泽地上晒着太阳观看鸟，无忧无虑地度过一天，确实是令人愉快的。但我的手机的嘀嘀声又把我从遐想中拉回到现实中来。在北达毕奥拉因打架斗殴被拘留的一个成年男子，高依吾想要找他的母亲来作担保。我马上又回到局里去了。在警察局的停车场里，我撞上了

达斯基宁。

“周末过得好吗?”他很严肃地问。也许他还记得星期五我在有关乱涂乱写的问题会议上发脾气的事。

“至少做到了不考虑工作中的事。”

我们不约而同地推开了走廊的门。我闻到达斯基宁的身上还留有剃须膏的香味。他趁机在我的手臂上捏了一把。早先我对他的这种表示亲昵的举动满不在乎，后来我才开始受到良心的谴责；尤其是当我意识到一个巴掌拍不响时，更觉得有一种犯罪感。我渐渐地学会了若即若离的方法，这种态度就像吊人胃口的礼物一样。

“斯切姆的哥哥昨天打来电话，他也给你打了，但是没有打通。”

“我的手机关了。”我心存戒备地说。

“他们决定遵照贝蒂的遗嘱举行一个小型的葬礼，但希望一起工作的同事来参加。他哥哥的心脏不好，他爸爸又病得厉害，因此，他们请求同事们为他抬灵柩，因为贝蒂没有什么朋友。书面的邀请函周末会送来。”

“看吧，有一些人要值班，我问问他们谁愿意去。赖岱和技术员黑沃宁肯定要去，他们是酒桌朋友。葬礼是不是安排在下个周末?”

“再下一个周末。抬灵柩的人算我一个，看看还有谁来和我合作。”

电梯在我那层楼停下了，达斯基宁一直让门开着，我们就这样一个在电梯里一个在电梯外地谈论着工作安排的事项，直到有人大声吼叫要用电梯为止。

我的桌子上有高西加发来的传真，贝德斯和拉马那斯加斯出现在了卡尔卫的客船码头上。当地的警察想知道，等他们找到德

语翻译后需要问他们一些什么问题。我的思想马上飞到了高西加，那里一定还是夏天。接着我用英文列了一份要问的问题，我凝视着这些问题想，这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高西加的警察先要把它们翻成法文，然后再翻成德文。我想就以下问题得到简单扼要的答复：为什么要建立马来·诺斯曲姆公司？它经营什么？同时我把伊瑞找到的油漆桶上的商标复印了以后传过去，要他们问问贝德斯和拉马那斯加斯，关于这种油漆他们知道些什么？

我来不及吃午饭，就按约定准时去会见安奈·麦瑞瓦拉，我满心希望她能再请我喝茶、吃胡萝卜软饼。我感到自己的血糖很低，这样开车是很危险的，就冒着迟到的威胁，先到埃司堡市中心的小卖部买了一块巧克力。等我赶到的他们办公楼时，已经是两点零四分了。秘书鲍拉·莎尼奥正站在门厅里等我，随后把我带到了楼上去。

“安奈·麦瑞瓦拉还在和她的律师谈话，请你再等一刻钟。你喝茶吗?”

我当然说，喝，谢谢。看来鲍拉·莎尼奥是遵命来陪我的，因为她的桌子上放着两只杯子、两份菠菜馅饼。我毫不客气地往嘴里塞了一大块饼，然后才想起来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问问她，作为尤哈·麦瑞瓦拉的秘书，关于贝德斯和拉马那斯加斯知道些什么。

“啊，他们是尤哈的立陶宛的合伙人，但从来没有给他们分过红利。”鲍拉·莎尼奥的表情显得很得意，“我和海基，就是经济经理哈罗宁议论过多次，因为去年麦瑞瓦拉公司给股东分红利时，马来·诺斯曲姆的那份红利一直没人来领。”

“你当然知道哪些人是马来·诺斯曲姆公司的股东，另外还有经济经理哈罗宁和安奈·麦瑞瓦拉也知道。”我以不容辩驳的口气说，鲍拉·莎尼奥吃惊地看了我一眼。

“在我来这里工作之前，他们的股份交易已经完成了。但我还是知道，这是事实。我是在一次老主顾的招待会后，从尤哈的嘴里知道这件事的。那天，先是由安奈和尤哈在招待会上介绍公司的生态产品的宏伟计划，然后招待老主顾们大吃大喝了一顿，直到一个个吃得晕头转向。安奈那天有点发烧，提前回家去了。尤哈要我和他一起喝干瓶子里的甜酒。他举杯祝酒，笑着说，如果这些老主顾们知道这整个生态产品开发出来的钱都流到了另一个油漆公司的钱库里去的话，他们的表情会马上有所变化的。随后他感到自己说漏了嘴，又赶紧补充说，这不是他的企图，而是他父亲的愿望。”

鲍拉·莎尼奥直起背，靠到椅背上，把两条长腿交叉起来。她那条白垩色的条纹裤子熨得笔挺，让人无可挑剔。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前苏联的油漆公司是在马丁·麦瑞瓦拉在世时建立的，他们生产的那些油漆里含有大量的铅，用这种油漆涂抹的船底能保持清洁。那时候我收到过一份传真，但尤哈不通过传真作答复，而是直接去和拉马那斯加斯面谈。接着，星期六就来了一辆大卡车。当尤哈发觉我已看过传真时，他的心思就有些让人难以琢磨。最后他说，这只是一个股东公司的买卖。几次折腾后，他还是想把马来·诺斯曲姆公司持有的麦瑞瓦拉公司的股份买回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怀疑，麦瑞瓦拉公司的股份卖给马来·诺斯曲姆公司是一个骗局。”

我眨了眨眼睛，我多么希望冈代立宁现在能和我在一起啊。

“骗局？怎么解释？”

“九十年代初，公司需要追加资本，但尤哈又不想把股份卖给外人。马来·诺斯曲姆可能是一个黑公司，贝德斯和拉马那斯加斯就像其他的股东一样付给尤哈一大笔钱。”

这时，总经理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安奈·麦瑞瓦拉出来送客。从里面走出来的是一位灰白头发的绅士，穿了一身高级的三件套的西装，手腕上带着一只24K金的手表。安奈显然是哭过了。

“请再稍等一会儿。”她抱歉地对我说，然后要鲍拉·莎尼奥把律师黑基拉送出去。我希望莎尼奥能赶在安奈前回来。但安奈给脸补妆只用了一分钟。当她重新出现时，脸上哭过的痕迹已经没有了。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有什么新情况吗？”

“很多。例如这些马来·诺斯曲姆公司的股东名字，你丈夫尤哈是大股东。你能解释清楚你对这件事一点也不知道吗？”

“我能。”安奈佯装镇定地回答道，但她脸上的肌肉颤抖了一下，“还有很多事情我被蒙在鼓里，例如这艘船的钱已经全部付清了，但尤哈告诉我一半是贷款。去年秋天，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他就到保险公司去，根据病史的极限投了一个很贵的人寿保险，这就好像他有预感他将不久于人世似的。”

“这么说，这艘船是在尤哈的名下，而不是在公司的名下？”我紧接着问，因为安奈的眼睛里已经蓄满了泪水。

“它在我的名下。我真的不知道是用什么钱付的账，我们还没有……”

“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公司里肯定有很多事情像你所说的那样。你准备把这个公司怎么处理？卖掉？”

“我还不知道。我是想卖掉，但不知道芮佳和伊瑞是不是想继续保留他们的股权。尤哈是不希望我们卖的，所以他投了这么贵的人寿保险。我想请米盖考虑一下出任总经理的事，但我知道这是白搭。海基·哈罗宁对此倒挺感兴趣，但我信不过他。”

“那么你准备怎么办呢？”

安奈无可奈何地微笑了一下：

“现在我还没有太多的想法。有一天我曾和塞娅说起这事，她建议我在瑞兹盖尔岛上办一个学习中心，可以开设一些课程，例如开设石头学课程，她可以来任教。我有一个朋友可以开设营养学课程，另外还可以开其他的课程。瑞兹盖尔岛是一块风水宝地，那里会吸引很多退休的老人。我不相信塞娅的那些咒语的功能，只是想在尤哈死后，到那岛上去过一种安定宁静的生活。”

我正用叉子挑起第二块馅饼时，一只乌鸦突然扇动着翅膀从大窗户前飞过，安奈吓了一大跳。我把手伸进裤袋，摸着在瑞兹盖尔岛上捡的红花岗岩石子和塞娅·莎莱拉给我的紫晶石，但它们对我下面的提问并没有带来一丁点帮助。

“你究竟是害怕尤哈是杀害哈瑞·依冒宁的凶手，还是你已经知道了事实的真相?”

“不!”安奈吓得跷起的二郎腿“砰”地一声碰撞到桌子边上，桌子上的茶杯晃得咣当响。“我只是害怕那一次如果不是哈瑞掉下去摔死在瑞兹盖尔岛的岩石上，那就有可能是我们中间的哪个人。”

我不相信，我要求安奈说说清楚，他们到底是怎样发现哈瑞的尸体的。安奈说我已经看过审讯记录了，所以对案情的来龙去脉已经了解得十分清楚了。对她来说，回忆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不想对她施加压力，只是对她说，等她想说的时候可以到警察局里去说，那里有证人在场，还要作磁带录音。我使的这个雕虫小计居然奏效了，安奈开始说话了：

尤哈早晨从塔林回来，他说会议开得很激烈，所以他感到很疲劳。安奈从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和不停颤抖的手，可以想像到他们谈判完后又喝醉酒了。因此她建议说，不要到瑞兹盖尔岛去了，就在家里给她过生日算了。但尤哈坚持要到岛上去，因为他们俩很少有机会聚到一起的。尤哈好像有海鬼勾魂似地非要到瑞

兹盖尔岛上去，使安奈感到很不安，可尤哈并不以为然。

登上岛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异样。当他们走进厨房发现哈瑞的东西时，才大吃一惊。尤哈很不高兴地说，哈瑞明明知道他们俩要在周末来这里过二人世界，还故意来凑热闹。他们先在房子里大声喊哈瑞的名字，没有人答应，他们就到外面悬崖上去找。尤哈发现了尸体，他命令安奈呆在哈瑞旁边不要走开——要她面对着死人，这对安奈来说确实是件可怕的事。尤哈想抢救哈瑞，但已经晚了。

“我躲进一个避风雨的岩洞，我可不敢在那里坐在岩石上定定地看着尸体。尤哈给警察打了电话，并盖上了尸体。”

“当尤哈发现尸体时，他的反应如何?”

“这我说不上，因为我自己已经是吓得六神无主了。但看得出尤哈还是能理智地处理这一切。在我们订婚时期，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不害怕死，因为他的整个童年都是看着自己的母亲渐渐地走向死亡。这结果使他能从容地面对死亡，对其他的一切都无所谓了。他第一次犯心脏病，恰好在哈瑞的葬礼前。”

这肯定是一个狡猾的诡计，他自己假装发现尸体，有见证人在场作证。做抢救的假相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释疑点，如果从尸体上发现他衣服的纤维或他的头发，都可以说是因为抢救所致。对这件事没有什么可提问的了。

“尤哈是一个人去塔林出差的吗？他在那里和谁会谈?”

安奈说不知道，她要我问鲍拉·莎尼奥。我心里暗暗祈祷说，这趟出差已经过去一年多了，那天夜班游轮上的花名册不可能再找到，希望莎尼奥还保留着订票的凭据和会谈的记录。安奈把莎尼奥叫来，要她找出一年前的出差记录。

“会谈的日期可以从旧日历上找到，船票的收据要到会计那里去找。等一等，让我再查看一下，我要到尤哈的办公室里去找

一找，不打扰你们吧！”

“你们是不是确实认为尤哈是杀害哈瑞的凶手？”当鲍拉关上门后，安奈小声地问。我没有回答。她又接着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怀疑哈瑞是自杀吗？这都是由加曲娜告诉我的事情引起的。米盖把哈瑞送到瑞兹盖尔岛上后，就到阿维南马群岛去向妈妈道别，然后就去远航了。哈瑞从岛上给加曲娜打电话，要求和米盖通话，可是加曲娜转眼就把这件事忘了。哈瑞死的时候，加曲娜记得米盖那时已经在丹麦的海域上了。加曲娜说从电话里听出哈瑞有十分紧急的事，他虽然没有告诉加曲娜是什么事情，但加曲娜知道他肯定遇到什么麻烦了。也许她也怀疑哈瑞是自杀，所以自责是不是因为她忘了电话的缘故。”

安奈的话说得颠三倒四，就好像她想开脱尤哈对哈瑞的死应负的罪责，但又力不从心。这件事我必须还要去找加曲娜·休白格谈。不知早晨的班机是几点钟开往马里安哈米纳？[①] 也可以乘高西加的班机中途下来。如果有谁能带我去“找对象旅游”[②] 就好了。我脑子迅速地转动着，思想就像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兔子似的。过了一会儿，鲍拉·莎尼奥尴尬地出现在门口：

“这里没有找到去年十月三日在塔林的谈判记录，也没有船票。安奈，你是不是肯定在那里有过会谈？”

“是的，尤哈乘的是夜里的船，还买回了香槟酒和鱼子酱。”安奈说，但她的语气不是很坚决。我看到安奈的手有点隐隐发抖，或许安奈知道尤哈杀害了哈瑞，或许她已经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安奈虽然能忍受尤哈的其他女人，但她决不能忍受她的

---

① 这是阿维南马群岛的一个主要的大城市。

② 芬兰电视台安排了一个找对象节目，找上对象后，两个人可以得免费机票去旅游。如果找上的对象不愿意跟他同去，那么他可以在社会上找一个愿意和他一起去旅游的人。

丈夫在麦瑞瓦拉公司无可指责的经营表面现象下，隐藏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难道当她知道了这个家庭公司把含铅的油漆卖给立陶宛，她就对尤哈动了杀机？

我还是不太明白伊瑞找的这只油漆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决定暂时停止无的放矢，必须先去落实飞机票到马里安哈米纳去。当我听到早班机是七点二十分起飞时，我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娘。因为我要赶这班飞机，就必须在六点钟前起床。但考虑到只有这么早赶去，才可以把加曲娜·休白格堵在家里——这就是最大的回报，于是我就定了票，又订了租车，要求等在马里安哈米纳机场。我刚刚安排好出差的事，犯罪技术科的化验室来电话了：

"油漆的化验我们已经做完了，现在想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

我说还不知道，但我怀疑是从前苏联的船舶管理局来的。

"我们是第一次搞这种检测，测出其中的基本元素是三丁基氯化锡。"犯罪技术科的化学家尼尼马高兴地说。

"三丁基氯化锡？这是什么东西？"

"有机锡化合物。用它涂在船底就可以防止脏东西吸附在船底上。"

"这真他妈的操蛋！"我骂得那么肆无忌惮，以至于尼尼马惊讶地问：

"不是这个道理吗？"

"道理很正确。这种原料是不是被禁止使用的？"

"1988 年赫尔辛基协定规定，该原料禁止用于油漆中。但此后，在前苏联仍使用三丁基氯化锡。"

"有什么影响？简短一点说。"

"没有做过更多的调查，据已经观察到的有雄性雌性化倾向。

从大马哈鱼的解剖来看，血液和肝脏的新陈代谢改变了，眼睛也改变了。如果含量大的话，大马哈鱼的鱼子要受破坏。海贝死亡已有报告显示，如果鸟类吃了这些有毒的海贝，那么它们的免疫组织就要遭到破坏。这种有害物质在水里的有效期是三个月。”

我在心里又默默地念叨，现在是多么紧急的时刻啊！伊瑞说过的那些油漆罐，是不是这些罐中的三丁基氯化锡污染了水域，才造成了持久性的破坏？

我想到死海蟹和哈瑞的手提式奥立凡特电脑里的资料，立即要求尼尼马做紧急检查。我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情报，到底是在岛的哪一边的海水里有毒，所以还不能贸然派那些身价很高的潜水员去瑞兹盖尔岛。

我给米盖·休白格打电话，又没有打通。我就给始终在哈瑞的电脑上不辞辛苦地工作的检查侦破员打电话，他气急败坏地接过电话道：“这里正忙着呢！电脑现在的主人说，他的资料都在硬盘上。我不能保证以前的资料都可以得到补救，但我会尽力而为。这里还有许多其他的案子，就好像梅瑞达银行的取款机前，等着解决燃眉之急的取款人似的。”

“我知道。”我毫不同情地说。因为我们局里的每一个人都在马不停蹄地埋头苦干。所以，我也甭想能找到什么人和我一起到阿维南马群岛去。一个萝卜一个坑，谁也脱不了身。如果我进行正式审讯时需要证人的话，那就只好请当地迪格贝的警察帮忙了。

我把开晨会的事委托给赖岱，顺便又问他在为贝扎送葬时，愿不愿意为贝扎抬灵柩。平时我和他之间是没有废话的公事公办的关系。因为他是贝扎的知心朋友，贝扎对他是无话不谈的，即使是贝扎心里最隐秘的心事也会告诉他，例如，他认为科长的任命搞错了人选。可没想到赖岱说出的话把我噎得半天喘不过气

来。他说：

“呀哈，抬灵柩。我这才明白斯切姆说的话。”

“他说什么了？”

“银行他妈的都叫女人霸占上了，这应该都是男人的工作。”赖岱毫不留情地说。

“好吧！我来抬，只要扛抬的另一端能找到和我一样高的人就行。”我说完就跑回自己的办公室去，因为我听见电话铃已经响了好几声了，就在留言器要启动的千钧一发之际，我抓起了听筒。

“我是布斯特亚勒威。嗨！我已经找到鸟的尸体了。”

“太好了！在什么地方？”

“南埃司堡海湾。但这不是谋杀，是自然死亡。”

傻瓜一个，我受骗了。只要尤哈·麦瑞瓦拉没有造成环保毁灭性的灾难，这就是万幸。

“从依冒宁的资料里还找到了另一种尸体。”布斯特亚勒威继续说，“一条非常漂亮的大马哈鱼，它的肝脏、血液循环和眼睛都改变了。引起这种改变的元素是……”

“我知道，三丁基氯化锡。”

17

当赫尔辛基到土尔库的航班起飞时，整个城市还浸没在黑暗里。出租汽车六点半来到家门口时，安迪和依旦还在睡梦中。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五度，这是一个早到的冬天。

由于一早要出门，所以，我昨天晚上用家里的电话把工作中的事情一一都做了安排。依旦的两条裤腿拖在地上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我一边帮她提裤子，一边与高西加警察局的朋友通话，他说的十个英文单词，我费尽心机才猜透是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他们把贝德斯和拉马那斯加斯带到卡尔卫警察局受审时，他们俩暴跳如雷。他们承认是马来·诺斯曲姆公司的股东，这个公司是有麦瑞瓦拉公司的股权，但这不犯法。他们对尤哈·麦瑞瓦拉的死感到十分震惊。他们经营的马来·诺斯曲姆公司的业务是试着把油漆从芬兰出口到巴底亚，但是出口业务还没有走上正轨。前几年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做纸张贸易。尤哈·麦瑞瓦拉要买这两个立陶宛人的股份，等他俩下一次到芬兰去时就可以签定交易意向书。

高西加的警察释放了贝德斯和拉马那斯加斯。星期六，也就是十月四日，他俩和法国朋友、摩纳哥朋友一起在安格拉斯海滨游乐场旁边的一家尼斯人的饭店里吃晚饭，这有很多见证人。

“安迪，把依旦抱走！”这是我对安迪说第六遍了，因为这孩

子一趟一趟地跑到我身边大喊大叫，害得高西加的警察听不清我的话。最后我向他要了这两个立陶宛人的船上的电话号码。

安迪正在厨房里发出叮叮咣咣的声音，依旦突然爆发出吓人的哭喊声，原来是安迪不让她乱动做面包的面团。我赶紧把电话挂了走进厨房，依旦的脸上还挂着泪水，但她已经在随心所欲地捏小面人了。

“你下班回家后的任务就是看好孩子。”安迪生气地说。他自己也弄得脸上和胡茬上都是面粉。

“是，是。但这些事情必须在明天早晨走之前都安排好，我还有一个需要检查的电话，然后就照看依旦。”

我又给米盖·休白格打电话，还是打不通。最后我就要求巡警开车到芬兰湾海港码头去察看“兰达”船是否还在那里。巡警检查的结果是，“兰达”船正停泊在码头上，船舱里还亮着灯。我马上联想到冷漠孤寂的米盖，这会儿也许正躲在船上黑暗的角落里哀声叹气。但我不能老是凭自己的主观想像来猜测他。

透过云层可以看见土尔库城市的灯光了。当飞机降落的时候，我肚子里又像翻江倒海似地难受，浑身冒着虚汗，飞机上供应的像刷锅水似的咖啡被吐了出来。

东方渐渐亮起了曙光，但马里安哈米纳的班机继续向黑暗的方向飞去。灰蒙蒙的大海风平浪静，大大小小的岛屿上呈现出色彩鲜艳的金黄色和鲜红色，好像世界正抓住这最后的一刻在装扮着自己。接踵而来的将是枯萎的棕色和洗净世界的一片白色。安迪和依旦这时候该在煮稀饭了。我的心又感到一阵内疚不安，为什么我要坐在这架飞机上？身旁没有一个亲人和同事，也没有案子的涉及者向我提出任何要求，只有这些机械地来倒咖啡和把杯碟收走的空中小姐？

我是不是不愿意一个人去阿维南马群岛，才这样抱怨一路上

没有人聊天？但这和平常一个人上班、下班在路上没有人说话不是一样吗？我不是时时刻刻都有人陪伴的嘛！我是不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出任科长这一职务？是不是我该考虑再生一个孩子？

我们有时是考虑过再给依旦生一个小妹妹，但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可能再把工作搁下的。我的姐姐们经常絮絮叨叨地说什么独生子女容易养成自私孤僻的性格，但据我自己的观察，她们的论调是错误的。

飞机转向南方，升起的太阳在我前面像一朵炸开的七彩礼花，这礼花的色彩连着天空和大海，赶走了死气沉沉的灰色，染上了一层金黄、湛蓝色，中间还夹着花岗岩的深红色。搭着遮阳篷的小船在波浪上起伏飘荡。阿维南马群岛的主岛已经出现在前方，飞机上的广播里通知说，五分钟后飞机就要在马里安哈米纳机场降落了。

我租的汽车已经在机场上等着了。开车去斯威因码头只有二十多公里路，摆渡船十点开，应该说我有时间到马里安哈米纳市中心去逛逛，但我还是愿意慢慢地开着车，观看沿途的风景。马路的两旁是枯黄了的田野和金黄色的森林，时而可以看见银光闪烁的大海，现在的海水是碧蓝色的。这里的房子大多数都是木质结构的。秋收后的农田已经收拾得平平整整，背阳的地方还留有白霜。

摆渡口附近的咖啡店已经关闭，也许他们只在夏天开放。一条废弃的驳船在泊船港里随波飘荡。海岸边不惧寒冷的野草还开着黄色的小花。开始起风了，我把大衣往紧里裹了裹。摆渡船“克尼泊”晚点七分钟，所以使我有充足的时间把码头附近的景色看了个够。我把汽车开到甲板上，然后爬到楼上的大厅里去。那里的乘客寥寥无几，他们都是准备到马里安哈米纳市中心去采购商品，然后再坐船回家的。

渡船噗噗噗地向东开去，沿途经过许多红岩小岛。我向北面望去。那里有许多别致的小岛，岛上有碎石海滩和被海风吹弯了腰的赤杨树，可以想像得到它们都是经历过多次秋季暴风雨的洗礼的。强劲的南风刮得渡船摇晃得厉害，但这没有关系，渡船是在岛群中迂回曲折地行驶。这些连绵不断的岛屿组成了岛的长城，突然，在这后面出现了迪格贝小村。渡船的桅杆稍稍从东北方向转向北方。航道上密密麻麻地插了许多航标，因为在小村的前面有暗礁。我把视线从岩石上移到水里，水面上有一对天鹅夫妇在游弋，它们通身洁白的羽毛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

小村散落在蜿蜒曲折的岸边，有红色的和淡黄色的村屋，还有灰白色的饭店。码头上停泊着几只帆船。小村的一景一物都显出了初冬的气息。我去取汽车。由于风大，船工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渡船靠到码头上。

开车穿过迪格贝只需要一分钟。小村中有本地的博物馆、商店、邮局、书店和秋季已经关闭了的小型高尔夫球场。从这里可以看到饭店的招牌，教堂比较远。加曲娜·休白格告诉过我比较有把握的寻找方法就是，沿着向东的那条路笔直地往前开。

“我的房子很难找，但我每个星期二上午都在弗格娄教堂里参加唱诗班的练习，为星期天做礼拜作准备。去那里很容易找到我，我们在那里见。”加曲娜·休白格是这么说的。从小村开出两公里后往右拐，通过了一座窄窄的小桥。那里有一群燕鸥越过海面，在寒风中抖擞着翅膀。

教堂的塔顶是陆地上的最好标记，在海上一公里多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我把汽车开进停车场，然后向山坡上的教堂走去。教堂的大门被重新油漆过了，那颜色与众不同，和远古时代的灰红色岩石的颜色一样。我走进大门，里面就是教堂的公共墓地。第一块墓碑上刻着的姓氏是休白格，名字是约翰·埃瑞克、爱马

奴尔和黑尔达·爱瑞加，他们会不会是加曲娜和米盖的亲戚?

墓地是一块小小的开阔地，很多墓碑的碑文都被青苔覆盖了，十字架也已被腐蚀了。有几块墓碑上还刻着锚或船的图案，躺在下面安息的人可能是领航员或者船长。我走向黄色的主门，但大门锁着。我就转到停车场那边去，路过了一块三米长的纪念碑，碑文是瑞典语的，那意思是：为大海献生的英灵永垂不朽。这里的红色花岗岩和瑞兹盖尔岛上的是一样的，太阳照得这些石头像要滴出血来似的。

我打开边门，这圣母玛丽娅教堂就好像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教堂一样。一走进这座古老的石头教堂，就有一种平安和被邀请的感觉。这里的一切已触及了我的灵魂，但我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自己信仰什么?我打开里面的门，走进一尘不染的弧型的亮着灯的礼拜堂。

我第一眼看见的是从房顶上垂吊下来的保佑船。管风琴里弹奏着我从未听过的乐曲。我不想打断加曲娜弹琴，便在边上找了个位置坐下。神坛上面挂着一幅字画，上面写的也是瑞典文，那意思是：求上帝和玛丽娅保佑我，树立起来的一切信念不要动摇。这座教堂最老的部分建于一三〇〇年，那是在宗教改革前，所以这幅字画上的祷文是那样地圣洁虔诚。我小时候常常为我的名字感到苦恼，因为这样的名字很容易被人联想到家里是有老奶奶的，并且是一个十分虔诚的教徒之家。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有“圣母玛丽娅”的外号，可我调皮得像男孩子一样，根本就没有一点文静圣洁的样子。我经常百思不解的是：我的父母亲都是无神论者，他们为什么给我取了这个十足的基督徒的名字?他们解释说，只是按传统习惯而已，因为我的奶奶和外婆都叫玛丽娅。

外面的太阳高高地悬在空中，但阳光照不进来。神坛的一侧有一个大烛台，烛台上插着参差不齐的蜡烛，这时都没有点燃。

靠墙边的一把椅子上放着盛蜡烛的箱子和一只小盒子，那是买蜡烛时往里扔钱的盒子。我从口袋里掏出五马克扔在小盒子里，然后从箱子里取出一枝蜡烛，随手划着火柴，这时我想，如果贝扎知道我点燃这枝蜡烛是为了悼念他，他会怎么想？他生前不相信这些，只相信自己，但他现在对别人的一切都能理解了。我想得入了神，火柴差点烧着手指，我赶快把蜡烛点燃，新的悲痛压抑了刚才手指被熏着的灼痛。

这时，管风琴的那首乐曲还没有完，等我插上蜡烛，才听到从琴台上传来“啼”的一声响，接着响起了加曲娜·休白格的声音：

“嗨！你已经来了。”

过了一会儿，她走进礼拜堂，过来和我握手，她那布满青筋的手握得很有力，夏天晒黑的皮肤还没有完全复原。她上身穿着厚毛衣，下身穿了一条有点褪色的黑缎裤子，脚上穿着灰色的毛袜子和笨重的皮靴，手臂上搭着油布风衣。

“欢迎你来弗格娄。你以前来过阿维南马群岛吗？”

“主岛上去过，但这里没有来过。你是不是教会里唱诗班的领唱？”

“正式的领唱休病假了，我是代替的。我们现在就走吗？走之前必须把蜡烛吹灭，这是火警安全规定的。”

我小心地把火焰吹灭，烛头上袅袅地升起一股青烟。教堂的门在我们身后“啪”的一声关上了。我在想，加曲娜信的是什么样的上帝？这上帝能赦免罪恶的杀人凶手吗？

我没话找话地问刚才看到的休白格的墓碑。

“他们都是我们的表亲。我们本家族的公墓地都在那边。你想不想看看？”

“当然。尤哈·麦瑞瓦拉要埋到这里来吗？”

“不，他是火化。我和米盖在这里已经安排好位置了。”

加曲娜把我带到公墓地尽头的石栅栏跟前，那里有一块最大的休白格墓碑，大约一米半宽两米高。它旁边有两块比较小一点的，一块墓碑上刻着麦瑞瓦拉公司的奠基人密加尔·约哈尼的名字，另一块上刻着马丁·麦瑞瓦拉的名字。最大的那块墓碑上刻着帆船和锚，下面埋着的是船长约翰的同胞兄弟、领航员达尼尔·休白格。

“达尼尔是我的爷爷，旁边的埃尔兰德和伊达是我的父母亲。他们的旁边将是我安息的地方。墓碑已经订好了。”加曲娜平心静气地说。在最大的那块墓碑前面有一束秋菊花，它们的叶子已经冻得发黑了。

“这里都是些很自信的上辈人，他们从来不遵守那些人为制定的法律。我们休白格家族在这个岛上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就像生活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在兵荒马乱时期，当船长的约翰走私军火到芬兰，领航员达尼尔则掩护那些走私酒的货船过关。你们的公墓地在哪里？”

我压根儿没有考虑过自己墓地的事，我们加里奥家族没有公墓地，安迪他们沙盖拉家族的公墓地还在维堡老家。

“你还这么年轻，我不应该问你这样的问题。”加曲娜抱歉地说，“当我知道我的尸骨被埋在什么地方以后，我心里就感到十分地踏实了，我的亡魂有了归宿。”加曲娜弯腰在公墓地的草坪上捡起两片枫树叶，“我家离这里有一公里半的路程。你的汽车里能不能装下我的自行车？”

我们俩把她的自行车塞进我租来的桑塔纳轿车的后备箱里，先沿路开向岛的中心，二百米后拐向了东北方向的一条狭窄的石子小路。在这条小路的尽头，坐落着一幢两层的红色木质结构的小楼。它建在离海岸约一百米的地方，楼后有一片树林保护着，

海风吹不到小楼，但从树林的间隙中能看见银光闪闪的大海。

“‘马池堡达’是我母亲留下的房子。她也是休白格家族的人，我们这个家族的人际关系实在是乱七八糟。”加曲娜从汽车里取出她的自行车，她那执拗的动作和米盖一模一样。

我们走进一间大房子，里面摆着一台织布机、一只大烤炉和一张桌子，这张桌子足可以坐下二十个人。墙上挂着作装饰用的鱼网、鱼具和一米半长的锚。一只老式的挂钟嘀嗒嘀嗒地走着，好像每一秒钟都要比普通的钟走得慢似的。由于房子大，加曲娜瘦削的体型看上去只有一米六的样子。

“你有什么问题就问吧。”我们正在脱外套时，她说。她给我一双毛袜子要我套到脚上，“你特地从埃司堡赶来，肯定是有要紧的事情。”

“在我进行正式审讯时，你同意录音吗？”

加曲娜没有表示反对，我就从旅行包里拿出录音机和两盘磁带。我对着录音带说了日期和时间。在这所宁静的百年老屋里进行审讯，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我有几个问题，先从一年前的事情说起。哈瑞·依冒宁在死前不久曾往这里打电话，想和米盖通话。哈瑞是怎么说的？”

加曲娜·休白格抬起手理了一下绒毛似的没有光泽的头发，眼睛里蒙上了一层雾，就像早晨的大海一样。

“这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我记不太准确了。只记得他要求尽快地和米盖联系。”

“他的心情怎么样？”

“完全不像他平时那样文质彬彬、温柔敦厚的样子。我见过他几次，所以我知道。这次打电话，他一反常态，急得火烧眉毛似地说，有十万火急的事情要告诉米盖。可我这个老糊涂竟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加曲娜叹了口气，眯起眼睛说，“也许是我

的罪过，把哈瑞打电话的事情忘掉了，所以我把他的死讯压了很长时间才告诉米盖。我怕他追究责任，怨我没有把哈瑞打电话的事及时转告他，所以说，我有时候也是个胆小鬼。如果我及时地把哈瑞的电话转告给米盖，也许米盖会阻止哈瑞自杀……这种自责一直折磨着我。”

“我不相信哈瑞是自杀。”我安慰她说。但就现在看来，如果她把电话及时转告了，也许会阻止哈瑞死亡事件的发生。

“他说是关于哪一方面的事情了吗？好好想想，这很重要。”

炉子上煮着的什么东西从锅里溢出来了，飘过来一股诱人的鱼汤香味。加曲娜把锅移到一边，她揭开锅盖搅了两下，然后说：

“这牵涉到尤哈，我记不住原话是怎么说的，但哈瑞急着要和米盖谈关于尤哈的事。”

“从尤哈·麦瑞瓦拉十岁起，你就认识他了。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加曲娜用木勺舀了一点汤品尝，没想到烫了她的嘴。过了一会儿，她才回答说：

“和他父亲一样，是个贪图享乐和固执己见的人。马丁是一个懒惰的人，所以生意做得清清淡淡。尤哈在这方面与他父亲不同，他是个贪得无厌的人。当他只有十二岁的时候就曾经对我说，等他长大成人后，要把母亲留给他的遗产全部投资出去。那时候我也是一个生意人，我知道他的这个设想是聪明的举措。他还认识到他的财产监护人不是他父亲，这对孩子而言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尤哈在很多方面和马丁相像，但他缺乏马丁的为人处世哲学。我就是凭这一点才爱上马丁的。”

加曲娜坐回到桌子旁，窗外的亮光照在她那久经风霜的脸上，此时此刻她的表情随着感情起伏不断变化着。我把录音机移

到跟前，在我听她讲家史时应该把录音机关掉，这些与瑞兹盖尔岛上的案子无关。但我认为从她的叙述中也许可以发现一点蛛丝马迹，有助于我进一步了解情况。

“米盖也是马丁的儿子，他继承了马丁的……用你们这一代人的话来说，是性感。他们爷俩都算不上英俊，但他们内在的魅力总是使我无法抗拒，这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是，当天平称失去平衡时，在另一端称盘里的小媳妇的希望和理想完全破灭后，她就不再需要什么性生活了。我不是一个能忍气吞声的人，我独自把米盖培养成人，他却非常任性地按自己的主观愿望去航海。我出钱让他航海，结果却使我自己很少能见上他的面。看来这是没有止境的。”加曲娜停了一下，直起腰说：

“大马哈鱼汤已经好了，我也正好饿了，咱们能不能一边吃，一边聊？”

我不能拒绝。她马上又骄傲地说，今天早晨天不亮她就到海边去买了一条活的大马哈鱼，回来就炖上了鱼汤。这汤又烫又稠，我尝了一点，味道确实是鲜美无比。她又拿出甜面包，按我这个芬兰东部人的口味来说，好像太甜了一点，但味道不错。我们把话题就转到了自己烹调的事务上。我忍不住地问她烤这种面包的配方。当我听说烤这种面包需要持续三天时，不禁吐了一下舌头。我想，也许安迪会有这样的耐心试一试。

“当我接纳马丁的时候，我就想这是命里注定的生活——丈夫已经有一个孩子，我肚子里又有了他的第二个孩子。夏天的时候，我看见芮佳也陪伴着一个年纪比她大许多的男人在小路上散步，她还没有考虑过该怎么走自己的生活道路，先是靠着尤哈，然后是达毕奥·浩勒玛，我就想以奶奶的身份跟她进行一次促膝谈心。那时候还没有发生凶杀事件。”

“你找她谈了吗？”

“在尤哈死之前，我对她说过，要从父亲家搬出去，先要学会过独立的生活，慢慢地才能适应过有丈夫和孩子的生活。我是有经验的过来人，可以说没有人能和我相处超过一个星期的，我忍受不了任何人，包括米盖。你喝咖啡吗?”

我们每人喝了三小杯咖啡后，接着审讯。

“你在第一次受审时说，在尤哈死的那天夜里有船来瑞兹盖尔岛，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那是几点钟？可能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这很难说，因为我睡得糊里糊涂。”加曲娜回避地说。

“你能确定来的是船吗？其他人都没有听见有船来过。”

“没有吗?”加曲娜的脸变得很不自然，“也许是我听错了，或许是在做梦，或许是我希望能听到船声——有外面的人来岛上，这样就可以把尤哈的谋杀案的罪名加到他身上去。”

“有人听到你夜里曾出来和米盖说话，这件事你从来没有提过。”

“没有吗？我说过我睡得迷迷糊糊的。”

我从文件箱里取出审讯记录的复印件，说：

“你说过，但你从来没有提起过出来的事，米盖也没有说过。”

“尤哈死后第二天我对你说过，我很累，也很紧张，也许我没能记住每一件事情。是的，我走出来过，碰到了米盖，他刚从‘兰达’船上回来，也许他是去检查船的情况。我们商量是不是早晨一早就动身，但我们还是想和安奈打声招呼再走，米盖还要和伊瑞、塞娅告别。”

加曲娜·休白格保证是在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应付我的提问，我不想再问那些她不想说的事了。我把话题重新转回到尤哈身上。

“如果我说是尤哈杀害了哈瑞·依冒宁，你有什么话说?”

加曲娜眯缝起眼睛，在矇眬的眼神后面显示出坚定固执的信念：

“我并不感到惊讶，但我要问，你根据什么这样说?”

“哈瑞已经搞清楚了尤哈利用瑞兹盖尔岛附近的水域，销毁了那些损坏了的有毒的油漆桶。一旦事情败露，尤哈就要被起诉为破坏环境保护，麦瑞瓦拉公司就要被吊销营业执照，还要揭露出尤哈把前苏联船舶管理局的有毒油漆改头换面为芬兰的生态油漆卖给立陶宛。”

加曲娜看着外面。太阳已经开始西斜了，阳光也跟着西斜了。

“如果你不想再喝咖啡了，我们就到岸边去走走，否则我吃过饭后要打瞌睡的。”

我犹豫了一下。我没有必要把录音机提着到岸边去，那里没有什么见证人，只是去散散步而已。我穿上风衣，用围巾把头包上，其实这没有必要，因为南风刮不到马池堡达这边的海岸来，向东延伸的崖壁把这边保护得很好。海上风平浪静，就像一个不慌不忙的老人，已经为自己的后事做好了一切安排似的。

“休白格—麦瑞瓦拉家族靠海生活的悠久历史，就像教堂的记载一样。”加曲娜说着向岸边的岩石走了几步，“大海对我们来说，就像你们内陆人的森林一样。它们都是生命生存的依靠，如果没有它们，生命也就不存在了。大海既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在海上行驶必须多加小心。我从来就不相信尤哈的生态学观点，但安奈和孩子们都信奉遵守。对尤哈来说，环境保护在市场经济中只是一碟小菜。当海鲜风靡期间，他就投机做捕具生意。”

加曲娜从地上捡起了一块拳头大的红色花岗岩石头，然后扔到海里去。海水清澈见底，一直可以看到沉到海底的石头的颜

色。

“我很难相信尤哈会对哈瑞起谋杀之心。你已经知道是怎么杀害的吗?”

我摇了摇头。同一个地方死了两个人，可以假设尤哈是打着去塔林出差的幌子，实际上是去瑞兹盖尔岛搞清楚哈瑞究竟知道多少底细。哈瑞是一个得理不让人的人，虽然他的心地非常善良，连一只蚊子都不肯伤害。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曾在野营帐篷里为一件事吵得很厉害，他一点都不让我。当他看见尤哈特地赶到岛上来，就已经意识到他的生命有危险了。可能哈瑞想敷衍了事地应付尤哈后脱身，他计划在第二天凌晨的破晓时分离开，没想到尤哈先下手为强，使哈瑞永远地留在瑞兹盖尔岛上了。

我把自己的推测讲给加曲娜听，她静静地看着大海。我走到水边蹲下，脱掉手套，把手伸进水里，这里的水比周末在英高的水要凉，最多只有五度。岸上的花岗岩石却和那里的一样暖和。

“伊瑞和他父亲就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但方向不一致。这就是命运的嘲弄。”加曲娜一字一句地说得很慢、很干脆，“安奈给我打电话，说那次火警的事，希望通过这件事能拯救这孩子的灵魂，不要再去参加那种大喊大叫的示威活动，有损于动物保护的名誉。我相信伊瑞是个真诚的孩子，但谁也不能像他那样只是生活在狭隘的叛逆精神的生活领域里。我能理解那些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年轻人。世界如此之大，真是无奇不有。我相信有许多人是在努力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我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掌撑在岩石上。码头就在二十米外，附近飘浮着两只浮标，就像停在那里的两只鱼船。无论潜水员身价多高，明天一定要派他们去瑞兹盖尔岛。还要发传真，对贝德斯和拉马那斯加斯施加压力，问他们知不知道三丁基氯化锡油漆罐的事。伊瑞和立陶宛人前年夏天都在瑞兹盖尔岛上，也许就是

他们和尤哈·麦瑞瓦拉一起把这些有毒的油漆罐扔进海里去的。

“这里是我母亲家族的女人们翘首等待男人们从海上回来的地方。一般情况下都能回来，但也会有意外。1950 年的冬天，我叔叔代倪尔的船翻了，一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才找到一个同船人的尸体。在严寒的冬天，水面都结冰了，是冰下的流水把尸体都带走了。”

加曲娜在我后面爬下来，离我只有几公分远，她倒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我反而本能地往后退了几步。加曲娜熟悉大海，她从岸边的岩石上滑下来的动作比尤哈利索得多。马池堡达的海岸上没有其他的房子，所以这里安静得只能听到呼呼的风声。加曲娜脚下滑了一下没有站稳，我猛然地转过身抓住了她的手，防止她栽到海里去。就在这一刹那，我发觉她害怕我多于我害怕她。

“你的脚没有扭伤吧？要不要回家去？”我有点大惊小怪地问。

“我没事，你怎么样？”加曲娜想装一个笑脸，但结果只是咧了咧嘴。她走到前面的岩石上，注视着那些隐约可见的陆地。最后，她抱起一块有她头那么大的石头扔到海里去，只听到扑通一声响，平静的海面上泛起一圈圈涟漪。

“旋转的石头不会浮在水面上。”她说着转过身看着我，她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

就在这时候，我明白了。

18

我从马池达堡给局里打电话，下了拘捕令。我对加曲娜说，等我离开后，你想通知米盖，那是徒劳，他那里已经有人去抓他了。加曲娜争辩说，她没有这种想法，尽管她心里很难过，但她不想包庇自己的儿子。她此时此刻的心情使我想起了一首配乐诗，是由芬兰的传统乐器卧琴[①]来伴奏的。诗中说一个谋杀亲兄弟的凶手，对母亲许诺道："什么时候乌鸦变成白色了，什么时候石头在水面旋转时，他就回来了。"

安迪以前在沙瑞高斯基的合唱团里唱过这样一首歌：

去到湖边
拾取鸟的羽毛和石头，
石头飘浮
是你儿子回家的日子。

引用这段歌词来对照米盖，每字每句都恰如其分。其他的人谁也不可能像他这样能对号入座。

我不想目睹此情此景。

---

① 有点像中国的扬琴，但不是击弦乐器，而是用手指拨弹的。

在我从斯威因开车去马里安哈米纳的途中，我得到消息说，米盖·休白格已经被抓住了。在拘捕他的时候，他没有反抗。

“我的飞机是七点差一刻到达，你派人来接我。今天晚上就开始审讯。”我在电话中对布包宁说。

现在这些事情都已经暴露无遗了。俄罗斯警察局传来消息说：三丁基氯化锡在前苏联的船舶管理局里被广泛运用于船底的油漆中。检查哈瑞的旧电脑的专家从硬盘里找到了一个资料库，其中有一篇报道是讲述三丁基氯化锡对海洋生物的危害：鱼类，贝类及其他软体动物。兽医学院和食品总局都反映说，米盖·休白格在初秋的时候去问过哈瑞·依冒宁拿来的死海贝和死海蟹的情况。

为什么尤哈·麦瑞瓦拉要把有毒的油漆罐藏在瑞兹盖尔岛上？其中的奥秘使我难以琢磨。那里是不是中转仓库？立陶宛人在那里重新包装，使产品改头换面？是不是那些损坏的油漆罐已经毫无疑问地沉入了瑞兹盖尔岛附近的水域？尤哈胆敢冒险把有毒的油漆冒充环保信得过产品卖到国外去，他是不是认为立陶宛不会对油漆做劳命伤财的检查？也许米盖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在机场的免税商店买了一瓶“拉夫劳爱加”，给依旦买了一个飞机模型的软塑玩具。坐在回来的班机上，我没有感到特别难受。西下的阳光照射在海平线上，就像给大自然架起了一座金色的桥梁。渐渐黑暗的天空战胜了大海的至高无上的权力。飞机中途降落在土尔库机场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这架飞机上的咖啡味道不错，我连喝了三杯，因为我不知道夜里还要持续战斗多久。如果米盖不承认，这一切就没有办法，警察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旁证材料。

维持秩序部门的密拉·沙斯达冒宁已经在机场等着我了。我快速地坐到前排的位子上，要密拉把警报器拉响。倒不是情况十

万火急，只是我想尽快地把了解到的情况转告给公诉人。

“听说了吗？今天白天动物保护革命组织的人在奥瑞昂制药厂门前示威游行，他们要求把做试验的动物全部释放了。”当我们的车拐上三环道维丁路时，密拉告诉我。

“没听说。情况怎么样？”

“最后情况失控，不得不使用催泪弹，抓了三十个人。如果都要关起来的话，铁窗里就实在太多了。阿基拉和一个示威游行的姑娘扭打起来，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

“傻瓜。”

“警官们认为这样会促使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敌对情绪更加激烈。”密拉说得很含蓄，没有暴露他自己的观点。我是属于“警官们”的行列，但也许密拉知道，我的观点总是和他们这些大小伙子不一样。我不想赞同哪一边而反对另一边。

“你去芬兰湾抓米盖·休白格了吗？”

密拉说他在奥瑞昂制药厂前面维持秩序。晚上，警察局大楼里非常安静。我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脱了风衣，整理了一下麦瑞瓦拉案件的所有资料。布斯特亚勒威悄悄地走进来说，他是来为审讯作旁证人的。我吩咐他把米盖·休白格带到第二审讯室去。我走进卫生间往脸上扑了些粉，把嘴唇抹得红红的，把眉毛描得浓浓的，有些怒气冲天的样子。我给自己许诺：回家后要喝半瓶“拉夫劳爱加”！

“现在案子可以破了吗？”在我们去第二审讯室的路上，布斯特亚勒威问。

“也许。看吧，怎么样从这个人身上突破。”

米盖已经等在审讯室里了，他像小学生似地站起来向我们打招呼。他的脸色苍白，目光呆滞，表情无奈。他虽然和我握了手，但他并不看我。他坐在桌子边的沙发上，刚好在我椅子的对

面。布斯特亚勒威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显得很高兴。

“你想喝点什么吗？咖啡、茶，还是柠檬水？”我在坐下之前问。米盖什么也不喝。他身上还是穿着那件和我一起航海时穿的浅灰色的毛衣，但他现在好像显得很冷。

“在拘捕你的时候肯定已经对你说过了，在审讯时你有权利聘请一位助理。你想和什么人联系吗？我们的审讯可以延迟开始，直到你的助理到来。”

“谢谢，我不想请什么助理。”

“你被带到这里来受审的原因是，你有在今年的十月四日和五日间的夜里谋杀你同父异母的哥哥尤哈·麦瑞瓦拉的嫌疑。在早些时候，你争辩说你是无罪的，你声明在发现你哥哥的尸体前，你一直在睡觉。现在你想说些别的什么吗？”

米盖脸上的肌肉颤动了一下，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点了点头。我不急于催促他说话。两分钟后，他终于找到了能表达的语言：

“在你们来的那一天我已经知道，这是最好的解脱。当我们一起去瑞兹盖尔岛，你要我重新示范一次怎样滑下岩石去到尤哈尸体旁的第二天夜里，我就想逃跑的，也许在逃跑的途中会被活捉，那时候我就会说，是我杀害了尤哈。”

“最终你是逃脱不了法网的。”

“也许可以。我的目的并不想隐姓埋名地生活在南美洲的哪个角落里，我只是想驾着‘兰达’去遭遇一次大风暴，然后舟沉人亡。我不想背着谋杀哥哥的罪名继续活下去了。”

米盖用手撑在太阳穴上，那些指关节都因失血而变白了。他离我是这么近，如果我不怕遇到麻烦的话，我真想越过这张窄窄的桌子去抚摸他。

“我承认我抱有一种幻想，总希望你们能抓到另外一个什么

人。也许我还有一种侥幸的心理，认为你们不会坚持要证实尤哈的死是谋杀。”

“这话怎么讲？说出来也许可以减刑。”

米盖抬起头，一直向我的背后看去。我知道那里什么也没有，除了白色的墙。

“你知道尤哈杀害了哈瑞。”

“这我已经有了结论。你是怎么调查落实的？”

夏天的时候，米盖在哈瑞的电脑里发现了三丁基氯化锡的资料，他的疑惑立刻变得清晰了。他开始调查哈瑞之死的前前后后的情况。塞娅告诉了他死海蟹的情况，加曲娜则告诉了他哈瑞打电话的事。落实麦瑞瓦拉公司的那些造假材料要通过马古斯·恩克尔，但那是不用费吹灰之力的，因为叔叔已经记不得米盖不是公司的股东了。

马来·诺斯曲姆的股份事件纯属一个骗局。尤哈并没有像他自己所想像的那么容易地骗过公司里的人。兼审计的经济经理哈罗宁早就已经开始感到蹊跷了：为什么不给这个公司分配红利——马来·诺斯曲姆公司进口生态油漆的原料和前苏联船舶管理局的属于废料级的三丁基氯化锡油漆。米盖也不知道为什么尤哈决定把这些有毒的油漆罐埋在自己的草坪下面。

“在安奈的生日晚宴上，我们都喝了过量的酒，我就问尤哈关于哈瑞和三丁基氯化锡油漆的事，但他什么也不承认，我就没有足够的证据向警察报案。我自己的主观愿望还是想到国外去。我想把母亲送回阿维南马群岛后再返回埃司堡，找两个认识的潜水员，对瑞兹盖尔岛的海底做一番调查，但困扰我的是不知道三丁基氯化锡油漆具体沉入的地方，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毒量。”

接下来米盖说，他去过船上。从船上回来后，他同母亲说了一会儿话。当他看见尤哈出去时，他就紧跟着出去了。

“你明天就要走了，小兄弟。你是不是能够理智一点，把哈瑞和有毒油漆的事统统忘掉?”尤哈脸上露着酒鬼的那种狂妄自大的狞笑说，“在哈瑞的祭日必须有纪念的表示，我要到他尸体发现的地方去撒泡尿。”

这句话把米盖惹急了，他狠狠地揍了尤哈一拳，打得他往后退了好几步，然后米盖转身就向岸边走去。当尤哈站在悬崖上肆无忌惮地向海里稀里哗啦地撒尿时，米盖气愤地告诉尤哈，他不走了，他一定要把含有三丁基氯化锡的油漆罐找到。

“不要威胁我，我的兄弟。你是不是想步哈瑞的后尘?”尤哈恶狠狠地威胁道。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睛瞪得大大的。

“怎么叫步哈瑞的后尘?”

“他和你刚才说的一样，要把这事情搞个水落石出，我就处理了这个好管闲事的家伙。我先是和他谈条件，给他涨五倍工资，要他把这件事彻底忘掉，但他不同意，那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了。这不是可以效仿的事，不要再提油漆罐的事了。像这样操蛋的问题还多着呢，譬如像芬兰的农业和巴底亚的工业上不去，这都能怪东海吗？我现在他妈的才认识到杀了依冒宁纯属多余，因为如果他去告发油漆罐和死海贝的事，警察会笑话他的。”

米盖模仿尤哈的声音惟妙惟肖，使我不得不刮目相看这个坐在我面前的健壮英俊、从容自信的男人。

“那时候我和尤哈殴打起来，两个人都像发了疯似的。我用尤哈杀害哈瑞的同样方法杀害了尤哈。我实在是气愤到了极点才一时冲动所致。尤哈比我重二十公斤，但他的体力不及我，而且醉得比我厉害。他刚开始时占上风，差一点把我打死，我手里拿着古铜手提照明灯，我用这灯砸他，他倒下了，滚了几下后就从悬崖上坠入海里去了。”

米盖站在那儿盯着海里发了一会儿呆，然后他迅速地离开了

现场。他把手提灯拿到岛的另一边海岸，往灯里塞满碎石子，然后把它沉到了大海里。那天夜里他一直没有睡着，他在等待尤哈拖着沉重的步履回来。

“但他没有回来。早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就跑回岸边去看，我究竟干了什么？尤哈浮在海面上死了。不由分说我把他拖上岸来，然后说我是刚刚发现他的。”

“加曲娜猜到事情的真相了吗？”

“她没说什么，但我想她已经猜到了。”

当我问加曲娜时，她闭口不说她是怎么知道米盖杀害尤哈的。这是明智的，因为在这种案子中，她很有可能被起诉为同谋犯。但加曲娜问起过米盖将判什么样的罪刑。

我不能说我的估计，因为我还不知道问题的实质，到底是谋杀、仇杀，还是误杀？

布斯特亚勒威坐在沙发上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能不能休息一会儿？我实在饿得他娘的受不了了，我回办公室去拿点吃的。”

“好吧，顺便给我们端两杯茶来。这里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呢。”

门在布斯特亚勒威身后合上后，米盖第一次抬眼看我，我尽力回避他的眼睛。

“你让我走吧，我不能忍受没有大海的监狱生活，我会像刚才说的那样，驾着‘兰达’去迎接大风暴，然后与船同归于尽。你有权力网开一面的。”

“我不能这样做。”我失控地吼道。如果那样做了，我就再也当不成警察了。

如果斯切姆不自杀，也许他会考虑这样做的。现在我真正感到他的自杀是多么的不值得。如果他还活着，米盖可能就会免遭

多年的牢狱生涯。

“你不会结束海上生活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你是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减刑。”

“我已经给自己判了死刑，因为我不想苟且偷生。”

“那你就错了。”

“我如何面对安奈和孩子们?”

“这不是我的事情，留到明天再说。”

“我必须自己面对这一切。”米盖说完把脸埋到两手中。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正要搂抱他时，布斯特亚勒威进来了。

由于米盖在审讯中合作得很好，所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八点半时，我们已经审讯完了。

“现在干什么？我回囚房吗?”他问。我正对着录音机在说审讯的结束语。

“是的，明天我要和公诉人谈话。星期四他可以决定判刑的尺度。”

我自己思量着最好是对公诉人这么说，米盖威胁说要逃跑后自杀。我不知道这么说的后果是背叛朋友还是保护朋友，如果米盖可以得到无罪释放，那就要防止他在判决前采取自杀的措施。

“那么……他们突然把我从‘兰达’船上抓来，我什么东西也没有拿，能不能回去取点日用品?”

我不能不同意。布斯特亚勒威跟着米盖一起到拘留所去取了外套和船上的钥匙。我在这时候则去开了一辆局里的公车，做好准备。我决定自己开车，因为我不想和米盖并排坐在后座上。

布斯特亚勒威在汽车的收音机上选择频道。他找到了流行歌曲《黑海和水手》，歌词的大意是：“我干我所想干的事，钱赚得很多，可我再也找不到家乡的码头，在我内心深深地埋葬了一切，黑暗和邪恶，忧郁和坚强。”

“他妈的关掉！”我说着，自己伸手把按钮关了。布斯特亚勒威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都说你喜欢流行歌曲。”布斯特亚勒威讨好地说。

“我不喜欢这首歌。”我的声音嘶哑了。

一路上我再也没有说话。到了码头，我不能和米盖一起到“兰达”船上去，就由布斯特亚勒威跟着他去。我坐在汽车里等在岸上。我没有朝码头的方向看，所以我没有看清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到扑通一声响，布斯特亚勒威就已经掉进海里去了。我冲出汽车，但米盖早有预谋地关上了网状的栅栏门。栅栏有两米高，网间空隙很小，我穿着圆头的高跟皮鞋，很费劲地把脚伸进网眼里慢慢地往上爬。我看见米盖割断了缆绳，我听见布斯特亚勒威在水中正挣扎着往岸边游来。我爬到栅栏的顶部，考虑了一秒钟，敢不敢往下跳？

“米盖，别干蠢事！我们会抓住你的！”我的喊声盖过了马达的启动声。我搜遍了所有口袋，没有带枪，即使带了，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帮不上忙的。手机找到了，我向海上侦缉队和水上警察发出紧急呼救，要他们派一艘船到芬兰湾海港码头来接我。

“一个小小的要自杀的平头百姓，值得这么样兴师动众吗？”一个执勤员怀疑地问。

“你现在就按我的命令办！”我在摇晃的栅栏上大声地说。我对自己有这样发号施令的权力感到满意。我也奇怪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满足感。米盖一定要活捉。“通知海上侦缉队，派一架直升飞机！”

布斯特亚勒威自己从水里爬上岸来。当我从栅栏上跳下来时，他一边拧着衣服上的水，一边喘着气说：

“我根本没有警惕到这儿有危险。他在一串钥匙中正找着栅栏门的钥匙，突然他出其不意地往我肋骨上狠推一把，我就掉进

海里去了。”

“不要解释了。他肯定会被抓住的。”我安慰他说。我从汽车后面的货箱里找出毯子和备用的工作服递给他。

“这是他早就策划好的脱身之计。”

布斯特亚勒威回家暖和身子去了，我仍在漆黑的岸边瑟瑟发抖。我尝试着给“兰达”船上打电话，但他不接。岸边的水里发出喀喀嚓嚓的响声，水面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星星在漆黑的水面上空闪烁着。警察在一刻钟之内赶到了。我跳上船，穿上救身背心，我们就沿着航道向大海驶去。当陆地上的灯光渐渐消失后，海面上是伸手不见五指，好像十月底的夜晚本该这样黑暗似的。天空中一弯小小的弦月，散发着微弱的亮光。

海上侦缉队的巡逻艇分别从山达哈米纳和勃勒加拉出发，搜寻米盖的“兰达”船；同时，急救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水上还有我们局里的三艘警船。“兰达”船上的发动机和这些船上的发动机比起来，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米盖根本没有可能逃脱，虽然黑暗对他比较有利，但想冲破这天罗地网，那是痴心妄想。我对海上侦缉队说，要认准“兰达”船的标记，全力以赴地把米盖捉拿归案。

“我认为他是向大海方向驶去了。”一个同伴对埃司堡和勃勒加拉半岛之间的岛屿情况非常熟悉，但帆船不及小划船和摩托艇那么容易在岛屿间穿梭。

“休白格被抓是因为谋杀嫌疑，他对别人有没有危险？”

“没有。只是对他自己有危险，所以情况很紧急。”我紧接着说。

“噢，是这样。休白格船上的厨房里是什么样的炉子？”

“液化气灶。”我喃喃地说。这时，我听到直升飞机已经在我们上空盘旋，探照灯在水面上搜索，但搜到之处都是空的。海上

侦缉队的一艘快艇驶到我们旁边报告说，“兰达”船在斯道拉乐逶岛的东边被发现，米盖企图直接南下。

我们改变航向，向东驶去。直升飞机的隆隆声重新大作，现在已经增加到两架了。它们打的探照灯有时正好把我们夹在中间。它们接到命令后也向东飞去。瑞兹盖尔岛上的灯塔发出微弱的灯光，照射在天空中。离几公里远我就看见直升飞机在空中停住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向船上报告：“兰达”船和米盖·休白格都已找到。我们立即加速前进。这时从北边又来了一艘警船，他们的目标和我们是一致的。我们用了十分钟就把“兰达”团团包围住了。在探照灯的照射下，我认出了站在船的甲板上的一个男人的影子，但我看不清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邻区船上的巡警问，这人是不是有手枪?”报话器里问。

“我不知道。他们想到‘兰达’船上去吗?”我嘱咐他们一定要小心谨慎。

我们的船慢慢地缩小了包围圈，把“兰达”紧紧地封锁在中间。直升飞机接到命令撤回去了。围船中有邻区的一艘船和埃司堡的三艘船。我拿起了麦克风：

“休白格，我们是来抓你的，把手举起来，我们的船就在你的旁边。”

米盖没有执行命令，他只举起一只手，手里提着一只汽油桶，桶的盖子已经打开，他慢慢地把汽油倒在甲板上，倒了长长的一溜，然后用盖过突突突的马达声的声音大声说：

“如果你们有人敢过来，我就把船炸毁！液化气罐的盖子已经打开了。”

“给我望远镜。”我用报话器说。我冻得直发抖，手拿不稳望远镜，所以很难看准确。米盖站在甲板上，头戴滑雪帽，一直压到眉毛上，两只耳朵红红的。一只十升的汽油桶正拿在手上。我

看见汽油在深色发亮的甲板上流淌着，我还看见米盖的不屈不挠的脸和眼睛，那眼睛里是可怕的无底深渊；我还看见他的另一只手里拿着打火机，那是当埃司堡的三号船开始移动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掏出来的。我还没有喊出下面的话来，就感到我们的船一阵剧烈地摇晃，原来是三号船靠到我们船的边上来了。

“犯罪侦缉科的高级警察加里奥是不是在这里？”水上巡警高级警察拉迪奥问。他是一个大胡子朋友，今天由他负责整体追捕工作。“你到这边船上来，我们商量一下。”他建议说，然后把手伸过来让我抓住，我跳到埃司堡三号船的甲板上的笨拙样子，好像我从来没在船上呆过似的。我快冻僵了，我的手几乎不能活动了。进到船舱里是多么的暖和啊。

“你认为休白格真会那么干吗？”拉迪奥问。他让我坐下，但我这阵子坐不住，我宁愿站在船舱的窗口前一直看着“兰达”船。

“我认为他会，他在受审时已经说过，他考虑要自杀。让我再试试和他对对话。”

拉迪奥把麦克风递给我。我又回到甲板上，埃司堡的二号船已经从三号船这边开到另一边去了。我惊喜地辨认出高依吾在甲板上，我向他招招手，他也向我招招手。

“米盖，”我的声音在光斑点缀的海面上传向四面八方，“我是玛丽娅，你离开‘兰达’到这边来！”我看见他摇了摇头。

“你带着手机吗？”

这一次他点了点头。

“到船舱里拿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在电话里对话。”

米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把汽油桶放到甲板上，进船舱去了。我拿起电话，等米盖回到甲板上，我立刻按了“兰达”船上的电话号码。我走到埃司堡三号船的船头，用一只手挡在嘴

上保护声音。我小心翼翼地坐到甲板上，一股寒流立刻直刺我的脊梁骨。电话铃响了四下后，米盖接电话了：

“我还是那句话，你让我走！”

“不行！这一点你自己是很清楚的。听着，你可能被起诉为纯属正当防卫而伤人命，判刑不会重，只是短期徒刑而已；再说你是第一次，不至于让你坐一辈子牢。你有财产，可以聘最棒的律师，你不会判终身监禁的。”

“但我知道杀害哥哥是要判终身监禁的。”

“你是自卫反击，如果你不这么干，尤哈就会把你杀了。”

米盖没有话说了。我看见他坐到木箱上，靠在船舵的旁边，然后声音嘶哑地问：

“你自己杀过人吗？我的意思是由于你工作性质的缘故！”

“没有，但有一次差一点儿，我打枪没有瞄准。”

“后来怎么样？”

“那人瞎了一只眼睛。”

“他自我防卫了吗？”

“他还是我？如果有必要，我还会这样做。”

“那人没有死吗？你能不受良心的谴责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吗？”

“不能，但我还是坚持活着。你也一样，要坚持活着。你要原谅自己，大海还在等着你。”

我说这些话的语气就像对依旦说话一样。每当女儿在半夜里从噩梦中惊醒，我就这么哄她。或许这不会像安慰孩子那么有效，或许非要我亲自去“兰达”船上不可。我吩咐米盖一直把电话机开着，我自己在手机上按了暂停键。我走进船舱，发现高依吾在那里。

“我们能不能派人到休白格的船上去？”我问拉迪奥。

“太危险了。”

“你不要去！”高依吾和拉迪奥异口同声地说。当高依吾抓住我的手臂时，我已经清醒了，即使有人命令我到“兰达”船上去，我也不能去。那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时刻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我现在还要为我深爱的依旦和安迪着想。我不能死，我要活着。

“我继续用电话和他对话。从哪方面击破比较容易些？试试看，能不能和加曲娜·休白格联系上？”我对高依吾说，“她也许会切合实际地说服她的儿子。”我想让休白格同意埃司堡三号船靠近他的“兰达”船。

我又走出去，看见米盖还在木箱上坐着，我打开手机，告诉他我们的船想靠近他的船。他“腾”的一下弹起来，冲到船头的甲板上，打着打火机，把火焰拧到最大。

“让我走！”他绝望地大声喊道。

“不行！把打火机扔到海里去！”我还是耐心地劝说着。这时埃司堡三号船正一公分一公分地向“兰达”船靠近。我呼出的气在手机的周围都成了白雾，但我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冷。

“休白格夫人不在家。”高依吾在船舱门口说。我知道没有援兵了。在米盖和死亡之间只有我一个人了，就这一公分长的火焰，可以立刻使我前功尽弃。

埃司堡三号船已经离“兰达”船只有五米远了。在探照灯的强烈光线下，我可以清楚地看到米盖脸上的酒窝。我望着他的眼睛，与他的目光相对。

“我们给你放下一只橡皮船，你把打火机扔到水里去，‘兰达’船一定要保护好，你还要去航海许多次。”我用鼓励的语气对他说。他听着电话，两只眼睛一直盯着我的眼睛看。

“你要明白，承受群众的舆论，本身就是一种惩罚。尤哈要

杀害你，但你就偏要活着，不要轻易地放弃这来之不易的生命!”

米盖像是看透了我，他一把将电话扔进海里，随手提起汽油桶递到另一只手里，然后把它倒过来，我看见火焰“轰”的一声蹿了起来。

熊熊烈火急速地往大海里蹿。米盖顺着火势跳进了大海，急得我大声地喊叫起来。我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来回转，但我没有跳下去，我看见一个全副武装的潜水员已站在那里，等米盖憋得通红的脸露出水面时，他从身上褪下毛毯，一骨碌地翻到水里去了。

“米盖!”我声嘶力竭地喊道。他开始向我们的船游过来了。我放下船头的梯子，顺着梯子下去，把这个徘徊在死亡线上的人拉到甲板上来。我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他冻得像打摆子似地全身发抖。他像孩子似地哭了，眼泪滴在我身上。突然，我感到他的身体比刚才颤动得更厉害了，他的哭已经变成大笑了。

探照灯熄灭了，我们周围又变成一片漆黑的世界。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地面和海面上都结起一层薄冰。不知是谁给我们盖上了一条毛毯。我一直搂着米盖，直到他歇斯底里的狂笑平息后，我才把他松开，命令他到船舱里去把湿衣服脱掉。

埃司堡二号船上的警察从“兰达”船上给米盖拿了些衣服来。我征得拉迪奥的同意，把“兰达”船拖到了芬兰湾去。警船把高依吾、我和米盖送到了马瑞码头，那里有警车等着我们，我们坐进了后座。平时米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但现在他很安静。我问他要不要看医生或者心理专家，他回答说不要。过了一会儿，他很不好意思地说，想给他妈妈打个电话。

“这个要求我们可以满足的。”我许诺说。我们到达局里的停车场后，我提议到我的办公室去打电话。高依吾看了我们俩一眼后，问，需不需要他一起去？我说不要。他说正好，他可以去完

成埃·哈依·阿沙达案子的报告。

我把米盖带到办公室，按了加曲娜的电话号码，然后把听筒递给米盖。他以出奇平静的语调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加曲娜答应明天早晨坐飞机过来看他。

我把听筒放回电话机上后，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要把米盖送进牢房，我心里很难过，但我无法扭转乾坤。我又一次问他想不想和什么人谈话。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轻轻地说，“你再抱我一会儿，然后我就走。”

我疾步走到沙发前，在米盖身旁坐下，把他紧紧地搂到怀里。我闻到在他身上的汽油味中，夹杂着我熟悉的烟斗的香味。他那麦茬似的头发扎得我脸上痒痒的；他的手臂很光滑，也很结实。几分钟后，米盖放开我，看着我的眼睛说：

“不能再错上加错了，因为你是警察……”

我对他轻蔑地“哼”了一声，这比保持沉默要好些。他也同样用轻蔑的一“哼”回敬了我。然后他告诉我，他已做好了走的准备。我叫一个值班警察来把他带到拘留所去。

“你会来看我吗?”我们等在办公室门口时，他问。

“会的。可能明天就会见面。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和我一起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安奈和孩子们。”

值班警察来了，我又一次拥抱了米盖。回到办公室里去后，我从包里拿出“拉夫劳爱加”酒瓶，在咖啡杯里倒了满满一杯，然后一饮而尽。我用粉饼盒里的小镜子照了照自己，奇怪地感到自己的脸还和原来的一样。可我不能破坏自己的家庭。我必须正确对待两件事，一是端正对贝蒂·斯切姆的看法；二是要驱赶自己灵魂深处的邪念。到案情终结，我还要和米盖见许多次面，但那只能是为了说明一些情况而已。

我又喝了一杯酒，然后走出去，敲了敲高依吾办公室的门，推开门道：

“高依吾!”我的声音已经像稠稀饭一样了。

“听着，高依吾，送我回家。”